

國見聞錄

著 諾 斯 · 美

譯 社 譯 編 光 星



194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8716B

中國見聞錄

美·斯·諾 著
星光編譯社 譯



香港星光出版社

1941

中國見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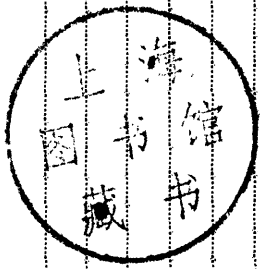
目錄

第一章 從北平到上海

- 一、亡命者.....一
- 二、一個紳士和一個流氓.....六
- 三、七·七.....三
- 四、華北前線.....七
- 五、中國的防禦力.....三
- 六、上海戰事目觀記.....三

第二章 從上海到漢口

- 一、沒有領袖的上海.....四
- 二、戰場憑弔.....四
- 三、艾利這個人.....四



四、工業合作社的誕生

五

第三章 南部前線

一、政治一瞥

六

二、蔣委員長

六

三、爭訟的遺產

六

四、『亡失』的紅軍

六

五、人民的軍隊

六

六、香港的插曲

七

第四章 一條舐吮自己創傷的蛟龍

一、月光和炸彈

三

二、自由中國的基礎

三

三、生產的貧乏

七

四、中國的主力

四

第五章 中國的『工合綫』

一、一個理想的史詩	一四
二、國民黨和官僚政治	一五
三、成都和赴成都途中	一六
四、中國艱苦的建設者	一六
五、明日的希望	一七

第六章 回到西北

一、中國的激流	一八
二、邊區政府	一四
三、兩中之旅	二〇
四、延安的重聚	二〇
五、女壯士的大學	二五

第七章 紅色的戰略

一、紅色預言家	二二
二、中國紅軍和蘇維埃戰略	二〇
三、紅星在新疆?	二六

四、一個縣長的教訓 二四

五、民主政治的實驗 二九

第八章 在日 後

一、遊擊工業 二五

二、八路軍 二六

三、遊擊隊的作戰效力 二七

四、團結還是毀滅？ 二六

第九章 帝國或民主

一、自由中國的希望 二六

二、日本的命運 二五

三、上帝要毀滅誰？ 二七

四、可能發生的事情 三七

譯校後記

第一章 從北平到上海

一七 命者

爲要征服世界，我們應先征服中國——田中奏摺

日軍佔領北平以後，離去太晚的人們遂有爭先恐後之感了。過去誤認爲安全的這座古城，現在却成爲一個籠子。劫數到了；人民彷彿是待決的囚犯。

日軍交給改組了的偽警一張單子，上面列有國民黨員、過激份子和各色愛國者的名字，這都是他們所要逮捕的，於是警察暗中通知許多人逃走。但高重的城門爲日軍嚴密防守，並且已有兩個多星期沒有開往天津的火車。逃難者在白天改變住處，在夜間商議脫離這座「死城」的辦法。報紙被禁，人民以謠言度日。

一位中國著名的大學教授，找到我的住處，問我可否請求英大使館「保障反日知識份子的安全。」他覺得這是可能的，因爲聽說英大使館曾勸告宋哲元將軍把北平城和平地交給日軍。一個燕京大學的我舊日的學生跑來問我，是否美國水兵預備「按照九國公約」保衛北平。另一北大的學生慌張地跑來，因爲他不能出城去參加遊擊隊。他問我，英美當局能否用他們的軍用汽車把反日的學生送去西山。許多大學教授抱有這樣

的樂觀，美國和英國現在就要同日本絕交了，因為日本已經違反她應盡的國際條約義務。當我告訴他們，任何政府都不能給中國以有效的幫助，美國政府且將在戰爭中繼續武裝日本，他們都吃驚了。此後若干年將給無數萬中國人以一種政治教育了。

我在北平已經安適地住過四個年頭，在那裏我一貫地受到和善的待遇，爲要表示我對於那些朋友們的謝意，我總可以作一點事情。我與一個瑞典的經紀人同住在一個大院子裏，院中有許多空地，不久便爲政治亡命者填滿了。東北大學的校長住在靠大門一間房裏，一個僞警每天來把日軍最近活動的消息通知他。半打別的人散住院中各角落，一得到逃走的机会便離開了。我擔心隨時有被搜查的可能。

在日軍到達以前，北平頗感住處缺乏，但現在各方面都願把房子給我住，所要索取的租金少得可笑，有的完全不索租金。日人正在估據最好的住宅，有外國人居住是唯一的保障。大家忽然都要捨棄他們的收音機了，因爲日人把收音機的主人當作共產黨看待。而最可憐的是學生們，他們不忍毀掉他們的書籍，於是來要求我把他們的書籍埋在我的院中，『以待北平的收復。』

一個星期後，有一些學生不來了。少數爲日人捉去，多數由城牆上逃走。當他們爬城的時候，警察故意轉過背來。照這樣子，他們一小羣一小羣地經過頤和園到西山去了，他們開始在那裏組織農民，從事遊擊戰。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日軍轟炸那些小山，想藉此排除逐漸增加的危害。他們直到現在還在那裏轟炸呢。

一天下午，在落着夏天的大雨的時候，一個姓吳的中國青年進了我的門，從他那剃光的頭上滴着雨和汗，大大地笑開了嘴。他拿有我的老朋友張玉聲的名片。張玉聲原是東北的官吏，現在城外率領一個遊擊隊。他告

訴我，幾天以前，他們『佔領』了西郊陸軍監獄。他們繳了中國衛兵的械，取得所有的槍械和子彈，把幾乎全體
的犯人（大多數是政治犯）招入他們的新軍隊。這是一個計劃周密的暴動。他們都逃脫了——連同那些衛
兵——在日人到達當地之前。

但吳的心中有一個問題。他說，他的隊伍——後來趙侗所指揮的軍隊的一部分——掘了妙峯山附近一
個前清皇室的墳墓。他們預料，如果他們不掘，不過幾小時，日本人也要掘的。他們因此得到許多金珠寶石，假如
他們能賣掉這些寶物，便可以用來武裝和給養他們的隊伍。吳想知道，美國政府肯否收買這些東西。當我鄭重
地表示困難時，他便十分失望了，於是問我有什麼辦法。

『護庇反日團體』（日本發言人慣用的一句話）是一件事，救濟政治亡命者也是別國人所不能拒絕
的一種工作。至於幫助賣出『抗日戰利品』，即使把它看作合法的，也是完全另外一件事了。我很怕美國大使
館會不高興這種事，至於我的報館，雖然在這類事上是極端開通的，也會覺得照這樣採取一件會由別人寫出
來的新聞未免過當。

但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幾天以前，一個遊擊隊的隊伍從西山的修道院中捉去幾個義大利的教士，並向北
平的日軍當局提出贖款的條件。他們的目的不僅使日人在別國人眼中丟臉，他們也非常需要現金來為他們
那挨餓的戰士們購買食物。我疑心吳君知道這件事，我猜對了。他承認他的伙伴們把這幾個義大利人拘留在
妙峯山附近。

『這樣作法是不能博得外國人對於中國的同情的，』我說。『假如你們不要被人看作土匪，你們最好即

刻釋放那些教士。」

「但教士們與日軍勾結，」吳辯白道。「他們設宴款待日本軍官。他們把我們的行動報告日軍，後來日人燒掉我們用作遊擊隊根據地的村子。義大利人承認滿洲國，又簽訂反共協約。他們不是日本的法西斯同盟者嗎？」

我雖然是一個天主教徒，但因我在中國住得頗久，所以能瞭解中國人的這種見解，於是我用了一點鐘的時間向吳解釋，他們應當注意海外不利宣傳的影響。最後他彷彿同意了。我告訴他，假如他們釋放他們的俘虜，我可以為他們的寶物尋得一個市場。他帶着這意見走了。

我很懷疑我的意見能否發生效果，但過了不久，這幾個教士居然得到釋放，並且安然地回來了。據我所知道的，此後遊擊隊永不會重犯這一類的錯誤。相反的，他們一旦得到政治領導權，他們便與全國各地的教士們建立友誼的關係。

幾天以後，當我期待吳的回來時，一位教授夫人由電話中請我吃飯。我去了，在我們談過半點鐘以後，一個留有長剪髮的中國婦人，帶着一副深黑色的眼鏡，走進房中來。她的神氣是稔熟的，但我一時認不出來。後來，她脫下眼鏡，笑着向我招呼道：「斯諾同志，你不認識我！」這並不希奇，因為她是我要在北平會見的最後一個女人，也正是日人所要捉拿的最先一個。她是鄧穎超，前中國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周恩來的夫人，中國共產黨婦女部的部長。穎超是我所遇見的中国婦女中具有最銳敏的政治頭腦的一個。

「我以為你還在陝西呢！」

穎超對我說明，她於五個月前潛來西山療養。她的樣子比我一年前見她時好多了，她那時正患着長征時得到的肺病，蒼白、瘦削，躺在保安的陽光中。這一次住在一個荒遠的廟中，得到好的飲食和休息，加以北方乾爽的春天，她顯然痊愈了。直到日人臨近她所住的廟，她於發生的戰事是一無所知的；她扮成一個農婦，穿過日人的防線，逃來北平，幾乎喪掉性命。（參看婦女知識叢書第八輯「李知凡太太」一文——譯者。）

「你當然不要在這裏長住下去了？」我問道。

「當然，我要儘可能快地去西北。」她說。「你能同我搭火車去天津嗎？」

通海的火車道剛修復，每天通車一次，需時十二點鐘，約當當時的兩倍。日人嚴密地搜查所有旅客，在天津的一端格外嚴厲，臉上稍帶政治思想的意味的，便被扣留下來。有幾十個學生已經被劫掠、逮捕，並且失去下落。所以這一旅程對於像穎超那樣的人是有相當危險的。但日人不會扣留別國人（在天津脫衣戲弄還是後來的事。）我告訴鄧，我將同她一道走，她扮作我家中的女僕，或可安全地通過。

這對於我自己的計劃也很適合；因為所有電信交通都操在日人手中，不經過日人的檢查，便不能發出一個「當場」的新聞，作為一個新聞中心，北平是死的了。我已經接到每日先驅報一封遲到的電報，要我去已經開戰的上海。我也要去尋覓在中國西北失蹤的我的老婆。在四月間，尼姆（斯諾夫人名——譯者註）親去延安參觀中國的「紅黨」，不肯從她的丈夫取得轉手的新聞，幾乎有三個月我不會得到她的片紙隻字。沒有消息便是好消息，這說法是不足恃的。我決定轉道去陝西，要多走一千英里，去探問她是否永久拋棄她所忽視的飯票。

還有掘墓的吳的問題未解決。當他第二天來見我時，我告訴他，我就要走了，他應當加速行動。他同意在三
天內把他的貨物目錄和若干『貨樣』帶給我，我要把這些東西拿給一個可靠的美國商人，我知道這人是肯
為這種罕見的东西冒生命的危險的。但因日軍掃蕩吳在妙峯山的朋友們，他的行程受了阻礙。過了五天以後，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把這筆生意轉託另一美國人，我相信他能使得各有關方面都滿意的。

穎超來到前門車站，樣子完全像女僕；她的剪髮莫名其妙的不見了。我送她深入一輛車廂中，為後來的數
不清的大腿、頭顱、和臂肘遮蔽起來。好的，在數目中是有多少安全的，我平凡地想道。一旦進入車中，在當夜達到
天津以前，旅客們是不能移動一下的。但他們彷彿並不在意。在北平的亡命者眼中，每天的火車乃是世間最
後的一列。在北平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沒有人肯拖延到明天了。

我在最後一輛車的末一節上，找到一個立足點。我終於把制動機作了我的臨時坐位，一整天，光頭赤足，晒
在冒火的太陽下，經過淹沒的田地，向海口進行。我向北平的城牆告別，並不覺得難過；外國人所愛的北平已經
不存在了。因為沒有別的事可作，我利用這時間把過去有關的事件在心中草草地加以整理。

以下便是我認為重要的一些斷片。

二 一個紳士和一個流氓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論語

北平必然要發生變故了。

北平是命運將盡的一種奇觀，一種中世紀的殘餘，在這奇妙的城牆中，藏有若干世紀的寶物和掠奪品，在這中間住有一百多萬人。（爲要造成一件美術品需要多少世代的盜竊呵！）在這城市中，有前朝的文武官吏，有學者和地主，有僧侶和匠商，有談吐高雅的洋車夫；這城市的設計和建造都是高貴的，一個藝術的寶藏，這地方有良家子弟和墮落份子，有狂歡燕席上的外交陰謀，有失去品格的媚力，有過分橫暴的惡行；這城市有活潑的溫泉，有蔥鬱的秋景，有在霜雪的樹和結冰的湖上閃耀的冬季陽光；這城市有永久的退讓和輕易的歡笑，有閒暇和家庭愛，有貧乏和悲慘，有對於垢污的漠視；然而這地方也有出乎意外的壯舉，革新的學生們爲全民族製造鬥爭的標語，由戈壁沙漠吹來的大風，使得華美的廟宇和金黃的殿頂蒙有最古老的生命塵土。

在一九三四年，日人佔據熱河以後，北平又已成爲邊疆了，我們長住在那裏的人只奇怪這座沒有防禦的城市竟能維持這樣久。經過連續的吶喊，我們醒來一看，北平的城樓依然由中國軍隊防守。也許連日本人對於北平也懷有多少愛惜，認識它的歷史價值，在取得時不願加以損壞。事實上，他們比所預期的遭遇到更多的抵抗，這城市最後的失敗不是沒有多少光榮的。

北平最後的中國統治者宋哲元將軍是具有這古老城市的惡德和善行的一個人。他是一個武人和愛國者，他的政治思想完全適合這封建城市的背景，他有自己的策略，他以不變的客氣和尊敬待遇日人，但他的計謀總比日人先一着。他不是一個進步的統治者（在那種狀況下是不能存在的），但他不是一個漢奸，也不是任何人的傀儡。雖然他只受過軍事的訓練，沒有應付這最困難的外交地位的特殊才能，但在政治的折衝中，

經過兩年的時間，陰謀家雖然在事實上把他擁立，但竟不能如所預期地來操縱他，這不能不歸功於他的善於應付了。

現在不妨略述往事。宋哲元的出名和得勢始於一九三三年。當日人佔領熱河（東部內蒙）向北平進展時，宋所統率的二十九軍，在長城的喜峯口的遭遇戰中，消滅了一個日本聯隊，遂由此馳名全國。宋的努力並沒有結果。那時的南京政府不肯支持他的抵抗行動，不久便簽訂了塘沽協定，停止了華北的衝突。但這和平只是暫時的。日本不久便要求所有中央軍從河北省撤退，廢除當時名義上由北平統治華北的蔣系軍分會。

作為一種讓步，蔣委員長同意成立冀察政委會，以宋哲元將軍為主席，宋的軍隊是馮玉祥的舊國民軍的一部份，曾經參加若干次反蔣的戰爭，從不會受中央軍系統的同化。因為這緣故，因為土肥原將軍（關東軍特務機關的領袖，以『滿洲的勞倫斯』著稱）喜歡宋哲元，因為日人知道宋哲元可以為他們統治這地域，相信他是於他們有利的野心政客，於是他們『認可』他作『半自治』的新冀察政委會的主席。

日人把宋哲元估計低了。他並不願作他們的傀儡。但他巧妙地使他們希望他終於會脫離南京政府而獨立，藉了他們的支持，成為華北五省的統治者。假如他那樣作時，日本便可以免除現在的戰爭而達到他們初步的目的了。

宋哲元就職後不久，土肥原便來施展他的手段了。他暗中向宋提議，由宋宣布華北為『自治國』。土肥原預備立即給宋一百萬圓，以維持他的政府，擴充他的軍隊。這對於宋顯然是一種有力的誘惑。他不是一個富人，在南京政府方面也是沒有前途的。假如他拒絕了呢，便要受到日本的攻擊，他不能斷定他能得到支持，也許會藉

此把他的軍隊消滅，這是過去屢見不鮮的。

有許多天宋哲元猶疑不定。爲要加強他的「條件」，土肥原在冀東發見了一些「土匪」（實際上，他們是由日人僱用的。）界於平津和長城之間的這一地帶，由塘沽協定規定，中日兩方皆不得駐軍。這時，土肥原竟不顧協定，派遣若干軍隊到冀東去，「恢復秩序」。他向宋示意，他在山海關擁有幾師人。如果他的提議被拒絕，便要出以行動。

南京的指示依然是含混的，並沒有確定地担保：假如宋出以抵抗，可以得到若何的支持。但有兩件事發生了。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土肥原的（後來發覺是他個人的）最後通牒滿限的前一日，一種完全出乎意外的學生羣衆示威在北平街上出現了，堅決反對任何「華北自治運動」。日本的各通訊社到這時才知道有這一運動。雖然北平的警察，由那時還留平的憲兵第三團率領，鎮壓示威，並有若干示威者受傷和被捕，宋哲元却得到一個有利的藉口。他請土肥原把他的計劃延期，等待民氣消沈時再實行。

另一件事是這位多謀的老宋突然「病」了。在這期間，宋的部下在天津聽說，日本華北駐屯軍不但不關心土肥原的計劃，而且加以反對。一聽到這，南京政府遂有勇氣向東京質問。日政府雖然情願接受由嚇詐得來的任何利益，但還沒有開戰的準備。震驚於華北反日感情的高漲，又恐怕釀成全國的抵制，日政府罷免了土肥原。他的自治運動很快地坍台了。過了不久，土肥原親自告訴我，這一切不過是一個報紙上的神話而已！

不過，爲了保全面子，土肥原從滿洲的關東軍得到充分的支持，在「不駐軍」的冀東建立了一個傀儡「政權」。這個機關定名爲冀東反共自治政府，它的二十三縣由一個名叫殷汝耕的半日本人統治。這地方對

於日本除了軍事上的價值，作爲販毒和走私的根據地，也是非常有用的。日人在這裏傾銷了上千萬元的免稅貨和上千萬元的鴉片和海洛因。在日本軍特務部的指導和保護下，這種私貨由日本和高麗的運私者運向南方去。

由於日人類似的行爲，北平的軍事地位減縮至可笑的程度，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它的窘態倘非目見是令人無法相信的。在冀東之外，日人幾乎控制了由山海關通舊皇城的北寧鐵路。他們在全線各軍事要點駐有七千軍隊，在華北最大城市的天津和北平的使館區，築有永久的砲壘一般的營房。在名義上，這些駐屯軍是由一九〇一年的辛丑條約規定的，依據這個條約，列強有權從北平到海口駐少數軍隊。但日本的軍隊比其他列強合計起來的駐軍還多出好幾倍，並且用來求達極端非法的目的。他們自由地在鄉間移動。從事不斷的「演習」，恫嚇和攻打攔阻運私者中國稅務視察員和鐵路查票員。

宋哲元將軍無力防止這些非法行爲，連他自己的軍隊也不斷地忍受這一類的侮辱。他只有一個二十九軍由他指揮，總數有六萬人，只有一萬多人可以留在冀北。他不能期待南京方面的任何幫助，從蔣委員長以下沒有人信任他。無論如何，可以斷言，在西安事變以前，南京政府斷不會爲了河北一省開戰的。不拘那裏發生了什麼事，宋必然成爲替罪的羔羊。他知道他不過是一個臨時的緩衝，他顯然要保守秘密。正因爲這一點，監視他的每一行動的日本人，繼續相信他們能把握他，直到宋知道全國能作他的後盾的時候。

這一切都像非常奇怪的政治的踏索戲。宋哲元藉了一連串的不平衡動作存在下去，時而討好於南京，時而討好於日人。當日人要求調走蔣的特務憲兵和解散藍衣社的時候，宋同意了，人們疑心他是暗中喜歡的。當他

們要求他的委員會任用日本顧問時，他照辦了，鄭重地接受他們的建議，而永不加以實行。當南京方面指責他缺乏社會改革時，他在幾個星期內槍決了一百多個毒犯，表示比蔣還積極。他贊助新生活運動，那一運動所採用的孔毅格言適合他那封建的靈魂。

在表面上，宋嚴厲地壓制一切過激派。但我在北平認識一打過激份子，這些人若在南京，早被投入監獄了。宋自己的部下暗中鼓勵一些反日的團體和出版物。我發見他的兵士在北平城牆上誦讀反日的文字。由宋津貼的北平新報實際上對西安事變份子表示同情，它的主筆暗中贊成與共產黨的聯合戰線。更希奇的是，北平擁有全國最有力量反日學生組織，到後來他們完全支持宋哲元。實際上，當地反日情緒巧妙地由批評宋哲元轉向批評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人對於這種現象搖擺於以下兩種解釋之間：可歡迎的分裂表現和對於他們的一種真正的威脅。在短短的幾個月內，這種奇特的情形，對於國內政治的言論，造成比南京政府直接統治下的任何地方更自由的空氣。

宋哲元長於賭撲克牌，善舞劍，有時請我們去作彈子戲。他是一個大個子，生有山東農民的身裁，佛陀一般無表情的臉，時時不相稱地銜着一支大雪茄。他滿嘴孔子的話，一半用來掩飾腐敗和虛偽，一半是出於習慣。他在身邊也有一些愛國的積極的青年，在他的智囊團的指導下，市政時顯出改革的跡象。但當他的青年部下對於他的敷衍外交和『組織民衆』的說詞感到不耐煩時，他便用關於孝的經典來訓誡他們，或要他們去加入軍隊，或教他們去同妓女組織起來。他有一種理論：守獨身是政治的過激主義的原因，把青年人的激動狀況歸因於晚婚。

一到爲難的時候，宋總要推病，當壓力太大時，他便要去『掃祖墓』了。這是一個非常的長時間的掃墓旅行，事實上，終於使日人明瞭，要想在華北得到他們所要求的東西，必須採取像蘆溝橋事變那樣的動作了。

當時的國民黨英雄×××稱他爲『反動份子』，但他竟使得日本人用一百萬人和二十萬萬元來取得一片土地；倘若×先生自己在北平代替宋哲元執政，由後來事實證明，他們大概用不了兩毛錢便可以得到這一片土地了。

三七·七

甯爲玉碎，勿爲瓦全——中國格言

宋哲元在華北的掃墓，相當於張伯倫在英國的釣魚，這是與當地危機的高峯相應的。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宋逃去山東的故鄉，避免日人在經濟、軍事、政治方面命令式的要求。其中有一點是日人特別堅持的。既經在北平和蘆溝橋的鐵路交點之間，作過一番精密的測量，當地日軍當局要求圍地一千多英畝，供他們建築一個飛機場和永久的營房。這要求實在無法應允，宋哲元的突發的孝思是可想而知的了。

蘆溝橋是永定河東岸的一個火車站，在北平西南十五英里。這是平漢鐵路與平津鐵路的支路西端相交的一個重要地點。一年前（一九三六年五月）日人曾經非法佔據這條支路的東端豐台。佔據蘆溝橋，等於佔據所有南方通北平的鐵路入口。在控制永定河鐵橋的蘆溝橋車站東幾百碼，是宛平的古城。我會同朋友們時

時去那裏欣賞那因馬可孛羅著名的具有三十座秀美的拱門的古石橋。

關於蘆溝橋和宛平附近的土地，日本特務部曾同當地中國當局舉行了無數次的會議。宋哲元一面虛與委蛇，一面設法保持這最後一道防線。但他不能阻止日人在附近舉行連續的軍事演習。在這裏，正如後來在上海，日本所分享的外國特權，使他有「權」在中國內部的根據地行動，利用她將要毀掉的全部不平等條約來達她的征服目的。「演習」愈來愈頻繁，終於在七月七日夜，藉口他們的兵士失蹤，日人突然要求進宛平城搜查——美其名曰「確保和平」。

但那縣長却不肯照辦；他十分正當地拒絕了。午夜以後，北平被槍砲聲震醒了。日人已經用坦克車攻城，少數中國衛隊加以抵抗。在早晨，我駕車到河上，我發見日人佔領蘆溝橋車站，與據守宛平和蘆溝橋的華軍散亂地交換鎗火。兩方軍隊隔着幾碼的距離相持了若干日，我在這戰線中間來回穿行，一點沒有困難。假如日人肯撤入他們的營房，這一場糾紛隨時可以很容易地解決。

日人對於是否真有兵士失蹤，不論在當時或後來都不會提供任何證據。在招待新聞記者時，我們問他們這事的詳情，他們連說都不願說起這一個兵士。當他們追求更大的目的物時，他們把這一個兵士完全拋開不提了。這事件是否由特務部計劃而東京不知，或不過執行上級的命令，我無從知道，但由後來的發展證明，東京準備盡可能地加以利用。在國際聯盟的報告及其後來斥責日本的決議案中，你可以見到日本進攻前的諸多事件的詳細記載，流覽一過，便可以為下面的敘述得到充分的證據。

關東軍立即開始向冀東和天津輸入軍隊，在七月中旬已經超過兩萬人。同時，華北、南京、東京，以及全世界

各首都的中國人，都在努力覓取和平途徑。有半打不同的一組一組的條件提出，即刻爲新的日本要求打消了。日本並不要使華北獨立的任何協定，她乾脆要華北。這在當時當地的我們，以及現在回想起來，都是很顯然的，日本人所作的調停談判只是用來掩護那破壞一切調停的軍事準備，日本所要的解決只是由武力取得的。但和戰問題，屈服與奮鬥問題，只能由南京政府當時的政策來決定。中國政府在夏季的首都牯嶺開特別會議，蔣委員長從各方面感到應作一種決定的迫切需要。連他自己最優秀最親信的將領也表示，進一步的退讓會使國內的局面惡化，同時他那最有力的反對派也來電聲明，全力擁護他所採取的任何抵抗計劃——進一步的屈服則非全國所能容許。在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再也不能緘默下去了。他那一天所作斬釘截鐵的歷史性的演說，表明立即作戰是必然的了。

蔣定下四個要點，作爲議和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條件。這必須承認的四點是：一、所作解決不應侵犯土地和主權的完整；二、中央政府所規定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的現狀不能作非法的變更；三、華北官吏自宋哲元以下不能隨日人之意罷免；四、二十九軍不能再以陣地讓給日本。

「現在我們同胞應當明瞭，」蔣委員長說，「所謂『最後關頭』的含義和此後應有的犧牲，一旦達到那個階段，我們必須作戰到底。假如我們躊躇不決，徒希望暫時的苟安，那末我們就要永遠滅亡了。……到那時，我們只有用盡全國的物力來從事爭取最後勝利的戰爭。」

但，即使在這以後，只要有一線和平希望時，中國方面繼續表示希有的忍耐。在廊坊，便有這樣一個例，那是平津中途的一個小市鎮，二十九軍在那裏有一個小營房。有一夜，幾個日本軍官和兵士在那裏下了火車，走向

中國的兵營，他們要求使用其中的軍用電話，中國人請他們把武器留在外邊，但日人不顧這合理的請求，一直衝入營中，佔據了電話交通。

因有非實際被攻不得用武力的嚴令，當地軍官只好聽憑這幾個日本人爲所欲爲。於是這幾個日本人無緣無故地用電話向天津司令部請求一個裝甲車團和若干轟炸機。他們所要的東西不久便到了，向火車站開火，加以佔領，駐軍在未受直接攻擊以前未還一鎗。結果華軍死傷甚重地撤退了。但談判依然在北平繼續呢。幾天以後，日本陸相杉山元在東京宣布，日本已經派了八個師團（約十六萬人）去華北，並集中有二百架飛機。在七月二十五日，華北日軍送交掃墓歸來的宋哲元一個久在預期中的最後通牒。他們要求宋和他的軍隊在四十八小時內無條件地從北平附近撤退。這便是終局。宋電告南京，他預備拒絕最後通牒，請加以批准。第二天，在接到回電以前，宋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略敘他避免戰爭的努力，結語是：『日本軍隊不斷地派遣和連續的挑釁，使得中國軍隊除了竭盡物力保護國家之外，別無他途。』

話是勇敢的。但宋哲元的地位到現在已經成爲完全不足恃的了。他在北平的一萬軍隊是裝備很壞的，既沒有坦克，也沒有飛機，只有少數輕砲。他們過去不得建造任何永久的防禦工事。他的軍隊，大部分用來執行警察的職務，一小組一小組地分散在各鄉村和北平城外的南北營房。日人已經完成他們對於平津鐵路的控制，華軍只能由紆曲的鄉村道路集中。日本會禁止南京增援北平——以『談判』破裂相威脅——因此南方的援助從來不會兌現。

宋哲元雖然一面遭無可奈何的圍困，一面繼續希望最後一分鐘的奇蹟，但他已經決心一戰，使北平的喪

失不至毫無意義。他不願人說，二十九軍放棄了它的信譽。戒嚴令在城內施行。外國人連同未逃的日本平民都避入使館區（東交民巷）。城門關閉並加以防守，宋命令南苑（北平僅餘的防地）的駐軍，「遭遇攻擊時，應即抵抗。」

日本的攻勢開始於二十七日。三隊飛機連續轟炸南苑，更有重砲日夜伴同轟擊。中國軍隊約有三千之衆，英勇作戰，但於實際無補，三分之二被消滅了。他們唯一的防禦工事是新掘的溝塹和沙袋築成的堡壘。日本的砲彈和炸彈像落雨一般地投在上面。在二十四小時的不斷轟炸之後，日本步兵跟隨一列一列的坦克前進，把中國殘軍向北平的退路切斷。這在中國抗戰史上是一種可怕的潰敗，也是一種最苦悶的開始。

第二天，我同路透社的伊美生通過了永定門，沿着初染戰血的城南道路爬行。這裏還是無人之境，還未被日人佔領，路上有南苑的傷兵殘餘顛仆和爬行。我們同一個在膝蓋和大腿上中了鎗彈的少年談話。他說，他是一個大學的學生，在不過幾個星期前，他同其他東北大學和東北中學的一百學生投入軍隊。因了不斷的請求，宋哲元爲反日的青年成立了一個特別訓練團。合計有三百個學生，中間雜有一些共產黨員，這時有二百多個陣亡了。那些人的死亡莊嚴地表明了北平愛國學生的熱誠，他們兩年來的活動在喚醒全國抗戰精神上盡了非常的功用。這裏也有三個中國青年將官喪命，「馬革裹屍」原是這一國家的武將的傳統呵。

南苑已被燬成平地，到處是在死神前逃亡的遺跡。日本飛機在路上低飛，掃射着兵士和牲畜。在一個地點，一個日本伏兵用縱射機關鎗屠殺了整整一縱隊人馬。驢人的死屍雜亂地堆在一起，田野中有一些農夫的屍身，是在從事耕種時被殺戮的。有六輛新坦克被遺棄在那裏，路上散布的手榴彈和彈藥筒可以裝滿一貨車。

沒有人看護受傷者，彷彿是與任何人無關的。只能怪命運不好，一個兵士隨時可有的命運哪。在這裏你可以看出，一個軍隊作戰時沒有民衆支持的弱點。北平有充分的醫藥設備，但沒有受過訓練的組織把那些設備與作戰的兵士聯系起來。這種情形，幾個月來，在每次戰後，到處可見。在那一天，我所見到的唯一想爲受傷者作一點事的人，是一個身穿灰色長袍，頭戴破洋帽的乾瘦的老人，他在南門附近惶惑不安地走向我來，問我去南苑的方向。他說他方從保定來，帶來由七日耶穌再來會的會友組成的一個救護隊。也許他能爲保守教派拯救一些靈魂：他像一隻鳥一般向南苑飛去了，我再沒有見過他。

平津一帶暫時歸於平靜，因爲日人更向南方和西方推進了。但華方的犧牲並非完全無益。這裏的抵抗使全國的意志加強，使南京政府的妥協政策更不可能。南京官吏曾對我說，華北的軍隊永不會作戰，這一次的戰鬥表明日人必須向其他方面尋找傀儡了。在此後幾個月中，二十九軍幾乎完全在可怕的劣勢戰鬥中消滅了。宋哲元將軍，正如他大多數的軍官，現在也死了。

過不多久，有一些中央軍開始在華北出現，以實踐蔣委員長長的諾言。在八月十三日，戰爭在上海發動了，一個新的戰線展開了，這將是決定二十世紀太平洋的命運的一場戰爭。

四 華北前線

日本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中國擊至屈膝。——近衛公爵

臨近天津時，我藉故同擁擠的火車中一些日本兵士談起來。我用中英混雜的話問他們，爲什麼與中國作戰。在我用一包駱駝牌的香烟款待他們以後，我們便相處得很好了。沒有比日本人更痛恨日本對於菸草的統制的了；愛國主義到這地步便不中用了。假如中國有大量的美國香烟，牠真可以把全部日本軍隊收買過來呢。

『我們日本人是和平的，但中國人不斷地向我們搗亂，』一個生有突出的牙齒的紅頰的少年說。

『下流的中國人在通州殺害我們的同胞，』另一個說。

『我們要從共產黨的手中把中國救出來，』第三個解釋道。『義大利和德國瞭解日本，但美國和英國不瞭解。』

一個顯明的農家少年說，他被召來爲天皇服務。『我並不明白戰爭的原因，』他承認道，『但蔣介石總要傷害我們的同胞，我們要打的是他，並非善良的中國人。』

一個由滿洲來的老兵，一個中士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爲別的一些人當翻譯。『我們要教訓中國人一番，』他自言自語地道。『他們變得太膽大了。』

諸如此類。他們的回答，與我過去從日本官方發言人聽來的話，同樣地合邏輯，他們說得很誠懇。那個中士說，別國人不知道中國人是何等的頑強；你永不能信任他們。他用自己在滿洲與游擊隊作戰的經驗來說明，別的人們都張大了嘴來聽。『你永不知道什麼時候一個和平的中國人會突然打中你的頭，』他警告道。

當火車進天津時，天已經黑了。我等待鄧穎超，我們經過車站上的日本守兵時不免提心弔膽。也許只是一個人提心弔膽。至少，在表面上，穎超一點也不驚惶。她裂開嘴，作成一種愚蠢的樣子，快活地對兇猛的日兵微

笑。草草地檢查了她一下，並把地上的蒲包顛動了一番，他們從喉中哼了一聲，表示她可以走了。

當我們走下站台時，我們看見有一打中國青年男女被從行列中曳出，驅上候在那裏的軍用汽車。他們穿的是農民的衣服，但生有知識份子的白手，於是引起日人的疑心。直到我們走進英租界的鐵絲網，我才放了心，在那時的租界內還是安全的。英國當局還不會開始用人命來換取他們自己的便利。到後來日人要求引渡中國人的權利，他們便照辦了。

英法租界的街道爲五十萬難民塞滿，彷彿他們都要搭乘那幾條去『自由』南方的船。艙面上的票早已被掮客收買，到可以用時便以可怕的高價賣出了。但外國人可以在統艙帶一兩個僕人，作爲頭等乘客的特權。藉助於一個朋友，我爲穎超安排好，她又爲一個她從未見過的男士充當女僕了。她得到一個去青島的艙位，到那裏，她便可以由那時還在中國人手中的鐵路旅行了。

『假如外國人出門不帶用人，我們中國人怎能去任何地方呢？』當我送行時她大笑道。

『不要緊，』我告訴她道，『溥儀是在一隻洗衣筐中離開北平的。』

當我第二次看見劉穎超時，她在漢口與周恩來在一起，她依然是一個僕人，但她是她自己人民的僕人了，她作了西北聯合婦女團體的首席代表。

十天以後，我自己也要動身了。在最後的時間，我的朋友勃特蘭決定與我同行。他剛寫完中國的第一幕，現在決定去參觀紅軍了。正如我的老婆，他要親自去查考紅軍的聲望是否與事實相符。在天津，我們與李察茲夫婦和英國詩人伊普生飲上好的德國啤酒消遣，並爲在華的日本人起了一個現在頗爲流行的綽號：小『Nip』。

我們搭一條英國船，海口（譯音）到山東，船上擠得有人睡在船橋上。黑頭髮的人們像魚子醬一般散布在艙面上，水手們必得擠路去絞盤。我們登陸的青島還未被日本海軍封鎖，但三分之二的居民已經逃走，彷彿是一個放棄了的城市。主持這裏的特別市政府的是海軍司令沈鴻烈，他因在內戰時倒戈得到現在的位置。青島是日人想以銀彈和陰謀取得的對象，他們終於失望了。

一般地說來，山東的地位是有一點混亂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已經佔領青島（那時是德國設防的殖民地），後來又佔據了德國建築的膠濟鐵路。由於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也作為在九國公約中所得權利的代價，日本必須把這地方交還中國。但因日人在鐵路上擁有重大的財政利益，在青島投資三萬萬日元，在全省住有一萬六千僑民，所以日本依然把山東看作她的勢力圈。為要加強她的勢力，日本付給山東的官吏幾百萬元，但當日軍想要攫取華北時，並沒有順利地達到目的。

青島市政府是由南京政府管轄的，市長沈鴻烈是蔣委員長所委任，但山東其他部分却是半獨立的，由軍人主席韓復榘統治。當勃特蘭和我到達省會濟南時，斯太因旅館（德國人開設）的外人大半相信，韓復榘將作日本的傀儡。山東在當時絲毫未受攻擊；日本財產由韓復榘的特別衛隊保護；日本飛機除了例外的一架，從未來過濟南。這個例外使得許多人的猜疑得到證實。這一架日本飛機並未投炸彈，只投給韓復榘一封信，慶賀他的『中立』。韓把這封信懸在布告板上，附加了一通他自己的效忠中央政府的聲明。但這聲明並不能說服懷疑的人。

就我個人看來，韓並沒有叛變的可能。中央軍正在大批地輸入山東；連他自己的五萬多軍隊，也大半由南

京任命的軍官率領。這個老軍閥當然希望這次的衝突在達到山東以前便停止。他不要惹起敵方的攻擊，因為他知道，抗戰時最先被犧牲的是他的軍隊和他的權力。正如別的軍閥和政客，他與日人直接勾結，也正如南京政府的官吏，他隨時可以同日人講交易。這在別國是要被當作賣國賊的，在中國就不必如此了。他所關心的只是提防別人會襲取他的政治地位。結局，他雖未公然降敵，但因他要保全他的軍隊，不肯作損失過大的抗日陣地戰，遂被蔣委員長加以軍事審問然後鎗斃了。

這是一種令人納罕的事實，直到九月中旬，日人在華北前線所遭遇的只是那些被認為最不可靠的裝備最劣的中國軍隊——「有問題的」河北、山西、山東的省軍。然而他們的高級將領竟沒有一個降敵的。實際上，華北軍隊在戰爭初期遭受了可怕的傷亡。蔣委員長顯然有意用那些地方軍隊來作緩衝，以便在他們的後方保全和擴充一個由他居中統率的清一色的新軍隊。結果，賣國的並不是那些被人造謠中傷的「軍閥」，却是自命「學者」和「革命者」的那些上流人，這已成爲中國歷史上不變的慣例了。

以平津兩地爲根據地，日軍向華北和內蒙的內部作扇形展開，用中國北方的三條鐵路幹線作進展的總路線。一路沿平綏鐵路，穿過歷史性的南口，西趨內蒙的察哈爾和綏遠，以鐵路終點的包頭（戈壁沙漠的門戶）爲目的地。另一路循稍偏向西南的平漢鐵路趨漢口。第三路沿平浦鐵路南趨山東、徐州，與由上海內移的南線日軍會師徐州。

面對着沒有飛機、坦克、大砲，也沒有任何機械化戰事的訓練和經驗的中國步兵，日本部隊以無比的速率注入河北和山西。有幾天每日行進三十公里；在一九三七年，有五個月的期間，平均速度是每天十二公里。日本

在攻擊武器上的優勢，使得華軍在華北平原上任何長期陣地戰的嘗試歸於慘敗。但華軍在那時並無其他的戰術。許多華軍在不會看見一個敵兵時便死掉了。日軍的攻擊完全在飛機、大砲、坦克的掩護下前進。這是一種摩托化的機械化的衝鋒陷陣。先由飛機勘定中國第一道防線，加以轟炸，然後移向第二道防線，這時大砲緊接着掃蕩殘餘的陣地，爲坦克隊開路。實際上，坦克隊已經「如入無人之境了。」到這時，日本步軍才出現，從容進入破碎的中國戰場，時常連一鎗也不用放。而飛機和大砲又在攻擊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線了。

當我們遲緩地沿隴海鐵路向西安前進時，我們經過尚未被黃河決口淹沒的河南北部焦旱的平原，我們看見許多開赴前線的軍用列車。這與我在更北方的日本後方所見的軍事力量的誇示對照起來，實在是可悲的。在那邊，日人堆積有成千的美國製的汽車、載重車、坦克，又有成千加侖的美國產的強力汽油。在天津，我見過由滿洲開來的長列的日本新火車，成百輛地載有煤油、重砲、子彈、精製軍糧，閃光的軍官用的新汽車。在這裏呢，敵車上載的是營養不足的青年人，用來掩蔽日本正在轟炸該路的飛機的只是有限的幾條樹枝。他們攜有來復鎗、機關鎗，除了在末一輛車上偶然有一輛福特汽車或雪佛蘭汽車外，再沒有別的了。中國在能有摩托機械化之前，必須先有大砲。

勃特蘭與我同意，這些灰色軍隊是不會知道日本後方用來對抗他們的優勢準備的。

日軍在尚未深入山西時，便遭遇到困難了。山西的山地成爲防守軍隊的良好掩護，摩托機械化的裝備在這裏不是一種便利，而是一種負擔了。裝備優良的中央軍開始參加，一些中國大砲以至少數飛機也出現了。在這裏，第一次，日軍必須應付中國紅軍的遊擊戰術了。現在，中國紅軍，在與南京政府成立聯合戰線以後，改組爲

第八路軍了。在這裏，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協助軍隊的民衆動員終於開始實行了。這種作爲『民衆抗戰』的原型的方法現在不僅是一種到處散布的口號了。但關於這一點，留待後來再說吧。

當我到達古西安市的時候，我對於我的老婆在紅星下的冒險，懷着非常的疑慮。也許她已經走上遊擊戰線？也許她已經被土匪綁架？也許她已經死於空襲？一切可能性都有的一到西安招待所，我立即想去當地的八路軍辦事處，追問事實的究竟。當我看見招待所的副經理時，他那和氣的臉上顯出一種疑問的神色。『你看見你的夫人嗎？』他問道。『她在一點多鐘前由這裏去搭往青島的火車。』

我來得剛好遲一點鐘。但警察知道，爲要使我離開西安，必須尋見這個善於逃避的尼姆·維爾斯，於是他們開始從事有效的工作。尼姆當夜在潼關爲軍警捉住，並被拉下火車。她在綠西行漫記中說，她只希望從速就死了。但並沒有殺她，只把她帶到一個電話棚裏，在那裏我終於又聽見她的聲音了。她當夜回到西安，在與中國紅軍團聚了一天以後，我把勃特蘭託付給他們，便同我的病人搭車去青島了。她不會被土匪綁架，但爲更可怕的一種東西所害——延安的飲食。她已經害了兩個月的痢疾，變得奄奄一息了。她十分需要醫院、休息、好的飲食，以及一個領她前往的護衛，於是我自動地來担任這一項職務了。

第二天，我覺得我到西安來彷彿是算定時間的。在徐州，我們下來換車，在車站上與難民和無家的遊民擁擠在一起。這種人是此後兩年在戰區中到處可見的。我遇見兩個從北方來的朋友。他們告訴我，徐州被炸得很重；有八十五架飛機在隴海鐵路上的各城市轟炸。我探聽關於我在離城不遠所見的破火車的事。那便是綠色快車，在前一天被炸毀；死了許多旅客。假如我不把尼姆從潼關喚回，她剛好坐在那一次車上。

在這裏，我也同一個從德州前線下來的軍官交談。他述說了一個希奇的故事，這是一些憤怒的中國農民在經過他的軍營時告訴他的。日人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發狂一般地找肉吃；鄉村中所有的豬和雞都給他們搶光了。關於這，農民們也只好認命了。但後來的一些人，再也找不到雞和豬肉了，於是把田裏的水牛趕回來，活生生地吃掉。他們不耐煩先把這些牲畜殺死，逕把牠們懸在一堆火上，然後用刺刀和指揮刀從那可憐的牲畜身上隨意割肉吃。這些牲畜乃是中國農民最好的朋友呀。痛苦的牲畜的鳴聲在幾英里外都可以聽見，但日人的食慾彷彿並不因此減低。

在那時以前，農民們不會離開他們的田地。直到看見這樣的行爲，他們才相信，他們遇見了妖怪，於是逃往山後的中國防線了。他們反來復去地說：「他們一定不是人。」

兩天以後，我們又來海邊。青島依然是含有凶兆的平靜。我發出幾封在旅行中收集的快訊，但每隔十天還不能有一條船去上海。幸而有 J·B·鮑威爾代我應付先驅報的工作，所以我不用發愁。這在戰爭中是一個難得的時間呢。青島這時是十分可愛的，晴朗的白晝，微風披拂的夜，這風或從海上吹來，或含有山上的松香。幾英里長的著名的白沙灘，在過去這季節總聚有成千歇假的人，但現在却成爲我們專有的海岸了；一連三天我們不會看見一個別的浴人。所有浴棚都關閉了，在瀾漫於這半空的城市的靜寂中，有一種奇特的預期。我們每天準備看見在每一浪花後面有一隊日軍登陸。

我注意到中國人並不乘時把貴重的日本工業機器移出市外，當我問起的時候，市長沈鴻烈司令避不作

答。有一天，市長的秘書告訴我，環繞本市的一團東北軍，正在計劃，一見日軍臨近，便把日本工廠炸毀。我還有一點不相信，但他的話終於得到證實。在我到達上海以後，華軍在退出該市之前，把日本工廠轟炸和縱火。損失約值兩萬萬日元。日本在中國各地所受最大的損失。當初不設法把一些機器移入內地供中國人使用，究竟是一種失算，不過這依然是一種進步的象徵，至少中國高級當局下令破壞了一個敵人的根據地。關於「焦土政策」說得很多，做得並不多，這一次算第一遭有效地實行了。

我終於得到一個船位，船長橋上的一個吊床。我的老婆決定不再去漂蕩，要在上海留到戰事他移的時候，得到她的許可之後，我又走下去了——去「東方史上最大的戰場。」

五 中國的防禦力

看一下地圖，與中國比起來，日本是多末小。誰能懷疑我們將來的勝利呢？——蔣介石

在開戰後不久，蔣委員長對我說過上面一段話，表明了形成他的抗戰行爲的基礎的一個信仰原則。陳誠將軍後來把這意思對我解釋作「用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中國文字總是含混不清的，他這說法似乎應當叫作一種理論，並非一種戰略；一種無限後方的理論。

在一九三七年，日本的軍事力量雖然遠勝中國，但中國的陸軍却是該國有史以來最大最強的。日本在一八九五年的陸軍恐怕還不是中國的敵手呢？中國這時的陸軍大概能打敗日本用來戰勝俄國的軍隊。考慮到

它那短短的歷史，不能不說是一種非常的成就。

中國開始成爲一個現代國家，比日本晚了四十年。極端保守的退化的滿清政府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共和國不會承襲到前代多少軍事價值。但在滿清末，確曾開辦過一些軍事學校，其中的教員是以日本軍官爲主的，資格比較老的中國軍事領袖都是從這裏訓練出來的。在那些時，日本的政策是訓練中國青年，協力建造大亞細亞帝國。在今天，幾乎所有他們的學生都在與日本皇軍作戰了。其中之一便是蔣介石。他所受的正式軍事訓練，都是從清代的陸軍中學和日本東京的士官學校的日本人得來的。

在推翻帝制後十年之間，中國的武力分屬在一些半封建的軍閥手中，他們養兵並非效忠於國家，祇效忠於他們個人。直到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在廣州創立黃埔軍官學校，才立下一個真正國軍的基礎。在黃埔，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青年同被訓練作國民革命軍的軍官，這軍隊後來推翻了大多數舊軍閥。蔣介石是該校第一任校長。他聘用由加倫將軍領首的蘇聯顧問。這些顧問，作爲孫中山聯俄的報酬，爲中國創造了一個以國民革命爲政治信仰的軍隊。在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以後，反共政府建立了，蔣委員長建立了南京軍事政治學校，以繼承黃埔的傳統。共產黨也在他們的蘇區開辦了他們自己的紅軍大學，與蔣的軍校對抗。目前的戰爭開始時，領導中國軍隊的軍官，都是從這兩個組織和散在各地的省立軍校造就出來的。

德國軍事人才在中國和日本兩方面各有其影響。蔣委員長最初聘用了一個德國軍事顧問，包爾上校，隨後來了一些別的人。在一九三七年，由韋爾森將軍領首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共有一百多個軍官。蔣氏最現代部分的軍隊的青年軍官，大多數是在他們的指導下訓練出來的。在南京軍校之外，政府還建有訓練大砲、坦克、化

學戰術的專家的學校。從技術的觀點上看，這些學校所立下的訓練基礎是十分好的。到戰爭開始時，這類東西的應用還不滿十年呢。

中國有一百八十萬常備軍與日本作戰，但這軍隊的訓練和裝備是很龐雜的。蔣氏『自己的』由黃埔或南京軍校生率領的，受過德國訓練的軍隊，只有三十萬人。蔣氏在這核心之外，團結了八十個師，具有不同的訓練和裝備，統名為中央軍。此外有廣西軍，由白崇禧和李宗仁兩將軍統率，從一九二七年以來，他們曾在中國西南作他們那局部的政治和軍事活動。他們大致有三十萬人，被認作與蔣氏的模範師同樣優良的。最後是西北的共產黨軍，具有非常好的戰鬥士氣和嫺熟的戰略的領導，但他們的裝備連許多省軍還不如。餘下的是從未完全同化於中央統率下的地方軍隊，具有平凡的以至極端惡劣的訓練和裝備。雖然國內各軍隊現在一致承認蔣氏為總司令，但地方性質依然存在，許多時並沒有從事合作的軍事連絡。

中國軍隊配有輕重機關鎗、自動來復鎗、和戰壕臼砲。蔣氏的受過德國訓練的幾師，有輕重大砲和山砲，與日本師團成一與四之比，有機關鎗與日本師團成一與三之比。一般地說來，中央軍的大砲是很少的，大多數省軍只有輕山砲和戰壕臼砲。大致中國一師所有的機關鎗平均不能超過一百架。在裝備優良的第一軍中，只有少許抵禦坦克的砲。至於坦克自身，為數少於五輛，這種人員的訓練也是很很不完全的。

中國補充戰爭材料的設備是很有限的。例如，所有兵工廠合計起來，每月只能製造二百架機關鎗和三千來復槍，所以連最小件的軍器也是舶來的。中國不能製造滿意的砲彈或空襲炸彈。戰壕臼砲產量很大，這是大多數中國軍隊最得手的一種現代武器。至於來復槍彈和戰壕臼砲的砲彈，中國的產量，差不多可以適應它的

常備軍的需要。

在其他方面，因採辦時沒有一定的標準，使得軍械的供應成爲非常複雜的難題。自動來復槍、機關槍、大砲的種類是無所不有的。自製的或舶來的子彈，適用於一種武器的，不適用於另外一種。一旦子彈的來源斷絕，一種新式的槍械時常變成廢物。飛機的情形也是這樣的。駕駛的學生時常變換飛機和教師，既浪費，又無系統。高級政府官吏每出洋一次，便帶回一批新的飛機。像買零星用品一般，隨地購買，沒有一定的地方。於是收集了許多劣等的貨色，傷損中國最厲害的是義大利人。結果，當戰事到來時，蔣委員長才發見，他那誇稱將近千架的戰鬥機，實際上只有不到一百五十架可用。這種國際飛行戲班的最大缺點是，中國沒有維持它的輔助工業。許多飛機只要有一點小毛病，就變成了廢物，因爲修理的設備太缺乏了。

因爲沒有集中的組織，沒有充分的設備，沒有適宜的戰事根據地，沒有優良的技術，所以軍用品的使用必須講求極端的經濟。因此中國在可能時必須避免消耗太大的對壘戰和陣地戰。中國軍事當局顯然不能期望在以優勢武器從事重要點與線的鬥爭中戰勝日本。中國必須在什麼地方尋到一種資本，以加強正式軍隊的主要活動。先前已經說過，這資本便存在於成百萬的人民和他們所居住的土地面積上。單是數量和面積不能制勝；但假如在全國動員中統一起來，它們便可以使敵人不能有效地控制這個國家。

所以中國最現實的戰鬥目的並非取得形式的軍事勝利，乃要使敵人在取得勝利時的犧牲失去效用。這樣作戰需要一種戰術，須包含以下幾點：（一）藉了主力和裝備的保持，藉了誘敵深入，把戰事極端延長；（二）一面在主要前線上從事延宕的活動，一面在敵人的後方和側方從速發展遊擊戰；（三）在淪陷區中，藉了抗

敵民衆革命的政治和軍事的組織，使敵人不能獲得經濟自給的根據地。

『民衆動員』這一名詞一定要時常出現於討論中國的戰事的一切書中，乃是達到上述目的基本的迫切的需要。中國有四萬萬人，但在戰爭開始時，可以動員的不及百分之一，因為，在過去十年間，中國政府不會組織和訓練和領導農民大衆。日本的人數雖然少於中國，但在戰爭活動上動員的比率却比中國大得多。所以，與普通見解相反，數量的利益在戰爭開始時是在日本方面的。假如日本能綏靖廣大的淪陷區，她不久也可以取得作爲中國的資本的面積了。

在華北數省，日本軍隊只集中在重要據點，城市、鐵路和公路，只能很緩慢地向內地展開他們的防區，這本是事先可以料得到的。在他們的刺刀以外，是大量人口所在的成千的鄉村，不到大的攻勢結束之後，日本是不想加以征服的。這些『孤島』或『空隙』中的農民大衆是可以組織的、訓練的、武裝的，可以成爲中國主力軍的有力的同盟。這乃是遊擊戰的老家，日本的勝敗最後在這裏決定。

N·裴佛(Nathaniel Peffer)銳利地指出道，『中國方面的問題大致可以歸納成以下的說法：所有中國軍隊能否把一九三〇和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所用的戰鬥方法加以有效的採用？』

一切都足以表明這種戰略的需要：從速把僱傭軍隊轉變作革命的人民的軍隊，盡量採用遊擊戰術，與浮動的損失不大的陣地防禦相配合，充分發展人民與軍事組織的合作。但高級軍事當局直到在戰爭中吃了很大的虧，才認識這一點。在過去，他們繼續在不平衡的火力下從事據點的防禦，並把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起來的遊擊戰，看作一種不可避免的罪惡。

在上海方面的長期犧牲，使得有訓練的將士和軍火受到可怕的損失，幾乎一開始便毀掉中國有組織的抵抗力。這在政治方面也許是有一定道理的。這種犧牲具有一種心理學的價值；加強民族的自信。蔣委員長也許會這樣希望，把戰爭留在上海公共租界附近，一種意外事件可以使日本與列強發生嚴重糾紛，因而可以引起國際的干涉。此外，假如利用這時間，向內地轉移重要的工業機器和技術工人，加速內地鄉村的民衆動員，以至爲動員的武力預備後方根據地，以接替防禦東部各省的主要任務，有一於此，這場戰爭中的重大損失也許是值得的。

但事實並不如此，我們後來便知。

六 上海戰事目覩記

上海這中國臉上的政治潰瘍。——約翰·根室

在九月的末尾，我們緩緩地溯黃浦江來上海，經過一列正向目不能見的灰色線開火的日本戰艦，天空有一隊一隊的飛機飛過燃燒着的閘北和江灣。

這一切引起我一種舊地重臨的奇怪感覺。五年多以前，當這同一戰事在這同一地方發生時，我曾參觀過那一次的預演。這一次雖然規模比以前大，但總是一九三二年的重演。沒有人能懷疑它的結局。記憶的感光面凋零得多末快，新的恐怖形象拭去了舊的毀滅幾千人的大戰事，像去年的運動會一樣被忘記。在一九三七年，上海大部分人已經忘記一九三二年的戰事。到今天又幾乎忘記一九三七年的重演了。在含有成千戰事的戰

爭中，一場戰事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在我自己的頭腦中，一場戰事模糊了，又進入第二場。

但當這戰事繼續時，它乃是世界最偉大的表演，即使回憶起來，它的情節也是奇特的，在某種意義上，連希特勒的閃電戰也不足以比擬呢。再沒有那一個大都市，有像這樣幾乎一百萬人競相殺戮的場面。這好像凡爾登搬場到塞納河上，而歷歷在目的右岸巴黎是中立的；又好像有一個葛提斯堡在哈楞（Harlem）作戰，而曼哈坦（Manhattan）的餘處却是袖手旁觀者。

大家都知道，上海有兩個：一個外國人統治的上海，是由幾千英畝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合成的，這地方是將近一世紀前由中國取得的；又有一個中國人管轄的大上海，包括老城區，一大部分閘北、江灣、南市和浦東。在上海三百萬居民中，有三分之一強住在外國租界內，其中約有六萬歐洲人和四千美洲人。

與一九三二年完全相同，日本軍隊佔據楊樹浦和虹口（蘇州河北一大段公共租界），作爲他們攻擊中國人的根據地。在蘇州河南，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邊界，到處有英法義美的軍隊防守。在黃浦江面，在依然中立的殘破的外灘前，泊有歐美的戰艦，滿懷興致地觀看下游相距幾十碼的日本海軍攻打那堅守三個月的中國戰線。

戰事把這小小的國際「國」完全包圍起來，但它的大部分依然是旁觀者。有時砲彈從頭上飛過，有時落進界內一個，而且頗有死傷。日本人隔着公共租界放高射砲，炸彈碎片有時落在外灘上。有一次，美國旗艦奧古斯大上有一個水兵被擊中，又有一次，一個中國的或日本的砲彈在一個百貨商店爆發，炸死六百人。在戰事最初期，一些中國飛機無意中轟炸了聚在街上張望的人羣，死傷了二千多人。據我所知，這兩顆炸彈造成死傷最

多的紀錄。雖然如此，大部分國際的上海——終必成爲日本與西方之間的戰場——依然常試度它那不正常的生活。

對於一個戰事通訊員，第一次的上海戰事，從技術的觀點看，乃是一個完全的故事，只有在上海才可以再遇見這種事。對於拙劣的著作家，這是再方便沒有的了。備有適當的通行證，你可以在早晨去中國的戰線後方，去寫一篇『戰地目覩記』。然後你可以在下午經過公共租界去日本前線。假如你要十分澈底，你可以去參加中日雙方新聞記者招待會，去聽取官方的報告。最好的是，你此後可以安坐在中立地帶，發出你自己的不經檢查的電訊，然後良心（假如不是胃口）平安地入睡。在一九三七年，這同一把戲，雖然不那末容易，因爲空中也有一些活動，但依然可以辦到。

在任何別的現代戰爭中，通訊員和攝影員都沒有這樣的行動自由。當日軍內移以後，在日軍後方是要受限制的，但在中國方面，你可以毫無困難地進入前線。中國人力求避免開罪任何外國人，不十分瞭解治外法權並不包含外人自動冒險權，於是時時加以少許勸告。中國兵士把大多數歐美人看作他們的同盟者（上帝知道爲什麼緣故！）一點也不担心第五縱隊。既然有這樣的自由，互相敵對的特殊通訊員又是那末多（他們的報紙總以目覩的故事或獨得之秘相誇耀），但在上海的戰事中，倫敦每日電訊的年青的P·斯提芬士（P. Stephens）乃是我們中唯一的喪生者，這却令人驚奇了。

這戰事是像這樣的。有一天，在中國招待新聞記者的會中，一個瑞典通訊員尼斯特洛姆（E. Nyström）在閘北淪陷前由北平來上海，他問市長俞鴻鈞，新的中國戰線設在什麼地方。俞市長把插滿針的大地圖指給

他。

「我們的戰線的尾端恰在鐵路以西，兆豐公園以外，」他解釋道。

「啊，」這個勤儉的瑞典人沈思道，「我想我明天應當搭兆豐路的公共汽車去前線。」他就那樣作了。

人們站在所住的公寓的屋頂，看他們眼前的日本轟炸機，把一噸一噸的炸彈，投向隱在屋頂以外的中國戰壕。國際飯店的旅客可以從屋頂餐室寬大的玻璃窗中看出來，一面從容不迫地喝着他們的黑咖啡，一面考究日本砲隊的射擊術。

駐上海的外國軍事觀察家也得到一個無比的機會，目覩戰事的雙方，以及海軍的砲戰。雖然戰爭的結果是沒有疑問的，但依然滿有令人驚奇的地方，在新的屠殺藝術方面得到一些新的教訓。許多觀察家在這裏改正了他們對於日本軍事力量的估計，有一些人第一次開始相信中國最後勝利的可能性了。

日本在這時攻擊上海，是否犯了一種重大的戰略上的錯誤，是頗可爭論的。不過，假如主要的目的是在華北「速戰速決」，這必然是一種軍事上的錯誤了，因為上海的戰事分散了日本的軍力，擴大了衝突的範圍，延滯了隨後的鞏固工作，加強了中國的政治團結和決心。作為一種政治戰略，這舉動是日本人特有的一種錯誤。所有中國統治階層動搖的沒有決心的份子，都集中在上海內外和長江下游，他們與外國資本結合，在民族革命運動中不斷地盡出賣的作用。日本所以不能使中國政治隊伍中這一羣人儘早屈服，主要的理由是，在戰爭開始時，日本把他們的利益摧殘太過，減弱他們在政府中的勢力，消滅他們的物質基礎，否則這物質基礎可以使他們犧牲華北來謀和。

日本也許最好暫時從上海撤退，把她的利益交列強保管，這在列強是十分容易辦到的。那樣，日本便可以集中注意來澈底肅清華北，隨後她可以用侵入長江流域相威脅，藉了中國內部和外國的幫助，她大概可以迫使南京講和。但八月初南京軍隊的到達上海，是日本不能忍受的一種挑釁，更主要地，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性質，使得它不得不即刻除去在政治方面應當保存的和議基礎。總之，日本登陸軍隊既在公共租界內增加，中國的援軍也開過來，沿着閘北與他們對峙，顯然一場衝突是無法避免的了。

在戰爭的初期，中國表現了出乎大多數人意外的銳氣和軍事技巧。面對着黃浦江 日本海軍戰艦的直射砲火，他們幾乎把日本人從公共租界中驅逐到江裏去。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日本軍隊有被完全殲滅的危險。因為中國的右側是中立的公共租界，日人無法加以攻擊，因而延滯了他們的援救工作。援軍必須由長江在北方登陸，穿過由吳淞到瀏河一道二十英里的戰線。這些登陸的動作，使得一些觀察家看出日本作為一個軍事強國的弱點。

中國軍隊的防禦工事建築得很潦草，然而日人在一打戰艦的掩護下，在優勢空軍的輔助下，用了幾乎一個星期，才能使一支隊伍登陸。既經在瀏河建立這一新的側翼，既經由那裏結聚充分的軍力從事進攻，日人依然有幾個星期沒有任何重要的進展。經過兩個月海陸砲隊的連續轟擊，日人才把華軍陣線攻破，使得華軍的右翼從閘北撤退。

這一切使西方軍事觀察家明瞭，日本步兵的「攻勢」一旦遇到堅決的勇敢的敵人，即使雙方條件大致相等，也並不像到處宣傳的那樣可怕——日本後來與蘇聯在張鼓峯和外蒙邊境作戰的失利，更加强了這一

種見解。當中國的右翼既被日本衝破，向蘇州河南岸公共租界以西後退時，日軍竟不能乘勢擊潰中國的軍隊，使得以上的見解在上海格外流行了。日人的進攻是非常審慎的，因而中國軍隊得到充分的時間建築新陣地，於是日人不得不再度從事長期的轟擊和新的進攻。

在華北，日人所遇到的軍隊，裝備既極端惡劣，又缺乏現代的防禦，日本的坦克隨砲火前進，時常擊潰中國的軍隊，因此步兵可以不受損失地佔領新陣地。但在上海呢，這裏有五十萬軍隊，其中包含中國最好的幾師，大砲的轟擊並不能把防軍逐出，坦克的前進一次一次地被阻。大砲很少與坦克連繫，僅只一次兩次地被用作掩護步兵前進的活動烟幕。

據外國觀察家的意見，大砲和空襲的技術也都是不高明的。直到戰事結束前幾日，中國的汽車運輸依然能通前方陣地。雖然日人在京滬之間有五百架飛機，而且實際上遇不到什麼抵禦，一切可能把這些連絡切斷，但竟辦不到。

但火力的絕對優勢，雖然在轟炸鄉村和掃射難民時不免浪費，依然是不可輕視的，中國的陣地一個隨着一個地被摧毀了。成千噸的鋼鐵，從天空中，從大砲中，從海軍砲中，落雨一般投在閩北。據軍事觀察家說，那一個地方所受集中的砲火是從來最重的。中國的損失之大，顯然達到不能長久支持的程度了。

在這種可怕的轟炸下，中國軍隊的平靜的勇氣，看起來是動人的，幾乎令人不能相信的。在死亡之前的冷靜和任命的意識，乃是中國軍隊的一種特長，任何西方民族都未必有。有一天，我自己受到日本飛機更番轟炸的威脅，他們那種完全不顧命的精神使我永遠不能忘記。我同那時的美國海軍參贊武官嘉爾生（Evans

F. Carlson) 少校留在蘇州河南的中國戰線後方，我們不是去那裏考查中國的新陣線的。

當我們經過一個在一些樹的掩護下轟擊北方日軍的中國砲隊時，我們遂走上冒險的路了。忽然間，一隊日本飛機在頭上轟鳴，在砲隊附近投彈。我們加速離開道路，剛來得及在第二彈投下前臥在一所破屋附近——那顆炸彈正落在我們先前站過的地方。我們爬起來，再往下跑；回頭一看，我們先前臥過不久的地方又被炸中了。同樣的事連續發生了好幾次；日本飛機在並無目標的地方一路隨着我們的逃避轟炸。我們想到這些飛機隨時可以用機關槍掃射我們，當我們不能再跑下去時，我們來到一道小河旁邊，我們於是溜下岸去，伏在多少可以遮掩的地方。

另一飛機機來了，但飛過我們去，向岸上張望時，我看見它們向不遠的一叢樹中投彈。後來的飛機更向西飛去，於是我們又爬回田中，覺得我們的得救是一種奇蹟。這時我看見一個青年哨兵，大致不能多過十六歲，從樹叢內一個坟墓後邊站起來，戴正他的軍盔，拾起轟炸時震落的步槍。他恢復了他的崗位，當我們行近時，快活地招呼我們。同他談起來，我才知道，在前一晚，他曾留在前線一個戰壕中，那裏還有十七個別的兵士，一個炸彈投下來，除了他以外，別人都死了。這時，附近沒有一個伙伴或官長，他的冷靜和安詳，使我感動，以至吃驚。

在十一月初，中國傷亡已經達到十五萬人，防守的損失顯然屬於南京的第一線常備軍。一些中國最好的師損失過半了，物質的犧牲也是很大的。到這時，中國才想在未完成的三合土防線中預備一個強大的輔助陣地。這道防線，在上海東八十英里，由長江經蘇州南達杭州。但在守這道防線的援軍未到以前，日人已在杭州灣登陸，終於使這場戰事完結。日人由杭州灣迅速內趨，透入中國右後方的松江和閔行，迫使防軍在十一月九日

總退却。在這時，日人按照他們每次勝利後的習慣，在閘北高空放起一個繫留汽球，從那上頭垂下一長條飄帶，上面寫有自吹自捧的字句；不料那天竟發生了一件趣事，打破了十分沈悶的空氣。路透社女訪員C·狄密爾（Christine Diemer）看見這汽球在火和烟上飄浮，於是慌忙從電報局的屋頂跑下，向倫敦發了一個電訊，說日人有一種新的秘密武器——「浮空炸彈」。

但中國的後衛依然在南市守了兩天，我們在這裏看見戰事的結局。我相信，一個旁觀者再也不能看見像在南市所見的那樣逼近而又廣闊的戰事了。我們與戰場只隔一道徐家匯河。這道河不過五十英尺寬，形成法租界與中國地的界限。我爬上一所臨河的中國公寓搖擺的陽台，那裏已有半打攝影員。他們應當攝就好萊塢從來未有的最完善的戰事影片。但我不會看見這些影片上映，我可以想像，美國那些不耐煩的觀眾一定以為這都是假的。

在河的右方，我們看見日人小心地前進，從這一掩蔽物到另一掩蔽物，逡巡在他們的坦克後面。他們的坦克呢，走不上幾尺路便停下來，用斷續的砲火震動天地，然後退却了。在我們對面，不過一球之遠，一架中國機關槍從一個混凝土的堡壘的方孔中噴射出來。這堡壘便建築在徐家匯一個狹窄的支渠的左岸上。沿渠有一長列草舍，都藏有中國的襲擊兵。從後方什麼地方大砲轟鳴，砲彈從頭上尖叫。在華方的河邊停有一些舢板。船上的人若無其事地吃飯，直到一架機關槍突然向他們掃射過來，他們才伏到蓆子下去。我永不會知道他們是否喪命。

轟炸機出現了，使得一串草舍燃燒起來。好幾架飛機在一個中國堡壘上轟炸，終於從二百英尺的高度將

渠隄炸壞。日人沿渠轟炸，我們在看臺上像盒子裏的骰子一般顛動。我看見日本步兵在對岸破牆的後面側起身來，預備過渠進擊。一架戰壕白砲從正面發了一砲，我看見一些帶銅盔的中國人伏下來，向後方逃避。現在全部南市火光燭天。侵略者放了一個烟幕，逐漸把全區包裹起來。最後，在渠下一百碼處，在濃烟籠罩中，我僅能看出。一列日軍爬過在他們前面架起的浮橋。中國軍隊在退却。

我們回市區去取膠片。我在都城飯店遇見倫敦泰晤士報的通訊員 M·麥克唐納 (Maccolm MacDonald) 這人後來寫過一篇最生動的戰事通訊，便是炸沈美艦潘內的故事。當這條軍艦在南京上游被日人轟炸時，他正在艦上。麥克一面與我同行，一面埋怨我誤了他的飯。我們又約同嘉爾生，回到迅速變動的「前線」。現在是在幾區建築物以東。走到法國電力廠，我們設法進入院中，走上河旁的水塔頂。我看見斯提芬士的黃色的大腳踏車停在不遠的路上，但看不見斯提芬士在什麼地方，我相信他一定在沿河的一所建築物中。

水塔是徐家匯一帶的最高點。它矗立在工廠的一百英尺以上，從頂上我們可以鳥瞰全部戰局。我們走上低級的平台，正要再往上爬時，突然一陣子彈向這建築物射來，這顯然來自裝在河下游一座建築物上的日本機關槍。幸而有一道三合土的牆遮住我們，但槍彈亂擊我們上方的水塔。鎗火愈來愈密，我們爬下來，走進電力廠。槍彈擊碎厚玻璃屋頂，玻璃和牆紛紛落在渦輪上。十分鐘後，槍聲停止，我們又出來，這一次走上水塔下面混凝牆旁的一個木架子，在那裏我們可以看見河對岸，也可以照像，同時可以遮蔽另一次攻擊。

在我的腳下面，是一大片紅色。

「看！我對麥克和嘉爾生說，『這是血呢還是油漆呢？我不記得幾分鐘前這裏有任何油漆。』」

當我們正揣測那一片顏色時，我們聽見牆外發出一聲叫喊，向外一看，便見中國軍隊擁過徐家匯法租界的鐵絲網。中國軍隊現在完全被包圍，再往後退，便進入由南市的黃浦江岸來的日軍射程以內了。來復鎗、刺刀、手鎗、手榴彈、子彈、防毒面具、鋼盔堆積在街道上，也有備收藏的紀念品。這軍隊是十分年青的，有許多人彷彿還不到童子軍的年齡。已經到來的法國守軍司令，說話相當和善，一面稱許他們作戰的勇敢，一面向他們保證不把他們引渡給日人。

我發覺嘉爾生不見了。四下裏一看，我看見他正爬上水塔。攝過幾張影之後，我跟他去，但當我走上水塔時，我遇見一些驚慌失措的法國人從上邊下來。隨後我看見他們中的一個受了傷。我退下來，向那曲折的梯子上張望：另一渾身血污的受傷者拐了下來。走在他們後面的是嘉爾生，還有幾個別的人，拖着斯提芬士的身體。滴在我足旁的顏色，正是斯提芬士的血，並非油漆。他死了。

「我看見一隻腳從塔頂垂下來，」嘉爾生告訴我，「於是跑上去看。當我走到那裏時，斯提芬士躺在一窪血中，另外有兩個受傷的人，還有幾個別的外國人，驚得伏在一起不能動。」

斯提芬士被擊中頭部和鼠蹊。驅逐我們走進電力廠的那一陣子彈，顯然是向着塔上的這些人放射的。這是多麼困難的地方：在一片餅乾大的臺子上，離地一百英尺高，無處可以逃避或移動。他們一無辦法，只有留在那裏忍受了。

這是十一月十一日，幾乎是上海戰事最後一點鐘了。斯提芬士依然在鈕孔中帶有一朵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的紅罌粟花。

第二章 從上海到漢口

一 沒有領袖的上海

在人民政治組織和教育方面，並沒有什麼進步。這種失敗，隨着戰爭而愈益明顯了。

——一九三九年國民黨宣言

日本奪取了上海及揚子江流域下游，使中國所有近百分之七十的現代工業不能動員。在上海一地，就有五千五百二十五個大小工廠及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一個作場（註一）為日軍所毀，或為日軍所奪。即在廣州與漢口陷落前，日本已奪去了中國全部電力廠的百分之七十。現存重工業的半數已經喪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造紙橡皮及紡織工業不是被毀便是被佔。他方面，三百個絲織廠停工。上海的五十四家繅絲廠，其中有五十八個陷入日本人之手。中國百分之八十輕的及重的機械廠是被毀或被充公了。

中國戰前工業的殖民地性，可以從這種反常地無意義地集中於沿海地帶，與設在租界之內或鄰近租界的這一事實上，清楚地看出來。差不多所有官辦、或半官辦的工業，都不聽專家的勸告，設立於游弋黃浦江與揚子江日本軍艦短距離的射程以內。許多戰時工業竟設在虹口與楊樹浦公共租界的日本人的防區以內，這一

（註一）根據一九三九年重慶經濟部的數字

帶早已被人知道，一旦發生任何事變時，要爲日本海軍所駐防。國民黨的高級官吏，是上海工業投資當中最的人，這些人又重在一九三二年戰爭中被日人毀滅過的同一地點建設了工廠，他們很單純不信這樣的事件會再發生。同時龐大的國內市場，無人加以注意，牠的資源也不加開發。在上海及其他條約商埠，商人重利剝削者，買辦資本，實際上是與國外帝國主義者合作，建立了殖民地經濟根據地，阻礙了中國的正常工業化，而供給了日本從那地侵略大陸的必要的立腳點。

如果中國工人在戰前允許其組織起來，如果對他們施以任何種類的政治訓練，以備動員，中國很多的工業可以搶救而移到內地去。熟練的工廠工人，可以保留中國一方面的前線。可以使日本從租界方面指揮的軍事行動，付出遠較現在爲高的代價。可是這樣預謀，在一個政府恐懼工人即便不超過，至少也等於像恐懼日本人一樣的情形下，完全不可能。

在一九二七年，六十萬以上的工人，曾在上海組織起來，在一個成功的叛變下，當蔣介石將軍還沒有帶了他的國民革命軍抵達以前，工會便佔領了華界，驅逐了張作霖的奉軍。但幾星期以後，蔣介石成立了反共的南京政府，工會及人民組織都被摧殘。五千以上的工人領袖及其黨徒在一次歷史上浴血最慘重的事變中，被消滅淨盡。即使在那次事件後，南京的勞工政策，依然保持其專制與陰謀的作風。在那想以武力統一的十年中，國民黨與外國巡警及上海的外人廠主密切合作，殘酷地禁壓工人爲其政治及經濟權益而奮鬥。

外國當局不斷地邀請國民黨中的流氓協助人仲裁租界內的工潮。公共租界英國人所管轄的巡警不斷地逮捕工人領袖交與南京羈押或鎗決。即使美國人所有的上海電力公司，對待工人比較地良好，也一直津貼

某青幫著名領袖蔣介石頒佈了罷工爲不合法的戒嚴令，並公開地宣佈，工人的工作時間（平均每天十二小時）應該加長，而不應縮短。在一九三六年，南京政府正式答應禁止青島日本人的大紗廠的罷工。

由於這樣歷史的結果，上海工人（占全國熟練工人半數以上）在戰爭爆發的時候，不但因爲他們沒有組織和他們最優秀的領袖死掉或在獄中而沒有力量，並且非常鬱鬱不平與仇視國民黨的。後者在過去十年中，曾製造了一種破壞羣衆組織的工具。這種工具不能在一夜中就使其變爲羣衆領袖的工具。可是即使在很晚的時候，如果有決心要這樣幹，動員這些可寶貴的男子與婦女，也並不是不可能。

如果這些工人動員起來，有適當的領導，無數噸的機器工具及金屬可以在七月七日至上海陷落前運出。上海的較多數的工廠是由輕機件及工具所組成，體積很小，便於運輸。這些工具對於一個爭奪大後方的長期戰爭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些地方，因製造工業稀少，這些物資實是無價之寶。如果江河船舶及運輸工人都已動員起來，如果長江下游四萬萬農民當中只要有很少一部分成立羣衆組織，無數噸的有價值的工具就能安然運入內地。

日本在中國境內的投資，約有三分之二（共約十億日圓，爲數不明的借款尙不在內）是集中於上海。大部分的日本工業是在公共租界的虹口與楊樹浦及與閘北接壤的越界築路區以內。日本棉織工廠一項僱用五萬以上的中國工人；實際上所有日本工業皆僱用中國工人經營。如果這些工人組織起來，日本在上海的工業根據地，可以在蘆溝橋事件發生後與四個月後從上海撤退期間，完全毀滅。大部分日本人的工廠能够毀滅掉，而中國軍隊也許可實際佔領虹口與楊樹浦。

但事實是當中國軍隊從這日本重要根據地及立腳點被驅逐開去後，他們讓日本工廠差不多安全無恙。上海日本三十個大棉紗廠中，只有兩個紗廠被毀。公共租界中只有日本的六所工廠受到嚴重損害。（註二）在租界中因為是敵方工業而遭受到的戰時損失，也許比之日本人自己所加於那地方億兆圓的英美投資要少得多。

但在戰爭計劃中展開勞工運動，需要政治組織與共同享有權力，這兩者既不是國民黨也不委員長所願意讓步的。即使少數幾個中國工業家極願自動地想在日本侵佔或毀壞前，搬走他們的工廠與熟練工人，却有時因這樣的努力而受到懲罰，那是為人所周知的事。在上海戰役中，淞滬警備司令楊虎損害每一個想作這樣活動的人，而從中發了一筆大財。

共產黨沒有合法的地位，他們當中有好幾十個人仍在上海監獄中，國民黨繼續壓迫任何受他們影響的組織。在日本佔領該城不久前，他們才開始認真地的組織，到了那時已太遲了。好多政治犯在整個上海戰爭中仍羈留於華德路西牢內（那裏面會有幾個人為砲彈所轟斃。）好幾個月後，仍有人請求政府釋放他們，但據我所知，他們到今天仍奄奄待斃於上海。

事實是國民黨中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分子，在上海有非常濃厚的買辦利益，不願看到其毀滅。他們始終懷着百分之五十的希望，以為列強會來援助他們。他們不願意他們的工業被移走，或被毀壞，並且他們也認為一個中國不對這國際帝國主義的堡壘捐輸血汗，乃是匪夷所思的事。在經過兩年的戰爭中，中國最高統帥不

（註二）見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工部局『工業現狀』的報告

願正視那種顯然事實，那就是中國長期戰的無情的必然結果，任何給養的方法，都不能存在，反讓日本人改造成為他們自給的根據。國民黨與委員長太為對外國資本的義務所束縛。他們關心於每個條約口岸的『外人資產的保護』，遠超過他們把握住那殘酷無情的真理，那就是每一個城市讓其完全無恙地存在，即無異任日本侵略勢力的伸張，而給無數中國人以致命的打擊。

國民黨不能擾亂以往整個帝國主義勢力深入中國中心的路線，從而不能擾亂目前自內部為日本所取而代之路綫。官僚為解救那些神聖的外人資財而受着那些空泛的獎飾——自然政府官吏也有很大的利益在那些資產中——他們以為那種『維持現狀的帝國主義者』一定會讚許他們這種服務，而起來反對日本，保護他們的權利，以為酬答，他們也用了這種幻想來自慰。無論如何，他們希望外人阻止日本人有效地阻止日本人獨佔那帝國主義利益星羅棋佈的地帶，作為進攻中國其餘地方的根據地。

在上海，我只遇到一個中國官吏，他似乎看得非常清楚，認為這地方的生產工具的喪失，對於中國具有何種意義。這人是朱子文，委員長的內兄與中國銀行的董事長。

我有一天問他：『政府的全部經濟都建設於環繞上海的四周，當你們失去你們上海根據地後，你們將怎樣辦呢？』

他回答說：『你以為怎樣呢？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在內地組織一新形式的生產。那就得我們人民以極端忍耐出之，但我們却很能够那樣試一下，如果別無其他方法。舉例來說，我們只要一看中國共產黨在江西所應付的同樣不利條件，就可知道。只有一個省份在手，他們却能和政府百萬大軍作戰而仍不被殲滅。從那一點，你就

能明白，當整個的國家爲着一個目的而動員起來所能完成的任務。」

「哎，是的，但那意思是講，需要一個很大的改革。」我說，這使我想到了紅軍所根據的特殊立場的農民革命。

「你認爲政府是準備趨於那樣的極端麼？」

宋子文眉頭一縐，遲疑地說：「也許還沒有。但在最後，一定要做到動員一切抵抗力的必要的事。」

「一個良好的發軔，可以在這地方進行。如果民衆是組織起來像江西一樣，你們能够搶救出不少的工業機械。動員會使政府獲有很大的權力去徵收工業與財富。如果工業家不願自動地移走，爲什麼政府不強制接收工廠與組織人民去把他遷入內地與恢復內地的生產呢？」

他同意說：「這件事應該去做。某些事已經着手。也許在上海已嫌太遲，但在其他地方仍有充分時間。我們應當忍耐。」

但雖則宋子文在中國有着最優秀的財政頭腦，明白各方面有動員的必要，可是他却不在政府大員的職位。他有他的獨立見解，時常與蔣委員長不一致。

這些中國最進步工業根據地可怕的全部喪失，與上海熟練工人與中國戰時奮鬥很大的隔離，都是可以責備的幾件事。在幾月以內，日本開始利用這些工業及運輸工具，這些東西是中國當局在退却前沒有移走或毀滅的。日本把上海變爲進攻長江上游的一個龐大的根據地。

中國怎樣克服這一個在戰爭開始所受到的鉅大損失，我們將在後面講到。但在這個時候，好多人在這大城市的灰燼中，以及在無組織的由兩租界區慈善機關負責的難民收容中，看到中國抵抗初期的結束。

二 戰場憑弔

日軍除開增進中國大眾繁榮以外，絕對沒有別的企圖。——土肥原

有時，我漫遊上海重大毀壞之區，一英里一英里地走過去，偶然有着一個烟囱，或電綫木聳立着，看到令人心傷。無主的電綫殘缺不完地懸宕於頹壁敗垣上。屍體從瓦礫堆中，發着臭氣；每一樣東西都是靜悄悄地，正像那在冬天太陽中腐朽的死亡一樣。

以往，我非常熟悉北與虹口的一切，但這時所熟悉的標幟已完全消失。行走這可怕的世界中，宛如一個焚餘的地獄，你很可能變為迷惘失神，但有一個人似乎依然認識每一塊傾圮的磚，每一架被擊毀的機器。這人就是艾利博士（Rewi Alley），一個紐西蘭人，他那時是上海工部局工業部的總稽查。我過去在上海的時候，曾和艾利一同出發，參加調查工作；那是你所能得到關於這座城市的最好的教育。現在和艾利出遊，經過了這一國家工業區域廣闊的廢墟，立即把這些毀壞了的工場活躍於你的眼中。

我們看到日本人圍繞着被桎梏着的一羣可憐的中國俘虜，扛走任何可以想到的廢鐵來源。從若干差不多沒有毀壞的工廠中，他們移去全部機件，運回日本，那地方再由陸軍售料部賣給資本家。貨棧中的貨物，也全被偷走，任何金屬都攜走不留一絲。艾利自己在江灣屋中的所有，也差不多被劫掠一空。

自然，在閘北的許多工廠依然未動，好多在公共租界以內的中國工業（在虹口與楊樹浦）也很少毀壞，

因為這些是日本首先攫奪在手加以經營的，因為他們完全控制了蘇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

對於艾利，他知道這些毀壞了的機器，都由極端剝削工人而產生，所以鐵是真正的血肉之軀，在他簡明解釋之下，這些東西都變為虎虎有生氣。有時，他指點着日本人所還沒有搜刮去的一團不成樣子的鐵，會突然使你想到了全部工廠的景象，正如一個爆炸了的彈片，在倒置的電影中所集合起來的一樣。

「那是張智林的汽鍋，」他倔強地說。「我叫他在不久以前裝置的，原先的那一個是危險的。我奇怪那可憐的機器是否也在那一團糟的中間呢？」

或者，我們到了一堆十分混亂的磚頭堆的時候，你仍能從那裏面看到毀壞了的傢具，或拆散了的輪子，或輪軸。艾利就要自動地說：「這是楊興的電料廠。」我幾月前告訴他在機器上設安全防止物。他不照辦，一直等到他的兩個工人失去了手指。」

如此等等。這一位艾利曉得這樣幾百家被毀工廠的個別歷史，以及在牠們裏面做工的幾千工人的生活史，這一種智識是比中國任何人所能知道的還要來得親切完全。雖然由於他是一個公共租界的檢查員，他的權力不及於中國市政府所轄區，甚至對於虹口的中國人所有工廠，也成疑問；但他們都受着他的影響。雖則有好多外國工業家對於他的「改良」的企圖表示反感，雖則工部局祇容忍這一個由邢德（Eleanor Hinder）及他自己指導的部存在，然而他們却有他們的成就，救援了不少人的性命。

因此艾利明白這些工業所損失的一切，不獨金錢蒙受損失，並且就人力上講，也永遠蒙受損害了。對於他，那就是幾百萬小時的勞力，這種勞力產生了中國工業的財富，以為交換飯盤之資。而這些飯盤却已在火焰中，

或日本的砲彈中喪失了。他也知道在這地方的殘跡中，也使他十年想把亞洲工業灌注一些合理的舉動的企圖，同歸於盡了。

就我個人講，我看到那些最惡劣的汗血制的工場的毀滅，不禁感到某種惡意的滿足。在日本把工業建築於婦女的肉體上，而在上海，却時常以青年兒童爲吮血的對象，他們當中有好多人，訂契約賣給他們的主人，經過好多年變爲實際的奴隸。

艾利有一次在旅途中，曾說起：「一個壞蛋經營着一所藏垢納污的作場，從孤兒院僱用了六十個孤兒，此地差不多所有的孤兒院，都是奴隸工作制或者是奴隸販賣所。這一位蠢豬把這些孩子們睡在他機器上面的架子上；他們從不出外，他們每天工作十四小時，機器沒有防止危險的設備。他從這上面攫得了百分之百的利益。真是一個好的營業。當我檢查孩子們的手指的時候，我發現其中有二十六人失去了指頭。在那一個作場中，總共有三十八個指頭切去。」

在戰事中，這些孩子們當中，有好幾個爲他們的主人鎖在工廠中。好多死掉，還有好多被日本人俘虜當爲男奴。我記得有一天和艾利在一起，我們發現幾個學徒推翻了慣常的事態。主人會把他的孩子們鎖在閘北的工場中，他隔一兩天偷偷地到那地方去看看是否中了砲彈，和拿些食料去供給替他做工的牲畜，一天，這些孩子們哄鬧起來，拿了鑰匙，把主人自己鎖在裏面。我很抱歉，這是我所聽到的那一類事件的唯一消息。

艾利慣常地說：「這些鴿籠爲砲火轟毀乾淨，並不是一件壞事，如果比較好的事件能够代替牠。然而那却是最壞不過的事。日本人使事態弄得十倍以上糟糕，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真正無產階級的奴隸是怎樣的情

形。

大多數人關於這件事都作那樣想法，但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我記得曾聽到一個以前曾遭遇過工潮的外國人這樣說：那也許是一件很好的事，中國人現在可以『安分』了。他相信這樣一來可以使『勞力更廉價一些。』對於日本人——的確可以辦到這一層了。

八十萬以上的工人，因上海戰事而失業。好幾個月來，公共租界與法租界擠滿着兩百萬的華人，至少當中有一半人是部分地或整個地陷於絕境。在上海戰事終了以後，男子婦女及兒童，喧鬧於隔絕中國南市與法租界鐵門之外。在這些地方，饒神父設立了他所謂中立區，有三十萬被困陷的人，擁擠在這地方，以求獲得這位神父所能給他們的短期的安全。

艾利和我從由安南與法國軍隊防守的鐵絲網看過去，在鐵絲網的那邊，形容可憐的無組織的民衆，終日祈求鐵門開放。並討乞麵包與水。不時有中國救濟機關，從法租界方面，准許走到這旁邊來，把饅頭或麵包從鐵柵上面拋過去。不時有着中國童子軍（他們在上海戰爭中，做着成人的英勇事務，其中有許多人犧牲他們的生命），帶着幾桶水來。四周的大火從烟霧迷漫中吐着光耀，這些烟幕，是你在他們後面的天空所能見到的唯一事物。好多在那些悽慘狀況羣衆中的人，都有着絕望的爲烟薰黑的面孔，其中有許多人頭部四肢受傷而縛着綑帶。那情形看起來很像巴黎六月的叛變，所缺者只是這個地方沒有革命的情緒。這地方只有無武裝與無組織的受驚嚇被封鎖的人，想從他們的鄰居獲得逃出牢籠與援助的辦法。

好幾個月中，你不能走過任何偏僻的街道而不踏着這次大災禍的犧牲者。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難民收

容所從沒有能够收容十萬以上的人。其他五十萬以上的人，睡在行人道上及街上，房屋及店舖的走道中，窗壁間，垃圾堆中，他們利用隨身所帶的藍布小包裹，做着枕頭，破布與舊報紙當做被褥。巡捕防止這些無家可歸的人，聚集在大街上，這些地方，他們常在夜裏流蕩到一起，從電光照耀的店舖櫺窗，獲得些溫暖。每一條弄堂中，苦難的人們蹲踞着，立着，或尋找有空地的地方去睡。

我到這些地帶，這些樓面以及出租房屋去搜尋秘密，我的報紙需要有些故事。好多人在那裏日夜不斷地輪流着睡。他們在樓梯的兩側，劃成了重疊的邊界，在這裏面的，大部分是婦女。你從一層樓到一層樓，得小心穿過這人體橫陳的地帶。雖則夜間是冷風刺骨的，每一個這樣租屋的屋頂却都被人佔滿。三四層樓的房屋原來預備住四五十人的，却住了四五百人。

即使在收容所中，似乎比較衛生一些，然而好多星期中，每天平均仍有二百人死亡，他們都是飢餓、痢疾、霍亂、傷寒、紅疹傷寒及其他疾病的犧牲者。有一天，在一個救世軍所辦的大收容所中（一萬七千人擁擠在一個學校舊址的各教室中）我看到六十個屍體搬出去，其中大部分為婦女與小孩。救世軍竭盡了他們全副的精神，在這裏面，還可找到一間產婦室。至其他地方，赤貧的產婦，時常在走廊中，弄堂中，有時甚至在行人道上，或街道轉彎角上生產。

好多基督教的工作者也竭力來參加這種工作；但我也遇到好多外國人，他們似乎一些不知道關於這些人出於尋常的事。來往於他們日常購物或公事房的瑣事中，他們把車從靜安寺，或霞飛路，或海格路開來開去，只看到在他們面前的汽車。在他們的意見中，整個的事件，有些『過分的誇張。』我曾在俱樂部，或中央飯店舒

適的餐檯上，聽到有幾個人說，收容所實際上是一件可怕的东西。『這些難民將養成專吃不做的習慣。他們決不想再去做工。那是一個職業呀。』

非常可怪，這些人却對幾個無主人的貓狗的痛苦，引起許多可驚的關切。在富有的上海，大眾飢餓當中，本地報紙的通信欄裏，常填塞着歐洲讀者的不合時宜的問題。關於當心金魚問題，曾引起熱烈爭論，報紙上登載了好幾天。我記得曾有一個寫信人發表一封使人眼淚都會掉下來的信，請求大眾把他們家中殘餘食物煮熟，放在垃圾桶旁，以供那些餓狗食用。另外一個『老上海』則表示非常難過，因為當他驅車經過法租界時，他會看到一個帶着口罩的狗，流落街上，沒有主人，因為擔心那條狗沒有吃又沒有喝，害得這位寫信人一夜不能安眠。那些對於一兩條餓狗作不合時宜的煩惱的人，（其實狗可以從那面的壕溝中的屍體，吃得很飽，）顯然對於那些無數兒童為貧困所束縛，沒有臥具，沒有食物，沒有父母，在餓斃的慘狀下，是不會引起他們的同情的。

我對他們的心理，不求甚解；我只不過盡報導的責任。

同時，夜生活已恢復。所費極奢的旅館酒店、咖啡店、妓館，在蘇州河以南，做着好生意。汽車在靠近我住的樓面的那些四元一跳的舞廳旁邊兩租界上的各區域停滿。頭髮上擦滿了油，穿着綢衣的中國人在地板上婆婆起舞，非常自得其樂。我敢說這些人當中有好多人是那些工廠在租界上未受損毀而賺錢的主人，或者是那些地主，他們把租費增加了一倍，同時把難民從他們的貨棧中趕出去的人。……一個愛國志士作了一次演說並在這些地方的某一處投了一個炸彈，希望把他們都置於死地，地好多人有一時期裹足不前。但那些經營這種事業的流氓，却僱用了保鏢，公開地陳列於那兒，並在門口，用外國巡捕站崗。安全的信賴，不久又恢復了。

我想起我在北戰場的朋友所給我的好多信，講到穿着棉衣的軍隊寒冷而死，及手指因為沒有手套而凍落了，不能拿步槍及手榴彈。我奇怪，這是爲什麼呢？不是爲了這些頭髮油光光的穿長衫的人，他們舞票的代價及一夜飲酒所費，就可救出一打人的手指或生命吧？外人控制下的上海的中國殖民地的產物，是世界布爾喬亞當中最腐化的一羣，除開香港的類似的人以外，實莫與倫比。中國的戰爭，如果不包括摧毀這一城市流氓對全國的勢力在內，將變爲毫無意義。

無數沒人收殮的屍體仍在這些活動隔開幾步的房子腐朽着，這一件事我覺得特別令人反感——因爲那些幹這樣活動的人，不是從前線回來的戰士，在再去拚死前尋找一些歡樂，而是中國人所稱的『解悶的執棒兒』。在相反方面，上海西面的戰場，那地方我和艾利星期日去散步過的，空氣非常新鮮可愛。那是一個奇怪的逃出塵囂的地方，可是對於我們，却是一個對於這可傷心的城市，一個可以改變觀感的地方。一個人至少可以相信，上海不是中國。一個在這發芽滋長的泥土上，意會到橫在那以外的中國的力量與廣大。一個人又能感覺到瘡痍滿目而出產仍豐富的土地內，有着新生希望的把握，遠較那當前的死亡，更來得大。

公共租界西面，及蘇州河南面，田野中充滿着砲彈孔穴。混合在腐朽的兵士屍體中，是着藍布衣服農夫，他們仍深耕着他們的田地，努力不怠。日本人在這一帶大規模的縱火焚燒，差不多經過一星期之久。村莊都成爲可憐的焦土；以前奇怪拱形的橋，都變一團枯木，欄干向着天。日本人仍在灰燼中，搜索金錢與古玩。被徵服務的中國羣氓，搬走了最後一片的銅鐵、鍋釜、窗框、門軸、車軸、絞鏈、鐵釘、螺旋釘——鉅細不遺。田野中撒佈着沒有爆發的手榴彈、鎗彈、砲彈，這些東西都逐漸被人收集起來。到處有着爲高射砲彈擊毀的鋼盔，半浸沒於最近

所降的雨中，將那些戴鋼盔的頭顱，自然地埋在水中。武裝的日本兵士，監視着一羣中國人，命令他們掘去在戰場上倒下的士兵，四周的殘餘屍體及泥土。

我看到一個年青的兵士屍體上，找出了兩張染着血的一圓鈔票，孫中山的兩個頭疊得很齊整地放在他的棉外套的袋中。

同志，不要忽略他的微笑的情人的照片，是在他一半已吃掉的手旁。你拿走了，他決不放在心上，他已決不會啜泣，你可以用他的錢來糟塌他的愛情，這件事不會遭到死者的要求停止。他所要求的，只是把那腐黑爛熟的屍體清除掉，這屍體據說會有一個婦人對他表示親愛，他是急切要清除那從未好好地生活過而只消耗於死神面前的生活污點。不，不要沮喪，把一圓錢退回他，那錢是救援你的母親或你的少女的勇敢所獲得的微薄酬報。把他的屍體衣服剝去呈露於雨中，他將如此感謝你，這樣會加速他的驕傲消失在這美麗的無名土地上的美麗長眠中。

沿着這一帶走過去，你可以看到到處有着緊握的拳頭，或一條手臂，一條腿，一個被擊碎腦蓋和趕成的墳墓作抵抗。學解剖學的人，你也許會欣賞這種景象，這種為炸彈任意所造成的解剖，在那供給上海的蔬菜的公共汽車經過的大路上，行路的人看也不看地從一座堆着屍體四四方方的角堡的橋上走過去。藏有火藥的手榴彈仍點綴着農夫所踐踏的小徑上。在那地方，你可以看到污泥中，有着一方識別的標幟：用一件制服的一片代表着『張友民』，他的其餘身體，早為那遊蕩那地方的，以充滿着蛆的屍體為食料的貪食的狗所吞噬。

農夫挑着小袋的米，經過裂痕滿地彎彎曲曲的田野，到上海來出售他們的生產品。有時，日本人叫他停下

來，要求賦稅，榨取幾個銅子，或幾個角子，或者解下一個老婦人的一隻用得舊的銀鐲。在公共租界的邊境，他們付一圓的『輸出費』，以便他們的包裹能經過鐵絲網。我們問那些農夫，他們來自多遠，其中大部分人都說來自五六里以外，雖則我們也曾遇到過幾個走上兩三天，帶了值幾圓的穀類，冒着各種勒索的危險來到上海出售。青年男子與青年婦女是沒有的，只有年老的人與兒童。一個年長的人帶了一個女孩與兩個男孩，在另一條路上行走，據說是回到他的農村中去。他的房屋或他的所有物，已蕩然無存。

他愉快地說：『還是有田，還是有泥。』

在戰場中，少數幾個農夫在他們自己田地上面建築起來的蘆葦棚中發抖，深恐土地也被人攜走。有幾個農夫甚至在毀滅的土地上耕種，很小心地繞開那些屍體。我看到一家人環繞着烤火，靠近一堆黑色的灰燼，那一堆以前就是他們的草棚。他們眼睛紅紅地沉默地注視着那柔弱的火盆。艾利拿出一些錢給那近邊的小女孩，她難為情地加以接受，當我們問她是否怕時，她苦笑了一下，搖搖頭說：『現在雖痛苦萬分，但最後我們可獲勝利。敵人要退回去，好日子就會到來。』她却以我們所不及料的精神說着。

三 艾利這個人

工人是社會的健全分子，與他們共命運乃是我們時代的真正冒險事業。

——艾利

我第一次遇到艾利博士，是遠在內蒙古，那時是一九二九年的乾燥的六月，雖則我從沒有想到我有一天

會寫這些關於他的幾節文章，我可知他是一個有些異乎尋常的人。

我們是僅有派到張家口以西去的做「振災專使」的外國人，那地方有三百萬人，瀕於餓死。除開我和中國政客所乘的專車外，只有四等車和無頂鐵棚車，塞滿着農民與貨物。在後者的車中，我很吃驚地看到一個歐洲人走出來吸一口空氣，在火車站的月台走着，我走向他去，對艾利作自我介紹。

他是在那些黑暗帶病的羣衆當中，一個特別不調和的人物，他的太陽晒紅的面孔，滿帶風塵，上面的頭髮亂蓬蓬地豎起。他僅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但却有着龐大難看的手臂和腿。當他用着那龐大的兩腿，按照他的特殊姿態立着，他看來好像植根於地上似的。他的大頭，有着好像一座石頭的大山雕刻出來的側面，引起我的注意。

我推測他在那使人窒息的車中，也許困苦非凡，我提議他來和我們在一起。引起我的不快的是，那位政治家對這建議不贊成。若干英國人曾污辱那位可憐的人，他生存着好像專門從事報復似的。如果我那時更其了解艾利的爲人一些，我必更能知道他是一個隨遇而安的人物。對於那一方面，他比我們，更其能做一個好的伴侶。

他笑着說，「沒有關係。」「看那奇怪的地方。」他的目光注視着那廣大的蒙古草原在眼中移轉過去的優美風景。「牠像我所來自的紐西蘭。」

這一件意外的小事有着象徵的意味。艾利從不引起人家的不安，或污辱觸犯人家，也不對他的蔚藍色眼中所看到的，遠方人民看做奇跡的加以干涉。他能接受一切——任何大量中國所能呈現出來的東西。對於那

些明白中國的人，中國有着一種高尚，不過有時是過分奇特的使人滿意的制度。

我們在薩拉齊分手，我在太陽如焚的不毛之地作了一個短短的旅行，在那些地方，我第一次看到餓死的人。我不過只是一個驚懼萬分的觀察家，而那位艾利，那時已在上海工部局任職，却選了這地方，作為他的休假的對象。他在那地方過一個夏天，在傳染着傷寒症的人民中間工作着，分配賑糧給他們，看護他們的瘦弱的兒童，使他們恢復健康。

我眼中充滿了這種景象，我回到北平為紐約先驅論壇報寫了一篇通信，一個紐約的小孩讀了這篇通信，從紐約寄來一圓美金給我，救濟饑民。據我所知，那是我的通信所能做到的唯一好事。但艾利却做着更多的事，而其結果，使他變成了更具人道的人，並且為他某一種人生目的的開始。

第二次我見到他時，他已做着一個孤兒的養父，那孤兒的父母在飢荒中已經死去。他替他的養子取名為愛蘭（Alan）而將他送到上海一個基督教學校中去讀書。

兩年以後，艾利由上海工部局資助，派到辛博生爵士那裏去，幫助修築長江大水後的堤防。我又再寫了幾篇通信，而結果艾利又領了一個災况中的孤兒，作為愛蘭的兄弟。他替他的第二個兒子取一個教名，叫做米契兒（Michael），在工部局一羣人當中，白人的大人先生與苦力同桌，認為乃匪夷所思的事，因此艾利家族變為一種神話。因為在幾年以內，那兩個不識字的農民孩子，變為兩個漂亮的青年，這是任何義父都可值得驕傲的事。在中學中，他們領導他們的同級同學讀書遊戲。最後，在聖約翰大學中，愛蘭被選為級長。那是在中國對於一個來自不知名的農民家族的孤兒極光榮的事。

有着那高瞻遠矚的眼睛，他的帶些紅色的頭髮，他的英國人的鷹爪鼻，艾利是一種純粹洋鬼子的形相，足以使中國兒童嚇得舉止失措。可是他今天也許比之任何外國人都要受他們的敬愛。即使在工業合作時代以前，他已幫助了好幾百個從上海到蒙古的不幸的兒童。他自己的兒子，變爲他解決中國青年問題及了解中國人情感的各項困難的手段。他曾經領養了他們，而他們也被決定了中國現在也一定歡迎他們的。他和他們經過關山河川，走遍中國，和他們在一起學習言語寫作。他深入中國農村及城市生活的中間，因此使他和環繞在他周圍的人具有同樣思想情感。

米契爾與愛蘭都懷着熱心與很大的志向，而艾利也鼓勵他們對人類熱烈的同情。當戰爭爆發時，愛蘭正準備進醫科學院。在中國放棄了大學教育，是一件犧牲很大的事，因爲一萬人當中只有一人可受大學教育。但這兩個孩子，毫不躊躇，離開學校，到內地去參加志願兵。艾利請我赴他們餞別的小宴。像兩個互相友愛的真正同胞兄弟一樣，他們也是孝敬的兒子，但父親却用着一切祝福，遣開他們。

可是沒有人像艾利那樣痛恨戰爭。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自己還在學校中，他隨着他的幾個兄長們的後面，一同加入了紐西蘭的軍隊中。他的長兄陣亡。艾利自己兩次受着毒瓦斯的傷害，可是他卻繼續勝利地作戰下去，一直等到戰爭快要終了時，才受着重傷。他受過威爾斯王子頒給的英勇獎章；但從大戰中出來的他，失望到極點，深感戰爭的浪費與愚蠢。在那種心情下，他來到上海，擔任工廠檢查員的工作。

不過艾利並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深信應爲某種理想而作戰。逐漸自由中國的觀念，把這幾種理想合而爲一。他認識了中國，雖有時在黑暗中摸索，但却是一個很快地蘇醒轉來的民族，正走向自由解放的道路。

如果能讓其完成了牠自己的命運，對於世界却有某種極大的價值。由於他是一個極端實際的思想家，他把他的信念，建築於兒童及担任着中國一切工作的平民身上——換句話說，就是那些很少外國人當他們爲人類的農民與苦力身上。

在他自己的經驗中，艾利一再很明白地看到中國最貧苦兒童偉大的潛力。如果給他一半的機會，這些兒童的未來，他們在社會共同生活的權利，保持他們人類尊嚴的權利，以及他們反對任何方面奴役他們的必要條件，將變爲這位極端仁慈的人的信條——爲了這一信條，他願意犧牲他自己及他兒子們的生命。

我認識艾利，遠在我知道他的精神力量與實際意識所產生的那種稀有的人格以前。他是一個一世紀前幫助人家居住於紐西蘭的愛爾蘭人及英格蘭人開拓者的子孫。他的兩個叔叔在美國內戰中，幫助北軍作戰。內中有一個，是納伯拉斯加（Nebraska）州林肯城的奠基者。艾利的父親，是一個享有不動產的農夫，又是一個小學校長，對於紐西蘭進步的社會立法，極有貢獻。爲那膺他的主張，他費去他最後一生的二十年，爲改良教育及宣揚農業中『工廠農場』而奮鬥。

爲實施他所主張的理想，老艾利把他自己的土地交付給他的兒子及其他青年們，在那裏面，他們消磨他們的休假，在一起學習工作。他不是一個頑固的人和有國家偏見的人，他敬仰任何民族的勇敢與天才。因此他用那位著名的毛利人（Maori）酋長黎威德門尼波士（Rewi Te Manipoto）的名字來命名他的兒子，這位酋長，會以類似中國今天所採用的遊擊戰方法，來抵抗紅衣軍（Redcoats）紐西蘭嚴酷的邊區，造成了艾利堅實的體格，正堪和他裏面的精神匹敵。艾利有一次告訴我，『那是一個空曠堅苦的國家，有着吹過茂草而

爲獷悍的愛爾蘭人生活在他們中間的捲地的冷風。一片金黃色的金雀光，無數的家兔，和湍急着的奧雷第河（Oreti River）——在這地方，當我兒童時代，幾喪失我的生命，不止一次。

他的父親對於社會浪費及愚蠢，很易感氣忿，他的愛爾蘭血統的遺傳，他的受野性未馴的國家的嚴格訓練，在這個國家裏面，人們必須互助，否則就必遭死亡——同時受着那個沒有解決一些東西的戰爭經驗的教訓——這一切都有助於一個人適合於居住未來人類大同的世界。

這也是使艾利在這次戰爭所付與他應盡的重大任務應具的必要條件。

四 工業合作社的誕生

中國工業合作代表人類的復興，經濟的進步與民主政治的教育。——孫夫人。

當他的孩子離開了以後，我時常與艾利會晤，並且時常同他一同出去幹他寂寞的任務。雖則日本人侵佔了蘇州河以北租界上的一切警權，他們却允許艾利和其他公務人員盡少數幾個對於他們有利的職務。但他們的關於他們惡劣行動的報告，日漸引起他們的敵視；於是對他發出不斷的警告。日本浪人和僱用的流氓擴大他們的活動於蘇州河以南，好多中國愛國志士被暗殺。投擲炸彈，變爲家常便飯。劉湛恩博士不願做日本傀儡，在離開我住的那樓面門口幾碼以外地方被暗殺。人頭放在那些認爲『不合作』的外人住宅旁邊，而編輯人與外國新聞記者也被投匿名信，以處死來恐嚇。

我的妻子，生病恢復健康以後，從北平到上海來和我在一起，憎恨這令人氣短的行爲。

艾利在一天工作完畢後，時常跑來，和我互交換關於最近發生的發狂行動的新聞。那些消息總是非常可怕的：大概總是關於最近某報或某通信機關，從窗中吃了一個炸彈，或那一個會發現某人頭在某人的門外。但我們更時常討論到我們共同的某一信念：認爲中國除非發現一個方法，動員勞力資源，以及爲那種我們預先見到的而不久以後必普遍採用的流動戰建立工業根據地，否則必然要失敗的。

這樣每天的討論，使我們逐漸在心中形成了一個觀念，這觀念竟全變爲中國戰時工業民主化的基礎。在尼姆（斯諾夫人名——譯者）習慣地聰明的思索下，有一天，我們的思想，突然奇葩怒放，想出了工業合作，可能在戰爭進行中，產生一種新社會。牠們可以把迅速的建設，和生產的難民救濟，勞工的訓練與軍事動員，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保衛遊擊區的反抗封鎖，與反抗日貨經濟侵略的方法，放在一起。

雖則我們對於中國政府是否會贊助這樣含義廣汎的計劃，深致懷疑，但這是一個打開環繞我們四周的無法解救的沉悶的希望。我們有了這樣的觀點，心胸爲之一暢。我們愈討論這問題，我們愈相信牠的有實施的價值。梁思成，一個在美國受過教育的工程師，參加了這思想的集團。梁介紹了那位溫文爾雅多才多藝，有着社會眼光的中國大人物之一，非凡的銀行家徐新六一同到來，他變爲一個熱烈的贊助人。另一位早期的合作者，是英國領事館服務的一分子，從他的口中，僅合作一字也引起宗教般的虔誠。

這一件事深獲我們一致讚許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在我們認爲艾利是唯一在中國可以產生必要的組織，以求其實現的人。因爲艾利信任這工作，我們知道這一定會成功。這工作吸引了他，他草成了對這運動的技術

計劃——因為他已當牠是一種社會改善事業。我們發行了一本小書（註三），這本書中主張在內地建設三萬所小合作工業。這在一九三八年春天，造成了普遍的信心，不久以後，這書以好幾種中英文版本發行。

同時，若干中外人士，也有着同樣的見解。我們組成了一個中國工業合作委員會。徐新六當主席，他擔任着這一職務一直到他乘中航機在廣州附近被日人擊落，用機槍掃射身死爲止。

艾利組織了一健全的技術組，其中包括兩個那時與上海電力公司有關係的中國最良好的工程師，名叫材福裕（譯音）與吳祖汎（譯音）兩人都是美國工程學校的畢業生。合作專家盧慶綿，他曾在蘇格蘭受過教育，也是另一個早期的參加者。這些人今天都成爲他們所產生的二千英里長的工業合作線當中佔着技術上與組織上的最重要的地位。

但工業合作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牠的第一要件，是一個各項情形的歷史的綜合物。戰爭使中國重工業遭受了厄運，資本從內地逃入租界，而運輸的斷絕，使新建設特別困難。但我們對於工業合作有信仰的，因爲有四個基本的條件對於牠們有利。

第一件事，是日本軍事線自動地封鎖了廣大的區域，外貨不能深入到這些區域裏面。這些地方，中國工業可以暫時絕對獨佔其國內的市場。第二，中國勞動力，因有着幾百萬難民在侵略的慘禍達到以前移入內地，實際上變爲無限的源泉。第三，中國大部分的天然富源及原料，幾年之內，不致被人征服。即使在淪陷的省分，也有廣大的空隙，爲中國遊擊隊所控制。在鐵路區與日軍駐防區之間，自足的中國工業可以維持下去。

最後，中國政府把新工廠集中於西部少數幾個城市的計劃，會招致轟炸而被毀滅。當全國都在日機很容易到達的距離內，沒有工廠可以永遠不受危害。幾千萬這樣半流動性的工業單位，建立於日本摩托化部隊所不能達到的區域，小心地掩護起來，沒有顯著的大煙囪，也沒有大廠房，可以為中國全面長期的抗戰，獲得一個工業的基礎。

但這不但需要動員勞力並且那項動員，得首先需要有一個進步的前途。勞工需要與獨立戰爭發生利害關係，並使其具有犧牲的意義，及負有參與負責的意識。戰時工業中的工人，應使其堅決具有軍隊般的士氣，及感覺為經濟的民主制度奮鬥的精神。

理想上，那需要一種機械，可以調和工人消費者及政府間的合作——那就是人民、行政當局、及作戰軍隊間的機械。工業合作，遂變為解決這問題的工具。我們相信中國工人，從救濟基金中予以必要的財政援助，予以利息低微的政府借款，防止那種毀滅掉信用合作的腐化政治的管理，一定很快地可以適應這種緊急事態。中國工人，正如艾利所說，完全能夠經營他們的事業，並且一定很歡迎有取得自己工廠的機會，以便同時學習用民治的方法來經營。

一直到此為止，戰爭還沒有為大眾推進了一個有積極希望的口號。這地方有產生一個的可能——同時也是一個急切必要的。

工業合作原來的草案是把全國分為三大經濟防衛區，或稱工業線。前線的單位，應該便於流動，甚至便於移走，並且能够在日軍後方利用水力或人力，便於經營，在開始的時候，利用着自焦土下的城市所搶出來的輕

便機器與工具開工。這些單位需要軍隊的全部維護，並獲得有訓練，有組織的民衆，當這些工業是他們經濟生命線的共同合作。

第二線包括廣大的前線與後方的中間區。在這些地方應該建造一些分量較重的工業，惟在形式上仍須具有半流動性的，在緊急事態到來了須依賴牠們自己的運輸合作機杼，撤退至安全地帶。看來中國最後，必完全被封鎖，因此中國不獨應該必須發展工業的自給自足，並且須發展一種適合於她抗戰的特別形式的運輸制度，我們主張組織規模龐大的運輸合作社——包括駱駝、大車、騾子、馬，以及人力負載。第二線的運輸與工業兩項可以這樣變爲適合於遊擊的條件，一旦當戰爭到達了這些地帶以後。

第三線或後方區的工業合作，是設於西北西南及東南在初期可不受日人侵犯的各省內。在這些地方，鑛業應加開採，以及爲所有三個地區製造機器。在這一帶，在中央總部指導之下，要盡販賣分配之責，要設立訓練學校、合作醫院、退伍軍人及戰士遺族的職業的中心區、病院、育兒院以及其他艾利所夢想的社會副產物。

由於事實證明，那些草案完全可以實施，雖則開始的時候在漢口並沒有引起深刻的注意。懷疑論者，以及失敗主義者叫牠爲雜湊的理想。那些老中國的外人，仍在那兒悠閑地噁舌。

『這計劃是難於成功的，因爲有家族制度的存在；中國人的個人主義傾向太厲害。』

『苦力太沒有知識，不會經營工廠；他們一有機會，就要攜走工具及借款。』

『難民不願做工，難道你不曉得那件事麼？他們寧願在難民收容所中領取不要錢的米糧。』

如果這事不爲英大使卡爾熱烈贊助，沒有艾利參加在內，工業合作計劃聽從了其他外行人的勸告，也許

要壽終正寢。卡爾爵士在英國外交家的陣營中是一位嶄新的人物。他最近剛來到中國代替那位被日本人用機槍掃射受傷而退休的許閣森爵士，這一襲擊，日本人現在也許深覺懊悔，因卡爾證明是一個堅決反對綏靖的人。從他來到後一天起，卡爾爵士對於中國抗戰，即予以廣泛熱烈的同情。雖則顯然他不大獲得張伯倫政府的贊助，這一政府中的人物，把希望放在東京的克萊琪身上，可是他以其個人的立場，沒有放棄任何他所能做到的機會，使英國堅守『擴大對華援助』的諾言。

也就是卡爾爵士，他以個人的資格，把工業合作的計劃，送呈給委員長、蔣夫人及行政院長孔祥熙博士。中國政府在那時的態度是這樣的，雖則工業合作或許並不專為反映國內需要而推進，但這三巨頭當英大使敦促的時候，願意來試一試讓其產生。委員長的忠實的能幹的心腹端納（W. H. Donald）也看到工業合作的重要，熱烈加以贊助。在七月中，卡爾爵士受中國政府的請求，把艾利從上海工部局方面解聘請到漢口，介紹給委員長和蔣夫人。

到了今天，關於工業合作的中英文文獻，日漸加多，工業合作對於好多人，是認為戰爭所產生的最有希望及最有建設性的成果。以怎樣堅苦的奮鬥與冒生命的危險，造成中國的一些進步，已由艾利的被委託參加那些努力以求實現他的新『生產互助』計劃，在我們一些人的前面表現得很清楚。這事也許可經為我們時代人類最大冒險事業之一。以往麥倫斯帶給阿刺伯人的是一種破壞性的游擊戰技術，而艾利帶給中國人的，却是有建設性的游擊工業技術。

當蔣夫人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她笑着說：『艾利又領養了另一孤兒。』但她對這一運動，從其一開始，就

予以熱烈愛好的援助，並且徵求到她的眼光敏銳的兄弟宋子文的援助。孫夫人憑藉了她的聰明的智慧及無誤的直覺，看到工業合作可以補充國父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最重要及最被忽略的部分。

她說：『這就是他所說的民生的意義，但使其成功，牠必須是一個受生產者管理的真正民衆運動。』

在最初的醞釀中，我參加了一部分，我深覺我像電機輪及難民當中的一個中間物。但每日先驅報不久就召我去担任探訪戰事的任務。那年六月，我再到內地去，到達了被圍中的漢口。

第三章 南部前線

一 政治一瞥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

武漢是個雙生的城市，位於長江上游，距離上海約六百哩。這地方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分裂的舞台，又是中國戰時的第二首都，但牠不是瑪德里。

我到武漢的時候，正在牠失陷之前三個月，當時公正的政治預測，都已假定，這地方是業已失陷了。英國大使寇爾有一天對我說：『要是我們能够使這些人不再說「當武漢失陷」而改說「如武漢失陷」那將有很大的好處。這兒所需要的，正是那種「不許通過」(no pasaran) 西班牙內戰時政府軍的口號——譯者)的精神。』

幸運得很，我竟能住在海軍青年會秘書那間小小的樓房裏，這房子一向是漢口許多外籍記者聚集的地方。不久之後，季威阿萊應委員長的邀請，到武漢來，着手搜集機械，以建設一新的工業。他搬來和我同住，每天清早，天剛透亮，一個報童的尖銳的叫聲，就把我們喊醒了。

『武漢日報！武漢日報！』

我們很喜歡這個小孩。在他那清晰的尖聲中，蘊含着一種勇敢的挑戰，似乎在召喚這古城裏的每一個人，能够及時醒來。阿萊說，這叫喊隊是新年的鐘聲，使他的希望復活。

但是在『武漢日報』的喊聲過後一兩個鐘頭，時常又傳來一陣微弱的叫喚，這叫喚者的聲音，似乎與漢口的真實情形更加吻合。我們始終不明白他叫喚的是什麼，不過誰都會覺得他是在說『我的爸爸和媽媽已經死了！我的爸爸和媽媽已經死了！』二千年來的宿命論與惰性，都已明顯地包含在這哀乞一樣的調子裏。

『那是沒有用的，那是沒有用的，』他似乎在這樣說。

這就是武漢。在這裏，青年、勇氣、毅力與自信正不斷地受到恐怖的壓制，而統治階級的內部的疑惑，又迫使他們拼命去尋找妥協，以支持他們的政權。

世上從沒有一個戰爭，像這次東亞之戰一樣的充滿着荒謬的矛盾。因為是一個爭取獨立的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國就像一面鏡子，反映着各國的貪婪、偽善和矛盾的外交政策所不能免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因為是一個半封建的國家，雖然牠亟欲成爲一個現代化的國度，可又不斷否定牠本身的目的。

比方，拿德的對華政策來說。一九三七年，德的勢力支配了整個的中陸軍，在工業、貿易、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響也漸形顯著。德對華的貿易，只次於美和大不列顛聯合帝國，而且比德對日的貿易來得大，獲利也來得多。一九三七年中開始實施的建設計劃，其中德所佔部分，比其他各國都來得大。在中軍官層中希特勒所採用的方法，業已發生深刻的印象。國內某些組織，也做效納粹的模樣。蔣委員長本人對希特勒

非常仰慕，大有英雄互相愛憐之意。然而希特勒的簽訂反共協定——作爲一種威脅，以拒阻蘇聯的干涉——終鼓勵了日本擴大其殖民地的掠奪，造成了征服全中國的戰爭。

戰事爆發後幾個星期，德國商人過去二十年辛苦經營得來的收穫，已大半爲戰爭所消滅，而當日本設立貿易與資源的獨佔政策之後，他們爲中國政府承辦的業務，又喪失了數百萬元。因此，德國商人十九反對希特勒的遠東政策。

但有一種貿易却在不斷的增加，中國從德國方面購得的軍火，佔全部輸入軍火的一半以上。德國軍事顧問也繼續在華服務。甚至在希特勒公開發表辱華演說之後，蔣委員長與德國顧問仍保持密切接觸，政府中某些官員對納粹的崇拜，也依然如舊。只有在日本以盟友資格施行壓力之後，希特勒最後終於在日軍進攻漢口最危急的時期，命令全部軍事代表團撤回國。這七個德國顧問雖與蔣委員長訂有契約，但全體於一九三八年六月棄他而行，其中且有一個是猶太人，當他回國之後，希特勒立刻把他關在集中營裏，以作爲他服從命令的酬報。

英國的政策也非常動搖不定。就表面而言，倫敦始終追隨史汀生主義，拒不承認日方以武力改變的現狀，同時又贊助國聯決議，答應不做任何足以削弱中國或增加其困難的行動，並且以信用借款貸與中國。英國在華投資，總額逾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這巨額投資的價值已失去一半。然而英國商人依然每年由日本輸入價值千百萬鎊的貨物，使日本獲得外匯，用以購買更多軍火，來毀害更多的人命與財產，攫奪更多的英國貿易，侮辱更多的英國僑民，並進攻英國平準金所支持的中國貨幣。

美國又怎樣呢？新政官員與國會議員時時斥責日本，差不多每個美國人民都希望中國得到勝利，報界也共同痛責日本的不義。但日本却從美國得到大批的飛機用汽油，其份量佔其全部輸入的十分之九，美國還供給她巨量的銅、廢鐵、鋼，以及佔全部輸入百分之八十二的合金。在一九三八年，日本由美國輸入的飛機與零件佔全數百分之七十六，此外，我們還把各項最新式的武器的圖樣與計劃賣給日本，並且派送有經驗的技術專家連同專門機械，以指導日本如何去製造此類新式軍火。我們的商人把整個的飛機工廠與汽車工廠原樣不動的移到日本。同時，我們又是日貨最大的購主。因此使日本得到了購買更多軍火所必需的外匯。

美國一面斥責日本是盜匪，一面却又不斷武裝這些盜匪，直到這次歐戰爆發之前，美國商人供給日本的軍需原料，佔其全部輸入的百分之八十。當中日戰事剛發動的時候，美國曾頒佈一道愚蠢的法令，禁止一切美國船隻運載軍火至戰國。交戰國必須自購自運，日本是擁有充分的商船隊的，而且當時她不僅佔奪了中國全部的海運業，而且封鎖了全部的海岸線。因此，這一法令無異阻拒中國獲得她所能向美國購得的少量軍火。此外，我國在華商人的活動，自日軍佔領了沿海區域之後，大部份僅是有利於日本，因為後者實際上已控制了整個的經濟。我們一向斥責日本破壞條約，但我們對這侵略者的支助，至少要比我們給予中國的「援助」大過十五倍至二十倍。

我們某些糊塗的孤立派的議員，似乎真的以為，這種幫助日本的舉動，就等於那種神秘莫測的「中立」。當人們提到我們不應再武裝侵略者，或者更易明白地，主張不應以軍火供給交戰國雙方的時候，這些紳士們又說這是拉着美國去參加戰爭。自然，如果我們禁止那些對征服戰爭是那麼重要的輸出品，至少有一小部份

美國商人，每年要喪失三千萬至四千萬美元的純利，然而這數目，至多只等於美國目下正在建造的超級主力艦的造費的三分之一而已。難道是等我們把充分的武裝供給日本之後，再和她開戰嗎？

給予日本以喜劇式的慰藉的，是義大利。義國在中日戰爭中並無何種損失，只失去中國的善意而已。但牠却從日本方面得到很好的代價，一方面牠獲得了外交上曖昧的協助，另一方面，義國人民又得到了反共盟友的特殊待遇。事實上，義國給予日本的幫助，要比英美小得多。有一個半醉的日本軍官，在上海某次宴會散席時，曾對一個義國官員說：「義大利，日本，是好朋友。義國人是最後被日本逐出中國的人。」這故事也許是偽造的，但牠實質上是正確的，這一點，再沒有人比義大利人知道得更清楚。因此，他們儘快的出賣雙方，以賺到一些現錢。

義大利人利用他們在日佔領區的特殊地位，接管中國財產，在上面懸上義國之旗，然後從華人方面索取該財產的一半價值，以作為「保存」該財產的酬報。他們以同樣方法接管中國人的輪船，裝載一些有毛病的槍砲與軍火穿過日封鎖線，沿中國海岸開進華軍的駐區，有時又把上海的重慶人員出賣給日本人，以領取一些賞金。自然不是所有的義國人都如此，我只是把某一個著名的黑衫隊員告訴我的話記錄下來而已。

唯一執行堅決的政策之國家，乃是蘇聯，這是必須承認的。一九三〇年，日本由蘇聯輸入的物品，約值四千萬日圓，依據經濟專家斯泰恩（Guenther Stein）的估計（註）約等於日本當時由泰國、安南、英屬婆羅洲與非列濱輸入品的總值。但到了一九三二年，即日本侵佔滿洲之後，這貿易突然停頓，而且從未恢復，而在

現行戰爭中，蘇日貿易總額仍不及美日貿易總額的千分之一。（註）日本除開從庫頁島得到一點點油的供給外（這是日本戰勝沙俄之後獲得的），她始終無法從蘇聯得到可以幫助她進行侵略的物資。

同時，蘇聯又是各列強中，唯一認真執行國聯決議的國家，自一九三七年國聯大會斥責日本違反盟約之後，蘇聯便以極多的飛機、航空員以及軍火供給中國。蘇聯反與中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如果其他列強競相效尤，那麼，這條約已給遠東的反侵略前線奠下一個以保存中國獨立為中立的國際反侵略陣線。

就中國國內情形而言，牠顯然陷在牠自身的種種矛盾之間，而這些矛盾，似乎只有在日本侵略的不斷的壓迫與推動之下，方才能够解決。政府搖擺於獨裁與民主之間，因此很難決定牠的外交政策。在中政府許多極高級的領袖人物之間，他們認為中國是受騙的，完全為着美、法、英與蘇聯等國而戰的。行政院長本人曾告訴我說，墨索里尼警告各小國慎防民主國家的話是很對的，他們使得弱國倚賴他們的援助之後就叉起手來，熟視無睹，『我們認清了，我們全是些傻子，』行政院長這樣說。但中國的統治者在與列強來往時，又自以為他們是民主國家，但對內的統治却依然是獨裁的。

誰都感覺到，在官僚軍隊與民衆之間，正隔着極大的鴻溝。在這個全國經濟的中心區，始終不會訓練和動員千百萬的農民與工人，每一個人暗中都恐懼地感到一九二七年的往事——這是國民黨時刻不忘的——確有重演的可能，如果民衆真的以民主方法組織起來的話。

各城市內部的工人，正如城外的農民一樣，都一樣得不到組織的權利，因此有許多人到現在還不明白這

（註）一九三九年貿易額不及二百萬美元，見上引書。

戰爭的性質，整個農村都沒有動員，士兵與民衆的關係總是十分惡劣。撤退熟練工人與工具的工作，簡直沒有進行，約有四十萬噸的機械，被遺棄在長江下游各城市裏。單舉如下一例來說，中區最大的產鐵中心大冶，在失陷之前六個月，當地積有銑鐵約達五十萬噸，但當局從未把牠移至內地，後來却反而大鬧鐵荒。如果當地工人動員起來，這批銑鐵即使無法移至內地，那麼萬不得已時，也可以把牠掉在河裏，然而日本人却原封不動的接收了牠。

千萬輕傷的人，爲着回後方醫治，備受辛苦大多死於半途，否則即因無法追隨退却大軍，而爲日軍所屠殺。政府從未組織農民作爲担架夫，也未曾教授他們以急救的技術，否則必定有許多輕傷的人能夠活命。在農村裏組織民主的人民自衛團，可以使日方鞏固後方的工作，遇到極大障礙，同時，正在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政府，也不至像現在這樣遭遇極大的困難。

所謂「赤色的漢口」，自然是無稽之談，但誰都能够看出，要求改革的暗流正很湍急，而且時常有波紋現到水面來。行動的自由是沒有的，說話倒比從前來得自由些。知識份子可以相互閒談，甚至可以任意批評，只要他們沒有組織別人的企圖。

政府本身仍然是在一黨獨裁之下，而以蔣委員長巧妙地保持黨內的，和國民黨與其他各黨派之間的平衡。說也奇怪，國民黨仍然是唯一合法的政黨，雖然牠與其他各黨派組成了抗日的聯盟，雖然共產黨的存在實際上已爲所有的人所公認，但沒有一個共產黨員在政府中佔有一席重要的位置。國民黨爲着對抗共產黨在民衆間的影響，又鼓勵向來備受壓迫的某些政治派別再度出面，進行宣傳工作。因此而復活的計有社會民主

黨、青年黨和國家社會黨。這是國民參政會創立的先聲，目的在阻止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

這裏不妨說一說那些小黨派。他們所有的黨員，大約總計不會超過二千人，雖然他們的領袖說的數目比這來得大。就他們的綱領說來，全都大同小異，一致主張在戰後實行平均地權，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終極的社會主義』。在談話的時候，他們的目標和共產黨的簡直無甚分別，不過實際上他們都不是『鬥爭的』政黨，而且與民衆毫無聯繫，因為他們都沒有武力，因此也就只有忍受那擁有武力的國民黨獨裁的壓迫。

此外還有一個第三黨，牠創立於一九二七年國共第一次分裂的時候。正如牠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樣，第三黨一開頭就取着妥協的綱領，他們強調民族利益高於階級利益與政黨的政策。維持統一戰線是牠的不變的主張，但牠的得力黨魁劉渙達（黃埔畢業生，前陸軍政治部的部長，與目前陳誠將軍的職位相等），却爲蔣介石的黨徒所暗殺，自劉被害之後，第三黨遂趨消沉，只有在給閩變提供理論背景時曾有短期的活躍，一直到抗戰爆發，國民黨才請他們回到漢口。

這四個派別可看作是國民黨內部的少數派，每一派都有牠自己的主張，但全都缺乏強有力的民衆基礎。這些『政黨』在漢口並無合法的地位，但他們可以經由他們在國民參政會中的代表發表他們的意見。

還有別的許多集團，包括救國會與東北協會，都容許參加國民參政會，但大部份的代表還是依據地域選出的。國民黨也容許共產黨有七個代表參加，這數目跟其他各小黨所得到的相等。國民參政會的二百個會員，完全爲國民黨所挑選，爲着防範未然，他們又委派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七十個委員爲會員。至於工、農、兵、學生不但不能選出代表，甚至連被派定的席位也沒有。因此國民參政會的一切決定，決不會有不利於國民黨

的可能。沒有一個人當真把國民參政會看作是一個民主的組織，大概只有共產黨才竭力去使牠成爲一個黨的民意機關。不幸，這組織毫無控制政府與官僚的權限，因此牠的一切活動都歸徒然。

然而，這組織雖然是一種滑稽的東西，但牠是國民黨所賞賜的最民主的一種代表會議。有許多相信牠『大概可以做出一點什麼來。』不錯，有點出人意料之外，這會議的主席本人當真做出了一點事情來。汪精衛之出任國民參政會主席，不能歸咎國參會本身，他是國民黨所委派的，而且他還被舉爲國民黨的副總裁呢，在國參會開會的時候，汪精衛希望大會會支持他撤換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而由他本人繼任。但孔祥熙是蔣介石的妻舅。汪的黨徒曾弄到一百人在他們那張彈劾孔祥熙的提議上簽名，但這計劃沒有成功，蔣介石本人却以及時的警告打消這個運動，使之無法提出通過。

在一個人民的政治意見被壓抑而無由表達的政府之中，那些最惡毒的人民公敵，便有着充分的機會，爲其私人的權位與利位，而非非常公開地積極地進行其叛賣國家的工作。上面的事情就是一個例子，這是極值得注意的。中國統治階級內部的主和份子，其數量之衆，比外間知道的還要多，他們與日本在各方面保持密切的聯絡，也是周知的事情。（義大利的領事館就是他們與日本溝通消息的媒介。）這日趨成熟的政治危機，充分表明了一個積極的有組織的對抗在朝黨的反對派，在嚴重困難期間，確有着極大的價值，雖然他們被剝奪了參加政府內部的權利。在漢口時，如果國民黨跟着汪精衛跑，牠便有被左翼消滅的可能，這種威脅使國民黨不得不調和那些互相衝突的階級利益，結果終於推翻了汪的對日妥協的建議。

自然，在國民參政會這政治騙局後面，中國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這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競奪領導權。

統一戰線顯然是一種脆弱的辦法，如果牠的基礎——武裝抗戰——終於破裂的話，牠要團結全國就不可能。國民黨不承認共產黨是一個對等的政黨。牠的幾個代表備受監視，既不許他們召開民衆大會，又不許他們組織任何部份的民衆。共產黨忍受所有這些壓迫，但所有這些並不能掩蓋如下這一事實——隨着戰事的進展，國內政治的與軍事的力量的比重，業已迅速改變，萬一國民黨全部對日投降，共產黨已可以取得民族的領導權了。

這兩個政黨的裂痕仍然十分深刻。例如，國民黨始終堅持土地政策與一黨獨裁，在對日作戰時，不准不應改變，反而應當加強，共產黨的主張却與此相反，他們認爲抗日武裝鬥爭，只有與政治上和經濟上實行民主的改革同時進行，方才能够得到勝利。在華北共產黨軍隊佔領的地方，他們實行了若干變革，這些使國民黨大爲震驚。

雖然共產黨業已放棄沒收土地的政策，作爲統一戰線的條件之一，他們現在還是協力組織地方政府，這些地方政府默許把漢奸的和在逃的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的貧農，並充分利用一切的休耕地與荒地。富農絲毫不受干涉，不過納稅比較貧農稍高。總之，在共產黨軍隊開到的地方，貧農與中農都得到好處，因此，大部份的民衆都熱烈支持戰爭。在這種經濟變革的基礎之上（這一點在西北一章中另有詳細說明）共產黨便以新的、溫和的革命方式，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組織人民以從事全民抗戰。

雖然這些發展，主要僅限於日軍所佔領的內地，而且當地國民黨的政權業已大半敗潰，但國民黨對這些的痛恨，還是不言而喻的。國民黨本身是代表豪紳與地主的利益的，牠自然認爲這些改變土地制度的行動是

非法的，而且決不願在其他區域再作類似的讓步。國民黨領袖，甚至不管這些變革是爲着制勝民族敵人，仍然一味痛恨，並且不願給游擊區以微小的接濟。最後，國民黨遠擬好向共產黨「收復」失地的計劃，這就是說收回那些共產黨早已從日軍手裏奪回的地方。這一計劃的實行，使新的內戰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

在這種情形下，蔣介石這一人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蔣本人一向是以保持國內勢力均衡的重責自負的。因此，如果我們對蔣的認識能够更加明白的話，我們對戰時政策的複雜性，也許可以更加清楚一點。

二 蔣 委 員 長

在侵略者尙未遭到最後失敗之前，抗戰決不中止——蔣介石

我想，我們在過了每個安息年（猶太人以每第七年爲安息年——譯者）之後，全都應該重新檢驗一次，因爲據說人體的細胞，每過了七年，就要經過一番澈底的變化。究竟戰爭給予人類生理上的震動與精神上的苦惱，是否加速了這種變化的進行呢？這樣的討論我還沒有見到過，不過人們在經受了僅只一次的轟炸之後，他所發生的變化，有時倒比有生以來的變化還要厲害得多。馬克思曾在什麼地方說過，在大動亂的時候，「也許一天就發生了亘二十年的重大事件」，目下我們許多人就正生活在這樣的時代中。如果我們說時間與炸彈沒有使蔣介石改變了的話，那是不可想像的。

當我和蔣委員長握手的時候，他用着他那慣常的喉音和我說話。我想我當時看見他那薄嘴唇上掠過一

絲笑紋，但立刻就消失了。許多人說蔣在戰事發作後老了許多。在我看來，他似乎還是那個靈活而纖弱的身軀，還是那雙聰敏的眼睛向人注視。我覺得他的生活比較不算緊張，他似乎正享受着內心的悠閑與更大的自信。當我問他一個關於未來的問題：即假如漢口失陷了怎樣，他的回答是這樣的：

「我到的地方，就是政府與院部的所在與抗戰的中心。戰爭的結果決定於領袖如何指揮民衆抗戰，而非決定於兩三城市的得失。」

顯然，他那種自詡爲救世主的抱負，或是他的自尊心，抑或是使他說出這樣的話的別的什麼，的確是很牢固的。他這樣說，不是在吹牛皮，而只是在陳述他的福分。看樣子，他似乎真的相信，不管日軍如何蹂躪中國，除非他們能在精神上、肉體上或政治上，保護了蔣介石，否則他們就別想征服中國。

蔣委員長本人決定政府重要官員的人選，又是陸軍、空軍以及殘餘的海軍的總司令，國防委員會的主席，以及國民黨的總裁。沒有一個日本人在軍事上和政治上能有他這樣的權力。當他後來繼孔祥熙爲行政院長，繼汪精衛爲國民參政會的主席，又接任政府聯合銀行「四行」的總裁與四川省政府的主席之後，要分別軍人的蔣與銀行家、政客、官吏、政治家與官僚的蔣是十分困難的。人們也許要說，在一個擁有四萬萬人口的國家裏，那個委他自己担任這麼多職位的人，如果不是一個天才，就是一個妄大狂者。但蔣與這兩者都不像。跟中國一樣，他一身集合着許許多多的矛盾，其中有好些也許將在戰爭中得到解決。要了解所有這些，只有從整個的歷史背景上入手。

蔣本人擁有如下許多特性：頑強、堅決、無情、奮發、野心、機動和熱愛權力。諸如此類的特性，他比任何人種的

普通人都包含得多，而這些也正指明了他的個性與領導的特點。他不是一個智識份子，但他是一個力行的人（Man of Action）；當別的人還正思索的時候，蔣已依照他的本能行動起來了。他承認他是一個實驗家。

『不行不能致知』他曾經這樣寫；又說『唯一的失敗是在不能行』。在蔣的全部政治理論中，這大概是革命的觀念了。他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可說也完全得力於這一點。在中國任何決定，不管是好是壞，如果牠能迅速加以執行，那麼牠十九是可以得到勝利的。

蔣這種個性的形成，主要是由於他崇拜古代的英雄。他比普通的中國人更重視精神的價值；他所實行的改革，差不多都偏於精神的改造，而忽略物質的條件。例如他多年來推行新生活運動，企圖以這一運動來感化那些被他俘虜的赤色農民，但他並沒有改善他們的基本生活條件，一味把孔夫子的舊道德——禮、義、廉、恥——訓練他們。如果蔣本人會考察一下這些改革的成績的話，他也許不會像今日這樣子，然而他的主張還是始終未受影響。

他曾引用過孔夫子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他這兩句話把他所想的『廉』字一字的意義完全描劃了出來。另一樁他十分重視的事情是『義』，所謂『義』就是『上下有別』。（註）

蔣相信精神的力量能够克服一切的障礙。當他在西多被捕時，他『決以正氣與精神的力量與之』（指當時商議將他交付人民審判的人們）鬥爭。』接着，他又在他的日記裏——這日記實際上恐怕是在他獲釋之後寫成的，但無論如何，值得重視——提到他備受『古來忠烈』、『總理之大無畏精神』、『耶穌殉難之精神』，以

（註）見董顯光作蔣介石傳英文本，一九三七年上海版六三七頁。

及『慈母之教』等的激勵，所以他說：『景行既夙，應求無愧。』

這位『精神家』之所以不因戰場的失敗而氣餒，顯然得力於這種對正氣的信仰。當我問他，究竟他根據何種理由，認為中國可以獲勝的時候，他泰然自得地對我說：『日本已經遭受了精神上的失敗。軍事行動沒有必要的精神的基礎，便不能成功。因為日本的精神觀念是不正的，所以日本不能獲勝。』請想像任何一個歐洲獨裁者嘴裏說出這樣的話來！

但是蔣委員長却喜以世上唯一的裁判者自居，由他決定何者為善，何者為惡，而他本人總是在『善』方面，別的人却總是在『惡』方面。反對蔣的人，如果不經過『認罪與悔悟』，蔣是決不與他和好的。引學長因為從未『認罪』，因此他仍然是一個囚徒。蔣喜歡把每一個不滿他的人，看作不忠於國家的漢奸，而不把他看做是政治上的反對派。事實上，這是蔣本人最嚴重的弱點之一，而有一些阿諛他的人，也正竭力利用他這個弱點。

中國歷代君王，除開那些偉大的歷史領袖而外，差不多都因為他們一味聽從周圍那些『是是』的人的讒言，而終於失敗，這是中外如出一轍的，如果蔣本人疏於防範，那麼他也不免要步人後塵，成為那毀滅所有君王的諂媚的俘虜。在他周圍的某一些『宦官』，都是些精於吹噓奉承的專家。例如，他們之間有一個最得意的狡計，那就是他們打聽了蔣喜歡讀的是那些書（大半都是古舊著作）之後，就囫圇吞棗的讀完牠，在下次拜見蔣時，把書裏面的意思和字眼說出來。

蔣本人必須經常瞭解他本人的真正實力，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不管他的頭銜如何驚人，他並不是以簡單的命令行施其統治權力，而是運用着巧妙的以此制彼的權力來行施職權的。他對於政治局勢，有一種可說

是心靈的感覺，而就他本人的歷史背景看來，他是一個虛空而不着邊際的政治家。他以其精神上的確認，把各政治派別的忠誠，集中在他一己身上。中國人特別擅長的運用以此制彼，使自己敵人同歸於盡的權術，蔣本人對此是異常嫻熟的。

蔣介石不是一個歐洲式的獨裁者。論起他的實權，他也沒有被人民推選的領袖——如羅斯福總統與英國的首相——那樣的大。他今日所享的偉大，僅只是各種力量的綜合的象徵，設若他一朝死去，這些勢力還一樣沒有基本的改變。那些說蔣是「中國的統一者」的人，未免把非常複雜的實際情勢，估計得過份簡單，他們把集團的推動（指對中國的統一的推動）與一個人的人格視爲一物。

這種觀察決不會減弱蔣個人的影響與乎他的統治地位，只是說明了他的某種局限而已。至於蔣本人的成就以及他的堅決抗戰，倒並不因這而有所變更。現在蔣是全國公認的領袖，也只有在他繼續成爲中國統一的民族抗戰的象徵時才如此，如果他有一天背叛了這種付託，他的權威馬上就會失落。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歷年的重大事件，已使他今日居於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能以不幸方法破壞中國的統一的只有他一人。同樣，他對於抗戰的堅定，也表示了中國爲獨立而作的戰鬥的尊嚴。

我們還不知道，歷史對我們當代的人物，將作何種品評，我們也不知道，牠將怎樣去調解蔣介石領導中的許多矛盾。要判斷一個人，只能從他本國整個的環境入手，蔣雖然有許多缺點，但跟不久以前的許多執政者比起來，他顯然來得更有能力，更加勝任，說不定在他同時代的中國人中，沒有一個人比他更偉大。英雄本非天生，而是由歷史最深刻最微妙的配合所造成。中國有比蔣更好的思想家、組織家與軍人，但如果他們走在他們所

生活的社會的前頭，那麼誰能認識他們的真正的天才呢？然而應指出的，是中國的環境乃在不斷變革中。現在如果我們更仔細地去考察蔣介石本人，也許我們可以用他作為戰時中國的政治氣溫的溫度計。

三 爭訟的遺產

什麼是民生主義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也是社會主義……不過中國不

需要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

——孫中山

蔣介石的少年時代與中國 父親 孫中山的完全不同。孫中山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孩子，他到十六歲的時候，還沒有過一雙鞋子，蔣却是一個中等商人與地主的兒子，一八八七年生於溪口。溪口是尊波的一個小鄉村，而尊波則是中國最老的通商口岸。

蔣的父親在他九歲的時候就死了，以後教育他的是他的母親，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非常敬服他的母親，時時表現出對她的恩感。雖然自他與宋美齡結婚以後，他已成為一個美以美教徒，但他的論理觀念依然是半封建的孔教主義者。

蔣顯然很早就想做個軍人，但到了二十歲方才進保定軍校。他在那裏只唸了幾個月，接着改進日本的士官學校。一九〇九年就在該校畢業。畢業後他又在日本的第十三野砲隊勤務。這兩次合計起來，一總只有三年。在日本的時候，他遇到中山先生，並加入國民黨，回國的時候恰巧是滿清政府被推翻，自此之後，他便同中山先生一道工作，企圖在地方軍閥中活動並推倒他們，但沒有成功。因為一再失敗，他顯然很不高興，終於在一九一

七年退出政界，到上海從商。不過當國民黨找到一個強大的盟國——蘇維埃俄羅斯——之後，他又加入政界了。

他曾奉中山先生之命到過蘇俄，回國之後便被委爲黃埔軍校校長。他在蘇俄的時候，見過托洛斯基，但沒有見過斯大林，他對加倫將軍有着很好的印象，後來加倫也作了國民黨的蘇俄首席軍事顧問。當他由蘇俄回到廣州的時候，國民黨軍人中曾見過紅軍和對牠的組織，做過短時的研究的，只有他一個，因此他自然做了黃埔的校長。這學校原是仿倣蘇俄的紅軍大學而開辦的。蔣介石本來碌碌不足道，自此之後，（卽他三十五歲的時候）他在國民黨中，就開始飛黃騰達起來。他做了國民革命軍的總指揮，這軍隊最後終於控制了華南的大部份。接着到了一九二七年，發生了「清黨」事件，關於此後十年間的階級戰爭的情形，已有許多著作述及，這裏只想約略說明蔣在這十年內戰中所扮演的角色。

社會的和經濟的事實，不用說是這衝突的基本原因，但也表現在對同一主義的兩種解釋上面，因爲兩方面都在爭奪革命的領導權。孫中山先生這遺產，是有點曖昧不明的。中山先生關於實現三民主義的方法，似乎自相矛盾。在某些地方，他肯定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是同一種東西，但在別的地方，他又不滿於馬克思主義。這是國民黨內部的矛盾所使然的。實際上，中山先生關於三民主義的演講，都是臨時發表的，這演講與其說是擬定未來的嚴密的政綱，勿如說是在調解黨內的矛盾。國民黨是一個包括富者與貧者的政黨，中山先生既是這政黨的領袖，他又無時不想保持黨內的和諧，因爲國民黨的分裂，已使他的計劃一再遭遇失敗。此外，中山先生又是一個力求進步的人。

中山先生本人的基本的同情，是從未改變的，他沒有一個時候不與被壓迫的下層階級站在一道，他認為革命主要是解放他們。孫夫人才慶齡會這樣說：『他所計劃的一切，在他看來，都是改善大眾生活的手段。解放了的工人與農民，就是他所說的建造新的自由中國的柱石。他清切地承認，這兩個階級是中國推翻帝國主義時完成國家統一的基本力量。』（註）由於孫夫人對中山先生的無限景仰，這解釋的圓滿與忠實，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在他臨死之前不久，起了非常深刻的變化。在他中年時候，他還是相信中國可以借藉一種國際計劃，以取得英美的援助，用他們的資本來發展中國，使之成為各國的市場。他充分準備信託英美，以牠們的援助來渡過中國的過渡時期，在這一時期中，中國國民黨就在英美等的『保護』之下統治中國，中國也仍然是歐美資本的半殖民地。在上次大戰之前，他曾經不斷依照此項計劃，向英、美、法、德等國呼籲援助。最後，他還以具體計劃，向凡爾賽和會提出，請求各國，在安定遠東和平與發展巨大市場，使各國均獲其利的基礎之上，共同發展中國。

中山先生當時的思想，似乎很受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有遜（J. A. Hobson）的影響。有遜氏在他的

（註）見宋慶齡中國不可征服（China Unequarable）一九三七年上海版，這裏值得一記的，是孫夫

人與我談話時，曾斥責莫里斯·威廉（Maurice William）一個歸化美國的俄國人）的謬說，因為他曾說過中山先生是一個『反共份子』，恰恰相反，據孫夫人說，一直到他死時中山先生始終把共產黨員當作最可靠的盟友。

帝國主義一書中會說：『如果西歐數國的資本家能作聰明的合作，不再互相殘殺以爭奪各別的掠奪區域，他們就可以在亞洲組成一個聯合的國際企業，這計劃也許可以使整個西歐資本主義，得到另一個活動的而且獲利的世代。』（註）

然而歐洲偉大的政治家，似乎沒有一個與霍布遜具有同感，也許，他們中大多數的人還沒有聽到霍氏的主張。中山先生的國際合作開發中國的提議，除被斥拒外，沒有得到何種回答。在凡爾賽和會上，那些偉大的和平製造家沒有閱讀他的計劃，看樣子，戴絲帽子的外交家們，都把中山先生看作一個無害的狂人，世界列強都不喜歡有一個民主的新中國。他們仍然專心一意地去分割世界，使目下的『世界事件』——日本也許會這樣稱呼牠——終於無法避免。

只有到這時候，中山先生才認清了中國，只有倚賴他自己的資源去爭取自由與平等。只有到這時候，他才放棄了受西方列強『保護』的念頭，並接受了革命的觀點：即只有在推翻了國內的封建制度，與恢復了本國的整個主權之後，中國方才能够發展，當時準備援助中國實現此項計劃的，僅有蘇聯，所以中山先生之主張聯俄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孫中山先生曉得，在他自己的國民黨中，正有許多仍然反對土地革命，希望與外國資本保持不平等關係的份子。他曉得與布爾什維克的聯盟，將使這些右派份子震驚。後來他終於要求蘇聯代表起飛（Adolf Joffe）與他簽立一個用以減輕他們的驚恐的文件，這就是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孫文起飛協定，兩人在這協

定中承認中國當時還沒有『實現共產主義或蘇維埃的條件』當前的工作，乃是完成全國統一與民族獨立
的任務。

孫中山先生還同時接受了共產主義的觀點，認為民族革命如不與民主的土地革命——土地的平均分配——與保證農工的民主權利同時實行，就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註）因此中山先生邀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這種輸血不僅使國民黨復活，而且使牠獲得進步的與熱情的領導，就是這領導使牠在北伐初期得到的勝利。

現在左右兩翼關於土地問題與工農政治地位等的分歧，不用說是更不單是理論的了。這是不同階級為爭奪民族革命領導權而作的基本鬥爭。右派要求在國民黨『保護』的時期內，對內地地主——商人高利貸者的半封建經濟，只作溫和的和漸進的改革，同時又因為他們夢想得到資本主義列強的合作以發展中國，因此自願作為帝國主義利益的保護人。至於左翼的綱領，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是要求施行迅速而澈底的革命變革，把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變為現代的獨立國家。雙方爭論集中於中山先生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解釋上面。當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五年逝世之後，他遺留下的教義，因時期先後的不同的而有着許多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就支持了保守派與急進派。分裂至此已無可避免了。

蔣介石為着急欲獲得蘇聯顧問的好感，時常喊着世界革命的口號，而且公開宣言『三民主義的實現就

（註）遠在一九〇五年，孫中山先生業已採取平均地權為同盟會（國民黨前身）的基本政綱了。

（註）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廣州出版的英文廣州年鑑（Canton Year Book）

是共產主義的實現。」（註）他很獲得鮑羅廷的信任，在中山先生死後，他不斷從蘇聯得到軍火與款項的接濟。但他是屬於右派的；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而且是相信「保護」的。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了在廣州的早期，已陰謀在他的力量充分時肅清共產黨。他果然這樣做了，那是在一九二七年四月，當時廣大的羣衆運動正開始分配土地。蔣介石剛領導勝利的北伐軍打到上海，便推翻兩黨的聯盟與政府，在南京建立起他自己的政權，並得到長江下游的銀行家、工業資本家、地主、上海強有力的「幫」以及——這是不用說的——國外帝國主義列強的支助。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把一切的共產黨員，一切被「純化了的國民黨」認為是赤色的任何組織與團體的會員，看作是該判死刑的罪犯。千萬個進步的領袖、學生、官吏、士兵以及工農都被殺了。殘存的共產黨員組成了小小的紅軍，拼命守住華南的山頭，而內戰已遍佈許多省份。共產黨員繼續分配土地，組織地方的工農政府，蔣介石則恢復地主制度，重樹起田地界石，並屠殺叛徒，摧毀農會工會。這十年的虛耗，犧牲了無數受教育的，有罕見的領導才能的青年，這數目是如此驚人，而中國又是如何經不起這類人材的喪失啊！

蔣介石的統治，並不能給土地問題以任何基本的解決，不過全國四處却高喊起要求土地的呼聲。這要求從每個不滿的農民的心底裏發出來，紅軍由此也得到了無可動搖的基礎。大地主土地的分配，也許要影響全國十分之一的人口，但二萬萬五千萬農民却可以因此得到蘇生。如其這土地改革以政府收買土地的方式加以實行的話，牠所費的數目，也比之內戰的耗費倒要少得多。

另外兩種改革，即剝奪貪官污吏的稅權與建立各縣的民主政府，如能實行，也可以使蔣得到新的巨大的

自由農民的熱情的愛戴。假如一面實行土地改革，一面推行農村的政治改革，再加以合作工業的國家經營，蔣也可以使任何反對派失去強有力的口實。這樣，全國就可以迅速實現真正的統一，而全中國的力量，至此也就可以表現了出來。

再退幾步說，如果在本次抗戰爆發之後，蔣介石能够解放工農，組織他們，成立一個民主國家，獲得他們的擁戴，並使他們自覺爲保衛新獲得的權利而作戰，使全國不再有地主與被壓迫的農民之分，那麼，這跟目前的情形比起來，是有着多麼大的不同呵！

自然，如果蔣介石當時代表着容許這種變革的利益，牠根本就用不着分裂（清黨）。正如上面所說，蔣不是一個社會革命者，他代表着一個非常脆弱的與地主聯盟的買辦階級。他本人那堅強的財產意識與天賦的保守主義，使人不覺得有政治變革的必要。年來他拼命要完成統一，但他不曉得這種政治變革正是統一的基礎。他本人的階級背景與教養，只告訴他變革土地制度是道德上不容許的行爲。界碑正如階級一樣，是永遠不能更變的，「上下」是應當「有別」的。

表現於西安事變的中國社會的新動力，最後終於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考慮與共產黨再度接近。在西安事變之後，他認清了他不能同時對付國內與國外的敵人。這是一種基本的和解嗎？還得看以後的情形如何再說。共產黨並沒有「認罪」與「悔悟」，也沒有放棄牠作爲獨立的政治存在的權利。雖然他們承認蔣是抗日的國軍的總司令，但他們仍然保留他們自己的領導與他們自己的政綱，而且他們還不斷代表着實行澈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

共產黨承認蔣的地位是樞軸的地位，他們相信，戰時全國環境的改變，政府與軍隊的階級基礎的變動，堅持統一（基於民衆的革命動員的統一）的必要，以及中國抗戰與世界形勢的關聯等，將給蔣本人在全國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帶來了新的意義。民衆的動員越廣汎，戰爭的革命任務也就越大，這也將迫着蔣本人成爲更革命的領袖，如果他願意保存他那『抗戰中堅』的地位的話。他們相信，戰爭越持久，蔣介石也將被迫更加倚賴民衆的支助。

因此，『推蔣前進』成爲了他們的口號。在漢口時候——正如我上面所說，——他們在自由中國擴大政治影響的可能，盡爲國民黨所剝奪，好像已失去了推動的作用。然而，當日本帝國主義深入了中國內地，在國民黨主力撤退的地方，他們集中力量動員人民，建立起了新的社會。已表明他們自己的領導的思想。在這新的社會中，爲着更清楚地了解，共產黨與國民黨對中山先生遺教的闡釋，有何差異的地方，我想在下一節說一說新四軍的故事。

四 『七失』的紅軍

政治是一個革命軍隊的血液，沒有牠，革命軍隊便不能生長、發展，甚至不能存在。

——項英

當前紅軍的主力，撤出江西蘇區，向西北作偉大的長征時，（註）曾留下一部份部隊掩護他們從事退却。這

（註）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對此有詳細的敘述

赤色後衛軍是孤立的，被封鎖的，而且不斷被窮追達二年以上，直到官方正式宣布他們業已完全被消滅，但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他們又突然出現，作爲長江下游日佔領區的游擊部隊的中堅。他們過去所遭遇的一切，外間是很少知道的。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這奇怪的部隊的領袖本人，才告訴了我。我說的這領袖，就是辦活了許多次的項英，據農民們說，他是「由墳墓裏出來」當新四軍的軍長的。

爲着解釋目下這「非正統的」戰爭，以及爲着指出中國抗日遊擊隊的堅苦作戰的具體背景，我覺得這裏有簡單敘述一下項英堅守華南蘇區經過的必要。也許這敘述還可以幫着說明，作者在本書末尾所試作的判斷。（即關於這種戰鬥方式在中國抗戰中的成效的問題。）

當前紅軍於一九三四年退出江西向西北進發時，紅軍當局認爲除最低限度的需要之外，決不將第一線部隊充作後衛，因爲當時蘇區已四面被圍，留下的部隊頗有全部被殲的危險。結果正規紅軍留下的只有三千名，這些就是死守最後陣地的基本力量，此外還有七千名赤衛軍（民團）約二萬名非正規的遊擊隊，合計約三萬人。但當時由四面向他們進撲的軍隊，論人數比他們多十倍，論火力比他們大二十倍至三十倍，因爲紅軍只有一萬枝步鎗，數十支機關鎗和幾架舊的迫擊砲而已。他們大部份都以手榴彈、刺刀、大刀、標鎗等爲武裝。幾千個由十一歲至十五歲的男孩——少年先鋒隊——也參加保衛蘇區之戰，他們有許多的確參加過肉搏的戰鬥。

這決死部隊的指揮官就是項英，整個紅軍主力的命運，大半就倚賴着他的剛勇與忠實。共產黨之選中他，不是沒有原因的，項英不但是一個真正的無產者，而且還實際參加「無產階級」革命，獲得了高級的軍事的

與政治的地位，像這樣的人物是很少見的。事實上，項英的樣子就是一個「典型的苦力」，他有又大又厚的鼻子與雙唇，一副突出凹入的牙齒，還有一雙穿起草鞋來十分舒適的粗大的腳。總之，這個細小、結實、強壯的人，暗示出了原始的力量與勞苦的生活。

項英一八九九年生於湖北，十歲時候死了父親，便開始做工，在一家紗廠裏當學徒，靠工錢贍養他那衰老的母親和年幼的妹妹。到了十六歲，他已升為正式的工人。他讀過的關於俄國革命的書——他幼時曾進過四年小學——使 he 想到把他的同伴組織起來，以改善他們那非常惡劣的待遇。不久之後，他的行動使他注意到當時剛成立的共產黨，他又從共產黨的智識份子那裏，懂得了革命的歷史與口號。就在這些指示之下，他組織了中國第一個鐵路工人的職工會，第一個鋼鐵工人的工會以及別的許多工會。

不久之後，項英便成為千百萬工人的希望的象徵，和改善那可憐的生活的手段。對於當時還未取得政權的國民黨，他又是一個權力的象徵。在一九二四年國共第一次合作之後，項英被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一九二五年，因為他是當時突然出現於全國各處的職工會的負責人，機器工業和手工業工人歸他指揮的，約五十萬，蔣介石之能由北方軍閥手裏奪得漢口，項英的確有極大的功勞。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反革命之後，項英繼續領導漢口與上海的秘密工會，但國民黨對進步工人的殘殺是如此驚人，以至只有在江西「工農」紅軍的勢力區域內，才有組織工會的可能。項英的進入江西蘇維埃共和國，還是一九三〇年的事，開頭他是紅軍大學的學生，隨後被舉為工農革命委員會的主席，並陸續在蘇維埃政府內担任各項職務，如土地部、勞工部和調查部等的部長。跟中國共產黨許多最有材能的領袖一樣，他差不多

完全從實踐中受到訓練。他所有關於政治與軍事的學識，都是多年來在紅軍保護下進行戰鬥與組織時學習到的。

這種訓練，使他能在一九三四年執行了他那非常重要的任務，而且獲得成功。當紅軍主力為準備長征，集中在瑞金附近時，後衛軍便代替他們，守着主要的據點，不斷阻止敵軍的前進。不意機密以及得力的後衛，在共產黨突破包圍線的計劃中是最主要的，這些都因此得到了保證。將近一月之後，南京方面方才發覺主力紅軍業已退出，但這細弱的部隊還是牽制住巨大的政府軍，使之無法南下，同時主力紅軍已能够集中力量，進攻敵方最脆弱的碉堡線，衝入湖南，順利地開始西征，自此之後，國民黨將軍們始終無法阻止他們。

千萬南京的軍隊水也似地瀉入荒蕪的江西，壓迫殘餘紅軍不斷向東面福建廣東與浙江的邊境退却。他們的無線電機被奪獲，被毀壞或自動放棄，以致與西征部隊完全失去聯絡。至此他們已成為一個盲目的軍隊。當我一九三六年在西北與共產黨人在一起時，我會問起這件事，毛澤東與周恩來都承認，他們對這後衛軍的命運，毫無所知，有許多人還坦直地認為他們是全部亡失了。

但實際情形怎樣呢？

退出瑞金之後，項英把他的部隊改編為第七、第十和第二十二抗日先鋒紅軍，還有一個第二十四獨立旅。他自己指揮配備最好和由最有訓練的幹部組成的第二十四獨立旅，開向贛閩邊界。稍後，在一九三五年，第十和第七軍的大部，終在江西東北的弋陽附近，陷入重圍，被迫進行死戰，結果差不多都被消滅。第十軍軍長是××被殺，第七軍軍長方志敏被捕，因至死不屈，終被殺頭。

自日軍第一次侵犯上海之後，即一九三二年，中國共產黨已把他反帝的口號改爲抗日的口號。到了一九三四年，抗日成爲他們在軍隊與民衆間進行宣傳的中心。共產黨領袖們對國軍的主要政治要求的估計是正確的，連蔣介石本人也被迫秘密採用抗日救國的口號，以提高他部下那些正與紅軍作戰的軍官的情緒。

蔣介石一九三四年在軍官訓練班上發表的演說，已不再僅作反共的宣傳，而進一步解釋『勦匪』爲抗日的準備了。在第五次圍剿時，他所造的每條公路，每條戰壕，每座防舍，每座碉堡，以及每座橋樑，都被蔣稱爲抗日的防禦物。每個被殺的人，每個耗費的錢以及每次戰鬥，已不再是僅爲反對蘇維埃與支持國民黨獨裁政治而犧牲，而是爲着『抗日』了。

因此，由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雙方都以當前的敵人作爲日本帝國主義者！不用說蔣是企圖以這口號來挑起部下的士氣的，因此他竭盡所能，阻止紅軍反日宣傳在他部下的下級士兵中散播。同時，已退至武林的項英部隊以及第七第十兩軍的殘餘，雖然以抗日爲號召，仍不能減弱他們所受的壓力。在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包圍他的部隊的由十五萬人至三十萬人，而他們的部隊則在一萬至一萬五千人之間。他們運用捉迷藏戰術，竭力以新兵補充缺額，並從敵方取得足用的鎗械彈藥等作爲自身的給養。一九三六年夏末，他們在福建西部的主要的蘇維埃根據地，已被推毀，敵方所施行的有效封鎖，迫使他們不能不採新的戰術，以求生存。

「根據我們當時的情勢，項英這樣告訴我，『我們決定把部隊化整爲零，分成幾百人一隊的細小的遊擊隊，散處於廣大區域之間。這新的編隊，使我們放棄守衛根據地的一切企圖。我們規定軍事行動僅以迅速襲擊我們能加以突擊的小隊敵軍爲限。這些方法使我們能够保持我們自身的實力，雖然因爲完全失去固定的

作戰根據地，我們的物質條件是越來越惡劣了。

「到了一九三六年年底，我們的部隊實際上是以一當百。敵軍沒有讓我們休息，每星期至少有一次接觸。我們時時以爲我們西征的部隊是整個完了，夜裏，因爲害怕突襲，我們不敢在鎮裏或是鄉裏睡覺，只能睡在山頭叢林之間。有兩年之久，我夜裏從未解衣，有時甚至還帶鞋睡覺。全軍的人，差不多全都如此。那時候我始終穿着那件又破又舊，滿是補釘的棉衣。」

「我們從未吃飽飯。要是沒有老百姓幫忙，我們一準要餓死。我們有許多細小的隊伍，給南京軍隊切斷，但當地農民却藏起他們的槍，解救他們。農民們都很願意把他們的米分給我們。我們的農會仍然秘密活動，一面報告敵方軍情，一面又掩護我們。農民們一想到地主回來就憤恨，而在他們看來，我們的失敗，就正表示地主制度的恢復。不久之後，敵方對那些與我們友善的村莊，開始整村的捕，整村的燬。」

「我們與外界失去一切聯絡，全像野人一樣，依着本能生活與戰鬥。我們許多最優秀的指揮員，不是死於戰場，就是死於疾病，我們沒有藥品，也沒有醫院。我們的軍火越來越少，許多槍砲因爲沒有兵工廠修理，終於變成廢物。我們甚至無法製造子彈，因此在使用的時候極端節省，有時農民們偷帶一些給我們，但封鎖使這件事越來越困難。」

「我們時常退至人跡罕到的深山叢林間，我們認得福建與江西的每條小路，每座山頭，我們也學會了五天不吃東西，然而大家却越來越結實，越敏捷，跟野人一樣。我們的好些瞭望哨，實際上完全在樹上過活。軍隊裏那些青年兵士，能以驚人的速率上山下山。有許多次南京軍隊的包圍，離我們的軍隊只有幾里路，但由於我

們熟悉路徑，和得到農民的幫助，我們時常能够突擊和衝破他們最弱的一點，或者完全避開他們。

「我們甚至沒有聽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變，這消息傳到我們耳朵裏，已在好幾星期以後，但我們的情形一點也沒有改變。不但沒有改變，西安事變後南京已能够把他們最好的軍隊調來進攻我們了。從一九三六年年底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們的進攻簡直沒有一刻停止。當年春天，他們動員了三十個師，企圖殲滅東南中國整個的紅軍。在最後一次的進攻中，他們動員二十五萬人包圍武林山，包圍圈的直徑只有二百到三百華里。

「反共軍逐漸縮小包圍線。他們造了許多新路防禦和碉堡，驅逐許多農村的農民，運走一切的食物，然後放火燒光。他們燒燬了山下幾千萬顆的樹，決心圍殲我們。我們許多探子和傳令兵被他們俘獲。這種方法使某些在地的遊擊隊員吃驚，他們企圖脫逃，其中有些被捕，終被殺死。

「到一九三七年年底，項英繼續說，「我們仍然沒有得到主力紅軍的訓令，也不知道朱德與毛澤東的消息。後來我們有一個探子，終於帶着西安事變的全部經過和西北內戰終止的消息回來。我們立刻給政府和進攻部隊發出一道宣言，重申我們對統一戰線的擁護，並要求停止內戰。我們矢言我們願意簽署三月十五日延安發表的共產黨宣言，無論如何這呼籲毫無效果。

「甚至到了七月，日本已進攻蘆溝橋，我們所受的壓力仍未減少。我們發出另一個要求統一團結的呼籲，並請求把我們派至前線對日作戰，結果還是沒有反響。八月，我們還被進攻。上海的戰事越來越擴大了，但只有到了上海失去之後，國民黨方才開始談判。軍隊開始調至廣東與廣西，派至長江前線。當時南京很怕我們利用

這個機會回至江西。

「劉共軍總司令熊式輝將軍本人，在安於我們繼續存在的情形下，還作過破壞我們的最後的嘗試。他的代表應允給我們某些指揮官以巨量的賄賂，叫他們領着部隊開到福建，並確實保證將改編他們，參加長江流域的戰爭。這些努力都歸徒然。當時我們的軍隊已減至五千人，我們的步槍也減至三千支，但餘留下來的，都是身經百戰久受風霜，不僅是堅強的戰士，而且是服從紀律，心堅似鐵的革命者，我們長期的嚴厲訓練，已肅清了意志薄弱者與叛徒，所有的人，差不多都能够領導別人作戰。」

「熊式輝將軍以各種方法消滅我們的企圖全歸失敗之後，他最後終於要求我和他見面。在這次會議中，我們與熊式輝及何應欽（軍政部長）成立協定。以後關於把我們改編為政府統轄的新軍的事情，由共產黨在南京的代表負責進行。我本人則到陝北，在那裏研究了幾個月，不久便接到委任令，我也就回來担任新四軍軍長之職。」

項英這個以實行的雙手握住性命的人，以自信的調子結束如上的談話，不用說，這自信在他顯然是實際的真理。「延安的每個人」他說，「都以爲我是死而復生的，但誰也不覺驚異。我們革命者都有復生的習慣。你看一看朱德、毛澤東、彭德懷，他們都已「被殺了」幾十次，當作一個人，我們沒有什麼，但當作革命的一部份，我們却是不可征服的，不管中國革命「死了」多少次，他還是要活過來，除非中國本身能被消滅，不然的話，牠是決不會消滅的。」

五 人民的軍隊

只有武裝的人民，才能是民族自由的真正堡壘。

——列寧

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佔奪南京之後，蔣委員長最後批准贛閩共產黨改組爲新四軍，在長江下游南北岸，進行活動有限制的遊擊戰。葉挺是這支新軍的軍長，項英則爲戰地指揮官。

叫葉挺與項英合作，是一種巧合。十一年前，葉挺是老四路軍——在北伐時稱爲「鐵軍」第二十四師的師長。這部隊擁許多最勇敢也最進步的黃埔幹部，而且是北伐軍的先鋒。當他駐紮在武漢時，葉挺給項英的工人一千支步槍，在國共分裂以前，他們就以這些衛戍武漢。這些槍械後來又武裝了中國的第一支赤色遊擊隊。在富有歷史意義的南昌暴動時，葉挺領着他本師和朱德賀龍等的部隊一起參加，開始組織紅軍。後來，他又是不幸的廣州暴動的首領。

在廣州失敗之後，葉挺當即退休，不再參加內戰，一九三八年他之被委爲新四軍——紀念那光榮的「鐵軍」——軍長，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因爲這在蔣委員長臉上是很過得去的。但葉挺本人既是黃埔畢業生和著名的革命軍人，他是很能接受共產主義的，雖然他本人不是一個共產黨員。

項英和葉挺建立一支新的抗日軍隊的消息，在前蘇區內迅速傳播開去，因此千萬的農民開始徒步由很遠很遠的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等省走來參加。他們有的帶着在內戰時藏起來的步槍，那些有錢有米

的人，也拿出來作爲『抗日的貢獻』。幾千個剛由監獄和反省院放出來的『赤匪』也回到他們領袖這邊來。少年先鋒隊與赤衛軍，則攜帶着生鏽的標槍、手榴彈和斧頭參加。從佔領區的各城市裏，又來了許多學生和記得理英是他們的領袖工人與機匠。就像水滸傳裏所說的情形一樣，四面八方的人都應着宋江的號召前來參加。但是帶領着這支奇特的志願軍的葉項和其他殘留的同志們，必須把那些從未動員和意志沮喪的民衆動員起來，並使他們的軍隊能够打擊那配備比他好上無數倍的敵軍。但只經過幾星期的訓練與改編，新四軍便於一九三八年四月，集中在他們被派定的區域裏，雖然充溢着自信與鬥志，但非常缺乏金錢與武裝。農民們帶來的機械總共三千支，他們又掙掙自己那幾乎一空如洗的腰包和得自外面的捐款，購置了一小部份，再加上舊時紅軍的槍械，這二萬人的軍隊只有一半槍枝。蔣委員長無論如何不肯增加他們的火力，其實，這是可想而知的，他決不願意幫助這支他久欲加以殲滅而沒有成功的軍隊，因此他始終不肯發槍械給他們。

新四軍佔有蘇皖兩省三分之一，人口平時約一千九百萬，現在又加上許多難民。當日軍進攻漢口時，這地帶的國民黨軍都已退却，日軍佔住城市公路與鐵道，新四軍則奪回其餘的地方。這軍隊當時要獲得民衆的信任，是一樁異常困難的工作。千萬的土匪與海盜不斷蹂躪居民，其中有些受日本的津貼，有些却以掠奪來維持生存。新四軍必須解除這些『錯誤的遊擊隊』的武裝，或是重新教育他們。其次，牠又須對抗日軍的進攻。某些地方紳士，在日軍協助下，組織地方政府，拒絕中國軍隊的援助，入駐或合作。這些傀儡政權也是應該摧毀的。最後，他們本身沒有兵工廠、軍用倉庫和醫院，使遊擊隊得不到充分的供給，而農村經濟的破產是異常尖銳的。

費紹同博士 (Fei Hsian-tung) 在他的近作中，給長江區域下游農村經濟的惡化，作了一番可靠的敘

述。這區域恰正是新四軍活動的地方，費博士所述的惡化，也充分指出了新四軍動員民衆時所遇的困難。在日軍實行空前掠奪之前，這地區的貧苦本已非常驚人。極重的地租，各式的苛捐雜稅，貶抑的農產品價格，吃人的高利貸以及山樣的債務，迫使農民拋棄了最好的耕地。絲價的降落百分之六十以上，使農民最重要的一種副收入，一掃而光，小地主與佃農至此已不得不更倚賴高利貸者。

依照費博士所說，這整個區域的地主豪紳，正是受政府委派的稅收員，他們的地位跟印度的地主（Zemindars 地主兼稅收員）一樣。當地衙門所要求的指定數項，由他們負責徵收，因為佃農始終不知道被派的整個數額，所以他們不僅要繳付地租，不僅要交納捐稅（這捐稅本來是應該由地主本人繳納的），而且還要給收稅人的地主，加上一些額外的獻金。

這些收稅人擁有警察的權力，可任意逮捕任何沒有交納租稅的農民。那些不願意在冬天坐牢的人，就不得不向高利貸者叩頭求貸——而這些高利貸者又時常是收稅者與地主本人。這些貸款的本錢和復利總計，半年要達貸款的四倍，一年要達貸款的七倍。這區域的千百萬曾經是自由的農民，現在都成爲無產者，而這顯然是地主——豪紳——稅吏制度那種日甚一日，貪求無厭的剝削所直接造成。關於這，我想留在下一章再講。

新四軍開頭給農民證明他的部隊有着革命的紀律。項英說，「軍隊的紀律是民衆組織工作的基礎。民衆運動的迅速開展，與戰鬥的勝利有着密切的關聯。沒有紀律，便得不到民衆真正的友誼，沒有民衆的友誼，軍隊便不能提拔當地的民衆領袖，沒有當地的領導，民衆運動便得不到成功。」（註）

（註）見一九三九年倫敦出版中國農民生活，長江流域農村生活的一般研究一書。

新四軍最大的資產，也許就是牠的革命的傳統，那就是組織的方法，百折不撓的精神，以及戰鬥的戰術。

「革命軍隊勝過僱傭軍隊的地方，」項英對他的部下這樣說，「就是由於革命軍隊是為社會福利而戰，而不是為着搶掠與升官發財。我們是為社會與民族的自由而戰的，因此我們的軍官與士兵實際上一律平等。為什麼要平等呢？我們全都為着同一志願而戰，只有志願相同的人，相互之間才能稱為同志。有同志愛，然後有團結，有團結而後有力量。戰爭不外是兩種這樣的力量之爭鬥。我們的力量是優於敵方的，因為我們的同志愛比他們濃，使我們萬眾一心的。我們的目的，也比他們的大。」

「在我們的軍隊裏，只有工作之分，沒有階級與身分之別。我們過着同樣的生活，有着同樣的權利。軍官沒有特殊的徽號。我們不論是官員與士兵，完全沒有餉銀，大家得到的只是糧食與極小的生活費。我們大家都明白，在極度困難的時候，連這生活費也會取消，以作公用。我們的軍官絕對不能貪污，在軍官與士兵之間，毫無不可告人的秘密。」

新四軍的力量是基於牠的政治教育制度。「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項英說，「軍隊是一種為實現某種政治目的，而進行武裝的政治鬥爭的組織。政治的領導保證了革命軍隊的精神思想，生活與其行動。」每個軍事指導員若有一個同級的政治指導員與他並肩工作，每個部隊，在連以上的，都設有一個政治部，負責進行軍隊的教育與反動的宣傳等工作。軍事的與政治的決定，都在士兵之間討論，而每一個重要的決定或改革，都要得到全體的贊同與諒解。政治指導員指導士兵讀書，和他們分析政治問題，除一般的教育而外，還輔以各式各樣的活動：如宣傳、軍事衛生、民衆組織和娛樂等。士兵俱樂部歸他們監督，借着運動、遊戲比賽、研究和政治辯論等，

使士兵享受一種舒快的新的集體生活。除八路軍外，這在中國的軍事組織中是絕無僅有的。

但是，依照項英所說，除非革命軍隊成爲民衆生活的一個有機部份，牠便不能成功。『軍隊是民衆的武器，因此軍隊與民衆是同一家族的家人，分受着共同的快樂與不幸。』這在久已統一了的現代國家，乃是老生常談，但在中國，却必須在理論上，事實上，一次又一次的說下去，直到民衆相信這些話。民族軍與人民軍都是新的術語，甚至這名詞在現在還是新鮮的。我相信第一個採用人民軍這名詞的，乃是共產黨。

新四軍在組織民衆時所遇到的困難，比之他們北方同志（指八路軍）要大得多。在南方，跟華北冀察晉邊區那樣的戰時統治，是無法建立的。國民黨愛惜他們前時在長江三角洲的政權，他們禁止新四軍創立某些機關，以進行必要的政治的與經濟的改革。新四軍克服一個城市，國民黨立刻恢復前時那種黨部的統治，沒有人民的議會，也沒有民主的政府，他們又不許新四軍在後方設立有組織的根據地，像八路軍之以西方延安爲根據地一樣，甚至他們在鄉村裏開辦的學校、醫院和工業，也要他們自己派兵保護。這樣說來，成爲他們唯一的根據地的，只有民衆的愛國情緒了。

不管這些困難，新四軍仍然組織了廣汎的農村自衛團的密網，軍隊駐紮的地方，他們的政治宣傳隊，便進行說服當地民衆的工作，告訴他們，保衛家鄉是人民本身的，也是軍隊的任務。流動劇團，時常以淺顯易懂的演出方式，介紹此類的劇情，然後再依據統一戰線的基礎，進行農村動員的工作，他們提拔及訓練當地領袖，使他們足以領導地方自衛團，並且武裝他們。最勇敢的青年則編爲敢死隊，在經常變動的戰線附近，執行小規模的遊擊戰爭，再由敢死隊中挑拔新的後備兵，以補充軍隊本身的主力。地方領袖，由上海來的學生與工人，紅軍的

老幹部，都是新四軍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生，千百個幹部就在這學校裏，接受短期的，但是緊張的，關於組織和領導革命羣衆戰爭的訓練。

一個動員了的鄉村，究竟有什麼價值呢？這表現在軍隊作戰時民衆跟着作戰。這表現在獲得勝利時全體都很歡欣，因爲大家幫着得到這次勝利。這表現在一個士兵出發作戰時，他曉得自己要受傷，決不會被丟棄在戰場，將有人民志願隊來抬救他們，或把他們送至醫院，或把他們藏在鄉村裏，等到敵軍返回防地。因爲戰士的威望已經提高，不是傭兵而是志願兵，家族已不再以當兵的兒子爲『廢鐵』了（這是根據中國土語：『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而來的），自由農民也爲着他的家族的好田地，爲着他的鄉里與國家民族而戰了。

農村動員的目的，是要每一個男人女人與小孩，都爲保衛地方而工作。少婦參加爲宣傳員、組織者、教員與看護。老年婦人則縫衣做鞋安慰在前線的『他們的兒子』。老人則受投擲手榴彈的訓練，以對抗胆敢單身走至鄉村附近的日兵。少年人則組成耕種隊，幫着他們在前線的父親與兄弟或者偵察敵情，或在軍中執行勤務。經過自衛委員會，村民可以曉得戰事是否迫近本村，又因爲他們已有組織，早作防備，所以他們可以迅速攜帶女兒、值錢東西以及畜牲雞鴨等退至事先準備好作爲逃難的地方，在那裏他們可以得到軍隊的保護。

新四軍與民衆間的有機的聯繫，再沒有比他們那公正而著名的醫藥服務，表現得更清切的了。一九三八年，當華南紅軍改編出發抗日時，他們完全沒有救護組織，他們大多數的軍醫與看護，都已在內戰時被殺了。但在一年之後，當林可勝博士（Dr. Bolert Lim）領率中國紅十字會救護隊訪問他們時，他說，由『清潔、修理和對病人的小心看護』說來，新四軍的醫院在整個第三戰區中允稱第一。到了一九四〇年，新四軍可說擁有

中國最好的軍醫組織。這是一隊一隊緩緩建立起來的。他們已開辦了兩個醫務訓練班，十家醫院，八家派遣醫院，二十個旅（大隊）救護站，二百個營（中隊）救護隊，三百個連（小隊）急救隊（註）這是怎樣完成的呢？這醫藥服務的絕大部份，可說也是從那生產了米、絲和自衛團的同一地土裏生長出來的。

自然，說牠是中國最好的軍醫服務組織，也不是怎樣了不起的，因為在戰爭爆發時，中國整個的軍醫組織，大概是全世界最壞的了。從上到下，牠充滿着欺詐、無效率、不勝任、罪惡的冷淡等污點，一般說來，這只是使負責組織軍醫處的師長多撈一些外快而已。也就是這原故，他們公然虐待着傷兵，侵吞中飽。在內戰時，總參謀大部份是倚賴外國教會醫院，去治療他們的傷兵的，本次戰後，因為大部份留在日佔領區的傷病兵都被慘殺，這種卑鄙齷齪的行當方才暴發出來。自此之後，特別是在林可勝博士的賢明的指導與他那個模範的紅十字救護隊的幫助之下，才有了很大的進步。

組織新四軍救護隊的醫生與看護，像該軍的士兵一樣，都是志願的。其次，他們一開始，就得到葉挺軍長的全力的支持，葉本人對救護工作異常重視，並邀請盛（Sheng 譯音）博士領導這一工作。因為盛博士不僅有高深的醫學修養，而且是中國幾個富有革命的毅力與熱情，足以進行此種困難工作的著名醫生之一。第三，參加這一工作的青年男女，都為這軍隊的革命歷史所吸收，他們一樣為救國熱情所激發，抱有救護祖國戰士的熱望，以及亟欲使他們成為全國其他救護隊與個別醫生及看護的模範的決心。他們發誓忍受軍隊與人民所忍受的同一危險與苦難，同意與他們過着同樣的生活。最後，這救護事業之得以迅速發展，是由於民衆的合作，

（註）見一九四〇年香港所出版的新四軍醫藥服務簡報

他們訓練當地民衆爲救護人員與助手的才能，以及運用一切可能得到的便利的聰明。

博士着手工作時，只有五個醫生一個男看護，後來逐漸增加，配備也逐漸改善。

據林可勝博士告訴我，中國登記的醫師只有一萬人，其中勝仔的不過二千人而已。即使這二千人完全參加軍隊救護工作，每一千個兵士才有一個醫生。新四軍顯然認清這一事實，他們盡力創設自己的醫務訓練班。他們畢業之後可以作爲助手，可以治療輕傷兵，或救治重傷者，使他們可以移至後方醫院。這樣的助手，每六個月可養成一百人。他們除攜帶藥袋之外，還帶着槍枝，有時且同兵士一同戰鬥。他們在戰場施行急救，並把他們送至安全的後方。這種戰地服務對於中國士兵也是從未經見的。

但新四軍給予民衆的醫藥便利，也許使民衆最深切地了解了人民軍的意義。這是前所未見的。男女看護，不僅執行正規的軍事救護，而且在軍醫指導下，參加公共衛生的工作。這軍隊既然這樣倚賴民衆，那麼民衆的健康自然是值得極端重視的。個人的與公共的衛生，以及預防傳染病等的簡單規則，應當加以推行，病人也應當加以救治，在新四軍成立一年之後，他的醫院和流動醫院診治了五萬三千名傷病的民衆，其中大半是完全沒有收費的。

像這樣的事實還可以開列下去，但我在這裏只想暗示出他們的堅苦與偉大，像這樣的軍醫傳統是任何國都可以引爲光榮的。這些執行救護的男女，實在配加上英勇的稱號。他們冒着健康以及生命的危險，去實現這偉大的工作，而他們所得的酬報乃是農民與兵士的道謝。他們窮到無以購置外科手術用具，只好由他們自己的工廠製造鉗子、剪子和解剖刀。他們窮到無以建造新式病院，只好利用寺院和住家改造爲病房。當他們許

多主要供給的來源斷絕之後，他們便在自己的實驗室和藥廠裏製造代用品。

新四軍竭盡能力改善駐區裏的人民的生活，休耕地盡可能加以利用，時常由軍隊加入耕鋤，所以牠可以從當地取得一點糧食。在農民的耕具和種籽都被奪去，或是賦稅與高利已使他們破產的情形下，要恢復農業的生產是件極困難的工作。此外，普通的人民與乎軍用必需品如農業工具、手工業工具、衣服火柴、紙張印刷機器和建築原料等，全都異常缺乏。

新四軍爲着改善這種形勢，牠着手組織了他們自己的工業合作社。在極大困難之下，他們從佔領區裏偷運進了一些輕機器與工具。不久，新四軍已有了他們自己的機械廠和流動軍火廠（能製造地雷、手榴彈、子彈、白砲、大刀與刺刀等）。一個印刷合作社也成立了起來，他們又教導農民們紡織，用當地出產的棉花、苧麻和大麻製成粗劣的衣服。他們曾向中國工業合作社呼籲，請求他們到新四軍區域內組織難民生產隊。（註）

但是，一個軍隊的最後試驗，乃是牠所得的軍事效果。根據一九三九年中所發表的，關於這方面的不完全的報告，（註）我們可以看出，正規戰與流動戰，歐洲速決的閃電戰與東方這長期堅持的持久戰之間的傑出的提示。第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在新四軍作戰十三月中，他前後接戰五百三十次，參加每次戰鬥的至少不過數百人，而且這戰鬥本身，沒有一次是十分重要的。但他們的不斷攻擊，以及結果差不多每次都是遊擊隊勝利這一

（註）重慶政府拒絕資助工合，到這游擊區域裏開辦事業，但海外某些愛國華僑，因感於新四軍的作戰成績，給予相當捐款，在美國同情人士援助下，開始在新四軍區域內發動一個創建國際工業合作社中心的運動。

（註）見蕭向榮作二年來的抗戰，載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八路軍軍政雜誌。

事實却是重要的。一九三八年，他們平均每天有一次戰鬥，在一九三九年有時一天要作戰兩次。

第二、敵方傷亡雖小，但不斷增加，據葉挺估計，每天他們要死傷日軍三十人，每天如此，週以繼週，月以繼月。第三、他們給予敵方交通線的損害，比給予敵軍的傷亡還要嚴重。第四、最重要的新四軍得到民衆組織的協助，使敵方無法鞏固軍事勝利，進行有效的政治控制與經濟掠奪。最後，因爲新四軍主力的極端流動性，迫使敵方不能不維持極大兵力，以保持所有的戰略據點。

在新四軍開進其駐區之前，日軍覺得只有三個聯隊，就可以控制那些沒有組織和沒有武裝的民衆。到了一九四〇年，日軍駐兵已增加到三師。在新四軍開入之前，當地許多區域，都爲各地傀儡政府所統治，到了一九四〇年，這些偽政權只有在日軍刺刀直接保護下，才能行施職權。以前小隊日軍可以自由在鄉間路上行動，到了一九四〇年，甚至在南京近郊（單此地就有自衛團七千人）也必須有強大的護衛。

爲着避免長篇徵引，這裏只就新四軍出版的戰報中隨意摘錄幾節，因爲這些正是他們的活動的生動的描繪，由此可以推見其他的：

- (一) 某某支隊某部隊，在進行偵察時，進攻丹陽附近敵軍，擊斃敵軍十二人，奪獲步槍十二支。
- (二) 某支隊破壞金壇西面濟西橋（譯音）與古梁橋（譯音）間公路八八里，兩橋也被毀，攔回大批電話線

奧電線。

- (三) 某某支隊便衣隊在天皇廟附近埋伏襲擊敵方軍用卡車，卡車被毀，死日軍十二人，奪槍十二支。
- (四) 敵軍一百二十人向大橋移動，中我地方部隊埋伏，激戰四小時，在我軍增援之後，敵方始行退却，是役斃日

軍五十五名，奪槍甚多。

但是新四軍的軍事進攻，跟這軍隊的別的工作一樣，簡直沒有得到軍事委員會的援助，不但沒有援助，而且不斷阻撓該軍建立自給的經濟根據地，否則他們的進攻活動決不會限於此種程度。一九三九年之末，葉挺將軍告訴我，新四軍兵員約四萬人，有槍不足二萬支，部隊一半以上的兵員僅以手榴彈與大刀爲武裝，他們的主要任務，是隨同帶槍的人一同赴戰，看看是否有因死傷而掉落的步槍。到了一九四〇年九月，新四軍軍力已有三萬五千枝步槍，和四百六十架機關槍，這火力的增加主要是從敵方奪來，在戰時以這樣的方法增加軍備，不但延緩而且代價極昂。然而不管這軍隊兵員的多少（大致等於中國五個整師），軍事委員會給予新四軍的補助費，是每月十三萬元！

讀者也許可以想像出，這經濟奇蹟，以及以如此細小的款項供應如此大軍及上述各項活動所需的那種獻身的精神。他們之所以能够生存，民衆的援助顯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假如沒有無黨無派的救濟組織，如「保衛中國大同盟」以及「中國紅十字會救護隊」（這組織給新四軍許多藥品，醫學配備，和一點技術的幫助）的支持，他們的負擔甚至還要重。

後面我們討論八路軍在西北的成就時將繼續檢討這兩種戰術和戰略的相互作用。這裏所指出的乃是新四軍已把基於民衆動員的長期抗戰的意義，充分顯示了出來。假如他能得到大後方資源的供應，假如政府能够准許他們武裝和供應他們已組織起來的民衆，擴大他們的作戰地區，那麼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富有戲劇性的效果。

六 香港的插曲

除非日本剝下英國的厚皮，讓所有的東方看清，否則東亞的永久和平，永遠不會實現。

會實現。

——安藤提督

一如所料，漢口終於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陷落，不過稍爲快一點兒，因爲廣州也差不多同時失陷。關於引起這些不幸的悲喜交錯的事實，我想這裏用不着重述，幾個有能力的觀察家，早已加以說明了。在廣州、漢口失陷之前，中國人對這些挫折並不介意，因此，這些事實的最大的意義，大概就是告訴日本說，以後牠再也找不到一個可以結束戰爭的重要的城市了。

這時期最壞的地方，也許就是過去到處發生的錯誤，又再重演了他們沒有適當地改組和遷移工業設備與熟練工人，而且在這兩個戰略城市失陷之前，也未曾加以毀壞，使之不能成爲敵方的作戰根據地。廣州與漢口僅只稍微受損，並未成爲焦土。這種優柔寡斷所生的影響，在幾個月後就已表現了出來，因爲日本利用了牠已所奪獲的資料與工廠，推進了牠向內地的侵略。

此後幾個月，我便住在香港，這珠江口的海島，是廣州對外貿易集散的地方。在蔚藍的太平洋上，牠很像一顆靜定的真珠，每次當我由內地到來之後，維多利亞殖民地的古怪的景象，時常使我感到驚訝。錢的價值的對比，在這裏簡直叫人不敢置信。香港飯店客人，每小時化在喝酒一項的費用，就可以救活幾百個在漢口岸邊席地而坐的餓殍，或是擁塞在各處路上的難民；而那些富有的中國人，每天晚上擠在廣州茶館裏互相宴請的用

費，也足以購買充分藥品，以治癒那些因瘧疾痢疾而垂死的千百萬兵士。

約模一百年前，英國在擊敗中國之後，就掠奪了香港，作為牠的戰利品之一。到了一九四〇年，這海島和對岸的一片租借地，已代表了一萬萬英鎊的投資，並且是中國沿岸英國安全的最後堡壘。牠一向付出可觀的紅利，在現行戰爭中，更達到了牠繁榮的頂點。廣州失陷之前，中國輸入的軍火，極大部份都由香港輸入，因此巨額進款，不斷滾滾而來。就是此後牠還不斷經由安南與緬小海口，與中國內地進行繁盛的貿易，一面還把巨量的軍需原料運至日本。

香港許多英國商人對中國抗戰所抱的態度，跟唐寧街一樣的漠不關心。雖然他們的生存，完全倚賴着中國住民與貿易，但他們總認為這不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在他們看來，為日本征服所「孤立」的，不是細小的香港，而是中國的大陸。他們中有些人還不斷的對中國抗戰表示厭惡，因為牠阻撓了貿易的恢復，只要是中國投降的話，那麼一切又都可以欣欣向榮了。那些抱有這種政治見解的人，正衷心地企望日本與其早日的盟友英國聯合起來，這樣，他們兩方就可以從「發展」中國得到大批的利潤。這些人對過去十年來日本與中國的情形，似乎毫無印象。

自然，由鮑爾溫到張伯倫政府的英國外交政策，也大半持着同樣的觀點。張伯倫顯然既從未明白各侵略國間利益的共通性，也不相信歐亞軸心有實現的可能。我記起一個重要的英國銀行家，由倫敦乘飛機回達香港之後，所表示的極大的不滿。他的意見跟他們是相反的。在一次談話中，他告訴我，他行前曾見過西門爵士，西門在一九三九年春間，是張伯倫內閣中最有力的一人。當時他竭力說動西門，請他給予中國一筆信用貸款，

以作爲防衛帝國的一種方法。

『我竭力以譬喻和簡單的事實，使西門明白我所說的意思，』他說。『我告訴他說，如果歐洲發生戰爭，而日本已在中國獲得了勝利，那麼我們以及法國荷蘭在近東，就全都處於孤立無援的地步。我說那時候我們將不能防守香港，也許甚至不能防守新嘉坡。我想盡法子使他明白，以借款的形式在中國投下一千萬鎊的資本，要比爲着加強新嘉坡艦隊，化上一萬萬鎊的款項更要值得。』

『中國是我們的外衛防線，這一點，在西門看來，似乎完全是荒誕不經的。他的意見恰恰相反，他認爲日本總要獲得勝利，英國應盡可能表示高超，使他適應新的情勢，藉以保護帝國的利益。』中國離我們遠得很哩，』他說，『我們除同情外，再不能給他別的什麼，現在遠東的情形，實在壞得很，不過這些都是不能避免的。弱肉強食，你曉得的。』』

不用說，也有許多對中國抗戰在世界變革上的意義，能清切了解的進步的英國人士，他們在募集醫藥與救濟方面，做了很完滿的工作，香港政府對千萬中國難民的照顧，也要比上海方面好得多。溫善的香港總督諾錫國爵士（Sir Geoffrey Northcote），和他轄下的某些官員，對日本的侵略，以及這種侵略對他們本身的意義，已逐漸採取了現實的觀點，但我覺得，他們這種警告，並未引起本國政府的注意。我從未在任何地方，遇到一個比香港主教更精明勝任，熱愛民主，自由與人道的友人，他可說是東方的康特布里大主教。他一人做了十人所能做的工作，並從香港給予中國以許多有效的援助。但是在那些『上等人』中間，一向却把同情中國視爲是破壞秩序的傾向，因而對那些熱切關心中國的人，時常稱之爲共產黨員。

另一方面，那些未到過中國，只見到香港華人的英國人，他們之看不起華人愛國情緒，確有其原因，我們不更加以苛責。這地方擠滿着富有的地主、商人和官員的妻妾，這些人在日機開始轟炸的時候，就席捲他們所有的贓物，逃到香港來，希望英國獅子保護他們的資產。他們都幻想着，一到戰事完結，他們又可以安全地利用他們的資本，參加『復興』工作，撈他一大筆錢。

許多銀行家估計，逃在香港一處的游資，達華幣六萬萬元，據說還有二十萬萬元集中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上。一個負有使命到美國去的中國銀行家對我說，在一九四〇年，差不多有九千萬美元的中國貨幣逃到外國去。中國不能徵收這些資本，因為實際上這些都是由外國銀行放出去的，而半殖民地的中國政府之無法加以法律的統制。然而如果某些高級官員和他們的太太們自己，不會熱心於外匯投機的話，要採取更有效的辦法，也還是可能的。

在殖民地的一百五十萬華人中，大別分為兩種：一種是在地人，他們的家族已有三或四代住在香港，很傲慢的自認為是香港人；另一種是難民和移住的人，他們自認為是暫時的寄住者，在前者之中，有許多從未到過中國，他們說和寫英文要比中文好得多，而且還接受了英國的習慣與標準。而許多富有的『香港人』，因服務或捐助，而受到英國皇家賞賜的爵號或褒獎，已成為在地的貴族，而在他們周圍，構成了一個畸形怪狀的中等階級的英國社會。其中好些因為先時做了鴉片之類的買賣，發了一大筆財，現在都在經營商業或銀行，或則擁有許多皇家的地產。他們把孩子送到英國公立小學去唸書，過着英國小孩一樣的生活，接着英國的傳統的教育。這些人死心塌地傾向英國皇家，而且對此感到十分滿足。

日本人非常妬忌地注視着英國這種殖民地化工作的成就，這使他們想到自身的失敗，因為他們始終無法使高麗、滿洲和中國那些被統治的人們比較地忠順於日本。要是能够使那些閒存在英國銀行裏的資金，移到他們自己手裏，這在他們將是怎樣的一種意義呵！但日本帝國主義的弱點，是在她的財政基礎並未鞏固，以及牠不能使中國社會的任何一個階級得到安全。英帝國主義者在印度、香港以及別的地方，却與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組成同盟，給以英國法律與秩序的保障。日本却不能這樣做，她自己亟需立刻從軍事征服中得到報償，這就強迫她殘酷地掠奪中國的各個階級，固然她不唯不能給買辦地主階級一些殘餘利益，而且又不能改革土地與稅收制度，以博得全體民衆的支持。她的投資完全是極短期放款，在她沒有生利以前，牠已不能不收回這資本了。

日本既不能獲得中國真正某一階級的同盟，不得已只好倚賴一個總的階級，這階級包括貪財的官僚和一部份流氓無產階級——流氓、兇手、龜奴、毒販以及強迫的勞工與士兵——他們論工領酬，並不是真正忠順於日本。唯一可以使她得到中國一個重要階級的支持的方法，就是把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從東方逐出，以減輕中國某些份子所受的外國的壓迫。她必須在東方找到一種相當於歐洲的猶太人的外人，又因為英國最易遭受打擊，所以日本挑出牠來，加以攻擊。

當香港和倫敦緩緩看清了日本反英的基本目的之後，他們的意見改變了，英國人開始明白了，他們自身的前途，與中國作爲一個自由獨立而民主的國家存在，有着密切的關聯。然而，無論如何，只有在急降的轟炸與大批的屠殺——這在遠東已發生了兩年多，但全世界却一直關心地注視着——擴展到歐洲大陸之後，他們

方才看透了這一點。

有一天，我在香港跟三個新由歐洲到來，自願到中國作醫藥服務的醫生吃飯。他們都不是政治家，而是好的醫生，但因為一向住在歐洲，使他們成為革命者與國際主義者。假如他們住在本國，此刻要不是應徵入伍，參加反法西的戰爭，就一定給投進集中營裏。他們相信，他們可以在中國參加為自由與人類愛而進行的國際鬥爭，三個人對這一點都有着他們自己的見解。

他們中有一個，曾先後參加過近二十年來每一次重要的但都失敗了的革命，在匈牙利、奧地利、德國與西班牙。他對我說：『每次我都在失敗方面。這實在是單調的。』他半幽默地但又帶着一種古怪的謙遜的神情注視着我。『我現在只要你答覆我一個問題，不要轉灣抹角的，而是像兄弟一樣，用一句話答覆我：我這次到底有沒有站在勝利方面的機會呢？』

我想了一想，然後這樣對他說：『在這次戰爭中，中國每次都要打敗仗，但牠却在勝利方面。你要我用一句話回答，那麼我說：勝利者已在失敗中而失敗者將得到勝利。』

我想，這是一個慰人的警句。失敗者收穫，勝利者哭泣。但衡之我的良心，我不曉得這話是否正確。本來事情是應如此的，除非歷史真的開倒車。我覺得香港這地方已過份助長了我的懷疑，這正是我應該回到內地再度與現實保持接觸的時候了。

第四章 一條舐吮自己創傷的蛟龍

一 月光和炸彈

雖然有在四十八小時內毀滅一個一百萬人口的城市的可能，但一切戰爭的

主要因素——人——並不因此而消滅。

——Jose Mirajal將軍

『桂林』號在廣東附近被日機擊落後，中國航空協會決定在夜間從香港起飛。飛機於早晨二三點鐘秘密離開香港，破曉時飛抵重慶，此種遊擊飛航每星期有一二次。我搭的是道格拉斯機，由戰事發動後一直在這條航空線上服務的美國機師駕駛，破曉時到達重慶，牠在揚子江上游，離上海一千五百哩。

這是我初次赴川，四川意即『四條川水』是中國第二大省份，人口最多，四千二百年來，重慶一直是一個城市，但直到中央政府選牠為戰時首都時，牠依然是全世界最落後的城市之一。亞洲若干大川都從東西藏邊陲流入四川。其中嘉陵江和揚子江剛剛在那由堅固岩石構成的海岬下邊匯合，而草草建成的重慶便在這岬上建立牠的新舊廢墟，在蓋滿松林的小山和鋪滿紅土的田莊中間。這裏，闊帆的民船和小汽輪載着富庶的成都平原的土屋沿揚子江下駛——通過三峽，橫過危險的激流，直達漢口和上海——直到戰爭封鎖了揚子江，切斷了牠日益發展的貿易。

我於一九三九年初夏到重慶時，牠是一個濕熱、骯髒、混亂的所在，內遷的中央政府在空中襲前後在這裏建立一些秩序，完成一些建設。這完全是一座無計劃的、人口擁擠的中世紀城市，綿延許多方哩，平常人口超過五十萬，而現在却減少到十萬左右了。在黑夜，這個數目多少有點增加，但當月亮照耀着黃色的揚子江時，牠立刻又減少了。交通的速度降低了，跟鄉村的情形相彷彿。僱不到車子，而一部人力車——當你設法僱到一部的時候——從城市的一角拉到另一角，需要兩個鐘頭。

一畝一畝的建築物在五月和六月的野蠻空襲中被炸燬了，市民死難者四千餘名，而現在，要是天氣清明的話，每星期總有新的瓦礫堆出現。日機總喜歡在月夜實行空襲，因為這時牠們可以從漢口根據地沿着揚子江的銀色標幟飛至牠和嘉陵江的匯合處，這裏便是首都所在地，無論如何掩蔽不了。

有一個時候，我跟紐約泰晤士報記者杜爾亭（Tilman Durdin）及其勇敢的夫人庇其（Peggy）住在一起，她剛從上海來此，經歷未曾經歷過的空襲。他們有一座小屋在市中心，在峽谷脚跟兩所兵營和一所軍火庫的中間。然而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理想的所在，因為除了偶然的場合，日機難得擊中一個軍事目標。

廣大的公共避彈所正在開掘着，但據說三分之一的居民依舊沒有保障。最早得到警報的政府官員們坐在汽車裏往城外疾馳——最先是各部長，其次是各次長，再次是較小的官吏；民衆立刻也追趕上去；他們一看見成行的官車向西疾馳，便丟下的一切，跟着奔跑。人力車、貨車、牲畜、人，爭先恐後地沿着大街狂奔，像一陣暴風，把面前一切都帶走了。

我憑藉杜爾亭的月季證，牠給與我們一個很好很堅固的避彈所裏的一席之地。這個避彈所的頂蓋有三十

呎厚，週圍都是廢墟，附近是公寓房子。每次警報一響就有二百名左右的中國人在這裏，在全然的黑暗和更難堪的逼人靜默中躲那麼二三個鐘頭。這個避彈所有一次直接中了炸彈，炸死半打在洞口徬徨的人，我們因此爬到牠的深處，悶得半死半活，心裏不免懷疑起來：索性等在洞外試驗自己的命運，看炸彈會不會投中『你』，也許比悶在這裏好些哩。

一天晚上，在接連幾次空襲後，杜爾亭夫婦請鄧超和葉劍英將軍吃飯，但我們大家都因缺乏睡眠而覺得十分疲乏，很少談話。他們很早離席，回到他們自己的地窟邊沿去。當半夜又響起第一次警報時，我們已呼呼熟睡着了。

『就讓我們在這裏坐一個通夜吧，』我向杜爾亭提議。我會估計平均被炸的機會不過二千二百三十一個中的一個吧了。我的估計完全錯了。但我們決定：如果我們留在這峽谷邊沿的新鮮空氣中，即使有炸彈飛來，也來得及從谷邊溜下去，躲避彈片。然而庇其不贊成這個意見，我們終於聽從了她，跟她走下街道，剛剛在第二次警報前躲進洞裏。

女性的直覺是不錯的。避彈所裏猛烈的震動告訴我們，附近某些建築物中了炸彈。當我們在空中襲過去後跑出洞來的時候，一座緊靠着我們的大建築物炸震燬了，大街上有些房子在燃燒中。我們沿着骯髒的小路趕向那所小屋，在路上走過一顆未爆炸的炸彈，牠切斷了我們原想坐在這裏過夜的石造陰溝。再往前跑幾百碼，我們走進杜爾亭的花園，只見網球場上鋪滿了髒物。再過去，那座房子完全被炸燬了。一顆炸彈剛剛落在廚房外邊，在杜爾亭的辦公室旁邊爆炸了。這使我們對於某些美國人表示同感，他們回國宣稱自己所受的損害什

九是由美國的鐵片和美國的鋼所造成的，這些東西由用美國機件造成用美國汽油開動的飛機載到我們的頭上來。

庇其斷定事情大概比已經知道的更壞得多。她在黑暗中檢驗着，發覺某些玻璃依然無恙，而地下室也沒有遭受一點損害。她立刻對於整個未來的展望投以更樂觀的光影。但馬丁（Martin）、斯蒂華（Stewart）、懷德（White）和別的新聞記者羣不久都來到這裏，摧毀着地下室，以完成這裏的破壞。這個破壞隊一直工作到黎明。他們把屋子各部份都拉下來，於是離開，衣袋裏裝滿了紀念品。

當杜爾亭夫婦和我正在收拾着碎件的時候，賣菜油的小販照常出現了，他從牆壁的缺口看進來。『你們今天要多少油？』他帶着往常的嚴肅神情問。我們說一點也不要，他又挑上担子不響不響走開去了，既無遺憾也不驚奇。他大概每天早晨都要失掉一兩個主顧的。即使我們的屍體躺在瓦礫堆中，他會不會流露出更多一點情感，也是一個疑問。

我們幸而在『空軍醫院』裏找到房間，空軍當局顯然以為牠太顯露了，與原來的目標不符，因此把牠改造成一個招待所的形式。我們原想睡一會兒，但結果簡直睡不成。工人們正在房子下邊炸地窟，每隔一定時間炸藥爆炸一次，使這裏充滿了鬧哄哄的氛圍。他們一直炸到半夜，而在靜寂的間隔中，我剛剛睡去，日機又來了。我們睡態朦朧地跑到比國大使館，特桑（M. de Sant the chargé d'affaires）把我們安置在他的房子下面的河邊，靠近本市邊緣，一個淺淺的避彈所裏，一個重量炸彈很容易把牠炸燬的。

我們剛剛聽見頭上摩托的轟轟聲，鑽進防空壕裏去的時候，那種可怕的空氣的衝盪，那種尤其可怕的噓

嚇聲，作爲一個重量炸彈的前奏的噼噼聲，便到來了。有不斷的爆炸聲，而一陣猛烈的震盪使我們滾在一起，我以爲那噼噼的幾秒鐘，躲在地壕裏比站在露天野地上更要可怕得多，因爲在外邊，你至少可以看見危險，可以斷定危險的近來，而在地下，你的內心祇有充滿像要被擊中似的掛慮。最初，聲音是抖動的，像橡皮汽笛的尖叫聲一樣，立刻充滿了一個角落，而接着牠的音量漸漸增加起來，直到你完全相信自己這一回的確成爲臘腸了。炸彈接連落在河邊，兩三個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彈落在大使館門前的石級跟前。我們從防空壕跑出來，看看外邊被炸的結果。特桑的地方是一個屠場，但真的損害還在下邊，那裏，一方片建築物變成了一座由木頭和瓦礫堆成的山。幾輛汽車被壓成了奇形怪狀的碎片，空中充滿了灼熱的塵霧。月光中躺着一些青年士兵的不活動的屍體，顯出被壓死的人那種特別淒慘的軟棉棉的樣子。他們真像用爛布片做成的玩偶一樣，好像在臨死的一刹那，全部骨頭和血都從他們身上被壓出來了。

『Allez! Allez!』我聽見特桑尖聲喊道，而一隊奇怪的人馬衝下石級，特桑用一根手杖敲着大使館衛隊的腦袋，一邊向他們哼着莫明其妙的話。他不住尖叫着，好像發瘋一樣，把他的不解事的衛兵們趕到瓦礫場上去。我跟着他走過瓦礫堆。在月光、塵埃、燒過的火藥和肉人的氣味中，我看見委員長的衛隊長史手恩（Walter Stennes）。我不知道他怎樣來到這裏，但他的確跨立在瓦礫場的一個洞口上，用他的手杖狂亂地翻動着石塊。

『這裏有活人在!』他叫喊着。特桑同着他的援兵趕來了，他們全體開始工作起來。搬動着木料和石頭，而杜爾亭和我替他們拿手電筒。我看不見什麼，但史手恩說他聽見有誰在呻吟。過了幾分鐘，他發見一身棉衣的

背部一個腦袋倒插在兩塊石板中間，經過五分鐘的小心發掘工作，才把身體掘了出來。是一個少年人。說來奇怪，他還保留着相當的意識，說裏邊還有人在。一個五百磅的炸彈投中了那座剛剛在他們防空壕上邊的建築物，要不是史手恩聽見呻吟聲，他們全體都要被活埋了，救護人員趕來了，把他們統統掘了出來。

最最可怕的轟炸悲劇是不久前發生在城外的那一次。當一羣人正穿過墳場的時候，一隊飛得很低的轟炸機出現了。因為畏懼機關槍的掃射，他們躲進幾座四川人埋葬他們的死人用的敞開的坟穴裏。日機顯然無法在城裏投彈，就隨便把炸彈卸在這墳場上。這羣可憐的人一下子都被炸死了，而且被埋葬了。

在我未到這裏以前，杜爾亭曾經憑着舒適的河邊戰勝了所有的空襲，而我好像是一個約那（Jonah）。（註）兩天後一個奇怪的事件更加減少了我本來很少的衣服時，似乎可以斷定我是一個招致災禍的人了。一天下午，我出門時，讓我孤單的預備褲子掛在招待所裏的床沿上。一張小檯子放在床和窗中間，檯上放着一瓶水，下午的陽光正照在這水瓶上。集中的光線通過這個水瓶在我的褲子上燃燒起來。幸虧剛剛來到重慶的勃脫蘭姆跑到我的房裏找我，担負起童子軍的工作，把開始燒着檯子的火撲滅了。要是再過幾分鐘，我們都要呆在街上了，因為木架房子在十分鐘內就要燒得粉碎。這座房子始終留在那裏，直到最近一顆炸彈投中了牠，把牠炸燬了。

實際上，重慶並不像我們意想中那樣恐慌。許多人度過了所有的空襲，甚至沒有過一次千鈞一髮的逃避。從全體居民說來，民氣正在一天一天進步着。日本已經作了好幾十次的空襲，投下了好幾萬磅有高度爆炸力

譯者註：典出聖經，意思是不吉利的人。

的炸彈和燃燒彈，但它不能毀滅這個首都的精神，那已經是很明白的事情了。

日本第一次空襲重慶，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剛在冬天雲霧消散，暴露了這個城市的隱藏處以後，當一般人的希望最爲微弱的時候。重慶沒有防空的武力，只有少數幾架高射砲。由國際情勢看來，光景也很慘淡。美國沒有停止供給日本軍需品的徵兆。張伯倫似乎準備由克萊祺在東京發動遠東慕尼黑會議。重慶政府還在動搖不定。許多人正在經受着生平最大的苦悶。和平傳說在垂頭喪氣的氛圍中盪漾，某些官員據說跟汪精衛有私人的諒解。

在接連三天中，日機給與重慶最殘暴的轟炸，任何城市都還沒有經受過的轟炸。牠們是四川最初的猛烈空襲。像一切從沒有看見過炸彈的作爲的人一樣，數千市民忽視當面的危險，隨便站在露天觀望。好幾百人被炸死在街道上，或被陷在火牆後邊，因爲在二天內燒燬了十二分之一的市區。大多數炸彈都在人衆擁擠的商業區爆炸，商人們和工人們都擠集在商店裏和其他房屋裏，牠們像熟透了的甜瓜一樣坍落下來。差不多有五十萬左右的民衆逃走了，商業停頓了，市政給破壞了，政府各部院準備更往西遷。這時候，日機突然中止訪問了。爲什麼？牠們顯然相信自己已經「掃蕩了重慶」——正如佔領南京以後，他們就以爲「消滅了中國軍隊」一樣。

但在這日機莫明其妙地給與重慶的喘息時期中，市政府重新組織起來了，幾百個避彈所和防空壕從岩石上炸成功了，強有力的救護隊和清除隊組織起來了，避火道貫穿了最擁擠的市區，政府辦公處和司令部遷移到四郊去，分散在廣大的地區上。當我從華北長期旅行回來時，重慶也許成了全世界最安全的戰時首都。在

堅固的沙岩上，在高高的河岸上，很容易建造很深的，足以抵禦最重炸彈的避彈所。可惜一開始沒有這樣做，那當然是很可悲嘆的事——但中國人大都在過橋時才開始搭橋的。中國也像英國一樣，有時在災禍未來以前也有所謂應付計劃，但難得實行是項計劃。現在，日本可以炸燬這古老的城區範圍內所有的建築物，但依舊無法毀滅作為中國政治中心的重慶。

然而轟炸使我第一次明白如下的事情：日機的空襲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事，而在某些條件底下，毀滅首都的民氣和設施，是可以這種手段來完成的。然而這些條件都是很特別的。第一，市民對於本市的防衛工作和預防設施的反應必須很弱，以致他們腦子裏出現了一種信念，認為本城已註定了滅亡命運，無法挽救。第二，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彈必須配合着燃燒彈，投落在最廣大的地區上，使恐怖變為絕望，絕望變為驚慌，驚慌變為民氣敗壞，抱頭鼠竄。第三，侵掠的飛機必須實行長期間的不斷轟炸，以保持此種心理上的壓迫，使市民陷入肉體敗壞的狀態，使全市的經常生活趨於毀滅。市民的睡眠、飲食、和安適必須不斷加以剝奪；交通、工業、和市政必須使其麻痺。

恐怖的持續是戰勝民氣的可怕的因數，為要達到這個目標，無須龐大的空軍。每次只要少數幾架飛機飛那麼一兩個鐘頭就夠了，如果有幾次用大隊飛機轟炸一天一晚。這樣不停地幹了兩星期，便足以粉碎一個防備不週的城市的心，使牠不能再起一個戰爭因數的作用。如果這個城市靠近陸地前線，可能用傘兵和第五縱隊先行攻陷，再用突擊隊加以佔領，則上述轟炸行動才有其『公平』的代價。如果他們的任務在那樣情形下被『完成』了，則以殲滅市民為目的的空轟才能算得『成功』。

這樣佔領城市的可能性既不存於重慶的場合，也不存於其他大多數被日機轟炸的城市。直到一九四〇年八月，日機在中國已經作了一萬一千多次零星的空襲，其中六千多次是發生在遠離前線的民衆住場，和始終沒有軍事目標的地區。這些空襲所毀滅的生命財產，還不及牠們所創造的新生的鬥志之半。因爲那些空襲沒有『完成』上述的任務，牠們反而激起反侵略的浪潮。牠們不過更加提高了人民大眾的抗戰精神，同樣提高了他們的物質力量，使人們加強自己的團結，準備支持必要的措置，以實踐更大的持久戰鬥。

被對於中心市民區的廣泛濫炸所殺死的人數還比較少，三年來日機炸死的民衆不到二十萬人。但一切被炸城市裏的幾百萬劫後餘生却因此激起了深深的狂怒和厭惡，他們對於侵略者有一種特別切身的憎恨，你如果沒有鑽過地洞，沒有伏在田野上躲過直插下來的轟炸機，沒有看見過母親找尋她兒子的屍體的破碎頭顱的光榮，沒有聞過被燒死的學童的氣味，你決不能完全瞭解這種憎恨。這恐怕是日本對於中國的統一的最大貢獻。

但最重要的，這是轟炸在中國人的腦子裏喚醒一種重建中國的決心，比敵人能夠毀滅的還要快。現在讓我們看看他們抱着什麼希望，用什麼工具幹着這個不平常的嘗試。

二 自由中國的基礎

中國的新景象，爲日本所促成——而這新景象是在西部的。——W·H·端納

當人們在感謝戰爭把『有教養的中國人驅至西部』時，時常忽視了。這人口的移動，是在內地迫切需要受過技術訓練的人們時發生的。華西以犧牲遊擊區域，剝奪牠大部份優勢的技術人材，便利了自身的發展，而政府爲着抗戰也集中其力量於華西而忽視了華東，並且還有意在若干地方顯示出牠的這種態度。

然而，如果歷史真的是以劇烈的跳躍與『搏動』——借用一個著名地質學家的話——作着英勇的邁進，只有小的變化才能避免廣大的災害的話，那麼，中國的回至西部，或將是全世界最頂重要的一件大事。戰爭顯然已在中國激起了一陣社會以搏動，其變化的深刻，正跟歐美許多極大不幸所發生的影響一樣，現在我們想來，歐美當時的不幸，對於其後的進步乃是必要的。同樣，中國的放棄華東而被迫開發華西，使之現代化，也許終要被人視爲當代最富於革命意義的事件。

爲什麼中國要到現在才發現了他們自己的西部呢？原因是非常複雜的，這裏只能作一些簡單的說明。

首先，今日被稱爲『新中國』的，實際大半是最老的中國。儘管人種學家與漢學家對中國民族的起源有種種說法，一般都公認中國文化的發源地是在西北，最初大概在渭水（陝西）的上流，然後傳到漢水流域與黃河流域。中國的發源地是在甘肅、陝西、寧夏和河南，只有到很久之後，這些省份才變成乾燥的地方。漢人以其基於河川、運河與灌溉制度的農業經濟，逐漸趨向東方平原，開頭沿着黃河流域擴展，其次再及於長江以至太平洋，然後到達了多山而肥沃的東南。

當西歐由海道與中國接觸之後，近代商業與工業的大中心，當然集中於東部沿海一帶，同樣鐵道與交通，也大半僅限於東部的沿海區域，勞工移動的時期開始了，中國工人對變革中的中國的認識，要比富有的地主

多得多，地主們開頭非常小心地由內地爬到通商口岸來，而國外帝國主義者乃是這些口岸的真正的主宰者。在層山疊嶂阻隔之下，大部份的華西，仍然與這改變了東部的產業文化不相接觸，而且對其集中的勢力，抱着敵對的態度。這一次的龐大戰爭終於震開了由城市回到農村，由太平洋回到中亞細亞的中國人的眼睛。

在日本侵略發動之前，遙遠的華西，在大部份的中國人，甚至是受教育的華人看來，乃是未發見的大地，距非洲腹地一樣的遙遠和難信。幾年之前，我會和洛克博士（Dr. Joseph F. Rock）的遠征隊穿越滇省西部，南入緬甸，但由昆明鐵路的末站出發，一直化了我們六個星期，當時這省裏連公路都沒有。不過此行是值得的，我在那美麗的邊界上，看見了中國的未來。在這次旅行中，我從未遇到一個『外國的』中國人，後來，當我回到沿海地方，我也從未遇到一個智識身子，會到過他本國這一塊偉大的地方。

至於西方的傳奇、傳說與歷史，不用說是中國人遺產的一部分。西方在中國小學學童心目中，是荒誕的古典作品。山嶺裏那些最驚人的神話的故鄉。這古典作品敘說許多無頭的人、貫胸的人、巨人與侏儒、有翅的母牛、人頭的毒蛇、飛沙走石的沙漠與西北海外的蠻荒。這些故事中，有一部份無疑也包含着施惠特（Dean Swift）在海外渠軒錄（*Gulliver's Travels*）中所諷喻的真理，而且流傳至今已達二千年。中國古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的著作，千百年來，也使中國人知道了他們的西方，而三國誌也使每一個小孩曉得一千七百年前會發生過大戰的那些歷史上的河川、山嶽、峽谷與叢林。

然而，關於這些內地邊區的潛藏富源的近代科學的知識，却仍然極少，而公衆對這些的忽略，也足以驚人。外國探險家對於當地地理的情況，要比中國人知得多。在漢口和廣州陷落後，那千百萬跋涉長途，越過高山與

大河以找尋新的住處的人們，他們所有關於發見、危險、艱難與冒險的先鋒經驗，實在可與十九世紀美國向西
方移植的人們以相比並。

就地理上說，中國的面積在四百萬方哩以上，比整個歐洲還來得大，或相當於美國和大半個的坎拿大。日本現在自稱已佔領了一百萬方哩以上的地方，包括滿洲、內蒙和華北。她在中國本部約佔有六十五萬方哩，但真正被征服的地方只有極小的一部份。到了一九四〇年，我們所說的『自由中國本部』即西藏、蒙古與遊擊區不計，仍有二百二十萬方哩，約九倍於德國本土的面積。

中國人把『自由中國』——這名稱實際上是很不恰當的——分為東南、西南和西北、『東南』包括沿海各省如浙江、福建與廣東，以及為上面三省所圍護的江西、廣西、雲南、貴州、湖南、四川和西康則統稱為『雲南』，這地區與安南、緬甸和西藏接界，面積約七十三萬方哩，比日本本部要大五倍。至於『西北』則包括如下幾個大省，如陝西、甘肅、寧夏與青海，總面積約六十二萬方哩。

此外，中國還有着極西的新疆，其面積之大，約等於整個西南，而且約當戰前德國全土的四倍。

誰也不知道中國究竟有多少人口，根據不完全的數字，現在住在自由中國的約有二萬萬五千萬人，那些被日本控制的地區的人口，尚不計在內。單西南一地的人口，約等於日本的兩倍，四川一省已有五千萬至七千萬人，說不定世界上的四川人要比日本人來得多，但在四川，以及別的所有的自由省份，你所能找到的現代工業，却沒有你在日本大阪一處所找到的多。

除開煤鐵之外，這可說是處女地的華西，擁有中國最有價值的資源，其地位只次於滿洲而已。煤的儲藏量

相當多，在西南據估計約有一百三十萬萬噸。四川與西康的鐵的儲藏量，已知的總數達四千萬噸，雖然大半是菱鐵礦，質量較差。雲南是東方一個擁有許多極有價值的錫鑛的地方，而且還富於銅、水銀、鉛、鋅、錳和銻等鑛產。西南與西北到處都可以找到各種有價值的鑛產。江西有大的銻鑛，牠與湖南廣東出產的銻砂合計，約佔全世界銻產的一半。江西還擁有鉬、錒、錒、煤與鐵的鑛藏。廣東的鎢砂在世界市場上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總之，現代工業所需的基本鑛藏，在中國的各處都可以找到。

更往北看，新省西康有着鉛、銅、鎳、鋅、黃金、石膏、石棉、石墨和硫黃，還有鐵礦與煤礦，此類鑛產，西北各省都有多量的蘊藏。據說青海的金礦特別豐富，新疆金的採發量已日見增加，一九三九年金產值七、五萬元。新疆是遙遠的、荒蕪的，但牠却有許多重要的鑛產，如煤、銀、石腦油、硫黃、硝石與碧玉。

然而，關於這些地下的鑛藏，也仍然無人知其確實的數量，只在許多地方作過表面的調查而已。地質學家與工程師對同一區域的意見，時常不相同。例如，據說甘肅擁有一些油礦，政府也在那裏開了幾個小小的油井，國聯顧問斯丹帕爾博士（Dr. A. Stampar）幾年前曾說，甘肅的油藏，是世界最有價值的油藏之一，但這跟外國油公司的意見恰好相反。在甘肅的鄰省陝西，窮苦的山居者掘開油浸的地面，以簡陋的壓榨法提出油來，拿到城裏去販賣。在共產黨邊區政府服務的地質學家，最近曾在陝北作過一番詳細的調查後，宣佈他們發現了富有油藏的鑛脈達四十處之多。但爲了他們沒有錢，又不能取得外資，結果無從開發。

因爲沒有現代的交通與工業，大部份最好的資源至今仍然沒有開採，特別以西北與新疆爲然。交通最發達的是華南，而四川是政府施行工業化計劃最適宜的省份，雖然牠所有的的基本鑛產並不豐，但牠是自由中國

的經濟的、政治的與軍事的焦點，牠有最多的人口，農產生產也最盛。牠是中國新公路網的中心，其水道交通更比其他部份，給予了便宜的運輸便利。

中央軍現在已控制了四川，銀行家在那裏很有信用，私人資產也覺得比前時更有保障，四川的巨大的入口，富饒的農產，以及有價值的鹽礦，使政府得到很大的稅權，而桐油、菜油、豬鬃、皮革等的出口，更有助於自由中國對外貿易的平衡。一九三九年中國豬鬃的出口，值二千八百萬元，桐油出口約七千三百萬元，後者在政府統制之下，約佔中國對美輸出總額的三分之一。在英法封鎖滇緬與滇越邊境之前，重慶就是以牠作為抵付由美購得的汽車和機件的主要物品。

西南在戰前大半是自治的或半獨立的省份，但現在已成爲中國抗戰的主要根據地。西北的幾個部份，實際上是完全獨立的，在西南地方，約有屬於二十三種種族的一千萬五千二百萬生番，他們從來被吸收或被感化，雖然他們生活在中國的邊界，至今已歷數百年。西北又有一千萬回族與數百萬游牧的蒙古人、藏人與土耳其人，他們散佈於極廣的地帶，只有到最近才和機械時代發生接觸。他們兇烈地衛護着少數民族本身的權利，始終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並反抗中央政府的直接統治。

寧夏和甘肅兩省，都有一部份是從前時獨立的蒙古國割出來的；青海和西康的一部份則得之內藏。雲南向來是獨立的，境內許多部落的轄地，也久已實行自治。中政府應當謹慎對待他們，避免在國境內外的那些未開化的種族中，引起了種族的或宗教的敵對，這些小種族，一向宣言他們遠在漢人到來之前，就已佔有了那些地方。少數民族的反對『中國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災害，正如重新爆發的國共內戰相同。中國與邊疆外各

小國如外藏，不丹，尼泊爾，阿撒母（Assam）緬甸，安南，暹羅——這些都曾經奉中國爲宗主國——的關係，現在也成爲非常有趣的和非常重要的問題。當日本及歐洲帝國主義封鎖了滇緬，滇越的邊境之後，如果中國覺得有重開這些邊境的必要，而英國可不願意這樣做時，究竟中國將採用何種手段以解決這個問題呢？用帝國主義的還是用革命的手段呢？

如果『自由中國』要做到名實相符，不致徒擁空名，那麼這些就是建立起一個比戰前更堅強的和更賢明的國家的基礎。許多見過這個『新』中國的人，認爲戰爭打破了這區域幾百年來的孤立，結果也將因這裏建立起一個亞洲的有地位的新國家——一個在全世界生產者消費者中，佔有第一等重要地位的國家——而使戰爭宣告結束。但是與目下中國農民的苦况相形之下（這些下面另有說明），他們這樂觀似乎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誰又能夠否認，這種可能與需要不會給他們帶來實現的保證呢？

三 生產的貧乏

日本不能打擊我們，因爲我們本質上就是一個農業國。

上引這一類的意見，在中國是很普遍的，但不幸的事實乃是因爲中國是一個非工業化的國家，所以日本能蹂躪中國。

高麗（朝鮮）、滿洲、印度所有英法荷等國的殖民地，以及革命前的俄羅斯，也全都『本質上就是一個農

業國，『現在中國發覺牠屬於同一範疇，顯然對牠並非有利。恰正是爲了這一點，所以引起了日本對牠的侵略。空間，是中國方面一個因素，但牠不能與產業的落後混同。唯其因爲中國仍然『本質上是農業的，』所以巨大的空間不能加以部份的利用。如果中國的工業經濟能充分利用牠的巨大的空間的話，那麼日本是決不敢侵略中國的。』

同樣，中國現在也不能拚命恢復牠已失去的工業，而工業對於任何一個要在現代戰爭中獲得勝利的國家，是最基本的東西。中國在作戰最初三年中，已失去了牠百分之九十五的工業，因爲上海、杭州、無錫、南京、漢口和工業的工廠都沒有內移。

自由中國因爲是一個未經發展的國家，牠的最大的困難是運輸與交通。在一九四〇年，牠的旱路（雨天卽失作用）尙不及五萬哩，但美國舖有路面的公路却達五十三萬哩。在各自省份中，五份之一的公路是在戰後開始築成的，現在每天約增加七哩。最重要的路綫，是由重慶至新疆的公路，長三千哩，由重慶至騰茂，長一千五百哩，這條路使華西與緬甸及印度得以接通。

經由上述兩路以及另一條由安南至廣西的公路，和由河內至昆明的滇越鐵路，在主要海口失去之前，總共運入了中國必需軍火與工業品的百分之九十。內地的一部份鐵路現在還在中國人手中；卽由河南至蘇州至陝西的寶雞的隴海路，由湖南至衡陽至廣東的韶州的粵漢路，由江西至安昌附近至浙西的浙贛路。一條由衡陽至桂林的新鐵路已經完工，現在正在增築，使牠深入至貴州省會的貴陽。

自由中國的鐵路還不上八百哩，而美國同樣大小的區域，却有着十六萬哩。中國鐵路被日軍奪去的，約八

千哩，包括華東與滿洲。西南現在已在構築新的路床，也許將來長江流域與雲南、緬甸及印度洋之間，可以有鐵路交通。此一工程雖會迅速進行，但因英帝國主義者綏靖日本，封鎖緬甸邊境，禁止鐵路材料運入，終於被迫暫時停止。

由緬甸、安南與香港至內地的航空綫照樣運載旅客，而重慶與各省省會之間的內地航空綫，只須幾小時就可到達。一九四〇年中蘇間新設一載客運郵的航綫，即由重慶至哈密，再由哈密至莫斯科。中緬航綫則與皇家航路相連，又通至香港，或太平洋飛剪號航機相接。飛機對中國達官與外人的確天賜之物，按外匯說，內地票價便宜得出奇，但是對那些沒有地位或出不起票價的普通人，依然毫無幫助。

普通人另有一種辦法，那就是搭乘汽車。但公路上行駛的汽車，百分之九十為政府及半官性質的獨佔公司所有。中國汽車總數不到二萬輛（美國已登記的却有三千萬輛），其中十分之一在滇緬路上行駛，一九四〇年七月因英國封鎖該路，全數調至所謂「赤道公路」。

中國所有的汽車都是美國貨，而且差不多都是最新式的，政府命令在公路上開駛的每輛汽車，應先先運載如下六項，即軍火、士兵、藥品與傷兵，政府貿易獨佔品，油與汽油，以及工業的需用品，在此六項之外，還用無數的東西，而最後一項，才是搭載旅客。幾家真正商業公共汽車的座位，在許多天以前即已預定一空，而私人汽車，實際上已不再存在。

中國需要十倍以上的貨軍，在十倍以上的公路上行駛，但牠却不能輸入足夠的汽油以開動牠現有的車子，甚至即以一萬輛貨軍而論，如每車每月開駛一百哩，中國每年就必須使用四千三百萬加侖的汽油，這項汽

油的價值，依一九四〇年的市價計算，約需五萬萬元，此外，修理及換胎的費用約需一萬萬元，這兩項合計，已等於中國政府每年預算的三分之一。中國大部份汽車閒置不用，就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汽油。越深入內地，汽油越發稀少，比生命還要寶貴。普通市民如沒有政府的簽證，就不能買到牠，而簽證十九是領不到的。

補充稀有的摩托運輸的，是千萬輛的騾車，這些車子都使用舊的美國汽車的輪子與車胎。每隻騾車的費用，在一九四〇年約需三千元，即車輪與舊胎二千五百元，騾子與車子五百元。騾馬的數量並不多，有許多為軍隊所專用，因此又動員了一大隊的人力車，我會親眼看見一大隊手推車子，每車上裝着八分之一噸的棉花，推到五百哩外的地方去。但最緩的乃是千萬的駱駝，驢子與背運人伕，他們在各自的硬結的背上駝着其重量令人相信的各種物品。

滇緬路每月可以運載九千噸的貨物，畜牲又運了另外一千噸，滇越路每日可運一萬二千噸，另一條滇越路約可運二千噸。在西南邊境被封鎖之前，自由中國所有現代運輸工具，每月可以運入五萬噸，至於由水道小路等通過戰區與封鎖綫的，則不計其內（註）。跟戰前的比較起來，單鋼鐵一項，中國每日輸入的其總額即已達五萬噸了。中國對蘇聯接濟路綫的倚賴，當所有各路都已封閉之後，當然是更不用說的了。

在政府遷至華西之前，當地實際上沒有再生產的工業。而由長江下游搶救得來的又不多，因此工業發展的速度，完全看運輸主要機械的力量如何而定。這決不是一個修補破舊的問題，而是從戰爭的混亂和不斷的抗戰中，織造一個差不多全新的工業。

（註）第一次歐戰時，美日爲着接濟在法的一百萬大軍，每月須運輸七十五萬噸的軍火與用品。

基本缺乏的是鋼。在重慶統治下的各省份中，並無高度標準的鋼的出產，甚至連足以製造機械的好鋼也付缺如。西南和四川可用的廢鋼極少，簡直無法買到。即使輸入外國廢鋼仍屬可能的話，單運輸一項的化費，已使牠無法大規模使用。中國必需以增加銑鐵的生產量，來解決這個問題，在一九四〇年，牠的生產量約五萬噸，而自由中國的鋼的生產量，每日仍只有六十噸，而且並不是都適於製造軍火之用。以這跟日本鋼的生產比起來，其差額實在驚人，因為據計牠每日約出產兩萬噸。

政府仍然以更大的精力與實踐來對付這個問題，牠開發華西若干當地的鐵礦，建立若干小的比斯美爾鍊鋼設備與熔鐵爐。雖然自由中國能够生產足用的鐵與鋼，以適應戰時工業化的需要，但鍊鋼工業的前途似乎並不怎樣樂觀，除非新疆與雲南出產的鐵砂，其質量數預料的為佳良。就中國已知的十三萬萬噸鐵砂儲藏量而言，有百分之七十已在滿洲失陷時淪於日本，其餘四分之三，又在察哈爾、內蒙與長江下游為日本所攫奪。一九三一年，佔中國銑鐵出產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鐵礦，也已被日本奪去。同樣，中國戰前所有的熔鐵爐，除小部分的配備由長江運至重慶，也已全部委讓日本。中國最大的熔鐵爐，即北平附近的龍烟，每日能出產三百噸，竟毫未損壞地為日本奪去。現在只有遊擊隊的活動能阻止日本利用龍烟鐵廠，或阻止察哈爾鐵砂對牠的供給。

關於中國工業的『長征』，即由沿海遷至遙遠的華西一事，已有許多的敘述，但我想大半的敘述恐怕有極大的訛謬。政府的確曾經計劃過，把受威脅的各城市的工廠，移至內地，但因未能推行廣大的動員，以致阻礙了少數有意把大規模的城市工業改成為小規模的農村工業者的努力。這一半是由於官僚的無能、腐敗和愚蠢，一半却由於中國資本特有的『買辦』性質，而政府又不願強徵他們的產業或資本，因此只有極少數的民

族資本家把工廠移至內地。另一方面，如我們上面所說，幾十萬萬的游資却『暫時』逃至海外或沿海各通商口岸的租界裏。

我這裏只想舉出一例，以概其餘。在香港幾十個中國的百萬富翁中有一個是著名的國民黨官員，他的妻子最近向政府聘請的一個工業專家提議，請他辭去那個（非常重要的）職位，代她到上海去經營幾家紗廠，她力說最近中日可以實現和平，而有關各列強又會保持租界，投資在那裏確很安全，而且利息是那樣高，這工業馬上可以獲得厚利，所以這計劃是十分正確的。最奇怪的，是那位工業專家當時正在她丈夫的部裏任職，負責建立某幾種主要的工業，而且又拒絕她的請求。但願我能有充分的篇幅，把我個人所知的，那許多不但有這想頭，而且還加以實行，始終不願在中國內地冒險投下一元資本的人們，充分記述下來。

結果私人經營的工廠移到內地去的，只有三百五十四家。以歐美標準而論，這些都是極小的工廠，牠們的機件總計不過六萬三千噸，比起美國一家大的鋼廠來還不如。其中包括機械廠、電料廠、紡織廠和化學工業廠，其餘的盡是些各式各樣的輕工業。一九四〇年初，這些工廠開工的只有二百家，而且一半集中於四川一省。有許多還要等到新電廠完成後才能開工。自由中國全部只有二十家電力廠，其中十五家是在經濟部翁文灝統轄下的資源委員會經營的。

其餘的工業，除『中國工業合作社』（在人員與組織上，『工合』與其他工廠完全不同）外，差不多都為政府所獨佔經營。牠直接擁有錫礦與煤礦，還在甘肅開了四個油井，油的產量頗能令人滿意。四川的煉銅廠也為政府所開辦，昆明附近的另一家煉銅廠，也為政府所經營。此外，政府新近還開辦了鉛、鋅、錫等的煉冶廠，製

造機械、無綫電機電料、火油和榨油等工廠。牠還和銀行家及私人資本開了一家造紙廠，一家苛性鈉廠和別的各种工廠。這些都是認真的冒險，而規模最大的，是榨油廠，全日需用汽油與火油一千加侖。許多別的輕工業或重工業，都在計劃或建立中，但在自足自給的工業尚未完成之前，許多方面的困難是必須克服的。

這些簡陋的工廠，有四分之三完全供應軍事的需要，而且差不多吸收了全部以銅和鋼的出產，消費品是極度缺乏的，雖然牠也許還不致像消費者要求較高的國家那樣地驚人，然而無論如何，牠確已非常嚴重了。棉布價格，到了一九四〇年月中旬已漲了百分之四百，一條普通毛巾要買到二塊錢。製成品價格的飛漲，較之農業品要高得多。阿萊（Revi Alexy）及中國工合提倡者的預言，業已證實了，因為戰時經濟只有在極廣泛動員人力，以自國資源應付本國市場需要這一理論的正確，業已越來越發明顯。（關於我在西北親眼所見的工合運動發展的情形，下面另有敘述。）

不管大部份工業景象如何黯淡，我却在技術人員，特別是工程師中，發見了一種堅決的精神，與乎對中國必能復興的能力的確信，這與官員的失敗主義恰正是一個愉快的對照。下面就是一個例子，當我在西北旅行時，曾見過一個青年工程師，那時候他剛從香港回來，他對我說曾化了兩天功夫在香港購物。

「你買了什麼呢？」我問他。他從口袋裏摸出一個盒子，當我面前打開來。

「這是我買到的最好的東西，」他裝着鬼臉說。那盒子裏面裝着的，尤其量，是一副假齒。

「不是給你自己的吧？」

「是的，」他非常認真的說：「我現在用不着牠，但幾年後是用得着的，在戰事沒有結束之前，我恐怕是不

能回香港去的。」

這種無限的忍耐精神，在軍隊中是非常普遍的，雖然，由於戰爭的工業基礎的狹仄，他們的作戰效率已大受限制。但在讓我們來看一看這一組織，因為中國工業的命運，現在完全靠着軍隊保護工業的能力，這正如軍隊的命運，完全為供應他們的需要的工業能力所決定的一樣。

四 中國的主力

我的軍隊可彎而不可折。——蔣介石

首先不管中國在計劃、行動和指揮上的弱點，我們在判斷中國陸軍時，必須記住一個最重要的和最驚人的事實。這事實很簡單：這個被愚弄的、落後的、貧窮的中國，這個被東京稱為「不是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地理名詞」的中國，這個歐洲人蔑視地指出，在日本機械化部隊進攻下，至多只能支持六個月的中國，畢竟仍然站着身子迎擊牠的敵人。遠在奧地利人、捷克人、波蘭人、丹麥人、挪威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法國人和羅馬尼亞人迅速潰敗淪亡之後。

這些不幸的中國人有着許多足以自傲的理由。與一切的顯示（包括他們自己的）相反，中國內部的團結，已經多少抵擋了許多次的打擊與危機。在千萬困難之中，他們又組織了新的根據地以繼續進行抗戰。不管千百次的接觸與十幾次防衛戰略據點的大戰，中國戰術上的巧妙，終使敵軍無法達到她的主要目的：即殲滅

中國的主力。在有多次的戰鬥中，中國軍隊還沒有遇到一次跟法國所遇到的在一星期之內即已損失了法軍主力一樣的不幸。這蛟龍自一九三七年之後，曾受傷倒下了好幾次，但每次牠都苦痛地掙扎着站起來，再行從事戰鬥，而每一次當牠舐好了牠的創傷，牠更加確定地感覺到，日本人這次致命的打擊又落空了。

不管牠的工業機構如何草陋，中國在軍事戰場上並未受到打擊，反而顯出穩定的，不過是遲緩的進步，在重慶，一個曾經注意過中國每次戰鬥的，最勝任的美國軍事觀察家，對我這樣說，現時中國軍隊所受的訓練，所有的配備以及軍事的指揮，都比開戰以後任何一個時期來得進步。一個蘇聯軍事觀察家，剛就長期旅行和考察了一半的戰綫回來之後，也對我發表大體相同的意見。他們兩個因為慣於西歐式的尋找決戰的戰爭，全都自認無法發見一種戰略的目的，他們都覺得，在軍事意義上說，這種戰略完全沒有一處顯出了決定的作用。

事實是這樣的，中國的軍事領袖顯然把決勝分成了好幾部份，單是使日本無法獲得全勝，在他們看來也算是一種有限度的勝利，蔣委員長曾滿意地對我說：『本來，日本希望在三個月征服中國，打至我們屈膝。日本的目的，是求得迅速的勝利，這一點，已在好久之前就被我們擊破了。所以這事實，在我們看來，也正是一部份的勝利。』因此他把每天戰事的延長，看作是日軍整個挫敗的積聚，而無數小敗的綜合，將成爲日本最終的失敗。

中國軍事領袖對這種戰略的信念，從未動搖。這戰略原理，即『持久戰三階段』，本來是由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擬成的。簡單說來，這三階段是：（一）日本進攻中國，『在空間上後退，在時間上前進』；（二）日本攻勢在西南山嶽地帶達到她的頂點，日本作戰力減弱，中國繼續動員，兩方陷於相持；（三）日本國內及國際矛盾達到破裂點，配合中國的最大限度的動員和大規模的反攻獲得勝利。

然而，有一些人，關於在某一特定時間進入某一特定戰爭階段一點有着不同的意見。歐戰爆發之後，許多中國人相信『大規模反攻階段』已經到來，當時我恰好在延安，而毛澤東的意見與這是完全不同的。他認為戰爭只剛要進入第二階段——相持階段。在這一方面，蔣委員長的意見，大體也跟他的相同。兩個人都認為在沒有達到完全動員以前，抗戰的路程還是很長的。這一點，從中日雙方軍力的對比上是表現得非常明顯的。

由於中國人本身的誇張，人們時常誇大中國陸軍在數量上所佔的壓倒優勢，不錯，中國在戰爭初期擁有二百萬的常備軍，但牠的受過訓練的後備兵員的數量却非常有限，尤其是軍官人材更感缺乏。強迫的軍事訓練，還不能產生足以重視的學生後備軍，在戰爭開始後，新軍官又必須受過充分的訓練，而集中指導的徵訓制度，也進行得非常遲緩。在戰爭初期，部隊的補充都由各負責軍官自己設法，而他們時常是以民團作為補充的。中國人力的資源，現在由於戰事的繼續業已多少減弱。有一半的人口，就住在日軍佔領的區域中，只有游擊隊才能加以動員。華西的壯丁，有千百萬人正在執行運輸、造路、工業、開礦和農民生產等工作。行政院秘書蔣定甫曾對我說，在自由中國執行民團職務的壯丁，約達二百萬人——這數量比前綫的作戰部隊還要大。

沒有一個人能夠確切知道戰爭開始後華方士兵被殺的數字。中國政府跟日本政府一樣，沒有發表過完全的死傷的名單。一九四〇年二月，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發表一篇文章，估計中國死者三十六萬二千人，傷者一百零八萬七千人，但在同月中，官方文告又說單一九三九年一年，療治傷兵約六十七萬五千人。遠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蔣委員長在公開演講中承認，自七月抗戰之後，中國方面傷亡在三十萬人以上。這可能是過低的估計，但甚至如若後來所受損失，其平均數並不較以前的為高，那麼三年來戰爭傷亡也要達二百十六萬人。據一

九四〇年許多外國軍事觀察家的估計，總數也由二百萬至四百萬。無論如何，損失至少要等於原來所有的戰鬥部隊，這是可以確定的。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陳誠將軍，最近曾說，目下前綫作戰部隊的數目爲二百五十萬，正受過軍事訓練的壯丁則達一千五百萬。但是，只要他所說的數目有一半可作爲編隊的後備軍，那麼中國已可以有三倍的兵力以代替目下在前綫作戰的部隊。有人也許要問，爲什麼中國不把牠的兵力擴充至一千萬呢？這主要是由於供養軍火和運輸的問題。只有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在戰時能够保持一隊集中的五百萬人的大軍，但中國工業的薄弱，我們已在上章說明過了。

一九三九年，自由中國各省只有三個重要的兵工廠，最大的一家是重慶附近的第二十號廠，每月能出產二百架機關槍，十三萬發迫擊砲彈，和一些自動的與普通的步槍，牠不能製造大砲。另外兩家也出產各種軍火，不過數量更少，而各省設立的軍火廠，則只能製造槍彈與小的武器。步槍子彈的生產總量，每天大概不會超過幾百萬發，所以只能補充二千哩戰綫每天的耗費。中國如要配備更大的陸軍的話，牠只有迅速建立許多小工廠，分設各處以應急需；或則大量增加牠的輸入品。中國還可以採取『流動兵工廠』的辦法，在敵軍後方，把隨身武器供應五百萬游擊部隊。但軍事委員會却決定主要倚靠進口軍需，這理由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中國購買外貨的最重要的信用貸款，是從莫斯科得到的一九三九年，蘇聯又把貸款增至七萬萬五千萬盧布（一萬萬五千萬美金）。蘇聯對華的援助，與華盛頓進出口銀行所給的貸款完全兩樣。美國不過是以非軍需品換取中國的軍需原料，絲毫沒有一絲贈助的痕跡。英國的五百萬鎊貸款也是如此，因爲規定條文的苛

刻，中國至今只能動用極小的一部份。

西北公路的地理上的限制，還是十分嚴重的，據說蘇聯援華軍火，由黑海開至緬甸，再由緬甸運雲南，比之經由西北公路還要合算。每一輛運載軍火至西北的蘇聯汽車，需要十五頭畜牲或駱駝以運載供應的汽油。

至於空軍呢？美國寇蒂斯·惠特和內陸航空公司合辦的中國飛機公司，在雲南緬甸附近，開了一家製造廠，一九四〇年每日可以出產二十架，但這工廠本身不能製造引擎、機件與機輪，這三項都靠輸入。大概每架飛機可以比自國外買來的便宜百分之二十，但美國老板却都得了巨額的利潤。另外一家裝配工廠，由蘇聯管理，設於新疆。雲南還有一個美國機師教授的航空學校，西北也有幾個學校，但由蘇聯人員負責訓練。中國空軍人員，在漢口大戰末期，差不多已犧牲殆盡，餘下的數量極少，而且比較不足重視。

中國今日的戰鬥機都是蘇聯供給的，中國若干次空戰的勝利也應歸功於蘇聯機師。一九三九年，約有一百五十個蘇聯機師住在成都附近，其營房之大，足容六百人寄宿。在甘肅西部蘭州附近，停有蘇機一百五十架。計劃經常保持五隊的實力。可見蘇聯援華抗日的態度。蘇聯對華的援助，如戰爭進入決定階段，還將大量增加。

除空軍而外，中國陸軍還聘請了約五百名的蘇聯顧問。他們大部份完全限於提供戰術的和技術的意見，並在各軍事學校任教（各學校約有幹部九萬人）同樣，每一方面軍都附有蘇聯顧問。但是，甚至蘇聯軍事代表團的領袖，對蔣委員長的影响，也決不能與福剛將軍（前德國駐華軍事顧問首席）相比。蔣顯然只需要軍事上的指示，而蘇聯顧問也有意規避不談戰略問題。至於政治教育，不用說完全由蔣介石本人的政治部負責。蘇聯的軍火供給，雖然是重要的，甚至可說是主要的，但中國還不能單靠這些供應構成一個大規模的反

攻的基礎。假如蘇聯加強了中國的空軍，中國自身却沒有足夠的運輸與燃料的儲藏，沒有大砲與砲彈，沒有足用的步兵，和巨大的火力。即使中國沒有更多的坦克——甚至沒有飛機——也還可以對付的話，無論如何，牠不能以稀小的大砲與有限的運輸進行反攻。大量的軍火已儲積了，但這與驅逐侵略敵人時所作極大努力的極大需要，還是不相配稱的。

我們時常聽說中國還保留着牠的「機械化部隊」。這種傳說是沒有根據的，因為中國只有兩個輕坦克師（老實說來，還只能稱為輕坦克旅團），包括機器腳踏車哨隊、化學戰隊、摩托化的砲隊、和幾千名摩托化的騎兵。初時中國的樂觀份子，還希望可以得到國外大量的援助，他們心想中國可以組成一隊強大的，可以在反攻時衝鋒，克服重要戰略據點的摩托機械化部隊。現在看來這種想法，正如夢想中國可以由外國運入的飛機，組成一個强大空軍一樣的狂妄。日本會長時間竭力去嗅出這些躲在西南某處的機械化部隊。最後，在一九三九年南寧失陷了之後，其中有一師會領導反攻，企圖收復南寧，結果在失敗時失去了牠一半的配備。

一個沒有摩托工業，沒有油的資源，沒有重軍需工業，和沒有海軍以保衛牠進口航路的國家，要企圖建立一個機械化的軍隊，似乎全是一種夢想。但中國的將軍們，猶如別的將軍們一樣，只在失敗中獲得教訓。現在，有一些已認清了，還不如把同樣的款項用以輸入機械，來得更有些用。 中國如果有了基本的再生產的機械，牠就可以建立必需的基本的工業，和設立一種有價值的內地小型軍需工業的制度，而這些正是中國目下迫需的。

在漢口失守之後，蔣委員長終於認清了，中國反攻的基礎，只在於豐富的人力，與乎組織民衆的效率，這一事實，比之推動機械化還要來得重要。不用說，如果日本能够勝利地綏靖牠的佔領區，剝奪了他這一優勢，那時

候他顯然只好無限期地在西藏的邊境住下來。因此，在一九三九年的著名南嶽軍事參謀會議上，他宣佈了他的新計劃，這在他實在是一種革命的宣言。

『人民比軍隊更重要』他說，『游擊戰比陣地戰更重要，士兵的政治教育比軍事教育更重要，宣傳比槍彈更重要』

不久之後，蔣便模倣延安共產黨的抗日軍政大學，開辦了一個游擊訓練班，教導正規軍可以作游擊戰。共產黨最有材能的戰術家前紅軍參謀長葉劍英，也為聘為短期顧問。一九四〇年陳誠將軍宣佈，除前綫部隊外，已派遣總數達二百萬名的軍隊開入日佔領區，葉劍英却認為至多只有五十萬而已。他對我說，這些部隊大部份集中於長江北岸，即湖北、河南、安徽、魯南與河北。

但幾個因素阻撓了這種新的游擊隊。必須記住，在主力華軍撤退之前，並沒有準備好支持流動部隊的獨立的軍事、經濟與政治根據地。在這些依樣畫葫蘆的游擊隊中，不懂政治領導，和軍民合作建立此類根據地的技術，因此有許多立刻就消滅了。要把舊式的，不慣於軍民合作的軍官，在極短時期內，訓練成為民主的，能夠得到人民的支持與保護的人物，又怎能成功呢？另一個弱點，就是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人員，最關心的是從共產黨同胞手裏『收復失地』，而不向日本收復失地。

在游擊區裏作戰的軍隊，如得不到民衆積極的支持，馬上就會受到民衆積極的反對。如果牠不能運用巧妙的，運用當地資源的方法，以獲得民衆的擁護，那麼牠必然要變為以強力壓迫民衆加以支持的匪幫。——在這種情形下，牠已不再有防禦價值，而先成為敵人的目標，後成為敵方的盟友。那些新的游擊隊指揮官如果懂

得他們是完全倚賴民衆的支持的，他們都可以做得十分出色——這差不多都是模倣共產黨的工作方法的，至於那些用舊法作戰，沒有得到動員民衆的隊伍，全都馬上就消滅了。

軍事訓練總監與副參謀總長白崇禧，是中國最有材能的軍事指揮員，新軍質地的改善，可說是他的功勳，在戰前他和李宗仁將軍勝利地守着自治的和強大的小省廣西，拒絕服從南京的國民黨，因為他認為一九三七年以後的國民黨是反革命的。南京人員時常斥他爲『反動軍閥』，但當試驗到來，蔣委員長握住全國抗日戰爭的領導權之後，廣西軍隊却是最強大的抗戰一個的堡壘。在抗戰中，他們始終勇敢作戰，不斷在華中首當日軍攻擊之要衝，甚至在他本省廣西被侵犯時也是如此。

福剛森將軍有一次曾不滿地說：『白崇禧是中國唯一的將材，我可以把一切教育他，因為他是唯一一個承認他一切都不知道的人。』白崇禧的出任參謀長，（雖然他的意見並不見得有何力量）的確改善了軍事人員的材能，和有助於全國的統一。他反對反共的黃埔幹部所抱的內戰心理，而竭力在新的軍官中培育一種革命精神，而這精神已從他自己部隊的勇猛中表現了出來。白崇禧是一個國民黨的老黨員。但他在廣西的施政，却多少與共產黨所已採行的相似。中央軍將領，曉得革命教育與羣衆組織，在抗日鬥爭與爭取勝利中的價值與必要的並不多，而白就是其中的一個。在批評那些有心內戰而無意抗日的人員時，白崇禧總是勇敢的與直率的，就是他對蔣委員長有不滿的地方，也毫不躊躇地表現了出來。

『共產黨所應用的有效的方法』，白崇禧堅持着說：『革命的國民黨都可以採用。國民黨對共產黨用以獲取勝利的的方法，不應煩慮，應大大煩慮的，乃是牠應如何在牠的統治區域內去獲得牠。共產黨是抗日的，而且

打仗打得非常好。只要他如此，我們不應反對他們，而應幫助他們。」

「共產黨是不能用壓迫加以破壞的。如果我們的領導比他們的強，比他們的進步，那麼我們就可以對抗他們的勢力。國民黨要作爲一個政黨存在，只有領導民衆走上進步的大路。否則，不管壓迫共產黨如何嚴厲，牠本身還是不能存在。一個政黨不進步，不發展，就只有滅亡。而現在進步的途徑，就是採取一切方法去獲勝，如果這次戰爭是在國民黨領導之下獲勝的，那麼國民黨將比以前任何一個時候都來得強大。」

國民黨和軍隊中的頑固份子，對這些意見非常痛恨，但贊成這些意見的人，却比表面上以爲多。許多有着革命背境的青年，都被強力編入陸軍中，設若內戰再度爆發，他們的反應，也許將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就上面的進步看來，軍隊與民衆已有了更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說，由於軍隊被迫更加倚賴民衆的支持，以致牠的領導不得不反映一種真正民主的意志，這也許不是過份樂觀的斷言。不管牠現有的許多缺點，中國國軍（共產黨軍隊也包括在內）是一種偉大的成就，而且寄託着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光榮與希望，他握住了中國的政治命運，這是對的。只有那些準備爲祖國而死的人才配統治牠。

另一件事，中國千百萬被壓迫的民族不外是亞洲被壓迫民族之一部份，他們解放的希望就寄託在這軍隊的勝利上面，假如中國最後終於失敗的話，那麼，現在認爲他們的奴役只是暫時的台灣人、朝鮮人、滿洲人和蒙古人，也將被迫自認爲是永遠的了。不但如此，如果中國明天屈服的話，還有什麼能救出別的東方人，那些目下快從西歐帝國主義壓榨下解放出來的安南人、菲律賓人、馬來人、爪哇人、暹羅人、緬甸人和印度人，免受東方新帝國主義的野蠻的奴役呢？

第五章 中國的『工合綫』

一 一個理想的史詩

中國工業合作社正在打下中國新民主的基礎。

——克列普斯爵士 (Sir Stafford Cripps)

在日方加緊其海上封鎖之後，倘不是中國工業合作社——即『工合』——有驚人的發展，那麼中國前途的希望，就要暗淡得多。那個素樸的想頭現在已經變爲二千英里長的一條活的鏈條，即使日本造一座新的長城把中國完全圍住，這鏈條也天然能夠繼續擴大。由於它的更進的發展，中國不但許多種軍需品，而且日用東西，都依然能夠得到實際上的自足自給。

在工合的技術上面，中國找到了一個對付空軍威脅的工業防禦的原則，可以適用於力弱然而地大的國家。這原則不過是如此集中：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裏的工業，在不斷的轟炸之下，無法有效地或安全地做工，所以必須撤退，分成小的單位，散在廣大的區域中，務使轟炸機失掉其唯一決定的後方目標——即是機器、交通和熟練工人的戰略集中的固定化。

一九三八年七月裏政府委任艾利做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主任技術顧問時，那個協會沒有一家工廠，一架車床，或甚至一個鑿子——而艾利本人就是它唯一的職員。我們已經看到大部份戰前的工業都已失去，同時全國的技術人員分散在東西南北。在中國，在太平洋時候，組織是够困難的；而叫一個外國人着手去除這樣的障礙，困難似乎是無法克服的。老資格的『中國通』都把艾利看做一個說大話的傢伙和一個夢想的人。

懷疑的人現在正忙着取消他們的話，因為艾利今日就等於千萬個戰爭中被遺棄者的重生的希望和未來。他們有些喚他『高鼻子』，『工合人』。故事是艾利自己講給我聽的。有一天他坐在一輛舊公共汽車裏經過江西，這時在他前面的一個出鬍子的老者對坐在旁邊的一個青年說話。

『中國人做起飛行員來要比外國人好，』那老者莫明其妙地批評道，『他們四面八方都看得見。』

那青年露出牙齒笑着，恭恭敬敬地說道：『那是的確的麼？』

『的確之至！』那老紳士喊道。『只要瞧一瞧我們背後那個高鼻子好了。給那樣一個東西擋住了，他怎麼看得見呢？』

在艾利的情形，那個英國鼻子並未成爲阻擋的東西。在兩年之內，工合在中國創了一個從紙上計劃到實際行動之間的最短距離的記錄。從克服的困難看來，工合在一個富有得多的人們都在輕鬆得無算的負擔下，失掉希望的世界之中，可以作爲一個偉大國家的勇敢、機敏和持久力的紀念碑而存在。

工業合作社發展得那麼快，以致昨天的資料還沒印出來就已經是陳舊。一九四〇年十月初，這些袖珍工業有二千三百所以上，分散在十六省中，在七十個分部的技術指導之下。這條『工合線』一路從敵後遊擊區

直伸入中國的大後方，從蒙古高原而至雲南山地。工合經營着機器廠和鑛山，造出它自己的許多新工業的設備，這種新工業以一星期大約二十五所的速率出現着。三十萬人的一個大羣直接依靠這個組織活命；給更多的千萬人創出了工作。

艾利當然只是首先推動輪子的『發動機』。他和他所有的獨一無二的後盾是對於中國人員的必要的保證，就是說這個組織有一個不受傳統的官僚政治，引用私人 and 貪污舞弊的煩累，循着真正的合作的路線而發展的機會。有了這樣保證之後，中國最有才幹的工程師和技術家中就有一部份放棄了薪工很大的位置，以驚倒愛譏嘲的旁觀者的熱忱，自願投入這支新的工業軍隊。

要理解工合的精神和它迅速的成功，我們必須明白它中心人物的不平常的背景。這個中心裏面含有幾個年青的受過美國訓練的中國工程師和機械師，他們沒有共同的特殊政治信仰。却跟兩個人有一致的關係：艾利和一個叫做培烈（Joseph Batlie）的奇僻的美國教士。

若干年前，老人培烈得到結論，就是以入地獄做天火燃料來威脅買不起聖經的中國人是沒有用的，他使他的同事們大為驚駭地宣佈說，道德的行為在這裏受着飯碗的限制。基督教的考驗在於它改善人們生活的能力。中國需要少上聖經課，多開技術學校。老培烈在美國底得律（Detroit）改信了這些想頭。福特（Henry Ford）也以爲把科學智識傳授給對於工業得了新觀念的青年，較之無論多少說教，對於振作精神有更多的作用。他們作了一個佈置。福特出錢辦了一個研究院性質的工廠學校。培烈每年從美國工程大學挑選一百個『品行不及格』的中國學生來進福特學校，他們在這裏受到機械工程的健全訓練，其中混雜着培烈的傳佈

工業之道的重藥劑。

艾利在上海對於培烈和培烈的許多學生發見了同情的聯繫。他們大家憎恨浪費，在他們看來，生命被那原想解放人們的機器所毀滅，是一切浪費中最不合理的浪費。然而許多年，培烈的學生們回到一個不歡迎這些觀念的中國來。他們在上海辦了一所訓練學校，把技術和工業的社會使命教給工廠學徒。但是革命和反革命來了，開始了十年的反共內戰，而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大暴動以後，培烈眼見那最惡劣的剝削和恐怖時期到來了。他一定變得非常喪氣了吧。又因身體不好而愈鬱悶，他就在一九三五年悄然自殺。

培烈的人格依然活在他所訓練的最優秀的青年身上。他們是優秀的技術專家和優秀的基督徒，但是在一個親屬主義、政治腐化、剝削和貪婪的社會裏面，他們絕少把任何工業之道付諸實施的機會。這次戰爭第一次給了他們機會跟他們所要幫助的人民的生活相接觸。當工業合作社開始動員技術人員建立一個新的生產機構的時候，他們又一同找到他們的路徑了。現在，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行政和技術領袖，大多都是那年的老的教士機械師訓練出來的工程師。其中三個是在上海幫着草擬基本計劃的。

艾利和培烈的學生們和他們的生徒們，以一筆小小的行政基金和政府的貸款爲後盾，差不多只靠了一種共同的信仰和熱忱而動起手來。他們知道他們是在試驗，可能輕易便失掉他們的機會，所以他們不要在理論上多浪費時間。盛行的是艾利的散文風的格言：『使事情進行，』和『要緊的事情先辦。』不久，受了這個組織的直接的非政治性方法所吸引，其他許多有才幹的青年男女都開始自動參加。艾利自己每月只支一筆等於美金大約四十元的薪金，這個事實鼓勵了第一等的工程師們放棄報酬豐富的位置，而拿僅够購買食物的

一點錢爲工合做事。

技術人員和組織人員一直往鄉下去，着手進行教育民衆了解一個新觀念的浩大工作。他們每到一處，就召開會議，宣傳他們的原則，掛起他們的佈告和牌子，答應以技術援助和貸款給與願意組織起來從事生產的人們。懷疑不得不爲實行所祛除。慢慢地，最先的幾個單位獲得了公衆的信任。這些人說一句是一句。請求不久就大大超過了少數職員和可用資本的力量，幾千個被列入候補表中。

工人們依照康健、經驗和性情而登記、選擇，並依照行業而分類。合作人員教導他們如何組織，如何開會，以及如何研究當地市場。技術人員幫助他們找得機器——常常從沿海在陸地上拖了幾百英哩的——怎樣選擇安全的工廠廠址，以及怎樣運用，後來是怎樣製造，簡單的機器。最重要的，他們教導他們怎樣臨時應用可得的物料。學校開設起來訓練不熟練的難民、會計、組織人員和技術人員。

貸款都以年利六厘到一分放出去，在一個高利貸常每月要那麼多利息的國家。生產者對於遵守共同章程的保證，被當作担保品而接受下來。在所扣若干成的工資和利潤中，難民們依分期付款還辦法償還他們的欠款，成爲工業的股份工作者。在這新國土上資本的調轉是那麼快，貨物的需要是那麼大，以致有許多單位已經還清他們全部最初的欠款，而再借錢來擴充。同時，有好幾百家合作社現在經管他們自己的業務，只由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外勤職員給與技術指導。

織布、紡紗、編結、印刷和運輸合作社最先出現。一個村莊開掘一條河流，使它供給水力給一個機器廠；這個想頭傳播得很快。麵粉廠、造紙廠、風箱和爐子是用直接水力或藉工合酒精開動的。工合機器來運轉的。別的工作

業迅速地跟着出現：製造玻璃啦，開煤礦鐵礦和金礦啦，硝皮啦，提煉糖和油啦，織物啦，化學品啦，印刷啦，出版啦，等等。鑄鐵廠開了起來，工合的許多機器廠之中現在有着一一些極隱蔽而結實的單位在遊擊區裏。

工合的工廠製造醫藥供應品、制服、手榴彈、電氣設備、貨車、蓬帳、担架及其他軍用必需品。四萬個工合紡織工人現在供給全部中國軍隊的毯子——其中一部份以前是從日本輸入的。幾百所小型工廠中代表了五十多種工業。

在這迅速的復興背後，有着關於幾百個實地組織人員和工廠工人的不屈不撓、機敏和自靠目的無數事蹟，倘使艾利在寫這篇經過的話，他就會只說這些事蹟的。但是努力的大小也許從他自己走動的紀錄中最可見到。在最初的兩年中，他趕了一萬八千英里以上的路。請相信一個自己曾經在這塊彈痕累累的地上穿過一小部份的人的話，在戰時中國的大道小路上趕一萬八千英里路是足以自豪的事情啊！

騎着腳踏車，坐在軍用車上開開又停停的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坐了運送傷兵的車子或騎着馬到作戰區域裏去，但常常用了他自己不知疲乏的兩腿跨向前去，艾利在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最優秀的職員身上，鍛鍊成一種要把工業和合作的音信帶到國內最遠僻的角落裏去的幾乎像救世主似的意志。他親自組織了許多現存的合作社，從南京郊外新四軍遊擊區裏，直到遠在甘肅的回教徒紡織者。

「他是一個超人，」工程師中有一個跟他一同奮發前進了兩個月之後，說道，在其他的綽號中間，他得了「九生的人」的綽號，因為有九次當他所坐的公共汽車和貨車在不平穩的新路上傾覆或遭破毀的時候，他都幸免於死。一個仁愛的天使似乎看守好這個移動的目標。有兩次炸彈直接擊中他所躲藏的防空壕。在近來

一次工合出品在重慶的展覽期間，一個二百磅的炸彈直接掉在那個洞口，艾利及主要的工程師和組織者林福裕和盧廣綿就都立在洞裏。

「幸而它不是工合的出品，艾利說道，『否則它便不會不爆炸了！』」

「在這兩年裏面，你所經歷的最最激動的事情是什麼？」我有一天問艾利等着聽什麼別的險遭不測的事。

但他想了一下，隨即咯咯笑着，回答道：

「一個冬天的早晨，我們剛剛在離開蒙古邊上的一個小村莊，這時候聽到叮叮噹噹的鈴聲，我們讓在一邊，一大隊的駱駝從霧裏走出來，牠們的呼吸在嚴寒的空氣中凝結成霜。牠們走過的時候，我們驚異地看見那領頭的駱駝帶着工合的那幅巨大的絲旗，我們的紅三角畫在裝貨的大箱子上。」

「這是一個駱駝運輸合作社，在搬運遊擊出品。給我在一起的那幾個人是從溫暖的南方來的，他們突然明白他們是一種遍及全國的東西的一部分。當那些駱駝吐着鼻息走到曙光中去的時候，他們是怎樣向牠們歡呼啊！是的，那是一件激動事情！」

絕少中國人看到他們戰時的國家，像艾利那樣多的。他的路程叫他通過受着黑死病、回歸熱和其他傳染病的騷擾的地方，這些病他不是始終可以免染的。他害過骨痛熱病和瘧疾。一九三九年在江西贛州，他給傷寒拖倒了。有一個月，每天在空襲期間，他寒熱發得點汗，不得不從一個臨時醫院（設在一個火油棧房裏面的）被抬到河對岸田裏的一個躲避地方去。他總算脫逃了出來，像一向一樣地無慮不在而精力飽滿。

有一回，艾利當空襲中間，在一個上帝不到的什麼洞裏寫信告訴我說：『此地並不算壞，只是耗子糟糕。牠們拖掉我的肥皂、鞋子、衣服和紙頭。』有一回我在川西成都看見他。他剛從藏人聚居的松潘步行二百五十里路回來，走過極少中國人沒有武裝的人作伴而敢走的山路。沒有一個字提到他的艱辛，僅僅說他歡喜吃他的玉蜀黍和酪漿；但是熱情勃發地談到河流裏的金子和高原上的羊——以及被他爭取到合作工業來的活佛！這難以叫人相信，我問他怎麼弄成功的。

『藏人仍舊照埃及老法子，用手來紡他們的羊毛，那位老先生從來沒見過現代的紡車，』艾利瞬着眼睛說道。『我隨身帶着一輛我們的新紡車，這把他從消沉中救了出來。他說他做活佛做厭煩了，要幹一點有用的事情，於是我們就請他做我們松潘谷裏第一個軍需廠的廠長！』

但我從別方面聽說，真正使藏人轉變過來的，却是艾利夜間同那邊撒野的騎手們一起騎馬穿過狹小的山徑。他表現出他照當地規矩行事的能力——這包括狂飲他們在狂奔時從一匹匹馬上傳遞過去的烈酒！

艾利越多看見這個驚人的民族的勇敢和多謀，就越相信一種激發他們驚人的復元力量的民衆運動的健全性。『這不是我們所已做到的事，却是還可以完成的事，』他不住地重複說道。『我們的目標是三萬個合作工廠。當我們達到這個目標時，日本人就得把他們可笑的小刀捲進他們的蓆子裏去，自己帶回老家，再開始摹倣中國。』

是的，工合是一個成功，這是沒有疑問的。只有重慶的某些政客看見它正在成爲在他們控制之外的一種新的、民主的勞工階級動員的主要經濟基礎時，才越來越驚惶地看着它。它發展得很快，比全國的政治生活要

快得多而又多，這裏就有着它未來的一個危險。事實上只有戰爭促它前進，只有戰爭才說明使這樣一個組織可能存在的各種情形的奇特湊合。工合之所以處於那些反對任何種投降，要求堅決繼續作戰到獲得中國獨立爲止的勢力的前衛地位，這是一個原因。

這裏，我將很簡單地，把作爲這個最有希望的民主工業運動發展背景的政治機構，描出一幅略圖來。

二 國民黨和官僚政治

中國沒有階級……中國一點不受到資本主義的災禍。

——陳立夫

二千多年，中國被一種三頭政治自上而下，從未自下而上地統治着，這三頭政治包括皇室或軍事的勢力，一種以獨佔教育爲基礎的職業官僚和鄉紳。每一個官吏都得對他的上司們負完全責任，但是職位較高的，就沒有了一個可以被他的下屬着令負責，人民是尤其不必說得，人民參政的權利是從來沒有被容許過的。

在這古老的世襲的農業國裏，專制制度是像它在歐洲的大多數同時代國家一樣有效。但是當中國進了現代的貿易和工業世界的時候，以前的機構開始失掉它的可能性。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的緊壓，和貿易中心的發展，產生了熱望握到政權的未成熟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在農村裏，土地所有權的加速的集中，使地主與農民之間的敵對趨於尖銳。

一個跟中國社會突然變動的經濟基礎相調和的人民政府的需要，就是清朝傾覆的背景。這同一的要求，

帶了更多的自覺表現的，支持了國民革命；就在這種人民大眾的希望上面，國民黨握起了權來。但千百年的傳統重又武斷地要求建立一種新官僚政治。十二年內，給了十二個理由，解釋繼續不給人民政治權利，尤其是延期實行地方自治，孫中山先生始終認定後者是他政綱的基礎。

在一九三七年，國民黨治下各縣，一個也沒有得到自治的，統治的制度，極像舊時的世襲專制政治。中國劃分為二十八省，國民黨治下各省的官吏都由國民黨中央所委任。省又分為一千九百零五縣（凡國民黨擁有實權的地方），縣長也都由這官僚政治所選派。即在邊疆區域和特別市政府的場合，這也是事實。既沒有國民代表會議或參事會，也沒有任何種類的選任職位。甚至對於最起碼的小官的委任或罷免，人民絕無合法的開口資格。

黨的控制，跟官僚政治的政權的控制，成了同一的東西，然而後者跟軍權並不合一，却是互相聯結。如過去一樣。在一九二七年後，軍政二者恢復了跟地主土劣的傳統勾結。國民黨遂代表那樣一個利益的結合。再加上城市裏在抬頭的買辦、商人、銀行家階級。這後者，尤其在江浙這兩個沿海省份裏的，構成了這官僚政治的財政靠山。中國的銀行家大多屬於所謂江浙集團，國民黨內圈的握權派也是這樣。

這是一黨政治的常情，不同的派別在國民黨內部角逐着那官僚政治的支配權。其中最有力的是『二陳派』，通常就稱為CC。這要回溯到國民黨的早期。二陳是陳立夫和陳果夫，都是幫助過孫中山先生反對滿清的故浙江地主和秘密會社領袖陳英士的姪兒。這一位陳英士曾在黨裏把蔣介石跟他自己的兩個姪兒一起提攜過，據說二陳是和蔣滴血為盟結為兄弟的。

孫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陳氏弟兄一個都沒有多少影響，但他們是浙江人，對於他們的同省的同鄉蔣介石，却是有價值的。蔣做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時候，就叫陳果夫做他的秘書。後來，陳果夫就任國民黨組織部長，他在那裏幫助破壞黨的左翼。陳果夫立下CC的基礎，就是在那裏。

弟弟陳立夫到美國去，在璧茲堡大學得了碩士學位，那以後他就回來走果夫同一條路：先做蔣的秘書，隨即就任國民黨組織部長，最後當國民黨的秘書長。他據有六個別的位置，其中有情報處和軍隊中政治訓練的掌管。陳果夫近年來實際上已經不做事情。（因為肺病已入嚴重期）但陳立夫一身兼了兩人的差使。

陳立夫現在四十多歲，面孔生得漂亮而且驚人地年輕。他反對共產黨。在他看來他們是一種病，他無法不透露他的憎惡而談到他們。這種敵視總似乎是他的排外心理的一部份。一個有機智的人有一回說陳要辯護任何中國東西的優越，從三民主義的矛盾的矛盾到四川的臭蟲。希特勒發現耶穌是亞利安族的子孫。陳的同僚之一告訴我，他在一次行政院會議裏佔去兩個鐘頭，竭力要證明易经已預見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在戰前，CC的權力變得那麼大，以致蔣介石作為國家領袖的行為受到它密切的影響。所謂蔣家天下，陳家黨。也許再沒有影響力是像CC官僚政治那樣嚴重阻礙民主制度的發展的了，現在CC的轉變或可指示政治變化的性質。

國民黨通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以及通過它在各省各縣的黨部，而行使它的行政權力。黨部的首腦平常總是一個惟命是聽的爪牙，他（倘使並不直接統治）挑選行政人員。在十分之八以上的中國人所居住的農村裏面，黨部通過跟地主、商人和重利盤剝者的勾結，而實行統治，自然採用半封建的土地和賦稅制度。農民

在這個政權裏面沒有發言的權利，除了革命這一個傳統的權利。

這個機構在農民的擁護爲政府所不需要的時候搖搖擺擺地前進，但當大城市失去的時候，却開始崩解起來了。國民黨不得不退到內地和西部各省的市鎮和鄉村去，在那裏，它的影響很弱，從前的勾結非常不適用於動員工作。戰爭把它最吃重的要求加到農民身上：增稅、徵兵、強迫勞動漲價，和敵方的暴行。人民必須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應付這些犧牲，新的政治和經濟權利必須給與農民作爲革命鬥爭的基礎。但這樣的組織，就等於把新的權力給與農工；而黨部的機構裏面絕少能够控制和指導那種權力的民衆領袖。它尤其缺乏能够獲得人民信任的青年男女，而且當然受到它反對改革的豪紳份子的妨礙。

總之，戰前的官僚政治除了保持它對於農民的傳統的輕蔑以外，還保持那舊式士大夫對於農民的恐懼。不斷地使研究中國社會的人感到驚異的，是官吏之流方面這一種意見的巧妙，就是以爲農工是沒有自治能力的。他們能够爲國而死，能够養活軍隊和官吏，能够建造道路和工廠，能够供給國家全部的生產能力——但是他們沒有熟讀經書或者學會外國文，所以他們不知道怎樣挑選他們本村本鎮的行政者！這一種把獨佔教育和治理才能混而爲一的陳舊的官僚見解，除了最革命的知識份子之外，誰都是固持不改，這是中國政治停滯的一個基本原因。

在它背後，當然有着官僚對於發見他自己被罷免的真正的恐懼。『一般說來，』一個極尖銳的中國評論家寫道：『國民黨裏的人總有點以爲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不難」，但是控制中國愈益抬頭的民主勢力却非

(註)魏孟浦(譯音)語見一九四〇年三月號太平洋洋事務。

易事；（註）這句妙論我看來是完全正確的。

所以國民黨官僚政治不要『民衆運動』，除非是它自己獨力把持的；而因為沒有真正的民衆組織可以是一個並無民衆基礎的狹隘政黨的把持物，這種態度只是成爲妨礙而已。但是國民黨控制着現行的行政機構，能够而且確乎堅持任何不在黨的控制之下的戰時組織都是不合法的。自發的和獨立的團體被封閉。工人、農民和學生即使是地方規模的聯合會也都不可組織，當然也不准其他政黨來組織他們。『動員委員會』由豪紳組成，他們平常除了他們自己的傭兵——當地的民團——以外，是動員不起誰來的。

結果是已經表現出來了。從東部各城市撤退時，軍隊和黨的機構在背後掉下了未經武裝和未經動員的鄉村，這些鄉村敵人可以毫不費力地剝削。在他們後面，各種救國運動起來了，其中有些是共產黨領導的。這些運動填補了那政治的空隙，在日方能够鞏固以前，用一種新的民主的方法把人民組織起來實行民衆抗戰。這種發展似乎常常比日軍的佔領，更使CC和其他反民主派煩心得多。

對於政治控制的角逐，因爲蔣氏地位的意義在發生變動而愈形複雜，蔣氏的地位作爲團結的徵象，不得不承受性質完全不同的份子的廣大信仰。這裏面包括各部份的軍隊——例如他自己的黃埔畢業生、廣西派、地方軍的將軍和他們的軍政下屬、共產黨軍隊和其他遊擊軍——再加上職業的政客如改組派（在汪精衛出走之前）、政學系以及那些多少有名無實的政黨，它們構成不得不相互維持均勢的羽翼。蔣氏巧妙地利用一派對付另一派來維持他處於舞台中心的地位，但是他自己的政治基礎越廣，對於那官僚政治的安全，威嚇也就越大。

C C的對手中間，最觸目的是政學系，這一派裏面包含着頗有教養的智識份子，他們有意識地要想達到與從前士大夫之流一模一樣的地位。它的份子相信中國永遠不會是一個民主國家，而必須無可避免地藉助於舊式的治制，在這治制中，舉個高高在上的聰敏人使他們的服務爲軍人所欠缺不了，而在實際上統治國家自從一九一一年以來，他們一向是一種職業的幫閒的官僚，有時在國民黨內部，有時在國民黨外面，但老是在週圍聚集着一批握權的人物，他們希望在這些人物的服務中從上面來造成中國的命運。倘使如某人所說，C是國民黨的癩，那麼政學系可以稱爲國民黨的腰子流動病了。

「無論誰抓到政權，政學系裏一個最能幹的份子有一次對我說道，『總都是非在他攻擊一通之後，回過來請我們幫他統治不可。』」

這話充份暗示政學系的投機哲學，但它最好還是用一個深通世故者的一句使人信服的警句來表示：『在人面前說人話，在鬼面前說鬼話。』在一九四〇年，有五十多個政學系份子在那官僚政治裏據着高位，需要說什麼話，就說什麼話；有幾個是部長，其他是各省主席。這一派的天才在於它聯合中國資產階級集團去操縱地主的特殊手腕，以及它對於日本和美國的非常好的了解——它的羽黨大多是日美留學生。它的弱點是它跟任何種類的民主運動都沒有關聯——它在舊式上級官僚的根本的輕蔑之中保持着這個弱點。

另外一個，威嚇C C繼續統治的因素是汪的變節到日本陣營裏去。他代表寄生的官僚階級跟新武力相結合的一種傳統傾向。在現在的場合，他要做那帝國主義國家跟地主之間的聯絡者，這些地主的權力正受到遊擊區裏民主動員的威嚇。幸而日本人愚鈍，不了解他的地位，無論如何也許在客觀上沒有力量給他必要的

合作；但他的現狀却依然吸引了幾百個小官僚去幫着組織傀儡班子。在上海，一度是國民黨權力的一個壘堡的流氓之輩也分裂爲二，一部份到了汪那裏去。國民黨若干黨員是叛徒中著名的人物，這在覺醒中的中國是對於國民黨威信的一個打擊。

這個主要的國民黨官僚政治的機構這樣受到幾方面的威嚇。它不得不找一個方法來（一）恢復遊擊區內敵對的政治領導勢力所得到的權力；（二）加強其在西部諸『新』省裏的權力，與黨內別派相競爭；以及（三）防止它不滿意的和失敗主義的羽黨轉到汪那裏去，而覆滅一個正被戰爭迫往左邊的政黨的權力。國民黨確乎承認那些必要，而改變了它對於民衆組織的純粹消極的態度——這一個事實似乎暗示它不是一個『破產的黨』却是能够適應新的政治要求的。國民黨在一九三九年宣佈了一個確定的諾言，就是：『於抗戰勝利接近之日』立即實行地方自治並採行憲政中央政府；這是意味深遠的事。在它的六中全會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採用了一個宣言，（註）宣言中除了別的事之外，作了這一個駭人聽聞的承認：

『……總理革命目的，在於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當從積極方面，相互激勉，以履行吾人革命民權之獲得。……吾國近年國力衰弱，民力散漫之現象，推其本源，實由忽略總理革命程序，以表率自治單位之精義與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之規定，因爲籌備自治，未彰其實力。一切政治建議既未能確奠其基礎，而組織民衆亦捨本逐末，由是推進，抗戰既起，此種缺陷，更見顯著。……』

然而不應該由此而存幻想，以爲國民黨領袖們有意要承諾一個用民主方法選舉的政府。它的意思不過

（註）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是說國民黨承認有保衛和加強其政權基礎的必要而已。那在它所定的國民大會選舉規程和地方自治法（假定於一九四二年實現）裏是明明白白的。在後者的場合，人們預見到一種「民主」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之下，不過以對區長的顧問的權力賦與國民會議，所有的區長都是國民黨官僚政治的事實上的委派會員。這當然不是意外的。從來沒有官僚的獨裁，除了在極端的逼迫之下，而放棄政權的把持，倘使國民黨證明爲例外，倒是使人驚訝的。然而，這些有限的權利的給與人民，也正表示人民要控制政府的要求有增無已，使國民黨方面必須加緊其保持統治的努力。

在未淪陷各省，別黨的黨員依然被排除在政治活動之外，而國民黨現在又透了口氣，開始了一個急劇行動，那剝奪他們在游擊區裏的相對的自由。爲了這個目的，CC跟各個軍政集團合作，組成一個戰區黨政管理機關，企圖破壞日軍後方的左翼民衆組織和民選政府。這時常引起衝突，其中包括幾次對非國民黨軍隊的公開武裝進攻以及跟非國民黨軍隊合作的個人的監禁和屠殺。蔣委員長常不得不居中調解從這種政治競爭方式發生的爭執，並防止其擴大而爲大規模內戰。

爲要加強它在未淪陷各省的地位，國民黨恢復了它對於鄉村中政治訓練的注意，並努力在青年和軍隊中間擴大黨員數。爾立夫曾在一九三八年告訴我，國民黨有黨員約二百萬人；但是其中只有十分之一是活動的。所創立的新組織中，最觸目的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它以激烈反共爲目的。對於中學生和大學，實際上是強迫，必須加入的。所有學校以及軍隊裏的政治教育，都委任轉選的CC羽翼來加緊統制，這些羽翼也佔據差不多所有戰時各部各機關的職位。

在西部，省黨部和地方黨部大概都跟着政府權力而擴張。對於傾入這些「新」省的大部份資金的控制，使那官僚政治很快地擴張它的影響，並為幾千個新黨員找到位置。幾百萬元的政府貸款放到那些新區域裏去；這筆錢全部都經過那黨權的一派，被他們跟鄉紳合作着分配，當然成爲把黨部勢力打入新地盤的工具。

一個例子一定已經儘够：黨部在農村信用合作社中所任的角色。在一九三九年，約有五千萬元，在據說由CC派控制的合作管理委員會的監督之下，放進這些「自由省」去。這在理論上是一個膨脹農村放款刺激生產和增加購買力的方法。但是在國民黨決定使縣長實際上成爲所有合作事業的支配人之後，「合作社」就成爲政治性多經濟性少。它的自動性質被奪去之後，當然成爲一種畫虎不成的東西了。

我有一個朋友是合作社專家，他老老實實把他工作的困難細說給我聽。貸款係經由政府銀行付給縣長，縣長奉命組織一個信用合作社。這是常有的事：他爽朗把紳士們叫來，大家把錢分掉，算是組織一個合作社。有時紳士們以重利盤剝的利率，把錢再放給貧農或佃戶——現在就有許多貧農因爲無力歸還這種合作社債務而關在牢裏。有時，紳士們把錢用來合股囤積米或火油，或壟斷別種貨物。無疑的，這辦法使錢流入農村，且是迅速擴大黨部影響之一法——尤其在四川——但也是毀壞合作社信用的一個穩當方法。

有極少的幾個團體設法要不受CC的贊助和比較，不受官僚權力的壓迫，而發展；中國工業合作協會事業上就是其中之一。工合的領袖們想要真正建立一個以人民自動擁護爲基礎的純潔制度，他們拒絕一切想把這個組織置於任何黨派指揮之下的企圖。這個態度常使他們跟官僚頭兒發生衝突，這些官僚頭兒用了許多方法來壓制工合會，如以「共產主義」這些捏造的罪名，強迫它開除技術人員、或組織人員，並逮捕其他人

等。但總而言之，這個運動設法遵循合作原則和民主理想，獲得驚人成就；並設法維持一種多少不受各官僚派節制的行政——由於許多極複雜的特殊條件，這裏無法討論。

我在上面所說關於國民黨政權機構的話是不完全的，因之，可以說是不公平的。然而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在幾頁中間忠實地講述中國目下的政治實施情形。讀者會明白國民黨並沒有把民主政治行於中國，但那並不是說它沒有真正在努力救國救民的黨員。國民黨在黨員中間有幾個忠實、苦幹和熱心的人，和準備爲國而死的愛國者。它的黨員有幾個是在戰爭的每一考驗之下，忠實地無怨地站在他們的崗位上。有許多忠誠地做長時間的工作，拿着現在不算很大的經濟報酬。

中國的黨部制度是『自然的』政治進化之產物，也許是向着進步的變化的一個『必要』階段。看到國民黨裏落後份子中最嚴酷的批評家有幾個近來自己也做了黨員，至少是使人鼓舞的。只有幾個閉起眼睛瞎鬧的人才以爲它的行政制度是理想的。許多人只把它看作在一種驚人複雜的局勢中的臨時辦法；比較誠實和懂事的，則承認當那複雜局勢成熟的時候，國民黨非立即跟它一同變化不可。無疑的，它要這樣的。

三 成都和赴成都途中

夜深沉，鴉片燈出現……

蟲擾人眠，鼠行樂……

但這裏總有一天辦工業……

自由的人造他們需要的東西。——艾利

從重慶坐飛機到成都，要比坐車走陸路來得簡便，但是我要看看那邊的鄉村，和一些工業合作社。我錯過了一輛軍車，隨即等一輛英國桑涅克勞夫脫 (Thornycroft) 工程公司送給孫中山夫人，現在正在到前方去的大型救護車，等了幾天，影蹤全無。我正要坐飛機走了，這時候盧廣綿告訴我，他要坐一輛新的美國貨車到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辦事處去。他邀我一同去，畢竟如期開車了。

駕駛一輛兩噸的貨車通過世界的這一部份，似乎須有做『瑪麗皇后號』船長的謀劃和責任。作了長時間的、和神秘的談判，去得到甚至够行一段短程的汽油，以及用來滿足路上所遇各種查詢者的貨單和護照。好的司機極少，他們的薪金比官吏還要大。有一些使他們的職位顯得非常體面，帶着一批足够經營一座飛行堡壘的人手。我有一回坐了一輛軍車，車上的司機有六個『跟車的』一個機匠，兩個管滅熱器和汽油的用人，兩個換車胎的，和一個開車的替手。他所少的就只是一個管航行儀器的人。當這個傢伙套上白手套，坐在車輪後面的時候，你就感到動身到陌生海港去的一切激動。

工合第三號貨車上的我們的司機，由於有盧廣綿在車上，是稍帶拘束的派頭。盧君派了他的會計主任朱君分配汽油，決定停車的地方，並經管文件單據。朱君雖是一個優秀的會計，可並不熟悉燒油的機器。然而他仍然勤奮地通知那司機；什麼時候轉動聯動機，什麼時候慢下來，而且永遠在調整那玻璃遮風，在試驗車胎的壓力。他甚至告訴那司機——司機還受着痢疾的妨害——什麼時候停下來大便。我跟其他十二個搭客一樣，覺得在這樣小心不過的處置之下，十分安全。

橫在重慶和成都之間，是最肥的地皮中的一塊。那鐵銹色的泥土一年有三次收成，它豐富的化學成分似乎是不竭的。耕耘過的小山圍着道路，鄉村和人相繼不斷。農舍的特異的建築，使見慣了造在稻田裏的平頂泥平房的中國東部來的訪問者，感到驚奇。四川的村屋，在它的極傾斜的三角形草葺屋頂下面，常是二層的樓房，有着刷白的黑松板鑲裝的牆頭，所以遠遠看來，極像英格蘭的鄉村。那景象的某種說不清的性質——也許是那鮮明的綠色和偶然一見的吃草的羊兒——加深了這種幻覺。那些鄉村裏，在萬種臭味和普遍的敗毀氛圍之中，污穢的小客棧和全然的混亂，帶着一些迪更斯的氣味。四川是封建的歐洲由美國飛機和三引擎日本轟炸機給現代世界聯繫着。

中國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是這樣地赤貧，這樣地貧富判然。在四川，有幾家極其富有的人家，都是有幾千畝田的大地主；也有窮得叫人不相信的人家。中國的旅行者向我說起他們的驚駭，當他們發見四川鄉村裏農人窮得甚至買不起破衣服來遮住他們女兒的背，所以在出嫁年齡的姑娘完全裸露着做事的。成都金陵大學裏的史邁斯博士（Dr. Lewis Smythe）引用一個近時的調查，說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是屬於百分之七的人民所有。有些例子，田賦預徵了六十年——這個負擔結果是轉移到了佃戶身上。幾年前幾千個農民發見繼續爲軍閥和地主的利益而種田是毫無希望時，真正放棄好田好地，到城裏去當難民。

鴉片更進一步增加了四川的衰敗。四川以前幾乎出產中國全部鴉片產量的一半，雲南和四川是最後兩個感到政府禁烟運動的效果的省份。一九三九年，蔣介石親任四川省主席之職，開始決然努力撲滅鴉片。他已獲驚人成功，鴉片的出產和消費二者都跌至不足重視的比率。但在四川各處，你仍然見到多年的鴉片和苛政

的消耗。

那些副產之一，是一種我從未在中國別處見過的特異的慣例。四川開滿了茶館和飯館，前者是紳士和流氓的聚會所，後者一直開到街上，頗像人行道上的咖啡館。在較小的市鎮和鄉村中，在這些飯館四週，徘徊着一羣羣備有蒲扇的衣衫襤褸的男孩和幾個女孩。你剛坐下，他們也就把你圍住，開始趕開蒼蠅，不給飛近你的食物。探問之後，我才知道有幾千個流浪兒童都是這樣生活的。客人照例把桌上的殘飯留給他們，有時再給一兩個銅板。他們裏面，有些是真的孤兒——因近來的徵兵而數目增加了——但是有許多却是被懈怠的窮人或因鴉片而破產的父母所委棄的。

「你爲什麼不把頭頸洗洗呢？」我想要引他把袖子離開我的湯，這樣問一個搖扇子的。

肥皂和水跟他自己的頭頸發生關係，這景象顯然是過於奇妙，他放聲大笑了。「我麼？我麼？洗我的頭頸麼？熱水是給人喝的，肥皂是給富人使虱子不近身的。叫我怎麼洗頭頸呢？」

四川的這些「小鬼」，露着不洗的皮膚，生了顆粒性結膜炎、疥癬、濕疹和腳氣病，是叫人喪氣的，然而他們歡心的機智和他們的江湖奇藝却使你微笑。飯館老闆以道家的寬容，欣然安於造成這類討厭人物的世界，並以同樣的好心，承認那些童丐儘有使他的顧客厭煩的權利。顯然你不可打碎一個人的飯碗，當然也不打碎一個孩子的。

這樣的少年，前途完全沒有希望；紅軍「長征」通過四川，其中幾千個都歡天樂地跟了去，這是可以了解的。當你（像我在紅軍中一般）看見他們中有一些，倘使得到一個機會，會變成怎樣出色的青年時，這些小生

命的活劇真是痛心的悲劇。因之，蔣夫人的孤兒院是新生活運動所會做過的最好的事情。但他們不能用他們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是那麼廣泛，早就應該成爲國家的一個自認的責任。工合會完全以私人贈與爲經費，自辦孤兒工讀學校，也已經證明他們能够從這樣的料子造成中國最優秀的人，倘使政府對這工作給與協助的話。

我們在榮昌——一個頗大的城——停了一下，在這裏工業合作社發展極快，來不及弄貸款來作它們的資金。雖然四川的合作社給人印象較其他地區爲淡薄，但是榮昌這個分部却並不落後。自從開辦以來，在差不多六個月裏，它已設立了五十三個單位。那清潔得纖塵不染的分部辦事處，所有的職員，是幾個大學畢業生，他們拿着比食宿多不了多少的報酬而工作着。在他們的合作社中，他們似乎以一個印刷工場爲最得意，這個印刷工場有十一個社員，他們在組織合作社之前，大多是失業的工人或『謝師』（即不拿工錢）的學徒。現在他們的生意超出他們所能做的，有一倍之多——生意大多是從別的合作社來的——他們正在計劃擴充。

我訪問了幾個別的小工廠，他們似乎全都十分樂意這種合作勞動的新方法。『十根竹管比一根難弄斷』，他們說明道。貼或掛在牆上的標語使那地方有一種微薄的更生氛圍。（註）我尤其被一個專做麻布衣的清潔小裁縫工場所吸引。這工場有十四個社員，從前都是沒事做的，有幾個是別地方來的難民，只有兩個是戰前就相識的。這一種由各家的承擔的集團所有和責任，正是外國專家們告訴我們，說是『因爲中國人太個人

（註）例如，『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士兵在前線流血，我們在後方必須流汗』，以及『全國的工人覺醒起來，動員起來！』

主義，『永遠在中國行不通的東西。

當我們無法渡河到內江這個愉快的城市時，我們不得不在一個小鎮上過夜，因為跟這陰沉得難以形容的小鎮一對照的關係，也許我記憶中的榮昌要比它應得的更爲輝煌。門口掛着一塊過甚其辭的招牌『江邊靜憩』的那個客棧，甚至在四川也是一個骯髒的垃圾堆。後廊當作了廁所，椽子裏住了大隊的耗子，我想那地方已經有一世紀沒有打掃過了。因爲我把我裝寢具的袋子留在勃特蘭（James Bertan）那裏，我不得不睜眼客棧裏的被褥——那是最無法入睡的地方，除非你生了章魚的皮。經過一個鐘頭的不平等的掙扎之後，我把牀舖讓給了它的老住客們，而到廚房裏坐等天亮。我記得孫中山先生曾經竭力主張中國不是殖民地而是『次殖民地』，受着不是一國資產階級而是各國資產階級的剝削。這裏在四川，這名辭有一種不同的意思：那地方是它本國『微菌階級』的次殖民地——爲全部的實驗場備就方便的好行方便的供寄生蟲食宿的主體。

『你知道，』我記得另外有一夜兩個人在同樣情形下坐等天亮的時候，一個年青的受外國訓練的工程師對我這樣說，『一個抽水馬桶，比所有孔子的經典，具有更多的文明。』那是事實，只因爲孔子而生於今日，也許會同意那工程師的話的。

第二天，我們被空襲警報耽擱了幾個鐘頭，當我們等待飛機的時候，在河裏游了一回水。我們始終沒有看見飛機，但是天黑後到達成都時，我們才知道六十二架轟炸機已經把位於重慶成都之間，四川重要城市之一的嘉定，炸平了一大部份。四川省成都本身近來已受了飛機幾次的訪問，有幾個炸彈丟在華西大學的校舍上，我和一個加拿大教士一同住在那裏。中國東部的幾個大學在這裏結束了他們長途的行程，併在一個校舍

裏。其中有一所就是美國教會辦的金陵大學，它趕了一千五百英哩以上的路，把它的教職員和學生聚集在這西康的邊上，這些移民剛剛住了下來，那時候敵機就到了，傷害了大約一千個平民，並毀壞了這城市的一大部份。教士們看見他們的信徒和學生被美國的軍用品所屠殺，感到非常傷心。

「我們從日本侵略上面拿到無數的錢，」已經目覩過南京暴行的恐怖的史邁斯博士說，「然後送幾塊錢到中國來修補幾個傷殘的身體。我們談兄弟之愛以及和平，但是中國人眼睛裏看出來，基督是外國參與日本侵略的一條「陣線」。我們怎能回答他們呢？」

史邁斯博士是太謙遜了。他和其他像他一樣的人們，正在天天以他們自己的英勇和忠誠的行爲來作回答。美國人可以感謝教會裏的教師和科學家給他們在中國留下了好大的面子。你不能譏諷這些現代的基督，他們不怕死在異國而跟他們的羣衆留在一起，他們救治傷者，他們幫助從廢墟之中從新建設。有幾個也許犯錯誤，有幾個過份熱心，但極少不比批評他們的人好的。

即使在戰爭中，也有六千多個大學生——約佔全國總數七分之二——正在教會學校裏受教育。基督教醫院和全國基督教務服務總會（National Christian Service Council）治療幾萬個兵士和平民的創傷。教士們在任何需要最初的和自願的援助的地方，做了數不清的戰時工作，他們無疑地救了幾千條命。除了別的事情以外，有幾個把他們的援助給與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成都，我發現史邁斯博士等在積極爲工合分部主任 D. D. Sn（他自己是金陵大學的一個基督徒畢業生）招集和訓練人員。

金陵大學的一些教授和學生，在戰爭爆發之前，已經在南京附近的鄉村裏實驗紡織團體，希望政府給與

支持，來復興幾種破產的農村手工業。該大學在一九三九年遷到重慶的時候，就把他們的經驗和學識聽便工合應用，這些經驗和學識證明爲非常有用，尤其在改良紡車和布機的發展方面。多份因爲這一種幫助。工合的織物合作社才於一九四〇年達到這樣的進步，就是它們能够接受一百五十萬條羊毛毯子的大批軍隊定貨。單是在成都和近郊各村裏，當我在那邊的時候，就有大約五千個婦人和姑娘在紡羊毛，而當地工合的織工每天已出產一千二百條毯子了。

史邁斯也幫助在成都附近設立一個合作機器廠。這是『工合線』上最大者之一，有一百五十個工人——機匠、木匠和鐵匠。一天，我騎了腳踏車，和史邁斯一同到一條小溪的柳樹成行的岸旁，去訪問那掩護得很精緻的工廠。那時候，工人們主要地從事於布機和紡錘的製造；大抵由於工合會的倡導而發展起來的新的羊毛工業，需要幾千架的布機和紡錘。人們一邊工作，一邊唱着在他們合作訓練中學會的抗日歌；在露天觀看和耳聽都是極愉快的，想起上海工人的那些黑暗的監牢。

在我動身到北方去之前，我入了迷，幾乎把我的旅行根本取消。

我受了另一位客人的迷人的黑眼睛的誘惑，這位客人住在迪更生博士（Dr. Dickenson）的花園裏，就是我在成都奢華地就攔的地方。他是一隻在叫人無法不愛的極幼小時期的熊貓。當我知道一個當地獵人願意以差不多等於十塊美金的代價弄一隻熊貓給我的時候，我決定捐給動物院，坐飛機帶一隻回家。但是中國政府叫我斷了這念頭，它宣佈說：熊貓像外匯一樣，除非經當時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的特准命令，不得出

四 中國艱苦的建設者

人們很有理由說中國人『使貧窮成爲一種科學』。

——史密斯 (Arthur H. Smith)

我感覺到四川的廣大，當我們離了本身已在省中部的成都，向北，在田地和荒原之中，又在車上走了三天，然後蟠行而通過那高高地在山中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鎮關門（譯音）山隘，就是在幾世紀之前，三國時代的戰士們打過大仗的地方。

幸而我能够在成都從開那特 (Spencer Kennard) 借了一個寢具袋，所以我不再爲蟲虱所困擾。然而我還是很高興跟四川那些骯髒的小客棧告別，而發見自己又在陝西那種有着它崩坍的黃土小山的熟悉的景色之中。那對照真正是立時的：就在山隘的那邊，在交界的地方，四川的蹩脚道路讓位給了路面光滑的公路，這公路在幽雅的樹木和比較掃得清潔的鄉村之間轉向前去。走進這些鄉村中的一個，你就又感到戰爭的接近和一種照例的興奮。農人在大街上來往操練，走着常步和快步。家屬和朋友當真聚在那裏看着『好鐵打做釘』。偶然唱一隻歌或者歡呼、鼓勵的話，雖然在四川，看見徵兵們頭頸裏套了繩子被拖過街上，仍是普通的事。

在陝西的第一晚，我們又回到了『工合線』上，當我們在褒城附近，停下在一個工業酒精合作社技術主任楊玉珍博士 (Dr. Young Yu-cheng) 的宿舍前面。在楊博士——一個受德國訓練的工程師——身上，

我發見一種對於秩序和清潔的可羨的愛好。

『他一定要保持他的生活標準，』在我們到達之前，盧廣綿盡情地警告道，『不論他在什麼地方。倘使他遭殃，算不了什麼，他說趁此生尙在，他要過得有味，誰知道下一個炸彈掉在什麼地方呢？』

在酒精廠的前面，楊博士造了一座五間房的磚頭精舍，走廊寬大，室內陳設着外國椅子、桌子和床，以一間備有瓷浴缸、廁所和抽水馬桶的寢室爲佈置的頂點。除開從他西安的家裏搬來的傢具不算，那地方只化了楊（他自己淘腰包付的）國幣二千五百元（當時約合美金二百元），但那給了他『土皇帝』（“local lord”）的地位。比那精舍更驚人的，是他所備的食物。他從一羣包括十一頭的瑞士山羊，得到他自己的奶和白脫油；他教會他的中國廚子烤出輕如羽毛的麵包和『羅而』。在所有這種奢華體面之中，走動着那樸實的穿了工作罩衣的楊博士的身體，他是一個漂亮的灰白頭髮的五十歲的人，工合技術專家裏年紀最長的。

楊是一個東四省的亡命者，像他們大多數一樣，抗日情緒極其熱烈。他原在瀋陽兵工廠裏做一個機器工廠的場長，一直做到一九三一年，那時，我們記得，日方弄掉一段鐵路軌道（正如他們一九三七年在蘆溝橋附近弄掉一個兵一樣）爲酬報起見，就佔了一塊兩倍於日本那麼大的領土。『事變』以後，楊南下到西北，在那裏，他跟德國工程師們創立陝西省的酒精工業，地址在咸陽附近。莫明其妙地，政府在戰爭開始之後，命令把咸陽的廠關掉。顯然作爲把基本工業撤至四川的總計劃的一部分的。楊就此失業。

這是工合的一份非常的好運道。明白西北有繼續出產酒精的必要，並急於要出一點力，楊自動加入職員裏面，跟盧廣綿和工程師吳去非（Wu Chu-fei）商談之後，他們擬定了開辦一個合作工廠的計劃。一個幽

靜的小山給找到了，在這小山裏面——真是在裏面——楊造了一座大的蒸溜所，它開始每月出產一萬加侖。整個廠只化了國幣六萬元（當時約合美金三千五百元），它是這樣地發達，所以在開工以後三個月內就還了一萬一千元。楊正在用當地原料照樣再造一個蒸溜所，預料要有加倍的容量。

酒精不僅爲軍事、醫藥和工業用途所需要，而且作爲燃料而立即暢銷，工會會現在只有西北這一個廠。跟汽油混合之後，它就代表巨額的節省，在那裏從外國輸入的汽油零售要二十塊錢一加侖。那合作社裏，約有四十個工人。跟這個合作社聯在一起，楊辦着一個學徒學校。那地方全是『小鬼』，他們大家都似乎崇拜那個喝山羊奶的怪人。雖然他的開支兩倍於工會會所能酬謝他的數目，來『保持他的生活標準』，但是楊却再快活也沒有，他說他生平第一次覺得自己有用。

在襄城東面車行兩小時的地方，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漢中，它靠近那在南方極遠的地方流入長江，一度曾是旅行和貨運要道的漢水。今日，它的兩岸上排列着淘金的人們，其中大多已經組成了工業合作社——一共四百六十七個，當我經過的時候，中國銀元的跌價使這種工作獲利甚豐；一九四〇年時，金子在重慶賣五百元一兩。我化了半個鐘頭看一個合作社進行它原始的淘洗手續，淘着一百磅沙泥。他們篩到末了，在筐子底下發現極小極小的一片金子，似乎頗爲滿意了。

『它媽的！』一個拖辮子的年老裸體的淘金者高興地說道。『小得連唾沫都吐不着的，可是倘使你有了够多的話，你就可以向無論什麼人吐唾沫了！』

工合的漢中分部在它能夠的合作主任李華崇（Li Hua-chun）之下，組織得很好，李是西北大學畢業

生，大約二十七歲。他和他的職員十八個會計人員，技術人員和組織人員，依照合作辦法，同住在一間寬大的宅子裏，他們每人每月付等於美金一角的房租。這裏也有一間曬滿陽光的『董事室』在那裏，一天早上，我參加過一個四週各鄉村合作社來的代表會議。雖然漢中分部還不到六個月大，但已有五十一個單位在生產了，製造棉布和綢、皮件、墨水、紙張、肥皂、蠟燭、機具、機器零件、玻璃、編結物、衣着、化妝品以及足夠擺滿一家百貨公司的零星雜貨。

漢中附近一個小木作以它野心勃勃的名稱『江浙工程合作社』打動了我。它只有七個社員，二千四百元的共同的借款股本，它雖然只經營了五個月，但是每月却做一千多元的生意。到蘇聯去的那條從前運絲的路在近處經過，省政府向他們定造路上新的中俄文牌子，這事社員們認為很光榮。江浙工程合作社取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的社員大多是江浙兩省來的難民。它頗可代表這一地區內的小工合單位。

社員們共同住在一個清潔得無可挑剔（至少在我看見的時候）的宿舍裏，床是雙層的，隔壁一間是俱樂部，它把讀書和娛樂的設備合在一起。有一個合作書籍的小圖書館，和一個該區合作報紙的訂存冊子。一天的工作表跟社中的規程一同陳列在顯著地位。牆上掛着通常的勸勉性質的標語：

工業合作社是真正工人的工廠！

工業合作社是抵制日貨的方法！

清潔就是衛生，健康才可做更好的工作！

工業合作社是民生主義的實行！

在我們的社會上，只有做工的才得吃飯！

當我進去時，主席叫他的社友們在鋸子和鑿子上給我一個立時的敬禮；這位主席把他們一致通過採行的規定日常生活的規程，拿給我。五時半吃早餐，六時開始工作。中間有一個鐘頭吃午餐，工作再繼續到六點。出於他們自己選擇的一天十二小時工作，顯然，人們爲自己而工作的時候，就不在乎時間之長了。其他的共同協議禁止在作場裏吸烟和吐痰，浪費時間，叫囂，未得主席許可擅往社外，疏忽工具。社員輪流做值日，來實施規程。凡工人屢次犯規或不服從主席，可在全體大會裏予以開除，其股份由其他社員購買之。

漢中附近另一個有趣的難民合作社是一個織物社，它的零售室門上貼着：『我們爲人人工作，人人爲我們工作！』和『前方他們殺敵，後方我們造貨。』這裏，主席是一個極崇拜李太白的人，却把他的文才用到實際的目的上，用詩來寫合作社規程，好叫他們更容易記牢。這一位詩人織工光蓀甫（Kuang Sheng-fu）是杭州人，他曾在杭州一個工業學校裏讀過染色和織造。當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掛起它的招牌時，他有一天躊躇地走進去問合作社怎樣組織法。『我懂得織布織毛巾的法子，』他說道，『我會經在本地一個織造廠裏做過事，但廠破產之後，我以教書爲職業了。我知道布機和編織機器埋在什麼地方。倘使我有一點錢，我就可以把舊工人聚集幾個攏來，開始生產。』

當問他要多少錢時，光誠惶誠恐，要求足夠買一包棉紗的資本。他得到不祇此數（三千元）由一個工程師的幫助，他不久就把幾個無業的工人動員起來，急切開辦一個合作社。當我去參觀的時候，這個織物廠裏一月出產三千元貨，社員們正在計劃開辦一個新的染坊。

出城到鄉間，回到到寶鷄去的大路上，我偶然發見一個值得特別提起的臨時湊成的傑作。它是一個合作社玻璃廠，能够造出各種各樣的玻璃器具，包括醫用和軍用的東西在內。我計算它全部的借款資本爲數僅約美金一百二十元。完全用當地的料作，它的巧妙的建造者以那個不足道的數目，造了兩個爐子，六間各有一百二十磅容量的熔化室，一個烘爐，以及其他各種設備，它們大多像泥和草做的，可是顯然極其適用。那隻主要的爐子的烟囱，大約三丈高，外面塗泥（偶然地恰是戰爭顏色學的佳作）。中間砌一圈瓦，設法用一個竹架子箍住了。這東西完全是徐鴻林（Hsu Hung-ling）的創造，他是日本留學生，在山西兵工廠裏一直做到日軍把它佔去爲止。他是水晶體專家。這個合作社有社員三十人，大多數都是被徐訓練出來的女難民。七個男吹手和捏手，是僅有的熟練勞工。

漢中過去一天路程，是另一個工合分部，也許最好不要把它的名字說出來，雖然我確信日人現在得了汪精衛公司的幫助，一定已經把它畫好在地圖上了。這個縣裏也有五十多個合作社，那個小城作爲一個戰時交通和工業中心，享有着空前的繁榮。大街中有一條改名爲工合路，工合會在這裏維持着自己爲工合工人的孤兒和兒女辦的小學，它自己的醫院，一個技術訓練學校，和西北唯一的試驗所——這一切都巧妙地掩蔽在四郊。

在這裏附近，是『工合線』上那家最大的合作社機器廠。由它自己的水電廠所發動的這個機器廠，是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重』工業方面的第一個嘗試。當我經過的時候，它主要地在從事紡織機器的製造，以應付軍隊緊急的毯子定貨；但在過去，曾經爲其他合作社造過許多種機器。它也會一度造過盒子砲和步槍，一個

月裏造了七萬個手榴彈。但政府現在禁止它造軍器，誰都不知道究竟爲了什麼。工人中許多都是東四省人，從已被蔣委員長解散的張學良的東北軍的那小兵工廠裏來的。得知他們的老機器要被運到南方什麼地方去，或者當舊鐵出賣的時候，工人們團結起來，在中國工業合作協會下面組成一個合作社，把他們的車床和工具收還了一些。

在這工合分部裏的其他合作社，包括一些煤礦、運輸、皮廠、羊毛織物廠和一家造紙廠。最後一個，我相信，是那時陝西最大的造紙廠。跟廠聯在一起，（廠有廣大的空地）工合辦着它的小學校。所用的特別工合教本，是在工合的廠裏印刷，印在工合的紙上的。除了別的東西之外，從最小的學生起，都受關於合作原理，以及體操和軍事訓練的教導。那個小孩隊長爲了表現給我看，叫他的同學們在那空地上開步走來走去，像黃埔學生一樣漂亮。

這裏另一個特點是一個工合醫院，那城裏僅有的一所，原來是作爲工廠工人的診所而開了的。它的醫生是一個教會學校出身的青年，唐文和醫師（Dr. Tang Wen-ho）他把他的工作看作是佈道和愛國服務二者。他的薪金那時是國幣三十元——在作者寫此文時，約合美金一元二角五分，這數目，我相信，是給醫生界創了一個最低的紀錄。他的小醫院以一共六張病床自豪；住院病人每日收費一元——在美國說來是四分。醫生和護士爲這個高價辯解：『因爲這裏吃的東西很貴。』自從開辦以來，這個醫院已經給幾千個工合工人和他們的兒女，給幾百個鄉人，種痘防天花，打預防傷寒的針和預防霍亂的針。除了別人之外，他還給記者打針，取費半分美金。

越過這個小小的十字路，（它對於隔了好幾世紀之後來改變它的所有這些革新，依然在搖着它迷惑的頭，）車行一日，你到了寶鷄，關於這個勇敢的小組織，得到更多的見聞，這個組織出現得遲，但空前有效地幫助在世界最古老的國家的誕生地上，建設一個新國家。在我繼續行程到那遊擊邦裏去之前，我要稍稍停一下，來描述這西北的工合之家。

五 明日的希望

我們被炸一次，重建一次。我們被炸十次，重建十次。

——一個工合標語

寶鷄是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西北辦事處，在它下面，在五省裏面設十二個工合分部，一九四〇年時擁有近八百個合作社，從川陝邊界向北一直分佈到榆林長城邊，從甘肅西部蘭州一直分佈到東面晉豫遊擊區。這是一塊極大的土地，比法國大四五倍，是中國工業合作協會五個分區辦事處中轄地最大的。（註）

這個小城在戰爭開始時，原是一個毫無生氣的偏僻小地方，在這裏騾夫和駱駝夫把他們負載的貨物卸落在隴海鐵路的終點，但它現在却有大約七萬個居民，具備了一個邊界發達小城的一切熱鬧。它發展得這樣迅速，以致新的『外』城門還沒造成，已經成爲城市的中心地帶了。泥土的街道上擠滿了騾子、馬匹、馬車、駱駝、貨車和行軍的人們，這地方有一種偏僻西部的粗野樣子。寶鷄偶然遇到了好運道，有一個頗爲開明的縣長王豐瑞（Wang Feng-ju），他的熱心的支持幫助合作運動迅速地生根，而爲這個地方贏得了『工合城』

（註）這五個辦事處是：東南、西南、雲南、川康、及西北。一九四〇年爲華北各遊擊區設立第六個辦事處。

這個別名。

在這裏，在距離廣綿到來開設一個辦事處之後不到一年的時候，我發見工合傲然在經營着它自己的批發所和零售部，它自己的學校和訓練班，以及它自己的裝着本地僅有的淋浴設備的俱樂部。附近的合作社製造着鞋子、帆布袋、衣服、機具、肥皂、顏料、電氣用品、糖食、軍裝、綁腿、帆布床、篷帳、毯子等等。合作商店是城裏最大的店舖，我去訪問的時候，它有二百多種不同的貨物，代表六十三家作場和工廠的出品。後來，它一部份被炸毀了。但中國人冷靜處之。他們說日本人免掉他們拆除已經不够用的房屋的麻煩，進行以更大的規模來重造。當附近一個合作社鐵廠也被擊中的時候，那些靈巧的鐵匠聲明對於那炸彈的全部碎鐵有優先權，收回的錢足夠償付修理費用。然而，這樣的損害在工合工廠中間是極少有的，它們大多造在郊外，從空中望起來，它們像鄉下人家的茅屋，倘使被擊中，也是偶然的。

寶鷄的合作大商店是受合作社聯合會的一般指導的，但因為大多數的工人做生意的經驗都有限，所以工合辦事處的職員幫着經營。董事會裏三個董事是辦事處的人，四個由聯合會選舉。零售平均每天五千元，批發生意更大。我在那邊的時候，軍隊方面買了十萬元的藥水紗布，和二萬四千元布。不久之後，它定製二十五萬條羊毛毯子，三萬磅繃帶，三萬磅藥水棉花，和幾千件大衣和担架。這些必需品，在工合上市之前，當地是一樣都不製造的。

迅速的發展把很重的責任擺到辦事處職員四十六個組織人員和技術人員身上，但他們正從一個訓練學校添補助力，這學校已經畢業了六十一個男人和十個女人。這些青年每月拿等於美金一二元的薪金，穿着

棉布短褲和襯衫以及草鞋，像他們向着教導合作的工人們一樣地吃和住。在寶鷄辦事處和分部雙方的職員都共同住在樸素的宿舍中，他們的吃食費錢極少。淋浴，一種寫意東西，在娛樂室隔壁，是用美孚火油箱做成的。靠重力供水的裝置，有小的球狀東西調整水流。洗一個澡，歷時十分鐘，收費五分。

一天早上，當我坐在我的舖上吃一碗凍米（putted rice）——一種工合出品——的時候，一個剃男裝短髮、穿藍布旗袍的眼睛明明的年輕女子，極其謙遜地走進來，自己介紹是任珠明（Jen Chu-Ming），倫敦經濟學校畢業的任女士，是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婦女工作部的主任，並且如某人所說是「此間附近最出色的人。」這一位堂堂的小婦人剛從甘肅陝西艱苦地旅行了一個月回來，她在那邊創辦着識字和訓練學校。她把身受的艱苦和冒險，（在一世紀以前，中國婦女沒有一個會夢想單獨去冒這些艱險的，）一點都不放在心上；她只有興趣談她的工作。

幾千個婦女和孩子從日軍或從黃河泛濫的地方，向西逃了幾百英里之後，在這裏，在渭河和漢水的古老的流域，在起浪的麥田中間的黃土村裏，停了下來。他們住在蘆扉棚裏，在本省人旁邊，這些本省人自己也像難民們一樣地貧窮和沒有知識。縣政府發米給他們，但也只發米而已。任珠明有出奇的信念，以為這些沒有希望的人可以組織起來，成爲國家的一宗資產，以代替作爲國家的一項負債。

任女士和她的四個助手——五個姑娘解決兩個廣大的省份——先從難童開始她們的使命，給他們辦小學校。有時她們借用合作社的房子；有時露天的田野就是他們的教室。在六個月裏，她們組織了十九班，招得了義務教師指導他們。除了識字以外，無家可歸的兒童和孤兒還學數學、地理、簡易衛生學、戰爭發展、自由歌曲

——和合作原理。通過兒童獲得了婦女的信任，通過婦女獲得了社會的信用。

任女士說：僅僅是求知的熱情就使她們能够迅速地將兒童組織起來，對於婦女這可不行。中國一句古話說：『女子無才便是德。』西北的婦女依然是非常保守，有許多纏足，而傳統又教導婦女必須服從男人，不得男人許可不可走一步路。在某一個村裏，一個女人想要加入合作社和讀書，被她的丈夫用牛鞭子抽打。從縣長下來，個個人都同意這是懲罰『越軌妻子』的適當方法。

『於是我們轉變到娛樂，說說笑話，講講關於這些母親和妻子的故事，她們了解她們國家的運動，鼓勵她們兒子和丈夫去參加作戰。』任珠明說明道。『我們講關於女子所做的英勇事蹟的故事。我們發現這些故事非常有效和感動。這樣，我們回到教道德和品行的傳統中國法子——用犧牲和英勇的故事。』

要在鄉村裏贏得對於合作社的承認，必須除了難民，並須把當地的婦女們捲入這個運動。有一回，任女士發見幾家窮人家住在一個洞裏，跟中等階級的鄉村婦女相差只有極短的路，這些中等階級婦女對於她們鄰人的窮困滿不在乎，但自己也是閒居，要做點有用的事情。她爲這兩批人都組織訓練班，兩批都立即組成合作社。明白自己有着共同的利害關係，她們在組織中衆見了團體的一種新的力量。

任珠明的工作恰巧做到足夠證明它的可能性的地步。在教了九個月書之後，她和她的助手們已經組織了二十一個合作社，包括差不多六千個婦女。雖然到那時爲止，她們中間只有一個小的成數有勇氣做購買股子這極担風險的事情，冒險投資一二元，然而她們大家都在學得一種新的生產方法，以及目見耳聞以前從未有人肯費心解釋的事情。兩個紡織訓練學校教會一千多個婦女運用改良紡車和布機的方法，這些婦女中間

有許多正在工餘的班上，以她們所學會的，教給別人。婦女工作部維持着十七所給工合社員子女，給婦女和窮孩子讀書的小學。在寶鷄除了男人之後，女人也可進一所高級的紡織訓練學校，學習這種行業的技術方面的知識，和組織合作社的方法，這樣每一個學生畢業時才可以到外面去，在這種工作方面領導一個鄉村。

說起來，這些小小的成就在數量方面還不足以給人深刻的印象，但在受到影響的人類生活中所發生的面目的改變，却是驚人的。男男女女正在發現一種共同生活的新方法；他們第一次感到生活有了目的，感到屬於一個集團的意識。他們第一次爲了一個比老闖或家庭或僅僅他們自己更爲偉大的人格而做工。有許多都從他們微乎其微的利潤中，慷慨地捐給前方的兵士。他們中有一些議決把所有工餘時間用來盡義務給軍隊做舒適品。戰爭開始改變現實，對於他們自己的將來具有着意義。

母怪任女士恨不得有一百萬元，以代替那時撥給她的工作經費二萬元。她沒有從政府得到直接的援助，不過蔣介石夫人從救濟費裏給了她上面所說的款子。後來，海外華僑和美國人的捐款足以使她們增加職員，把訓練擴大到西北數千個別的婦女。

在中國所成就的經濟的奇蹟，用外國貨幣來說的時候，是十分使人難信的，除非你親眼目睹。我把一筆小小的零錢捐給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寶鷄所辦的一個孤兒訓練學校，只有二百四十六元，約合美金十三元。這一個數目買了二十二個女孩子穿的冬衣（工合出品）。任女士設立她第一個四十個人的紡織合作社，只化了差不多等於美金三百元的資本。這個數目除了十四架紡車、四架布機、採辦第一批原料，以及兼作工場和課堂的一座鄉下房子的租金——這幾項的資本之外，裏面還包括那四十個婦女在兩個月的預先訓練時期內的

吃食和書籍的費用和四個教師的薪金哩！

所以中國是靠了微乎其微的數目戰鬥着生活着。

艾利常常夢想以美國一艘戰艦的造價或那些「吃角子老虎」的一天收入，在中國可以做些什麼。但是事情完全成爲可笑到狂妄的程度，當我有一天覺察單是一個普通美國婦女每月化妝品和美容的費用，就可供給一個中國婦女的衣食住、教育和合作工業中的一個位置。用了美容家從美國婦女一年所收的費用（在一九四〇年，等於中國國幣四十萬萬元），你可以把永久的生產性的救濟給與中國二萬萬人……

我在寶雞訪問合作社費了一個星期，但我永沒有看到它們的最後一個。在我小住在那裏的期間，幾個新的合作社，組織成功了。在它們稀有的發展中間，許多理論和實踐的問題仍是沒有解決。例如，會計是一種神秘事件，批評者說工合工作人員永遠學它不會。但是在它的訓練學校裏，職員方面正在編訂一種簡易的簿記方法，從合作社招來的年輕學生們以驚人速度理解着。六個月以後，如會中會計星每期的查賬所證明，許多合作社的賬都記得完全滿意了。此外，購買原料和推銷出品也是需要經驗的難關，但是在處理這事情的工合聯合會裏，男女人員正在學習它所有的錯綜關係。盧廣綽叫我相信：目下雖有弱點，但在整個組織之中，沒有問題不能終於被合作工業的股東兼經營者所克服的。

然而遠遠地存在着這一切小型工業的戰後前途這個主要問題，以及它爲資本家競爭所消滅的危險。人們承認，工合的第一個任務是幫助戰爭得勝。人人都同意，倘使中國打敗，那麼中國工業不論合作社，或非合作社都不能生存。但除了領袖職員們外，合作社的工作人員也都在想到明日。

「我們許多人現在用手工的工具來做工，」他們中有一個說道。「但是我們正在製造機器，我們懂得怎樣開機器。我們正在賺錢，我們能够在二三年內還清我們的借款。倘使我們把我們所有的工廠都聚集攏來，把我們所有的賺頭都聚集攏來，那麼我們聯合的勞動可以變為強大。倘使我們能够製造機器、開機器，那麼我們能够把大工廠管理得跟任何人一樣好了。」

西北辦事處職員和工合聯合會已經採行一個計劃，把它們全部的財產都儲積在一個區金庫裏。它最後將接收所有的合作借款，經營一般的銀行和保險業務，成為所有工合單位的公共存款處。股份的支配權屬於合作社自己，它們購買股票以二成純利和五厘毛利為限度。當一個「全國工業合作社聯合會」成立的時候，西北區金庫就將併入一個全國金庫，後者本身被認為一個「全國工業合作社銀行」的先驅。

這是顯然的，合作工業只有在那樣地迅速建立起它自己強固的集體資力的條件之下，才能存在。第一批的借款是從財政部長兼全國救濟委員會主席孔祥熙撥作這種試驗用的全國救濟金裏來的。在營業成功表現出來，若干可為性被承認之後，幾家銀行發生了興趣。在一九四〇年，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訂了一個契約，使它得依年利八厘的利率，從四家政府銀行，動用差不多四千萬的一筆借款資金。

同時，政府繼續幫助給與職員做事的費用，作為它重雇程序的一部份。（註）因為工合只對孔祥熙負責，拒絕變成國民黨下面的一個機關，所以它可能作為一個比較不受黨派節制的民主運動而發展。但是倘使這

（註）整個工合協會行政的維持費，包括技術人員和組織人員，近千人在內，在一九四〇年，每月僅約合美金六千元。海外捐給工合協會的錢兩倍於政府所給的職薪補助金。

種民主的性質應該予以保衛的話，那麼工合協會對於現在作爲非常辦法由政府付薪的那些服務，非發展其自己的償付方法不可。那種協助可能是或者在任何時候被任意取消，或者要求以官僚政治控制這個組織爲交換。

大多數工合領袖都充份明白那一點。他們確信，倘使戰爭爲期够長，那麼合作社除了維持那些訓練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以外，並將成爲充份強大，能付這事業整個技術和行政方面的開支。前者實不受政府支持而經營，其得以成爲可能，都是主要由於國外熱心贊助者的幫助——尤其在菲列濱，那裏到一九四一年已募集中國國幣約一百萬元，來發展這個運動。但西北工業合作社聯合會對於它自己的合作社學校、醫院和寡孀孤兒訓練中心，已在捐助巨額的維持費了。倘使別區都聯合起來，大家把他們的資財儲積在一個中央金庫裏，那麼全國規模的有計劃的合作生產將成爲可能，這個組織能在任何部門應付私人工業的競爭了。這樣至少就是工合的忠誠的建立者們和它數千個工作人員的信念。

然而，對於這種抱負，從官僚紳士和工業資本結合而成的政治集團而來的反對，料必增加到現時爲止，政府政策容許基本工業和交通由國家獨占，其他工業由私人資本家控制。在工合獲得舉國公認之前，如我們所已見到的，政府計劃把戰時『工業建設』幾乎完全看作跟工業和資本集中在西南幾個大城市裏的意思是同樣的。把工業分散建立在最寬廣的可能的區域裏，這種意見在政府的經濟學家，得不到幾個贊助的人，而工人做老闆的工業最初被人所嘲笑。到一九四〇年，日方的封鎖使政府許多以輸入外國機器爲基礎的計劃無法發動，同時日機屢次的猛襲，把重慶附近新的工業集中點毀了不少，工合計劃的戰略這才受到了擁護。

所有的新條件都有利於工業合作制度的迅速增大，這個制度倘使得以在平等的條件上作資本和市場的競爭，那麼結果當可供給自由中國製造消費品七八成。但它將有提高工資水準並改善全部工業的工作狀況的傾向，甚至於或者會使政府爲了保持國家工業中的熟練勞動起見，不得不增加工資，並採行雇員分紅制。所以政府將來或則根本修正其工業化意見，或則把合作事業排除於重工業之外。後一步驟可能是致命的，因爲合作社非自己擁有基本的和服務的工業，就不能穩固。

倘使美國會通過中國政府，放一筆巨額借款給工合協會，那麼對於中國合作工業化的反對可完全消滅，工合的生存可獲保證。許多在遠東的美國人現在都相信，要防止日本以中國工錢低廉的貨物蕩捲世界市場，壓低我們自己的工資和生活程度，並使戰爭陷於危殆，最好的方法，就是支持合作生產，爲中國抗戰後盾。他們的立論是：老闖兼做工人不會剝削自己，這種工業會提高東方的工資標準和購買力，因此建立美國輸出品尤其是現代工具、機器和運貨車的未來市場。

在另一方面，倘使美國和英國竟然把真正巨額的未曾特別指定用途的借款放給中國政府來購買機器和供應品，那麼工合之將被迅速肅清，正如這種借款支用時將發生中國官員的揩油、居奇壟斷和投機，是同樣可能的。抗戰以來，中國人民雖遭劇烈的經濟衰敗，官員中却有一些已經倍增了家產。（註）或改善了境遇。倘使我在這裏不欲說得更詳細些，這不是因爲缺乏證據，而是因爲——老實說——難以說得詳細而並不無緣

（註）一件驚人的事情：沒有證據證明自蔣委員長以下，任何高級官員，除了區區不足道的自薪水所扣者外，尙繳納個人所得稅。

無故損傷一個從全體看來總是極值得世界援助的運動。

然而，倘使美國和英國在中國人民建立必要的民主制裁以前，不負責任地把巨額借款供給現在的官僚政治自由使用和操縱，那麼一個結果可能不僅是在經濟方面像工合這樣有希望的發展的有效的窒息，而且是在政治進步方面的顯著的倒退。怎樣一個奇妙的矛盾之論啊！中國雖然極需要外國的援助，但得不到援助反而幫着造成那些條件，它們因為迫着政府非尋求人民更密切的合作不可，使人總算可以認為民主在中國是一種可能。

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幾百個美國人，內中約有七十個菲列濱工程師，簽了一個請求書給羅斯福總統，要求美國以後借給中國的錢應指定作為通過工業合作社的擴張而發展國內生產之用。該請求書提議：代替了只把錢或信用轉給中國的銀行，或者把數百萬元注進淪陷區救濟機關的碗中，去養日本人從中補充其工廠奴隸的難民，華盛頓應該把借款借給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購買工具、機器、運貨車和其他必需品，而幫着在中國建立生產性的救濟。

關於工業合作社這題目，我還沒有寫完。稍後一些，我們將見到它們怎樣擴展到遊擊區裏，以及它們在全民抗戰的戰略中盡着怎樣極重大的一種任務。

第六章 回到西北

一 中國的激流

『不變』的中國正在爭取戰爭的勝利，因為他們終於變了，而且是朝着進步的方向。

——奧文·拉脫摩爾 (Owen Lattimore)

和平主義者儘管竭力否認，歷史却證明着確有『進步』的戰爭和『反動』的戰爭，證明着戰爭的物質損失，跟所做到的社會進步比起來，有時是相對微小的。一般說來，在進步的戰爭中，舊秩序被一種更適宜於新條件的社會模型所代替，而在反動的戰爭中，舊有的傳統只是又一次戰勝了新的，或是在無謂而徒然的對立中，跟它本身同一水準的另一種傳統或社會交戰罷了。

在中國，共產黨宣言抗日，因為他們說這是一種進步的戰爭，是民族和民主的革命的延長，他們聲言這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個階段，他們會始終爲此而奮鬥。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在保安對我說：『如果中國打敗日本，那就表示中國人民大眾已經覺醒、動員，而且達到他們的獨立了。因此，帝國主義主要問題也就解決了。』

不管世界接受他們的邏輯與否，現在大部份人都同意（至少在理論上）中國目標是進步的，值得支持

的。甚至中國傳教士中純粹的和平主義者，也都在盡他們的力，幫助『爭取勝利』。他們相信那目標和鬥爭是很有價值的。這裏我想暫時撇開政治經濟的廣泛範圍不談，看看是否還有其他變動的徵象。

雖然沒有發生革命，但戰爭對人民的社會文化生活却已做了許多『革命』的工作，這也許是革命的前提。就邊區政府的情形說，這些都是舊日蘇維埃時代開始的變動的繼續，常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哲學所指引的變革的一部份。除了摹倣共產黨的戰略和遊擊隊訓練組織的技術之外，政府當然很少有意地努力襲用共產黨的方法。但戰爭本身却重複了那紅軍方法所產生的許多條件，而人民的反響有時也造成相等的結果。久居中國的人誰都明白，整個的中國人很少達到一致，說他們矛盾也未必盡然。絕對性是不存在的；最後一句話往往是兩極端的調和，誰都不堅持。全部中國人構成了一種模型，但却並無定形，不能用言辭來準確限定何種形式。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變動得這麼快，也沒有一個國家比它更密切地與過去相連繫。下面將隨意談到的『新』現象，大部份是很久以前就在中國社會中開始了，在國民革命時期中粗具了形式，現在又一次更顯著地表現了出來。

舉一個例，這次戰爭也許比以前任何災難更深刻地動搖了中國的家族制度。自然，這種制度並非中國獨有的，而只是亞洲殘存的許多封建和半封建社會的特徵。它在印度依然強盛，在日本，除了特殊的不同點外，也許比中國更有力。全體性戰爭把嚴重而複雜的問題課給每個中國人，家族主義有限的手段再也不能單獨應付了。羣衆在空前的災難之前需要安全，結果便造成了社會結合和互相依賴的新形式，以及順從廣泛集團權力的更大願望。

幾百萬的人民離開了他們的親戚和父母，有的由於軍隊的徵募，有的在混亂中死裏逃生，但千萬的人却是自願別離家庭去爲國効勞的。假如中國的蓋洛普（註）向今天的中國青年提出一個「你的第一義務是什麼？」的問題，那答案大概可說是革命的。多數的人將回答：「爲中國」而不是「爲我的家庭。」

孔子所說的「無違」意思只是說一個人的最大義務，對父母應該「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日本內閣書記長風見章曾告訴日本政府說：「你必須帶去統治中國的一切，便是論語。」然而二千五百年來孔子在中國文化上的統治，已被多方面推翻着。孝已不再是向來認爲光榮的事情了。

兒童們對於從敵人戰壕裏拯救一面中國國旗的孩子，比之對於一個臥在冰上誘捉鯉魚去奉獻母親的孩子，常感到更大的興味。我個人知道有幾十個青年完全拋棄了他們的家庭去從事「救國」的工作。我又知道有許多家庭拆散了，因爲兒子們不願留在佔領區後面侍奉他們的雙親。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王克敏的女兒，她痛斥她的父親爲叛逆，逃到自由中國反對他。成千的青年在戰場上犧牲他們純潔的生命，犯了孟子所謂「無後」的最大不孝的罪惡。陳立夫這樣努力於復興孔教，他是否可以這樣教導他的學生，說傳後比爲中國犧牲更重要呢？一個沒有爲後一代犧牲的決心的生命，究竟還有什麼價值呢？

如果不破壞孝的義務，中國壓根兒不會有軍隊，更自然決不會有革命。也許儘有許多社會革命家遵守着一切孝道，但就我所知道的，我却從未碰見一個戰場上的戰士，而不否認對家庭的傳統義務的。因此，我可以斷言，這種行動在中國人一生中實是一個決定的步驟，這是他在接受新社會的理想之前，心理上必需的準備。除

非這麼做，誰都不能擔保他在危急關頭不會爲了增加家庭的幸福而脫逃，或竊盜，或變爲叛逆者或反動。正統的孝道是封建制度的支柱。它跟社會革命是不能調和的。

自然，稍有常識的人，誰都不會想着孔子從來不是中國的民族英雄，而不應受他一定歷史地位的尊崇；正如人們認識要把中國文字改造爲現代的語言，有實行拼音文字或拉丁化的必要，而決不就認爲這種改革，將根本抹煞了中國象形文字在考古學上的永久價值。

孫中山夫人曾經寫道：『在我們的歷史記錄中，孔子將佔着許多重要的幾章，因爲他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功績。』但『我們現社會的機構正劇烈地變動着，要解決大變動所引起的許多問題是困難的。孔教不能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它已喪失了所有實際的價值。……孔子的教條是徹頭徹尾封建主義的和專制的。我們必須認識孔子的影響是怎樣深刻地滲入於我們的藝術、文學、社會科學和道德。我們必須以最大的努力，從我們的生活和思想中把孔子的觀念徹底肅清。』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即宗教或至少是偶像崇拜，似乎已到了迅劇衰落的時期。基督教被公認爲一種有用的制度，因爲它的領袖們能從社會和戰地服務中來實行他們的信仰。但人民却很少相信神明保佑的禱告和祈求。中國佛教的社會影響在戰前本已衰落，現在是實際上等於零了。成百的佛教和道教的寺廟在戰爭中毀滅，受凌辱的菩薩的無靈，也許更加深了中國傳統的對於天上威權的懷疑。

在僻遠的內地，我看到一座古廟改作了印刷所，印刷工人統統是無神論者。在中國，到處是菩薩被拋棄在雨中，廟宇改作了醫院和堡壘，很少引起人們的抗議。我曾看見許多彩彫的塑像裝上了紡織機，工人喜悅地在

它們的臉上擦洋火。我看到農民的孩子們，惡作劇地給它們裝上了希特勒式的鬍子，並且在它們泥塑的褪色的大腿上，塗着『打倒日本』的口號，這些孩子在幾年以前看到這種塑像是要發抖的。工業合作社恢復了許多當地的手工業，但曾在所有鄉村最爲發達的錫箔業和香燭業，却並不在內。

各種偏見正在消除着。東部諸省的人民成千的湧入西部小鄉鎮。在川陝的酒館中，你常可以聽到同時說着半打以上的方言。成百的醫生、工程師、護士、兵士和學生都流遷到異鄉工作，他們都不能說當地的方言。海外的工程師都回到各地工作，在以前，偏見和『風水』的迷信是排斥他們的。

上海婦女訓練雲南人和甘肅人從事紡織。東北的流亡者替河南軍隊製造綁腿和制服，廣東醫生替言語不通的兵士療治創傷。在山東，麥食的農民由米食的湖南人組織着。上海來的殘廢兵士跟湖南的寡婦結婚。這樣多的省份和方言混和着，邊陲森林地帶的土人，從未見過中國的地圖，驚異地發現了他們土地的廣大和多樣性，並且每天準備接受一樁新奇的事物。

許多中產階級的家庭，幾乎喪失了他們所有的一切，有的現在是完全普羅化了。許多地方貧乏的物質條件使學者、商人、兵士和工人處於同等的境遇，成爲同等收入的一羣。中產階級人們學習了一些窮人的哲學。保守主義和階級歧視的經濟基礎多少是破壞了，而代替以一種戰爭，不幸和希望的同情。在重慶，有些人力車夫得到比商人更多的收入，而石匠的工資也比有些官吏高。在整個的自由中國，技術工藝的重要性有着從來未有的貨幣價值乃至權威。到處的着重建設，促起了對雙手有訓練的人們的注意。學者和政治家所全部靠賴的，便是這些工人——石匠、木匠、鐵匠、機械師，他們真正創造了自由中國，——除了他們之外，似乎都是無用的人。

只會說話不會做事情。就我看來，在這些有着有用的雙手的人們中間，正日益產生一種力的自覺。

侵略所造成的物質損失的數量，是鉅大而不可勝計的。然而你聽到人們說，這對於再建是一個大幫助。除了生命和生產手段的損失之外，有些城市的破壞，並非完全是悲劇。公路、工廠、學校、醫院以及其他的公共處所，在各地建立起來，如果沒有破壞，也許幾十年內不會做到。這些改革常成爲新的活動的焦點，這確乎使整個社會生活起了革命。生產形式改變的社會影響，進步人口的薈集於落後的西部，以及西部的成爲政府主要的戰爭根據地，在這裏說起來顯然是太複雜了。

當然，自力更生和自信的精神日益成長着，他們認識中國必能擺脫日本有力的戰爭機構，忍受英美銑鐵對日的源源接濟，並且以人家極少的援助，使敵人陷於嚴重的失敗。空虛和自負多半已在中國消滅。一種深刻的自信代替了它們，因爲中國眼見着那曾經認爲比柔和的中國人要堅強得多的歐洲民族，都一個又一個的在侵略前面倒了下去。

中國不會產生比歐洲第五縱隊更壞的叛逆，不會鑄成比協約國盲動更浪費的領導上的錯誤，也不會犯過甚於張伯倫主義的錯誤估計的外交罪惡。失敗主義現在似乎多半限於官僚主義者以及懷念沿海安樂窩的富有人們。這是民族成員的一種新驕傲。特別在軍隊中，你可以看到一個達觀民族的各種基本美德的綜合。每一個兵士，在不可避免的災難之前，都表現了可驚的堅忍、持久、愉快、沉毅的勇敢，以及對於苦難的毫不介意。這種穿得不好、喫得不好以及配備不好的戰士，究竟出於怎樣的精神鼓舞，而能視死如歸呢？誰知道！對於上帝或宗教神話的信仰，似乎很少作用。日本人帶了佛教符籙和千人針護胸去打仗，以爲這樣砲彈就打不進

了，並且知道他將上昇天國而再生爲崇高的上帝。基督教徒可以爲救世和來世的信仰而犧牲。回教徒自信地向前望着未來的先哲的樂園。但中國的兵士却不帶護身符，不說禱告，便連懺悔也沒有一句的死了。孔子不會拿天堂答應他，在他懷疑的心靈的深處，他很少有專一的信仰。他愛中國，但他也愛生命。究竟是什麼秘密的鼓舞，使他願意犧牲自我呢？

每個人都要求普及的教育，因了戰爭緣故，識字運動已有很大的進步。在軍隊中，識字的人可以成爲良好的士兵；未受教育的人是不能教他施用現代兵器的。宣傳在文盲的羣衆中是浪費的；如果人民不懂得希望他們做的是什麼，他們就不能完成它。成年教育已在許多鄉村中施行，義務教育也用各種臨時的方法推進着。除了羣衆教育廣泛而普遍的要求之外，更造成了一種智識活動和自由發問的空氣，這原是屬於民主社會的黎明期的，但在一個政治壓迫還在普遍實施的國家中，這却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奇蹟。然而這裏常有着一種爲真理的眞正熱心和「把握」的能力，這顯然是根據了眞理屬於中國一邊的普遍的信心。

許多舊的態度改變了，對於有用智識的輸入，也很少反對了。據傳在這次戰事中間，有一位國立藥科大學校長，因爲拒絕拿某官吏的蛙皮方劑替代西藥而被撤了職，但在人民大眾中間，現代藥物和科學却已獲得了普遍的接受。每一個醫院可以治療十倍的病人，如果它有人手和設備的話。「科學」現在已成了普通士兵中間常常聽到的一個名詞。成千的農民看見飛機從頭上飛過，並且拋下死亡來，因而認識了一種命運正在孔子所從不知道的世界中擺佈着。如果有人對他們講，他們便好奇地熱切地傾聽着說明，他們又常切望他們兒子去學習科學的解答，猶如以前希望他們中翰林一樣。

政治上，儘管很少民主，但在蓬勃的討論中，却表現了可驚程度的民主。照理，一個人在朋友中間可以自由發表他真正的意見。茶室中到處是政治談話和批評。沒有一個人的名字是神聖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現在已成了一句過時的孔子格言。政治是每一個人的事業，談話中的批評到處普遍。如果貪污發覺了，再也不能因為是孝子而遭寬恕。他們也許仍能逃避極刑，但廣大的輿論却一定要置他們於死。

日本在佔領區的政策恰和這種傾向成了顯著的對照。風見章的忠告已被採納。日本正拿論語來統治中國。

日本認為孔教對於控制她的征服品極有用處，關於這個事實，無法在這裏作更深刻的分析。中國統治階級的智識份子往往對侵略者的這種意識形態具有同感，這明示着他們不能代表『新型的社會』。這是重慶戰時領導階級弱點的一個關鍵，也是中國學者階級和布爾喬亞中殘存的封建主義的一個說明。幸而，上層儘管對下百計提倡正統的孔教，但自由中國基本羣衆的趨勢却似乎走着相反的方向，戰爭給予革命的中國人的進步諾言，便在這裏。

國民黨的政策和自由中國的真實情形固然跟日本的統治方式很多不同，但在那共產黨未被排斥的區域中，日本最嚴厲的反共論點，似乎也被採取着。共產黨是徹底的反孔教者，這一事實，跟他們坦白的提倡社會主義，也許同樣的引起了保守布爾喬亞學者的反對。反共的文化人攻訐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異國』的學說，但我却往往猜想，它的所以被痛恨，主要是因為在它對中國傳統的不敬態度的後面，儒家的孔教徒的靈魂還聽到了那曾經譏笑了他們兩千年的老子的笑聲。

孔子是至善論者，是傳統思想的世界主要潮流的砥柱。中國道教哲學創始者老子，則是威廉·傑姆斯（William James）所謂『意志堅強』的哲學家之一——自然主義的、現實主義的而且是唯物主義的。道教不信什麼與人同形的上帝，認為思想與事物在『道』的無所不包的原則中是等同的，即一切事物的全體性與自發性。它嘲笑孝道：塵埃即塵埃，一切祖先在『道』之中都是平等的。它的無為的精神，嫌惡優劣之間的『禮儀三百條與行爲法則三千條』在『道』之中，農民跟王公一樣的善良。老子和莊子不相信固定的道德和制度，但都跟黑格爾一樣，承認一切事物不可避免的變動性。孔子在一個『衰微』的國家中是不適宜的；老子可十分慣常。不過，共產黨在戰鬥的傳統上雖然可以暫時得到道教哲學的支持，但當他們樹立了他們新道德的傳統和制度時，老子就要笑他們了。

無論如何，老子和莊子都是有力的民主主義者，他們相信『一切事物的平等』，包括性別在內。在這一點上，比孔子更能與戰時中國的社會變動相協調。孔子教人是一切事物都不平等的，尤其是性別方面。他承認『婦女是人類，但比男子低一級。女子不能讓她有任何的自己意志，這是自然的法則。』但在今天變動的社會中，如衆所知，中國婦女却要求着並且已逐漸取得新的平等待遇。她們的解放，也許是這次戰爭的真正社會收穫之一。中國婦女今天擔任着男子做的一切工作，從領導遊擊隊到管理工廠和學校。除非是民族的失敗，什麼力量都不能剝奪她們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所獲得的發言權了。

一九一一年前清時代柔弱的、三寸金蓮的、連正眼都不敢瞧人的婦女，誰想得到有一個蔣介石夫人，會穿着皮靴，奔走於醫院血腥的臭氣中，去慰勞英勇的『苦力』呢？蔣夫人的努力和多方面的才幹，只不過是幾千

婦女中的一個例子，她們的品性和人格已在戰爭的鍛鍊下成熟了。有多少被迫肩起家庭負擔的農村婦女，發現了應付的力量；有多少膽怯的男子，受了婦女界勇敢和義憤的激勵，而不得不去行動？

自然，『婦女動員』仍是不夠。無數百萬女子受不到任何的訓練，這猶如在我上面所說的各種社會變動的趨勢中，無數百萬人仍屬除外一樣。在有許多區域中，戰爭只造成了死亡、疾病和倒退，一切舊日的罪惡，依然像以前一樣在廣大地域中猖狂。然而，在許多別的地方，在落後而遼遠的你所料想不到的鄉鎮中，戰爭却促進了思想的感染和變動，無異經過一次革命的鬥爭。

舉例說，幾年以前，誰夢想得到在那社會停滯了二千年的荒瘠的陝西黃土巖中，今天會有一個偉大的大學，訓練着千百的女孩子去當護士、教師、新聞記者和自由的戰士？在這些年青的女壯士中間，而不是在那爲了讀書還要鞭撻他們妻子的農民中間，中國看到了從目前苦難中生長出來的未來希望。

二 邊區政府

如果沒有共產黨，沒有八路軍，以至沒有邊區政府，中國就要陷於混亂了。

——毛澤東

我從寶雞東行九十哩，通過中國僅存的鐵路之一——隴海線，到陝西的首府西安去。黃河對面的日本飛機場離此只有半小時路程，因此兩年以來，西安城會屢次被炸。一大塊地方燒掉了。著名的迎賓館的餐室和一排側屋破壞很重，但我却異常幸運，得到了一個裝着彈簧臥床的房間，牆上只有幾個洞。我立刻去睡，毫不聽到

什麼，直到破曉警報纔響起來。你在那裏只能逗留十分鐘，連喘息的功夫也沒有，當我們到得城牆下面的防空壕時，一隊中國人所慣稱的『鷄羣』正好佈滿了天空。

一九三六年，我在這西安迎賓館第一次碰到中國紅軍，他們護送我通過反共軍的防線，到當時的蘇維埃區去。在我回來的一個月後，蔣委員長全部隨員也就在這裏被張學良所囚禁，當時張以『軍事上的劫持』來說服蔣委員長發動對日抗戰。後來我的妻子獨自逃過西安的警察網到蘇區去旅行，一九三七年，我又來跟她會面，並且護送她通過戰區到沿海一帶。我自己對於這個城市並無特殊的愛好，但我却不能不經過這裏到延安去。

西安是一個國民黨轄治下的反共堡壘，跟日本統治下的各地幾乎沒有分別，但八路軍在這裏仍設有一個聯絡站，經常載運旅客和接濟品的車輛，可以從這裏開赴遊擊隊的前線。因此，它又是到『邊區』去的一種跳板。

自從我最近一次訪問西北以後，延安已成了一連串這種神奇的遊擊區的根據地，而每一遊擊區，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自治權。他們的領土幾乎全在日軍的後方。人們必須記住，華北的大部份名義上儘管已於一九三七年爲日本所征服，但却仍在中國軍隊的直接控制之下。邊區填補了日本防區之間的空隙，在那裏，表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衆動員的最大努力的景象。主持動員工作的政府雖然大部從共產黨方面取得，他們的領導，但它們並非就是（當然也不能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它們是根據三民主義激進民主的原則而成立的一種戰時制度。

這種獨一無二的制度，是從華北地方的政治特殊性和戰爭所造成的條件中合理地發展起來的。這裏，我們必須約略回顧一下一九三七年七月以前的情形。西安事變的解決，讓共產黨和紅軍控制了一個約等於英格蘭大小的區域。它包括了陝北，從西安北面幾哩外的三原到長城，西面伸展到甘肅平原的邊緣，擁有甘肅省的幾縣和寧夏省的一二縣。在這區域中的蘇維埃共和國解散之後，共產黨的政策宣言改變，一個特殊的行政組織成立了，叫做陝甘寧邊區政府。它宣稱是一個建立於聯合陣線基礎之上的民主政權，實際上確曾把官吏選舉權不分階級地普及於人民——這在中國是破題兒第一遭。當一九三七年九月紅軍以八路軍（現爲第十八集團軍）名義編入國民革命軍並被指定在山西作戰時，這種邊區政權已暫時獲得蔣委員長的認可了。

延安成了新的臨時政府的首府，像它在以前蘇維埃共和國時代一樣。它是八路軍的後方大本營，也依然是共產黨的政治中心。隨着共產黨軍隊向日後東北部的進展，延安的勢力也擴充到更廣大的區域。今天，它已成了一種遊擊隊的大本營，指揮着從陝西東到黃海，從冀豫的黃河北達滿蒙的抗日活動。

遊擊區域中的所有邊區政權，控制了約等於戰前德國兩倍的總面積。它們多少跟陝甘寧邊區的模型有分別，每一個政權在政治形式上是不同的。它們都效忠中央政府，它們的武裝力量也在蔣委員長的最高指揮下。但它們在政治上對延安比對重慶更密切，就是動員的方法，也是多半沿襲着從前的蘇維埃，而很少採取國民黨區域中地主、士紳和黨政統治的方式。它們並不像後者一樣的在軍隊、公共機關和總動員工作中竭力排斥共產黨，邊區政府是建立於聯合陣線的基礎之上的，它們並不擯拒任何抗日的政黨，而允許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可以一樣的擔任官職和參加政權的活動。

山西的意思就是「山之西」，因毗連山東省或「山之東」得名，而山東又與海相接。山西位於那從陝西流入的黃河沿岸，在陝西，舊日的蘇維埃有着它們的根據地。現在，山西相對的「自由主義」以及它抵抗的堅韌性全是一貫奇妙的環境所造成。三十年來，山西省一直是老軍閥閻錫山將軍的轄境，他的勢力一度會遍及華北。有一時期，人們都說山西是「模範省」，但進步的觀念改變，最近幾年來，更常聽到有人叫做「落後的省份」。閻維持着他區域的自治和他自己的軍隊，印行他自己的鈔票，頒佈他自己的法律，而很少順從南京的中央當局。後者會盡力干涉他的自治，而當一九三五年時，閻不得不籲請中央軍來擊退當時的紅軍，因為紅軍慘重地打敗了他的山西軍。

不少的人會預言閻錫山將出賣給日本；但轉瞬之間這些常常譏笑閻錫山的「愛國者」有許多都已變成傀儡，而那位老軍閥，却依然爲了他神聖的山河戰鬥着。不錯，他的行政組織是腐敗的，封建的和無能的；但閻錫山不是叛國者。一九三五年，他似乎認識有些事情犯了嚴重的錯誤，開始設法補救，他把有些進步的青年吸收到他的政權中，並且努力聯合和組織他的人民。在一九三六年，他甚至庇護有幾個主張「聯合陣線」的人，那時候，這個名詞在南京是足夠把你送進監牢去的。他的想法有許多很像河北省的主席宋哲元。他認爲要抵抗南京和日本的兩面壓力，必須取得人民的支持，而他自己則在兩大勢力中間，盡可能長久地維持着平衡。

當日本最後侵入華北時，閻錫山不得不下了決心，他也像宋哲元一樣的做去，沒有多大的成功，但却鼓足勇氣，効忠於中國。日軍輕易地衝退了他的配備簡陋，訓練和領導都不夠的山西軍隊，他的半封建的行政機構迅速地崩潰了，許多官員都隨軍逃走。在一個月裏面，那「華北的戰略鑰匙」的山西，有一半以上被佔領了。閻

不知道怎樣指揮流動的戰鬥，那無組織的人民也沒有一個能够領導遊擊抗戰的地方政府。地方官吏從不爭取人民的合作，他們在軍事上既無訓練，在政治上也沒有修養。

老閻錫山無法拯救他所愛的山西，他只能聽取那打入他的內層的年青激進份子的意見了，他們時常勸他改組行政機構和動員民衆，現在，他們忠告閻錫山，跟那蔣委員長命令他們來助他保衛山西的共產黨軍隊維持友誼的聯絡——學習他們的戰術和組織方法，並採用那些方法努力準備人民的長期抵抗。閻錫山確是這樣做了，結果山西便成爲中國國防系統最强的堡壘。

因此，八路軍開入山西，受到閻錫山的歡迎，並在他的指揮之下，因爲他是第二戰區——包括山西、察哈爾和綏遠諸省——的最高長官。山西的北部，原已落入日本人手中，當共產黨軍隊北開時，他們恰遇到大隊省軍向黃河潰退。得了閻的允許後，紅軍就沿着他們經過的路線，立刻開始訓練和組織民衆，以支持軍隊和增強士氣。分遣的政治工作者集合並改組了一部份山西的軍隊，以適應流動的戰鬥，舉債的司令官則創辦學校，以訓練山西新軍的領袖，一切這些，都是在日本的攻勢中進行的！八路軍循着日本側翼防線的外面移動，它的主力漸漸地回到晉北和河北的今天所佔的地位。

大隊的中國軍隊因了有組織的人民的支持，可以在日軍的後方存在；廣大的中國土地，仍在他們的管制之下，而雙方誰也不能消滅誰；這些事實，對於閻錫山，猶之對於許多舊式的軍閥一樣，是一種新發現。這一切，當然便是卡爾遜（Evans Carlson）所稱的『正統戰爭』最特殊的特徵。就地形說，這種現象在華北是可能的，因爲那裏有極好的天然屏障，如廣大的河流，叢深的森林，和不能通過的山岳地帶；在它們後面，大軍可以相

對安全地避免突然的進攻。因為這些屏障常是依各省的邊境而成的，控制邊境最爲重要，因爲非把一切『邊區』平定，征服可說是不能完成的。

在區劃北方的一個最衝要的『聯結點』，山西與察哈爾、河北在太行山的亂峯中間相接，第二邊區政府就位置在這裏，那領土是由八路軍克復的。他們一到達山西的東北部，這些志願的遊擊軍就把那各縣城執行日軍命令的地方傀儡政權解散了大部份。事實上，他們現在只能存在於日本重兵的直接保護下，但日本缺乏充份的兵力來佔領最重要城鎮以外的地方，因此他們只能派遣周期的剿伐軍，突擊和攻掠一下鄉村，以維持他們對內地的『控制』。

山西的政治工作者到處教人民怎樣形成他們自己的政治和軍事組織，並鼓勵他們選舉自己的鄉村和縣政府，以代替那傀儡政權。一九三八年一月，經了一次蔣委員長特許的五台山代表會議以後，晉冀察邊區政府宣告成立，於是一切都統一了。這邊區政府主要是在共產黨軍隊和他們所武裝所訓練的自衛隊的保衛下，但也包括當地國民黨的代表，以及代表現在遊擊區中數百萬人民的各種人民團體。它的權力範圍自然依照軍事形勢而不同。一九四〇年七月，這政府直接控制了山西東北部、河北中部和察哈爾南部的七十縣，面積約等於義大利大小。

晉冀察邊區政府曾在太行山中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八路軍派遣了精銳部隊通過日軍防線向東深入魯北。在這裏，從日軍手中克復了許多個縣，並且建立了第三邊區。還有，另外幾個部隊穿過平津間的日軍防線，進入冀東，即日本在長城以南第一次建立傀儡政府的地方。後來他們深入內蒙東端山岳地帶的熱河，那是一九

三三年由日軍併入「滿洲國」的。他們又進入陝寧北面長城一帶的綏遠。

魯北方面組織完備的邊區政權，跟晉冀察政府維持着有機的聯繫，事實上，遊擊隊的陸上交通，一直從直隸灣的天津近郊伸展到延安。在熱河和冀東，遊擊隊還只有一些原始的軍事根據地，不能在何點上支持一個穩定的政權。但無論如何，他們却通過羣衆組織完成了某種程度的行政的控制，這些羣衆組織，形成了內地一切抗日活動的人力根據地。

軍事上最重要的是另一個包括晉南豫北和河北西南大部的邊區。它的面積也許要比紐約州大兩倍，擁有晉冀察政權下的同樣的人口——約一千二百萬。晉豫冀邊區在中國歷史上以「上黨」著稱，戰略上異常重要，中國古時有句話，「擁有上黨者即擁有天下。」（譯意，原文找不到——譯者）「天下」便是大西北；這在今天仍是正確的。上黨控制着到渭漢流域最便利的通路。所以，除非把中國軍隊完全掃蕩，日本就無法在黃河以西實行大規模的侵入。

在現代，比戰略利益更重要的是上黨區未開發的豐富的煤鐵資源——幾十萬萬噸，這種資源的誘惑也是日本侵入最初的原因之一。在抵抗沒有完全摧毀之前，日本不能利用這種資源取利。他們雖一再發動剿滅上黨區遊擊根據地的軍事進攻，但是經了三年的努力，這區域中的中國軍隊反而比日軍初來時還多了。日本控制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線，但廣大的陸地却爲山上堡壘中的中國二十五萬以上大軍所統治，那是任何邊區所誇豪的最強大的力量。

上黨區的保衛者是混合組成的，主要包括了以前會爲死敵的兩支軍隊。當我最後一次訪問西北時，那內

戰中以剿共著名的衛立煌將軍，指揮着十萬中央軍，以豫北和晉西南爲根據地。他最接近的鄰軍和晉東南的共同保衛者是八路軍的三師，在可敬的朱德和著名遊擊軍司令彭德懷的領導之下，當內戰時，我曾跟隨彭的舊有第一方面紅軍在寧夏旅行過。此外還有五萬當地志願兵組成的山西新軍，他們在訓練上會得八路軍很大的幫助，並有閻錫山的支持。在晉省西南，則是閻自己原有軍隊改編的殘餘，約爲六萬人。

上黨區不像晉冀察和陝甘寧邊區政府樣的統一於單一的指揮，它包括了九個不同的行政區，每一個反映當地駐軍的性質。在八路軍活動的地方，鄉村動員的方式很像別的邊區，山西新軍駐防的區域也是同樣情形。在中央軍以及改編的山西舊軍控制下的區域，那政權比較近於國民黨的舊方式，因爲它們在自由中國裏面仍有根據地，較少倚賴民衆的支持。不過，即使在後者情形下，許多人民團體也蓬勃地發揚着，而這在別的地方是禁止的；此外，在軍隊和人民之間，在不同的軍隊和不同的政治理想之間，都有着很好的合作精神。

一般說來，邊區政權現在給農民樹立了他們從不知道的最有能力和最民主的行政機構，人民和官吏之間的鴻溝，大部份堵塞了。以後我將更詳細的說明一個進步的邊區政府怎樣活動，以及老少男女的人民怎樣動員起來，把每一份量貢獻於社會的幸福。

日後的鬥爭並不僅是侵入者與防衛者的鬥爭，同時也包括了中國內部黨派、階級、軍事、政治以及社會利益和理想的衝突。一切發生的事情在西方人看來常認爲是演進而不是革命，也許要懂得它充份的意義，至少必須瞭解中國的歷史，我可不知道西洋人究在怎樣做。那一幕幕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偉大，只有用史詩的形式纔能希望把它們重現出來。勇敢的男女們今天所做的一切，將是幾千年後野史和傳奇的資料，但也許只有

中國人纔能瞭解和記得他們的英雄和勇士，纔能珍貴他們的主張和真理，正如只有中國人纔能在三國演義這部奇書的複雜敘述中認識它崇高的地位一樣，現在這一時期跟三國有許多相像的地方。

然而我要離開本題了。這一切只能算是我再度訪問延安記錄的一個前言。我前面曾經聲明我的見聞有限，但如果讀者仍願跟着我到地球上最奇特的『首都』那末，我們還可能知道一些關於歷史上一個最英勇的鬥爭的幕後人物和理想的有價值的事情。

三 雨中之旅

到延安的路是中國青年的生路。——魯迅

戰事開始以後，我走到一處地方，那怕是最料不到的地方，總有那脅下挾着一本西行漫記的青年，問我怎樣去進延安的學校。在有一城市中，教育局長像一個謀叛者似的到我那裏來，要我『介紹』他的兒子，讓他去進延安的軍政大學。在香港，一個發達的銀行家也使我吃驚地作了同樣的請求。我看到他兒子舒適的環境，說道：『那你兒子就必須睡在泥坑上，處置他自己的食物和洗滌他自己的衣服了。』

『我知道這些』他答道：『不過，他如果再在這裏逗留下去，他遲早將不得不替日本人去洗滌了！』也許他比他的沿海一帶的同業們，對於將來有着更明白的見解。

假使我在上海或漢口或重慶設立一個招募站，我可以募集好幾個大隊；這也許是對中國最好的貢獻。可

惜我未受招募的委託，而我跟延安的『內部關係』也沒有超過因戰時飲食而在我腎臟留下的傷疤。我對這些未來的獨身遊擊戰士不能幫很多的忙。據我所知道，『溜入』陝北最簡易的途徑是步行。成千的青年們都是步行的——從幾百哩的距離外。當我回到西安時，他們還從中國各地源源而來；現在，胡宗南將軍率領大軍控制着到前蘇區去的大部份通路，就他的眼中看來，青年男女如果加入八路軍或到延安學習，就等於犯了叛國的罪。

這位安徽的小將軍是蔣介石的黃埔軍官中最能幹而最有力的一個，自從委員長在廣州訓練他以來，確乎一直是蔣的寵兒。他統率着第一集團軍，那是所有中央軍配備最好、訓練最好的精銳——也就是蔣介石個人的驕傲和快樂。戰爭爆發以來，它實際上不曾打過仗，它駐防在西北，顯然是爲了隔絕紅軍勢力的蔓延，同時也作爲新的力量發展的教導團。可笑得很，俄國方面來的軍火，大部份都撥歸胡的部隊——如果大規模的內戰再起，它將形成反共運動的骨幹。

胡宗南是一個辦事能幹和富有吸引力的人物，他是復興社的領袖，這復興社是蔣委員長剿共時期中秘密組成的。復興社主要包括了黃埔和南京的軍官，採取着納粹的方法，無疑還受着德國顧問的鼓勵，有一時期，它公然以『蓋世太保』（德國的秘密警察）作模範。在一九三七年，這個組織準確地反映了蔣自己的政治理想；直到希特勒離棄蔣委員長的軍隊，即當元首宣稱打敗日本爲『精神上的不可能』之後，（這使中國的智識階級的驕傲，受到怎樣『精神上』的創傷啊！）某些親納粹的傾向纔告消滅。但它仍堅守着如下的原則：消滅赤色份子，服從領袖和擁護獨裁政府。現在，第一個口號主要自然用政治手段執行着。胡宗南自己負責組

織中央軍的特務部和政治憲兵，它們的任務之一便是使青年隔絕馬克思主義的沾染。除了他黃埔的同學陳誠之外，胡宗南在少壯軍官中間也許比任何青年將領有更大的勢力。許多人都認為在蔣委員長繼承者的一輩中，他是陳誠的主要勁敵。

隨着戰爭的進展，眼見許多青年都跑到『匪窟』去，這自然日益困惱了『復興份子』於是他們採取着一切可以阻止的手段。沿路設立了偵察站，特務憲兵攔阻着青年旅客，搜查他們，並常把他們送回胡宗南的感化學校，這在共產黨是稱為『集中營』的。它跟胡宗南的軍政訓練學校相聯繫，軍政學校又多少模倣着延安的學校，事實上也會造就了一些能幹的青年軍官。但延安的傾向者却被稱做『落後的學生』，除非他們聲明對共產主義不再有興趣，他們不能正式入學，或被認為無用之材而遣送回家。

這種奇特的軍隊之間的綁架，甚至包括了穿制服的八路軍人士，他們往往在軍部自己的車輛上被捕——車輛也不時遭沒收。有一天，一個過度熱心反共的憲兵誤拘了一個八路軍的軍官，甚至對他說『共產黨匪徒』無權乘坐公共汽車或貨車。這位穿着普通士兵制服的軍官，原來就是八路軍野戰司令彭德懷。他立刻把這個憲兵扭到天水的中央軍司令部，此後這種行動總算暫時停止了。但當我到西安時，又發生一種新的紛擾，那就是斷絕對八路軍的汽油分配。事實上，當我坐上一輛過度載重的貨車時，我很為自己慶幸，因為這是幾星期來第一部到延安的車子啊。

那巨型的道奇汽車高高堆着行李和接濟品，例外加上了十四個旅客，有三個是女人，我們在往北的塵土飛揚的路上蹣跚着。中午到達三原，我們在八路軍的交通站過夜，半夜裏開始落起雨來，到天明路上已是不能

通行。陝西的雨一開始就落個不停，有時一落便是四十天。這一次落了五天纔停，但等我們可以上路已是一星期了。三原的一星期是可想而知的寂寞之極的情景，但我似乎是唯一怨恨耽擱的人。我的同伴們都安定下來讀着站中圖書館所存貯的政治軍事的書報。時間對於他們在戰時與平時並無不同；在這種態度中，正有着一個瞭解中國的關鍵，西方人如果不經過親身經驗，是不大把握得住的。

我們的耽擱，至少使我熟悉了我的旅伴，每天晚上，我跟他們幾個人，在幽黯的茶油燈下玩着撲克牌和辯論戰爭與革命的大問題。其中有中國工業合作社遊擊隊檢查員孟雲卿（譯音），他是到延安本部去參加會議的。還有共產黨領袖陳昌浩的小脚太太，帶了她的兒子去看他那著名的曾被巨金懸購首級的父親。她在路上表現了絕好的精神。當司機者清除路上難走的障礙，或當我們聽了警報散避時，她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地撐着小脚攀下車來。然而她從不訴苦和表示一生中未有的顛簸的勞頓。年少的陳在精神、行為乃至容貌方面使我頗想起了舊時的一個同學，因此我在三原便給他起個名字叫做『皮耳脫』（Beet），並且教他裝着奇怪的樣子。『皮耳脫』直到最近纔發覺他的父親還活着以及他的父親是誰，因為在內戰幾年中，他的母親是絕對保守秘密的。

有一年青的姑娘，是一個湖南商人的女兒，她會脫離家庭去加入新四軍。在那裏住了一年，現在，穿着一件奪獲的日本大衣，要上延安的女子大學去了。她是一個美麗的孩子，溫和而快樂，但却像皮革一樣的堅韌，她十分能够照顧自己，誇言會在新四軍獲得射擊的獎章。此外還有一個湖南人，從新四軍來的一個年青的官員，當舊日南方蘇維埃時，他曾跟蕭克和項英一同戰鬥，他也穿着一件褐色厚呢的大衣，他稱爲『天皇的禮物。』他

曾把槍彈打過這件大衣的主人，而在那殘破的衣角上，他還驕傲地指出他目標的記錄。

這個短小的湖南人認爲現在比之他當紅軍別動隊時的艱苦生活，實是一個『繁榮的時期。』有一天大家辯論什麼是『痛苦。』一個人說痛苦是『除了小麥外沒有東西吃。』另一個人說最惡劣的食料是蕃薯。許多中國人，特別是南方人，認爲小麥和蕃薯都不宜於人類的營養。第三個人說：『但是草還要惡劣，除非裏面有蚱蜢。』

『沒有草，沒有蚱蜢，只有老鼠——我們曾經有過這麼的一次。』湖南人露着譏笑的牙齒，突然的說。『那末這就算是真正的痛苦吧，』每一個人都同意了。但一種恍惚耽於美食的神情偷偷地在那老戰士的眼角流露出來，他慢慢地搖着頭。『大家別說老鼠不好，』他說。『它們可實在不壞，要是你懂得烹飪方法的話。』你得知道怎樣選擇，剝皮和清洗，怎樣把它餓起來——最好是蜜餞，但當然在荒年時你不會有蜜糖的——還有，怎樣燒和烤。『很香，』他像夢似地作了結論。『如果再放些適當的紅胡椒，味道比童子雞還好哩。非常好——吃！』

唔，如果法國人可以看了烤乾的癩蝦蟆狂喜，英國人可以特別嗜好生牛肉，而美國人喜歡牡蠣液，那末，蜜餞的老鼠也許真有味兒。不過我個人總不能被說服，還是喜歡我的一碗飯。

講到飲食，當我們在三原閒蕩時，孟和我雇了一個廚子帶到延安的外賓審洞去。一天，我們在泥濘的大街上走，想找尋一家麵包店，路上我問一個挈籃的小販買一些栗子。『你從那一國來的？』他問我。我告訴他我是美國人，他說他曾經在西安府附近替一個英國人燒菜。孟感到了興味，便問他是否願意到延安去當一個外國式廚子。

在我們車上的貨物中間，裝有全套燒西菜必需的用具——坩鍋、盤和湯杓等——以及盆子、刀、叉和羹匙。負責採辦的職員在西安買到了這些東西，於是又去找尋廚子。他無法找到一個願意接受八十元以下月薪的人。最後他明白所有西式廚子的薪水向來被帝國主義者抬高了，如果因了雇一個薪水比毛澤東還大好幾倍的廚子而造成延安的特殊階級，那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他決定把用具帶去，不再找廚子了，心想到延安時再召集會議來討論這件事。

孟對這個賣栗子的小販反覆盤問了許多關於西菜的問題，以證明他不致說謊。然後說明他的工作是替偶來的外賓燒菜，給訪問的將領和其他要人製辦筵席。在孟描述延安生活的動人並且說他還能在那裏受教育之後，那小販就同意了十五元一月的工資。第二天晚上，廚子陪了他的老母同來，很明白，他們對此事已起了疑心，以為是軍隊綁架那兒子的陰謀；幾個月來，他似乎一直逃避着兵役。兵士們向這老嫗說明八路軍跟別的軍隊的不同，以及他們不要徵兵而只要志願兵的理由，我足足聽了半夜。最後，她似乎滿意了，第二天早晨我們離開三原時，廚子也上了車，其他旅客都馬上跑過去用『大義』來說服他。一天以後，我見他已戴上八路軍的制帽了。

『這是什麼？你莫非已經入伍了？』我問他。

『不，』他露了齒說，『但在這樣的時候，我可再也不去賣栗子了。』

我的中國話因為好久不說，變得十分生硬了，而在車上的時間中，使我有了溫習的機會。我的難題之一是我對旅伴講一個謎子，這謎子是我在重慶聽到的，經我一轉述，多少已經走了樣。

我說：『當咸豐年代，宰相要一個最聰明的人去當廣東的總督，因為這個職務是非常困難的。因此他召集所有最好的學者到北京，加以最嚴格的試驗。最後選出了三個人，智力完全相等。一天，他喚召這三人入宮，告以選定其中一人的困難，因為皇上對他說如不能找到最有才能的人，就要把他斬首。於是那宰相從桌上拿了五隻盤子，三隻藍的，一隻綠的。他把盤子拿給候選者看，說道：

『我把盆子分別放在你們每個人的頭上，然後請他們到另外一間沒有鏡子的屋子裏去，你們在那裏不許講話，或互裝手勢。第一個從屋子裏出來的人，把所有三隻盤子的顏色告訴我，並且加以合理的說明，那他可以當廣東的總督。』

『於是宰相如法做去，叫三個人到隔壁一間屋子裏。十分鐘之後，其中一個跑了出來，宣佈三只盤子都是藍色。他是對了；在他說明以後，宰相就任他為總督。他的說明怎樣呢？為什麼沒有一隻盤子是綠色的呢？』

全車沉默着，大家想了很久的時候。在我們快到延安之前，那個喜歡老鼠的湖南人作了準確的答覆。他的解釋，比我所能解答的還好。

四 延安的重聚

在延安，中國共產黨已實現了歐文·傅利葉時代原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

所夢想的公社生活。

——奈姆·韋爾斯（Nym Wales）

所有共產黨人對於他們延安的新『首府』，是很驕傲的，保安來的老戰士常常問我上次訪問之後，覺得

有什麼進步。這個問題初看似乎是諷刺的。因為城中幾乎每一座屋子都毀壞了，事實上，延安已成了完全受空襲破壞的大市鎮的唯一例子。日本顯然沒有完成他們的任務，因為他們幾乎每天在繼續轟炸那地方。單是這一處，日本一定已經消耗了幾百萬圓了。

但是建設和城內的破壞並進着。在城牆的外面：一個新的都市正在成長中。千百的建築物連列於岩影之間，或密佈在無盡的起伏的黃土間的小凹地，一層一層新掘的窖洞，沿山邊開着大口，有好幾哩長。約有四萬從事各部門戰時工作的人，成天在那窖洞裏上上落落。

樂觀主義是這些人們永久的習慣；他們拿它穿在身上像一件精神的甲冑。『延安比保安好，是不是？』毛澤東問我道。『自從你一九三六年訪問我們以來，我們會竭力在各方面求進步。給我們以時間。如果我們能保持現在進步的速率，到一九四五年我們就可有一些東西給你看了。』

當你看到他們用自己特殊經驗所造成的事物時，你就不得不承認：雖然是在穴居的首都，他們却過着快樂的日子。他們的軍隊已擴增了三四倍，現在防守着數千哩的新疆土。他們跟中國其餘部份不再完全隔絕了。他們在陝北有一個堅固的小根據地，除了給轟炸打斷外，他們在那裏可以訓練成千新的軍事和政治的平時領袖，並且樹立他們自己的制度。

物質條件改善了。鑛藏和原料工業正在發展中。在保安的時期，只有最冒險的商人纔肯在當時蘇區和『白』區之間做生意。現在，幾家私營的大規模貿易公司，藉着他們自己車輛的運輸，都很發達，因為延安爲了鼓勵商業，業已取消一切商人的捐稅。陝北的棉花、羊毛、皮革、植物油和穀類是出超的。工業生產——大部是手

工業——大大地增加着。工業和生產者的合作社適應了市民和軍隊的許多要求。消費合作社擁有着堆積農村人口必需品的貯藏庫。政府的管制把物價抑低了，在那裏，物價通常要比任何地方低百分之三〇到四〇。

農業生產也擴增了。大量青年儘管爲軍隊所徵募，邊區政府却仍動員一切體力強健的人們從事耕種，開墾了一百萬畝（十萬公頃）以上的荒地。地方的保安隊和駐軍也參加這工作，還有所有學生和「職員」。甚至銀行家都不能免。一天早晨，我到邊區政府的銀行去，這一天銀行停止辦公。全體職員都出去收割了。由於生產運動的結果，陝北以前的糧食恐慌已經克服。市場上充滿着穀物和蔬菜，羊肉也多而便宜。這區域，在食糧方面是自足的。

許多新的公共機關都位置在山麓間或在那隱蔽於小徑中的新的政府建築中。教育竭力推進着，新的印刷所替前線和後方出版着各種書籍、雜誌和報紙。許多外國的著作被譯了過來，刊行標準本，並且用中國文編著自己的歷史和革命理論的教本，我有幾個保安朋友現在成了作家，都拿他們著作的原稿給我看。毛澤東、朱德、洛甫以及其他軍政領袖的選集都印成了普及本。有小說、報告文學、論文，和關於戰爭的軍政書籍，也有自然科學、藝術和文學的譯文。我很惋惜那當我一九三六年離保安時正在編纂中的集體創作的「長征史」竟已放棄出版了。據說是爲了「對聯合陣線不適宜」。

公共衛生的工作業已改善，全部的衛生佈置似乎很好。這區域中雖流行風土的傳染病，但兩年以來還不會發生過。延安有自己的藥廠，除了大量的綑帶紗布和工具外，還出產了三十一種標準方式的藥品。在外國留學回來的藥學家的指導下，一共有八十個藥劑師。邊區中央醫院有病床一百只，每天門診病人約二百名，完全

免費診治人民，並且包括了一個產科收容室。在附近的村鎮中，還有八路軍國際和平醫院的分院，在外科和畸形療治方面有着特殊的設備。重傷兵士可以很幸運地回到後方受專家醫生的診察，如阿太爾博士（Dr. Atal）領導下的印度四個代表，阿博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醫生服務隊中的醫師。

另一種革新除了許多食堂之外，當地鄉鎮還有一個小棚搭成的現代化酒排間，和一個能够專門烹製南北大菜的廚房。我一到之後，就去那裏參加歡迎中國作家和學生慰勞團的茶會，他們在國民黨元老張繼將軍和黃埔軍官賀衷寒將軍的領導下，遍訪着各地前線。

賀衷寒的蒞臨延安，可說是難得的事情，因為他是上面說過的法西斯派『復興社』的第一個領袖。據說他最初竭力反對慰勞團訪問『叛逆』的延安，後來又拒絕自己親身去，到了最後，却又不可思議地改變了他的初衷。延安的人們在十分詫異之餘，很周到的優待他，並且給他以各種調查的便利。誰也不知道他的印象怎樣。穿着光亮的皮靴和挺直的制服，腰帶間閃爍着燦爛的金刀，他跟那代表當地各文化團體的穿着棉衣的主人們，恰成了顯著的對照。

張繼一向是紅色份子的死敵，現在却竭力主張黨派合作。我看他是一個魁偉的灰色長髮的人，有些像哲學家，當他作一次懇切的演說，盛讚八路軍的努力和愛國時，賀衷寒很感到侷促不安。我覺得他似乎在暗示地忠告他年青的同僚，這情景是怪有趣的。

「我現在是一個五十八歲的老頭兒了，」張繼開始說：「我再也沒有個人的野心，或黨的野心，我爲什麼不對你們都愛中國的青年坦白直說呢？是的，我是四十五年來的一個革命者，其中有三十年會跟着孫中山先

生一同戰鬥。但我雖然爲國家效力這麼長久，就能說我不會犯過錯誤嗎？例如，我後悔我在一九二四年的錯誤，當時我反對孫先生聯共。當時，我不同意他的解釋，說三民主義與共產黨沒有衝突。我這態度也許於中國有害。不幸，孫先生死了。只有他的聰明才智可以避免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悲劇。」

當他繼續說下去時，全場是一片沉默。國民黨代表在聽衆前面說這樣謙遜的話，這是第一次。張又講到最近的國共衝突，他當向聽衆保證國民黨的元老們都擁護聯合戰線，不希望再有內戰。我覺得這個老人對中國青年說着心坎裏誠實的話：民族的團結比什麼都重要，只有在這個信心之下，中國纔能圖存。他在雷鳴的掌聲中坐下來。

自然，對於大公無私的愛國者，療治這些爭取領導的兩大勁敵間的舊傷，比什麼都重要，即使這創傷不常因新的衝突而擴大的話，尤其是共產黨，似乎從不肯放過任何協調的機會。幾天以後，當那在山西前線駐防兩年的何柱國將軍的軍隊通過邊區時，又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宴會，以歡迎這個紅軍的死敵和他的官員，以及兩位蘇聯顧問。

何柱國將軍是東北軍司令最後的一個，他於一九三六年張學良的停戰協定後，就停止進攻紅軍。那年我跟舊時紅軍在甘肅時，事實上指揮進攻的便是何柱國。從何部俘獲的幾匹馬——他是指揮騎兵的——使紅軍組成了他們第一個騎兵隊。我也會騎過其中的幾匹。因此我那天坐在羣衆中間歡迎這個人時，我覺得有一種異常的感情。那個歡迎的晚上，擠在新戲院中——城郊中一個大建築——的當有二千人，男女學生、兵士、工人、農民、老的和少的都從各方面徒步而來。

何將軍作了一次激烈反日的演說，充滿着意料中的語句。繼他演說的是俄國人，是一個金髮的青年，有着愉快的眼光和異常動人的微笑。很少人聽得懂他的話，但他宏亮的聲音是這樣表現着信心，他的掃射聽衆的激昂姿勢是這樣優美，以致博得了聽衆的全堂掌聲。我心想他大概答應以一二個機械化部隊來幫助抗戰吧。但他老練的中國譯員，完全摹做着他的姿勢以及盡可能地的聲音，終於馬上把事情弄清楚了。實則那俄國人只是申說蘇聯對於世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讚美中國抗戰的英勇，以及預言日本的早日崩潰和中國的必然勝利。

年青而誠實，那是好的，我希望我也能分得他的樂觀。在我的沉思中，很慚愧，我也被請求講了幾句話。

我最不喜歡對任何人演說。我十分知道那些青年要聽的話是什麼。可以使他們歡呼的莫過於保證美國支持他們。但人人都知道美國拿了那破壞延安和其他城市的金屬品，以及殺戮他們千百同志的軍用原料接濟着日本。我能否認或減輕這種罪惡嗎？是否可以對他們說，幹這種事情的是資本家，完全違背了美國人民的意志？當真的嗎？我衷心同意伊利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話，『拿銑鐵和軍火賣給日本的責任，全在於美國人民的肩上。』事實是少數人從這裏賺錢，其餘的不加責備。是否可以安慰這些人們，說美國婦女寧願坐視他們受難而不願捨棄絲襪呢？

我忽然記起艾利在公共汽車上碰到的老人，他曾說到大鼻子的外國人和他對航空的妨礙，我認爲這是確實的。我把這故事全告訴了他們，以代替演說。

所以外國人因了他們的大鼻子，沒有遠大的目光，那末，我的朋友們，怎還能叫他們通過重洋看到而且瞭

解你們的苦難，以及他們爲什麼不應幫助日本殺戮你們兄弟姊妹的理由呢？我們居住的是一個短視的世界，是一個瘋狗的世界，的確沒有一個人能看到他自己鼻子以外的東西。中國不能等待別國帶上長距離的眼鏡。你們的領袖毛澤東曾經說，每一個男女必須學習「用他的牙，他的手和他的足來戰鬥」，所以中國可以單獨獲勝。他是對的；誰都靠不住，只除了你們自己。

然而我憑什麼權利拿我黯淡的陳腐論調來苦惱這些決心犧牲的青年呢？我於是含糊說了一些樂觀的希望，另外一二則笑話，就很快的回到了我的座位。接着合奏開始了。

是的，合奏，我在這裏第一次聽到了洗星海的作品，這位青年譜製的歌曲現在普遍傳唱於黃河到黃海。洗自己也在那裏，領導着他特別的樂隊，有中國的銅鑼、洋琴和笛子，有外國的絲絃和梵啞鈴，以及用美孚火油箱和土產弦子製成的，他自己的特殊發明品，指揮的是洗星海自己，他究竟是瘋子還是天才，我可不知道。他們說他的歐洲教師都斷定他是前者。

但我所聽到却是好的。它有生命，又像說話，它抓住了聽衆的情緒。他莫非是一個偷兒？有悲多汶的節奏，但未必全是，有些幾乎是巴哈（Bach 德國音樂家）的格調，也有像“Red chamber Dream”名曲中的低調，忽而是一個爬山者的歌唱，忽而是船夫疲勞之餘的小曲，是河流的怒吼，是槍枝的相擊聲。洗星海叫這只歌曲做黃河，這在形式上是一首史詩，它的重音部份由六十種聲調合唱着，它在訴說國家的勝利和失敗，民族的死亡和新生。唱也唱得好，毫無可怕的歌劇中故意做作聲音的痕跡。這裏全是自然的聲音，飽滿而有力，操着悅耳的中國國語。然而，它儘管很多摹倣外國，但仍然是中國的——不過是明天的中國，向西方開着半扇門。

什麼機遇使得冼星海教授帶了他混合的音樂到這遼遠的陝西呢？我知道那是延安的魯迅藝術師範。這裏有着五百個作家、藝術家、戲劇家、作曲家和他們的學生，他們都是來自各省和海外的天才者，他們在附近的村莊中建立了一個他們自己的藝術家居留地，位置於——任何一切的地方——教堂和寺院中。因了這個學校的創立，現在延安在藝術上也像在政治上一樣成了進步份子的『麥加』（mecca）。因為在這裏，羣衆藝術不致犯叛國之罪，他們儘可隨自己意思來『提高羣衆的文化水準。』幾天以後，我又做了這些『文化匪徒』的坐上客，（這是中國文化的守舊者稱呼他們的）在他們中間，見到了幾個北平和上海來的老友，他們對我說着他們自己對於戰時藝術的理論。

在黃河節目完畢之後，我順序退了出來，恰在毛澤東的旁邊。

『你覺得怎麼樣？』他問着。

『好極，這是燕京大學合唱救世主之後，我在中國聽到的最好的合唱。』

『是的，這是我們保安戲院之後的一個大變革。』

五 女壯士的大學

我愛孩子們像一個組織，但我自己却不要有一個。我必須應付軍隊中的工作。

——康克清（朱德夫人）

延安仍生存於它自己價值的一個智識世界中；一切問題有着不同的成就，教育方面特別來得顯著。過去

四年以來，任何地方沒有像陝甘寧邊區政府這樣表現着教育的迅速進步。延安這個小村鎮，六年以前連大部份中國人都不會聽到，現在已成了全國最大的教育中心之一。它的物質條件儘管簡陋，而且幾乎每天有敵方轟炸機的降臨，它却仍貢獻着廣泛的各種教育和嶄新的文化影響。

老徐特立在蘇維埃時代當教育委員時，就奠定了新教育制度的基礎，他是前湖南長沙普通學校的校長，以五十歲時加入共產黨出名。在他到陝北之前，整個區域中只有一百二十所學校，教的只是一些四書。在一九三九年年底，有了七百七十三所的小學，七十九所模範小學和十六所高級小學了。羣衆教育超過了自由中國的任何區域。還有七百個特別補習班和二百〇八所的成年夜校。在以前，陝西的幾所高等教育的學校都在西安。現在，延安除了一所中國最大的藝術師範，一個技術訓練學校和兒童工合職業訓練學校之外，還有四個中等學校和三個大學。工合職訓學校的學生都從「小鬼」中選拔，大半是孤兒，以酬報他們對於愛國服務的忠誠和辛勞。

在內戰停止以後，舊日的紅軍大學改名爲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它的教室散佈在延安附近的各處密洞中，我在那裏時共有二千個學生，而山西各分校的學生則有八千多。直到一九三九年爲止，全部大學集中於陝北，但後來在通過國民黨區域的路上，有許多學生被扣留或羈押了，這纔決定把學校的大部份移到日軍後方去。這樣可以避免與反共集團的磨擦，日本人顯然反而是一種較小的麻煩。從抗大修完軍政學程畢業的，總共每年約有一萬人。課目內容主要還是跟舊日紅軍大學一樣，但技術和物質的設備却改善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訓練，主要是在說明聯合陣線和三民主義與共產黨政策的關係。

但在延安教育機關中完全新創，而我認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却是女子大學，一個真正女壯士的大學。它圍抱着唐施附近的兩座山，而由二百個光景的窑洞組成，其間連接着一條整潔的公路，向下盤曲到蒼翠的山谷。在其他附近小山的側面，是縱橫曲折的玉蜀黍和蔬菜的田園，學生們在那裏自己種植着，每天一大清早就起來到田野裏勞作兩小時，然後去上課。有四百個女孩和婦女就這樣學習着一切，從紡織到看護嬰孩乃至複雜的英文和俄文的文法。

一天早晨我跟一個朋友騎馬到女大，在那裏消磨了開擴眼界的一天，參觀了大學的教室和宿舍，並且享受了學生合作食堂烹製的一頓甘美的晚餐。從前的蘇維埃首都保安是不能跟這相比的。共產黨婦女的面色也好了，當王明美麗的太太，女大系主任孟景樹和別的三位教師陪伴我到每一個窑洞去的時候，我不禁注意到這點。職員和學生都穿着棉制服、布鞋和草鞋，她們的短髮上面戴着軍帽。遠遠看去你辨不出她們和男孩子的分別。她們總是露着笑容，像你在中國到處勞動人們中所看到的一樣，沒有了這，這個國家對於多半外國人將感到像一個永久陰暗的天空般的窒息。

這個女子大學有着中國各處來的各種年齡的女孩子，最使我驚奇的是其中北方人佔着大多數。人們常說共產黨的理想決不能使華北人民發生興趣；有人相信中國『共產主義』是南方的產物。但在這些中國革命家中間有句格言：『地方領袖必須發展每一個新的區域，使其加入革命。』他們知道外來的領袖對於地方鄉鎮只能負責有限的部份。在今天，軍隊所到的地方，他們就增加着新的補充，並且選拔最優秀的份子到他們後方的學校去再受訓練。

從一九三七年被日本『征服』的山東到女大來的學生，比任何省份都要多。其次河南，再次是河北和山西。江蘇第五位，此外四川、陝西、廣東、湖南、湖北和東三省的人數大約相等。有兩個女孩子從遼遠的青海和西藏來。約有百分之六十的學生是十九到二十歲；其餘都是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只有五個在三十以上。有一個工廠工人和著名勞工組織者的學生是四十一歲。大多數都不會結過婚，十人中大約一個有丈夫，在黨裏、前線或擔任其他戰時的工作。在這麼僻遠的角落裏，有這麼一個全國性的女子大學，已够詫異；而其中的婦女還在兵荒馬亂中來自中國所有的各省，那就顯得分外驚人了。我奇怪她們怎樣跑到那裏來，一問之下纔知道大部份婦女都從佔領區從日本防線後面幾百哩外跟着危險的遊擊隊來。那是一種真正求知的飢荒。有幾個美國女郎，會從戰區中跋涉五百哩去進一個密洞的大學，而在那裏還得種植她們自己的菜蔬。

大部份學生是工人或農民的女兒。其餘都是中等階級家庭出身，只有一打光景是『資本家』。資本家中最著名的有星加坡華僑胡文虎的女兒，胡是以販賣療治百病的『虎標』萬金油發財的。四十一個學生是大學的程度，一百二十九個中學程度，有二百個以上還不到高級小學程度。我奇怪，對於這樣程度不同，省份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的婦女，究竟教以那一種課程，我於是去問女大的書記郭清（譯音）。

『我們有三級學生，』她說。『有幾個初到時連讀寫都不會。我們把她們編入特別班，只施以初等學校的教育，學習些中國語文、社會問題、衛生、政治和軍事常識』以及簡明的黨史。一年之後，有的便可升入第二級。這級必修的課程是社會史、政治經濟學、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三民主義、軍事問題、初步哲學以及公共衛生的問題。『還有是高級研究班。入學資格必須是大學或相當的程度或受過我們特別班和第二級的訓練。高級研

究的學生須修習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哲學、世界革命史和一種外國語。這裏我們訓練着戰時工作或現行別部們的專門幹部，俾他們擔任佔領區中的政治工作、教育、醫藥工作、宣傳、合作組織等。我們也設有選修課程，如英文、俄文和日文、文學和音樂、簿記、速記、新聞學和紡織縫紉等。」

三級聯合上課的是中國社會問題和『婦女運動』的講演。不消說，這種教育跟中國任何地方所施行的完全不同。沒有一門功課跟國民黨和教會的學校相同，它們很少注意職業式軍事的教育，自然更沒有馬克思主義或共產黨的理論。在女子大學中，一切課目都滲透着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包括了共產黨自己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

整個體系是戰時制度或他們所稱的『非常時教育』。但這是切合實際的，他們並非無用的律師或 Ph.D.（哲學博士）的過剩。生產，自然女子而有各種的，學校這對於陝西人民生活無異是一次地震。在紅軍進駐這個區域之前，他們還像驢子和馬一般的被雇去『勞動』，而女人則留在家裏，積聚他們的工資。

女大入學的一般條件只要體格健全，有合作精神，並在民族鬥爭中有為婦女解放而戰鬥的決心。勞工階級的婦女或是從事反日工作的婦女或是從日後各臨時軍政訓練學校出來的學生，都可受優待。大多數學生不是共產黨員。准許入學之後，還須經過程度審查的考試，婦女們這纔可以插入三級中的一級。請求入學者遠超過了可以容納的限度，因此名額將擴充至一千名。

學生們過着很好的社會生活，有充份的業餘時間從事競技和運動。她們在一個山麓裏建立了自己的戲院，在一條清流旁邊洗滌着自己的東西。他們有運動場和籃球場，也有健身房和騎馬場。在下面山谷中的管理

處和合作社的屋子外，圍着一道牆，大門口由肩着認真的刺刀的女哨兵駐守着。訪問者須有特別事情纔可以進去。那精神要比美國大部的女子學校好得多了。

畢業生多數從事鄉村教育的工作，次多數是回到他們遊擊區的老家去領導羣衆組織。也有進抗大繼續受軍事訓練。許多學生已參加了遊擊戰。戰區中婦女幹部的任務，包括了動員工作，農民的教育和組織，以協助戰鬥的部隊。

西方的教授們也許很難想像一個窯洞的大學，其實「窯房」不是一個潮濕陰暗的洞，而是一個真正的「窯屋」，可以溫暖而舒適的居住。在我離開延安期間，窯洞的建築已有進步。天花板高了一些，房間也開闊了。當地的掘窯洞者常認爲黃土牆是刷不上石灰的，但實驗却發現了一種白石灰，現在已被廣泛地應用，使內部的光線改好了很多。地上鋪着瓦磚，正面是中國紙糊的窗櫺——很稀奇，這種紙窗可以透過玻璃所不能透過的紫外光線——你可以有一個比許多簡陋學校來得好的房間，也要比倫敦東區（貧民區）的每一家清潔得多了。窯洞的另一種好處就是因爲它通常蓋着三四十呎的泥土，炸彈無法破壞。萬一炸彈落在入口處，那末，房間後面交錯的甬道可以擋住彈片，並且防止震動。

女的住食、書和學都是免費的，不過學生們必需備好她們自己的床鋪和制服。她們跟別的大學一樣，在山邊荒地上種植她們自己的大部食物，因此，這是一個小項目。開掘教室、宿舍以及裝置學校簡單的設備等，化了一萬元錢，那筆費用大部由公衆捐集和愛國的海外華僑的幫助。每個月的經常費，連職員（每人五元）和七十個教師的薪水在內，不到三千元。總算起來每個學生每月化費的約爲七元五角，即約等於美金四角。

第七章 紅色的戰略

一 紅色預言家

我們甚至不能談社會主義，要是我們被奪去了一個可以實行它的國家的話。

——毛澤東

在通我密洞的一條路的底脚，車子像肺癆病似地咳嗽着，望去好像一輛護送囚人的馬車。當我走近時，纔看到是一輛傷兵的病車，車門上清楚地寫着字：

獻給中國英勇的保衛者

紐約中國洗衣匠協會謹贈

這便是曾使我的教士朋友吃驚的毛澤東的奢侈品。有許多這種洗衣匠的禮物在延安堆積着，有時常被用以運送空襲受傷的市民，到就近的醫院去。但它們多半擱置着；因為沒有汽油開動它們。

摩托的病車在遊擊前線很少實用；戰爭的流動性，沒有路的田野，以及汽油和服務便利的不够，需要一種特殊方式的醫藥服務。假如海外華僑和外國友人拿了他們負傷兵病車和外國藥所費的錢捐給延安，投到當地的生產事業如擴充藥廠和遊擊工業等，那就將有永久的價值。但這些人却沒有注意到如果拿輸入品所費

的一部份作爲購買機器的資本，中國人就能製造自己的必需品。把一輛傷兵車折成現金送給八路軍，以資助軍隊中實際醫藥工作的組織和發展遊擊工業，確乎可以拯救了幾百條生命。

許多人認爲延安是中國「反資本家」的中心，但它却需要着「資本」和資本貨物，除了鎗之外，比什麼都重要。

那傷兵車沿着城牆外圍顛簸了幾里，轉過一個山谷，然後停下來把我們放在到毛澤東住所去的一塊鋪砌的谷場上。「我們」包括了黃華（譯音），他自願陪伴我；他要去聽毛澤東對於歐洲局勢的分析。黃華是我的老朋友，我第一次遇見他正當他在北平的學生時代，那時他是燕京大學中他的一級的級長，——一個有爲的富於理想的青年，有着領袖的天才。他是那離開北方美國最大教會大學的安逸園地去加入紅軍的第一批學生中的一個。

黃華已經大大成熟了，現在已是一個極有自信的人，富於責任心；他是一個青年救亡協會的書記和北方某校的教務主任。跟我在共產主義陣營中所遇見的受過教會教育的所有學生一樣（現在已有好幾十個），他使我感覺到，他在心理上比之中國別地方的基督教學生更能安定自己，因爲後者很少能够使他們的宗教背景與他們所生存的一種社會相調和。也許這些基督教的共產黨員，已放棄了跟中國理性主義不能調和的對於信仰的超自然主義，而真正能够把基督教的社會教訓和他們日常的政治問題相調和。也許是這個區域中根本的和禁慾的平等主義的生活，給予了他們以這樣做的理想。這也許就是那吸引過李倍神父（Father Vincent Lebbe）的當地一種實際的友愛，李倍神父是一個比國老牧師帶了他基督教的醫藥隊加入八路

軍，他說他覺得他的主義跟朱德所實行的並沒有衝突，這句話曾經震驚了基督教的中國。

我看到毛澤東仍住在一個窑洞中，但却改裝得現代化了，一共包括了書室、臥室、和會客室三個房間。牆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鋪着磚塊，還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的裝飾。如此而已。我發現毛自己仍只有兩套制服和唯一綴補過的大衣。他壓根兒沒有個人的財富。

在我第二次訪問毛澤東之後，我不能把我以前所記錄的印象添增多少。幾年來的戰爭不會使他有什麼改變。因為不再挨餓，他的體重增加了；他的頭髮已經剪短；他常是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農民和智識份子素質的奇異的攙雜，也有偉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識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樂觀主義始終不動搖；他永遠自信共產黨最後必在中國勝利，他還是徹夜工作到大明。他依然是世界形勢的研習者和政治的分析家；在他開始夜工作之前，他先要閱讀一大堆從附近軍隊無線電台收集的當天電報——從山西前線，從中國各處，乃至從海外各處。

毛澤東的政治知識說明了他領導共產黨的能力，但却不能說明他受軍民控制的實際影響。在講話方面，他有方法可以把一個最複雜的問題說得未受教育的人也能懂得。他熟悉許多習語和例子；他從不對聽眾說無關緊要的話，也從不駁倒他們。在他和聽眾之間，有着真正親密的交流，他似乎常在接觸他們的。

革命運動需要一個領袖對於未來事情有比何任人先見一着的能力；而在這方面，毛澤東是成功的，他的羣衆非常信任他的判斷。一九三六年，毛曾對我作了一些重要的政治預言，這在許多人看來是荒謬的。當時很少人相信共產黨可以存在；更很少有人預見到國共會締結抗日聯合陣線。只有極少數的外國專家懷疑日本可

以在幾個月裏面壓服中國，在中國人中，少數樂觀主義者相信日本在戰事一開始，就會遭經濟的崩潰；悲觀主義者則認為日本一封鎖沿岸和佔領重要的城市，中國就要崩潰。

不管他們對於共產黨的看法怎樣，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是誰，大部份的中國人現在都承認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並且無誤地描劃了未來的一般輪廓。內戰果然停止了，共產黨和紅軍不僅存在，而且在民族聯合陣線中增強了。他說在戰爭的某一階段，國民黨的一部份將出賣中國，並且變成日本的工具，這種說法會引起很久的憤怒；但到了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出走之後，那就無法否認他是真正瞭解政府的內部力量的。毛預言如果某些條件不做到，戰爭將是長期性的和艱苦的，而且一定是歷史上稀有的例子之一，僅僅靠賴軍事鬥爭，決不能獲得迅速而容易的勝利。但這種坦白的分析更進而使那散佈幻覺的敗北主義繳了械。在另一方面，毛又正確估計中國自己的資源、人力和物力，如加以革命方法的動員，必能保障巨大的持久力，而這幫助着建立了更堅定的民族自信心。

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中說：「許多人以為日本一旦攫奪了沿海某些戰略點和加緊封鎖，中國就無法繼續抗戰。這是胡說……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除非每一英吋的土地落在侵入者的刺刀下，那就不能說被征服。即使日本佔領了中國的大部份，控制了一個人口一二萬萬的面積，我們離失敗還遠。那時候，我們仍有一個巨大的力量反抗日本軍閥，他們仍將被迫用全部戰爭來對付嚴重的經常的後方行動。」

毛澤東又繼續說明爭取勝利所必需的一種戰略——這種戰略最後是採用了的：

「那戰略必須是一種運動戰的戰略，在一個展延的動盪的和無限的前線上，那種戰略全靠崎嶇的平

原上完成高度的流動性，而以迅速的進攻和後退，迅速的集中和分散為特點。這將是一種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僅是深壕、重壘和大軍密集的陣地戰。……塹壕戰必須進行，但這是輔助的和次要的。……日本的經濟將在長期佔領中國的消耗中瓦解，她軍隊的士氣將在無數的但沒有決定性的戰鬥的試鍊下衰沉。」

但這預言還沒有全部應驗，因為手曾預言中國的最後勝利，以國內的完全動員——還沒有做到——和「重要的外國援助」為基礎。如果手所謂「重要」是「大」的意思，那末這條條件也沒有實現。

手澤東在我再度訪問延安時的論調，似乎跟他以前推測一樣的可疑；但有許多已為歷史所證明。我到延安時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那裏關於歐洲政治外交危機的消息很少。當時許多觀察者相信俄國跟德國簽了互不侵犯公約之後，將成為希特勒的戰時同盟者。手澤東認為這種議論可笑，同時說明蘇聯與德國主義的矛盾，正與英法帝國主義矛盾一樣的尖銳。他說蘇聯只有當牠受直接進攻時或者歐洲的革命運動起來時，纔會拋棄牠的中立政策，他指出蘇德互不侵犯公約主要是一種「戰略軍事上的必需」與政治問題無關，而只是保衛蘇聯，擊破張伯倫與希特勒締結反蘇聯聯盟的企圖。

當時這種解釋不盡與事實相合。世界都相信莫斯科的英蘇談判已有進步。沒有幾星期之前，英國蘇聯和中國的外交官員都十分誠懇地對我保證，英蘇公約確將簽字。因此，在這樣緊急的時期，說張伯倫還在企圖綏靖柏林或甚至跟它聯盟，那似乎是不可能的。我當向手澤東要證據，手承認他一些也沒有，這只是他對於客觀形勢的分析。幾個月之後我讀到了英國的藍皮書和漢德森爵士自己回憶錄的使德辱命記，這纔揭露了張伯倫的幻夢，會一直堅持到最後五分鐘。

那時候，毛澤東也預料日本不會加入歐戰，而只企圖壓迫西方列強來幫它解決中國。只要在日本向英美勒索了足夠的綏靖，削弱了他們自己在遠東的地位時，他相信她就會進入越南、荷印乃至最後的菲律賓。毛說英國將設法「停止中國的戰爭」有一次他說，在張伯倫看來，認為「犧牲中國以爭取日本的聯盟」是必需的。他也預見到如果英國或美國企圖來一次遠東慕尼黑，日蘇互不侵犯條約也許就會跟着成立——但「不妨害蘇聯對華援助為條件。」

毛澤東的見解在重慶引起了反響。那是恰恰跟蔣委員長的意思相反的，他在演說中曾宣稱歐戰不會影響英國的遠東政策，它將繼續維護大國公約和門戶開放的原則。甚至有幾個共產黨員也認為毛的看法太過份；他們盼望張伯倫給予中國以實質的援助，因為中國為英國自己在遠東安全的堡壘。我必須聲明我對毛的推測也不大同意，因為那是這麼明顯地違反了英國的利益；當以後幾個月中國不大阻撓中國抗戰時，我斷定他是估計錯誤了。一九四〇年七月，英國保守黨又對日本作最後綏靖的努力，封鎖了中國經由蘇的貿易通路，破壞了大國公約和英國在日內瓦所作的「避免採取足以削弱中國抗戰力量的行動」的莊嚴保證。

在戰爭中，所有共產黨的軍隊也像國民黨士兵一樣，尊奉蔣介不為最高的軍事領袖。但他們並不把這種服從當作偶像的崇拜；例如，他們並不像別的部隊所奉命照行的，每次一提到蔣的名字就起來立正。蔣是作為抗日鬥爭中的總司令和國民黨領袖而被尊敬着。

蔣和毛之間有着顯著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兩個人都有堅強的意志力。毛在他自己的範圍內也許跟蔣一樣的堅忍；他是一個有力的進取的和有決斷的人，他而且是一個能幹的政治和軍事的戰略家。那以孝的傳統

觀念爲基礎的倫理道德，在蔣是他的哲學的核心，這些話在毛看來也許不過是一種社會鬥爭雙方的宣傳表中的參考目錄。毛主要是一個社會革命家，蔣主要是一個社會保守家。蔣是一個自是的人，他的脫離羣衆的性質，常在有意地強調保持中國舊有的權威人物的傳統。毛却不大神秘。他決不說沒有錯誤。我會聽到他承認錯誤，他是不以改變他的意見爲恥的。

毛很少作長時間的談話而沒有一些熟悉的警句，他似乎以壓倒一切的雄辯來維持他的領導。他是博覽的，在辯論中是一個成功的辯證學者，他有着一種趣味的技術。他很少對反駁者作正面的進攻。他在這裏駁擊一下，在那裏駁擊一下，他側面抄襲反駁者，他一個一個駁倒對方的論點，直到慢慢地把它全部包圍起來，然後用最後的滑稽語調或動人的邏輯說服了對方。他喜歡一切人們和他們的大笑，他在任何團體中是安適自在的。我記得有一次會見他笑得哭起來，當有人對他描述在上海所看到的一個喜劇的時候。那喜劇是一張美國影片——卓別林的《摩登時代》。

毛澤東雖然毫無問題是共產黨中傑出的人物，但他絕不是一個獨裁者。他是一個公認的領袖，他的一切決定，都是討論和集體判斷的結果。共產黨中沒有像蔣介石在國民黨中所居總裁的同樣地位。毛的權力主要是通過他在黨的政治局和軍事委員會中的地位。他在邊區政府中沒有職位。每個人都仍叫他主席——那還是以前江西時代他被選爲蘇維埃政府領袖時的一種榮譽的銜頭。

中國共產黨的團結以及黨內磨擦的比較缺少，在中國政治運動的歷史上是空前的。這一部份因爲過去十年以來，中國紅軍太忙於對付他們敵人的圍剿，以致必須團結一致的緣故。

無疑地，一個革命的政黨在武裝鬥爭的過程中所造成的深切的同志愛，決非那些不冒生命之險而只空談革命的安樂椅上的理論家所能做到。這也許就是爲什麼在民主國家中享有合法權利和文化上多少威信的共產黨，不能使一個偉大的運動發展感情基礎的理由之一。我記得狄克華茨（Dick Watts）對我說起他曾在白隆（Heywood Broin）死前不久與他作過一次談話。白隆讀了關於中國紅軍的紀載說道：「這些人們有着我在美國左翼團體中從未見到過的特點：共同目標的人們中間一種兄弟之愛的情緒。我們的左翼份子常等你說出一種意見就嚷着『出去，叛徒！』雖然你與他們的意見十九相同。」一同受着痛苦或分享初期命運的感情，把人們團結在一起，而使個人意見上的小衝突減少到毫不重要，這種經驗也許是人們從來所知道的最深摯的同志愛。在中國共產黨中，無疑有着一種彌縫內部裂痕的來自外界的水門汀。

在毛澤東和他的信徒中，民族的感情，似乎要比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來得顯著。我們必須重復說一遍，即依照共產黨的學說，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 and 半封建的國家，她的鬥爭，一方面是爲了完成民族的解放而不是爲了直接的社會主義，在另一方面，則是爲了肅清『封建殘餘』——以達到社會民主的目的，由於十年以來，一直遵守着這個信條，並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一個軍隊，中國共產黨當然充分發展了自信、自強和獨立的判斷。在它鬥爭的幾年中，中國共產黨常跟第三國際完全隔絕。中國紅軍領袖不得不從戰場上來解決他們的理論問題，而戰場上的決勝，常是拿同志的生命去換取的。

在它武裝鬥爭的長期歷史中，紅軍的發展沒有蘇聯的物質援助，沒有它自己領土的征服，也沒有利用叛變勢力的巨大的實際政治經驗，中國共產黨跟第三國際一切其他的支部都沒有關係。在蘇聯以外的一切共

產黨說來，無產階級也許是沒有祖國的；但中國共產黨在他們自己革命的勝利中却有一個祖國。

毛澤東的職務不是由莫斯科委任，除了他的同志和軍隊之外，是否有人可以叫他退休，那是大成問題的事實上，手以前因了違反共產國際的路線，曾兩次被開除黨籍；但這個命令從未執行。他是從未訪問莫斯科的唯一重要的共產黨領袖。他從未晤見斯大林。他從未出國一步。

中國的政論家、教士以及其他親華的人們，都在盡力說服世界，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共產黨』最近蔣介石也對一個德國通信記者說『中國沒有共產黨』英國駐華大使寇爾有一次對我說，中國共產黨實際上與凱爾哈第安主義者（Keir Hardians）——十九世紀的土地民主黨——因此，它們的名字儘可無須嚇壞保守主義者。有些人想着，因為中國紅軍現在是爲了民主和民族獨立而戰，他們便不能算是布爾雪維克，而『只是一個農民改良的政黨』所有這些人們究竟怎樣拿這種說法來解釋中國共產黨對於第三國際的效忠，我可不知道。

假如我是正確瞭解毛澤東的話，我想他對這些加於他的馬克思主義的誹謗，是不會覺得困惱的。他將冷笑着說，如果這可使那些想以親華而反斯大林出名的自由主義者解決感情上的矛盾，那末就讓他們愛怎樣便怎樣叫好了——只要他們能努一些力去阻止美國的武裝日本，並援助中國和八路軍爭取勝利。

我個人對這件事的感覺，認爲那些希望中國共產黨是『不同的』，『不過是改良主義者』以及『已經放棄了革命的方法』等等的自由主義者，最後是注定要幻滅的。他們是民族主義者，因爲他們處於革命的民族聯合陣線的階段。他們的信仰仍是國際社會主義，如果形勢變更，他們也許會採取他們認爲必需的方法。

來『支持歷史的動力』

二 中國紅軍和蘇維埃戰略

在現時，要接近社會主義一步，除了實現完全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國……之外，沒有其他的方法。

——列寧

我想中國的馬克思信徒自稱為共產黨，正跟耶穌信徒自稱為基督教徒一樣的合於邏輯。虔誠的基督教徒常承認經過了一千九百年之後，上帝的王國還沒有由任何國家實現，至少在當前任何社會中；然而他覺得這並無害於他自稱為基督教徒。延安的人們也正同樣承認他們還不會實施共產主義，事實上任何地方還沒有實現，但他們却深信一切社會現在正進入一次社會革命，而必終之以共產主義。他們不是生存於共產社會中，他們甚至也不是主張中國馬上實行共產主義，這個事實，却毫不會減低他們作為世界革命的先鋒而戰鬥的信心。

我會向毛澤東提出書面的問題，裏面有說：『許多人以為中國共產黨事實上不再是社會革命者而只是改良主義者。你怎樣答覆他們？你是否仍堅持中國革命是「反帝的和反封建的，在某一階段中可能轉變到社會革命」，而中國共產黨的責任就在領導這個國家進行這種革命？』

毛澤東回答說：『我們永遠是社會革命者，我們決非改良主義者。中國革命課題有兩個主要的目標。第一個包括實現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另一個是社會革命。後者必須做到而且完全做到。在目前，那革命是民族

和民主的性質，但到了某一階段之後，它將轉變到社會革命。目前「將成爲」中國革命課題的社會革命部份必將變成「已是」——除非我們現階段的工作失敗了，這樣一來就沒有提早實行社會革命的可能。」

毛澤東否認中國有轉向法西斯主義的危險，因爲在目前條件之下，一切反動份子只能是叛逆的和親日的性質。任何反對民主的集團必須反對民族的利益，任何主張「攻擊共產黨」或壓迫其他反日運動的集團，客觀上必將削弱抗戰的聯合力量因而主張投降。毛澤東說：「一半國家已經殖民地化了，而其餘的一半也受着同樣命運的威脅。中國經濟仍是半封建的性質。中國根本太脆弱（經濟上）支持一個法西斯運動。那些作着相反的幻想而企圖在中國「創立法西斯主義」的人，是一定連他們的頸子也要折斷的。」

毛對於中國真正民主的需要表示很積極。他說：「在革命的現階段中，第一重要的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反封建的任務也許暫時隸屬於反日的大問題。我們在這時期中反封建的綱領包括了普及全國的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

在說明戰爭以來政治進步十分緩慢之後，毛相信「民主運動不僅日益普及於工農之間，而且日益普及於學生、青年、智識份子、科學家、政治家、軍人、作家和教師等。這種運動當前的障礙是陳舊的政治制度。問題在於怎樣改造這種政治制度（不妨害抗戰），因爲除非政治制度改造了，除非民主實現了，勝利是不會有的。抗戰和民主是一柄刀的兩面。有些人支持抗戰，但却反對民主的原則。實際上他們不要運用刀的另一面。」

共產黨對於民主共和國的要求，究竟有多少誠意呢？紅軍代言人回答道，他們打了十年內戰，便爲的建立這種誠意；他們的鬥爭是對付「反革命」的國民黨，因爲它反對民主而要求獨裁。無論如何，正跟他們「聯合

陣線』的要求是赤誠的，因為這符合共產黨地位的一切需要——因而他們忠誠的堅持着——一樣，民主的運動也可說是誠意的，因為它也適合目前形勢的客觀現實。

共產黨常認定只有一個民主共和國，纔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達到民族獨立和清算殘餘的封建主義。只有一個民主共和國纔能對農工保證組織的權利和實現他們的內部要求。也只有一個民主共和國，纔能使工農取得政府的領導權，而在和平的遞移中——中國共產黨認為有這可能——轉到社會主義。

他們叫國民黨是『地主、資本家和買辦』的政黨，他們承認它掌握全國政權的事實，不過共產黨不承認它在中國革命主流中的領導作用。他們相信這是屬於工農的——而且只有工農。他們又相信，當全國政權的領導與勞工階級的領導混而為一時，那末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纔能很快的完成。這樣，爭取領導的鬥爭仍在目前聯合陣線時期繼續着，正如過去內戰時期一樣，而且還將在未來民主共和國中繼續。共產黨政治局的重要委員之一博古在漢口對我說：『我們必須隨時隨地為爭取領導而鬥爭。我們不否認這點。一個政黨如不能領導，就沒有存在的理由。』

前蘇區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員王稼穡在最近黨的出版物中曾經寫道：『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徹底的信仰者。他們決不放棄他們的理想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綱領包括兩部份：（一）最大限度的綱領，是要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並從階級的消滅中完成激進的解放；（二）最低限度的目前綱領是民族和民主的革命。……為了實現社會主義，中國無產階級必須首先爭取中國民族的』

解放……三民主義便是這個時期中民族解放和民主的綱領。

這些綱領的理論基礎是極端複雜的。每一個論點都有一段多年辯論的歷史。共產黨不致放棄他們的『全部綱領』，雖然他們會採取廣泛不同的策略和戰略。但我在這裏的要點是指出，他們決不像托洛茨基主義者相信革命『飛躍』的可能。因此，共產黨今天是最不相信中國在最近未來『趨向共產』的人們。他們說，中國現在只有『趨向民主』的『危險』。

從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中，我們可以知道多少關於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呢？在這裏對此作一個簡略的敘述，似乎是適切的。首先讓我們用壓縮的篇幅來溯述一下最近中蘇關係的歷史。爲方便計，這可劃分爲三個時期。

在俄國內戰結束和協約國干涉軍（主要是英法日美）被擊退之後，蘇聯政府就廢除了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並且宣布與英日所締結的關於劃分中國和蒙古『勢力範圍』的一切秘密協定無效。蘇聯『放棄了一切特權、利益和租借地，只有牠在中東鐵路的利益，由孫中山先生的勸告，仍在中蘇的聯合管理下。』中蘇的新約是一個強國對現代中國所訂的最平等的條約，奠定了中蘇密切關係的基礎。

不久之後，國共兩黨聯合領導的國民革命，在孫中山先生的邀請之下，得到了蘇聯的武裝、資助和指示。這一合作的時期繼續到一九二七年，那一年，國民黨右派驅逐了共產黨，殺戮了許多伊國的領事館官員，並惡化了對莫斯科的關係。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內戰不斷進行着——中國始終與蘇聯相隔絕，特別是中國紅區，比國民黨區域隔絕得更完全。這一時期到了日本征服東三省可說是中止了，南京於一九三三年下半年

恢復了對莫斯科的關係。

大約這時候，莫斯科向中國提議締結互不侵犯公約，甚至暗示更廣泛的互助公約——像蘇聯與外蒙所訂的。這一提議由蔣介石通過當時外長汪精衛加以拒絕，汪並且授權締結何林協定，企圖進行對日綏靖的政策。嚴重的內戰繼續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間進行着，南京與莫斯科的關係仍是冷淡的。

很明白，莫斯科歡迎中國停止內戰，並恢復兩黨的合作，因為這樣中國可以增強對蘇的友誼，並且成爲對日的戰略堡壘。莫斯科通過共產國際支持共產黨聯合陣線的運動，同時稱蔣介石爲『民族領袖』。不過，如果沒有張學良和西安事變，蔣委員長是不會停止剿共的。當時莫斯科會明白了很大的希望，把蔣當作能够領導復興團結的中國去抗日的一個人。

蘇聯在這方面的外交政策，顯然是由『建設一國社會主義』的計劃決定，它主要的目標便是增強蘇聯的戰略安全。莫斯科把西安事變當作一種政變，而不是一個革命政黨可以從此奪取政權的正當的羣衆運動。蘇聯惟恐蔣介石的去職，將造成像西班牙一樣的長期內戰的結果，而日本（在德義幫助下）可能把南京政府造成一個東方的弗則哥政權。這樣，中國對於蘇聯不僅在戰略上將毫無價值，而且將採取潛在的敵對態度。我們必須指出，中國共產黨在蘇維埃戰略方面佔着很有利的地位。中國是一個毗連蘇聯的半殖民地的國家，不管歐洲的政治形勢變化如何，中國抗戰對於蘇維埃戰略安全是必要的。只要中國抗戰一天，蘇聯一定繼續支持她，因爲那威脅中國獨立的侵略者同時也威脅着蘇聯。

只有當重慶政府放棄了反帝的抗戰，只有當侵略者或另一個殖民強國以某種讓步勸誘中國政府形成

了國際反蘇包圍線的一部份，蘇聯纔會停止對她的援助。同樣的，只有當日本放棄侵掠中國領土的完整，作為放棄反蘇企圖的誠意表示，蘇聯纔能對日協調。

蘇聯有着三倍美國的土地，有着以國內市場發展為基礎而不是以國外市場拓展為基礎的經濟，牠絕無理由為了擴展而去掠奪土地。蘇聯沒有要求開拓新市場的獨佔資本的集團，因為她沒有蓄積資本的階級。牠的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還沒有完成，國內購買力大過生產力，因而儘可在國家計畫之下無限地擴展。

蘇聯擴展軍備不是像法西斯列強似的為了經濟的需要或作為征服新的市場的手段，而只是為了保護社會主義的市場。在法西斯國家中，軍備方面巨大的投資，最後是為了挑起戰爭，以維持它的經濟，但這些法則不適用於蘇聯。假如世界條件允許的話，蘇聯可以毀棄它的軍備，而把軍需工業改造為供給國內消費的有用貨物的生產，而不致擾亂經濟。

到頭來蘇聯是否這樣做，固然不知道，但到現在為止，無論如何，蘇聯却還必需擴充軍備，以增強牠巨大邊境的安全，和阻遏侵略。只要附近國家不積極敵對蘇聯，或成立一個「帝國主義進攻」的根據地，蘇聯的戰略需要就滿足了。因此蘇聯必將支持反抗征服的任何中國政府。因此它必將支持蔣介石，只要他繼續領導民族的反帝戰爭。

關於中國土耳其斯坦的問題怎樣呢？蘇聯是否準備併入這個區域作為緩衝國，像收回波蘭芬蘭和羅馬尼亞的以前帝俄部份的土地一樣呢？因為這一個巨大的省份是瞭解蘇聯在亞洲的現在和未來戰略，以及莫斯科與中國紅軍關係的鑰匙，這是值得留出一章篇幅來約略檢討一下的。

三 紅星在新疆？

蘇聯……絕對尊重全部中國的主權，包括新疆在內。——新聞報 (Izvestia)

在納粹侵入波蘭以至蘇劃界之後，許多中國人向新疆投射着疑懼的目光，覺得它跟波蘭有相像的地方。有些人恐怕紅軍也許要開進去，『解放新疆』的被壓迫民衆，『像那華沙東部的情形一樣。』日本人更無時不在廣播俄國侵入的確實報告，這是很多人相信的。

新疆好像是中國伸展到中亞細亞的一只長耳朵，東北與蒙古交界，西面與俄國土耳其斯坦和阿富汗毗連，南部又與印度和西藏相接；這形勢衝要的新疆是中國最大的一省，兩倍美國的塔克斯州或四倍加利福尼亞州的大小。主要都是沙漠，由那東西的天山山脈和那橫貫境內的塔里木河分成兩部。在南部，崑崙山樹立着一個對印度的強固障屏；在北部，產金的阿爾泰山形成着對蘇的前哨。沿着這些山脈之間，都是出產林木的小山和牧場，而在塔里木以及別的河流的流域那裏有四百萬的居民和十四種不同的民族——主要是土耳其人和中國回教徒，但也有大量的蒙古人、韃靼人、薩克人 (Kazaks) 和其他少數民族，——都是以遊牧、餵飼駱駝和馬、耕種、經商以及在發掘金子和寶石鑛藏爲生的。

新疆是中國最古老的部份，長久以來最不爲外國人所知道，直到今天還是最難進去的。它對於外界是一種神秘和傳奇的地方，自從幾個西方探險者如身勃魯乞夫 (Obruchev) 考克 (Von Leccq) 史坦因 (Aurel Stein) 和里安芬 (Richthofen) 等首先發現一些它的考古學上的寶藏之後，近時又跟蹤着艱苦

的科學家和旅行家如斯文赫定和奧文拉脫摩爾等。在中國幾世紀來的保護下，新疆時常叛亂；一八六四年宣告獨立。但中國名將左宗棠於一八七八年又把它征服。於是新疆又成了中國的一省，實際上像一個殖民地似的被統治着，到一九三一年又發生大規模的叛變。後來爲那蘇聯所支持的新政權鎮壓下去。

因爲它是隔絕印度與俄國的險要的緩衝地帶，許多年來，一直成了沙俄莫斯科與德里之間陰謀與反陰謀的中心。後來蘇聯採取了不干涉政策，但到一九三二年，因爲不能容忍馬仲英所領導的回教徒的暴動，又不能不出以干涉。蔣政府與蘇聯沒有外交的關係，但又無力鎮壓馬仲英的叛亂。日本佔領了東三省，當一部份東三省軍隊被驅入蘇聯境內時，蘇聯決定允許他們退入新疆，並增強當地困難的防軍。爲着對抗日軍的陰謀——它是積極支持回教徒叛亂的——蘇聯支持了盛世才，他是負責處置當時局面的，並在東三省軍隊的援助下重建了中國的權力。在布爾雪維克革命以後遁入新疆的五萬白俄也加入了內戰——這是蘇聯關切的另一理由。當蘇聯幫助盛世才穩定新政權之後，莫斯科就把所有軍隊從新疆撤退，表示並不企圖建立像現在外蒙古似的自治政權。

這裏，我們應該回顧一下，蒙古人民共和國是由那俄國紅軍武裝下的蒙古人建立的，目的在反抗那『瘋狂的男爵』(Mad Baron) 史坦堡 (Ungern Sternberg) 的恐怖。(註) 史坦堡曾利用新疆作爲白俄與協約國聯軍進攻布爾雪維克的根據地。史坦堡被驅逐，喇嘛政府被推翻了。外蒙古的新政權雖由蒙古共產黨

(註)參閱格雷武 (William S. Graves) 美國的西伯利亞冒險 (America's Siberian Adventure), N. Y. 1932.

所掌握，但仍稱它的革命綱領是『布爾喬亞民主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它和蘇聯締有互助協定，但後者仍承繼中國對它的宗主權。事實上，一九二四年的中蘇條約的規定蘇聯全部軍隊從外蒙最後撤退；但在談判完成之前，中國於一九二七年與莫斯科斷絕了外交關係。

後來，關係恢復了，日本已經佔領了東三省，並且威脅蒙古的首都庫倫，而中國無力防衛。因為這中國的戰略利益也就是俄國的戰略利益——她決不容許日本把『滿洲國』的勢力伸展到她在中亞的橫隔膜——所以後者必須負起保衛蒙古的責任。蘇聯在答覆中國的關於互助公約意義的牒文中，重申它對中國在外蒙古宗主權的承認，但首肯置之不理。

某些觀察家拿蒙古人民共和國與『滿洲國』相比，但實際上顯然完全不同，一個是受蘇聯保護的自治共和國，一個則是日本殖民地假面劇中的傀儡帝國。西北問題專家奧文·拉脫摩（現任中國政府顧問）曾經指出，蒙古政權事實上是以人民革命為基礎的，所以明天蘇聯兵士即使撤得一個不剩，它將依然存在；而『滿洲國』則只要日本人一別轉脚跟，它就會馬上崩潰的。有才智的中國外交家私人承認這點，現在只希望蒙古將來會加入一個獨立中國的聯邦。一九三六年毛澤東曾對我表示了這種希望，說：『當人民革命在中國勝利時，外蒙共和國將照它自己的意志，自動成為中國聯邦的一部份。』如果外蒙不佔蘇聯遠東邊疆周圍的重要地位，因而無需蘇聯的強固防衛的話，它今天與中蘇的關係也許正跟新疆相同，我們必須承認，如果蘇聯僅僅是為霸佔而霸佔，那末，她儘可毫不費力的併取新疆。她不願這麼做，這正說明了決定蘇聯在亞洲戰略的眼光遠大的見解。

誰都可以看到現在新疆的經濟生活，與蘇聯的關係要比與中國的關係密切得多，這是很有趣味的。新疆與蘇聯締有特惠的商約，蘇聯貸款給盛世才，用以建立現在的政權。一九三〇年，那橫貫土耳其斯坦的鐵路伸延到新疆西境附近的阿爾瑪·阿他（Alma-Ata）後，這個區域在經濟上更與蘇聯接近了。在新疆首都迪化與中國最近的鐵路點之間，有着一千六百哩的沙和山。蘇聯在新疆設立了商業機關，蘇聯的機械運來開發新的鑛藏，蘇聯的坦克、飛機，和裝甲車跟着蘇聯的教官紛紛輸入，與新疆的金、寶石、馬和羊毛等輸出品相交換。自中國政府退到西方諸省以後，新疆對於中國前途，發生了一種新的意義。它成了蘇聯對華接濟的焦點。萬一這裏的邊境封鎖，這對中國也許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在交通和合作方面都有重大的進步。在西安事變，中蘇了侵犯的約，以及中蘇新商約之後，東介石改善了與盛世才的關係，而孫科在莫斯科進行的談判，更加强了中國在遼遠邊疆的地位。

那長一千五百哩的甘新公路，在蘇聯工程師和機械設備的幫助之下迅速完成了。在一九四〇年，重慶——迪化——莫斯科的航空線通航。不得盛世才的許可，誰都不能經由航空或公路到新疆去，但這却阻止不了無數中國青年紛紛移入新疆去參加進步的新政府工作，教師、科學家和醫生，都爲盛主席所歡迎，而且都在他的『三年計畫』中擔任工作。

盛世才是一個五十歲光景能幹而有力的人，他原籍東北，曾在日本和廣州求學。他曾參加國民革命，一九二六年被派遣到新疆。在前任省王席被刺之前，他只佔着不重要的位置，但因了鎮壓叛變，他頓時成爲當地有力的人物。他的任務不是在於恢復舊的，而是在於消除叛亂的根源。他成了新疆的所謂『四月革命』以及

『親蘇』的領袖。盛是一個忠實而平易的人，是一個爲民衆利益服務的幹練的行政家。新政府的綱領強調民族平等、宗教自由、公路建設、工業化、農業改良以及教育和自治的發展。它又採取了兩個口號：『反帝』和『親蘇』。

由於上述公布綱領的切實執行，盛世才政府現在已不僅是古老的土耳其斯坦空前最好的行政機構，同時也是中國最開明的一個。少數民族第一次獲得了平等的待遇，信仰自由有了保障，而在許多犯法者的總清算之後，廉潔政府已懸爲格言。幾千百哩的公路建築起來了，迪化和哈密充滿了新的機器工業，改良農業也已做到了許多，包括國營農場模型實驗站和農業專科學校等的建立。那裏還沒有土地革命，只有減租、利用荒地和增重地主捐稅等的改良。

一種特殊形式的地方自治發展起來了，各階級民族和宗教都派有代表參加。區議會選舉低級的官吏，並派代表出席每年召集一次的國家議會，在這議會中，由政府報告它的預算、計畫和政策。教育方面的進步特別來得顯著。現在學校數目已比一九三三年增加了二十倍。從前壓抑少數民族的帝國主義政策放棄了，結果促成了各民族的文學和文化的復興。現在爲了推進成人教育，甚至旅行的駝隊也伴同着流動的學校，並且駝駝夫們用自己的語言來讀和寫。

這裏，我們再把盛世才『反帝』『親蘇』的兩大口號特別說一下。這原是共產黨控制下各邊區政策的基本要點，新蘇政權跟共產黨現行政策還有別的許多顯著的相似點，那並非完全偶然的。但盛世才却不是共產黨，新蘇所崇奉的也不是馬克思，而是孫中山和三民主義。盛正確地從歷史事實中指出他的政治綱領的每

一部份由孫中山主義構成。這兩大口號最初確由孫中山先生本人提出的，當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與莫斯科決裂時，固然是實際放棄了，但國民黨却從未正式宣佈取消過。

很明白，新的反帝政策是雙重的，反對英同時又反對日本的勢力。盛會引舉近時英所支持的南暴動，認為是「帝國主義陰謀最典型的例子。」至於對蘇的友誼，他說：「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下，親蘇政策決不是偶然產生的。誰都知道親蘇並非就是推行共產主義。蘇聯曾經表明，它不要任何土地或特權，而只是真正幫助我們建設。」

在新，雖然沒有共產主義，學校中也不教馬克思主義，但可並不壓迫共產黨。正跟蔣介石統治下的實情相反，共產黨員可以加入軍隊，和參加羣衆組織。莫斯科留學的朝鮮和中國共產黨員，在新擔任事訓練教官的沒有幾個。在教育 and 行政方面，較著名的是救國會份子，那是老早就主張國共和好的左翼文化人的團體；還有激進東北派的青年，他們曾支持引學良在西安劫持蔣委員長。

除了這些情形之外，中國共產黨從新的親蘇態度受到很少的便利。正跟日本的宣傳相反，從新運往中國的飛機和軍需的接濟，完全交給蔣介石而不交給中國紅軍。日本人是知道那個地方的地理以及軍力佈置情形的，他們的宣傳真令人發笑，雖然也有一些人受了欺騙。事實是在新與共產黨軍隊最近的防地之間，隔着幾千哩的沙漠，甚至駝隊的運輸，也到處受敵對軍隊的阻截。

長城以北是蔣部反共健將傅作義高桂滋等的軍隊。在西面的寧夏，是三馬的回教徒軍隊，他們在一九三七年反共戰爭中受到它歷史上未有的慘敗。增援甘陝的回教軍以及到處包圍中國紅軍的是中國配備最好

的軍隊，即上述胡芬南所統率的第一集團軍。那聯結西北與新疆的唯一汽車路，由重慶的憲兵密切巡邏着，其他通到共產黨區域的幾條僅有的路，也一樣不斷地受監視。即使有一二駱駝隊能夠避免警戒綫，穿過蒙古沙漠到邊區去，那末，它所能載運的軍火也是極其有限的事實。事實是蘇聯嚴格遵守他們的協定，只把接濟品供給重慶政府。

日本人宣傳蘇聯武力攫取新疆的怪論，也同樣被戳穿了。(註)一個友善的新疆政府，加上外蒙古的控制，給予蘇聯在中央亞細亞以適當的側面掩護。顯然，新疆的攫取也許將造成日本與重慶反共和平份子妥協的基礎，並可能使東京在中國扶植一個弗郎哥政權。就我們看來，莫斯科是一定希望避免這點的。

倘使重慶真的承認日本在中國和東三省的霸權而成立了妥協，或者加入了日本的反共公約呢？或者倘使反共的總進攻，又重新成爲重慶「統一建國」運動的一部份呢？又或者倘使英國突然改變了它的政策，用某種姿態干涉重慶，使其自信可以同時對抗紅軍和日本，而造成加緊壓迫前者的結果呢？到那時怎樣呢？如果形勢嚴重，蘇聯也許將與新疆締結互助公約來對抗。中國共產黨必將增強西北全部區域中的權力，一直堅持到把全國的形勢挽回過來。

萬一自由中國的一部份依照上述假定變成了反蘇根據地的話，到那時候，蘇聯爲了它自己的戰略利益，儘可能把一切大砲、飛機、軍用品、借款以及技術配備的接濟去援助中國紅軍和它的聯盟者，而這些接濟，到現

(註)現任英國駐華大使克利浦斯爵士，是特許飛越莫斯科、重慶綫的第一個英國人。他曾於一九四〇年四月的
一次談話中嘲笑這個傳說。

在爲止，是完全送給作爲民族聯合陣綫領袖的蔣介石的。那時候，通過西北的全部，也許將出現一個紅色的國家，而使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受到深切的影響。在西北諸省，中國土耳其斯坦，外蒙古和西部內蒙古之間，可能形成某種的團結。這種共和國的聯邦，範圍很廣大——約等於美國的三分之二——也許並不建設社會主義或加入蘇聯。它也許僅是採取「民族和民主」的綱領，像新疆、外蒙古和邊區所已進行的。

只要蘇聯政府繼續抗日，而反共集團還不能說服蔣委員長重新進行大規模的反共總攻，那還不至有這種發展的危險。最近，毛澤東曾警告那些目前在重慶積極推動武裝進攻紅軍的人們，說他們的行動實是促成自身最後殲滅的可靠方法。毛澤東幽默地指出，那些壓迫異黨比抗日更熱心的人們，應該採取一個正式的決議，其中有一條應該這樣說：

決議：鑒於現在共產黨員太少的事實，必須把他們人數發展到最大限度；又鑒於八路軍手中槍械太少的事實，必須增加他們槍械至最高限度；因此，我們反動份子自動負責來發動一個反共的討伐戰。（註）事實上，這同樣的情形可以適用於歐洲列強，他們是這樣害怕着亞洲的赤化。我們也許可以摹倣說：決議，爲了擴增共產黨在中國勢力至最大限度，爲了強迫蘇聯出以革命方法的干涉，我們必須拒絕援助中國的解放戰爭，幫助日本完成封鎖（如封鎖滇越鐵路等）以及繼續拿日本所需要用以摧毀西方利益的一切軍需品來接濟她。

現在我們將探討一下爲什麼毛的『反動份子』憤恨邊區政府甚於日本人。但首先讓我們從一個縣長

（註）見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毛澤東在延安演詞，原文找不到，此係照譯文重譯者。

自己的眼光中來檢視一個國民黨保甲制度下的模範縣，以作比較。

四 一個縣長的教育

在政府眼中，縣長代表着一萬種能力；在人民眼中，一萬種罪惡；而在縣長自己的眼中，則是一萬種困難。

中國俗語

當我最近旅行華西時，我會遇見過許多地方官吏，都是依照常規施政的，但其中有一位某縣長却與眾不同，我曾在他的衙門裏作了幾天客人，我常跟他和他溫和而勇敢的太太一同進餐。這位縣長在那國民黨統治的區域中負着最好地方官吏的聲譽，這也許是因為他從未受過縣長訓練的緣故。因此我只叫他「陳先生」。陳先生來自東部的某省，他是一個能幹而博學的人。他在戰爭中擔任一種重要的行政工作，直到日本佔領了他的官署。於是他跑到中央政府交卸他的職務。不知怎的，最後他做了甯府（譯音）縣的縣長。

現在，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還是認為「政府」即縣長，過去由天子指派而今天由黨部指派的。他對於人民有着最高的權力，他對一切高級的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負責。在大多數的農民看來，縣長是最高的權威，一人的政府。在他之下，有着各種大小不同的區，有的面積不到三十哩，有的跟歐洲國家一樣大，平均約等於美國的一州。

縣政府的組織是全國一致的，擁有三十萬人口的甯府縣當然不是例外。縣衙門照章包括六、七科，在縣長之下有民政、公安、財政、建設、調查、等科，戰時更有兵役科。在各科科長之上有縣政府秘書長，位置等於助理縣長，

常爲地方政治上的有力者。縣劃分爲許多個鎮，每鎮有鎮長。鎮之下包括了許多村莊叫做鄉。自從保甲制度恢復以後，所有村鎮都被組成爲『保』，每保包括了一百家。『保』再分爲『甲』，每甲約由十家組成，所有屬於每一保或甲的人民，都必須相互對各人的行動負責。

縣長的許多工作，實際上都是通過各區區長的。他們的職責包括維持安全，取締非國民黨的政治組織，強迫軍役，解決土地爭執，拘捕負債者和『叛黨』，徵收捐稅，以及補充和訓練地方民團等。這些附屬的官吏由縣長指定，有時不支薪水；那職位常是世襲或榮譽的。實際上，他們可從他們所徵收的捐稅中沾取一份作爲報酬，或者以禮物的形式從地主取得，因爲他們常常替地主的利益服務。這種情形是縣長所默認的，正如後者的剝削也爲省政府所默認一樣。一切進行得很順利，只有不幸的孩子們，一切命令都落到他們的身上，因爲整個制度只造成了一條鞭的交通，從高級的官僚政治到個別的家庭。後者沒有方法可以推翻上面的意見和解除他們之上的長長鎖鍊的任何一節。

有一天陳縣長說：『我所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國雖然革了三十年的命，但却還沒有觸及縣政府。經濟改變了，社會改變了，人民改變了，縣政府依然老樣子。』

陳縣長又告訴我：『當我到任時，縣裏約有五十個收租員。他們沒有一個支薪水。他們都由紳士指定，他們的家往往是數代的收租者！這些人對於地主關係有着自己秘密的記錄，而依照士紳所提出的估計去收租。只有將他們盡量鞭打，他們纔肯把租繳送給縣長。』

『對不起，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陳縣長重複一遍說：『將這些收租者帶到衙門裏鞭打他們，那是慣常的事，因為只有當他們挨了打，他們纔肯把錢送到縣裏。但即使這樣，他們還常是設法尅扣了大部的租稅。』

剛縣長不贊成這種制度，因此他把所有的收租者解了職。而對田地作了一番新的勘察。他派職員到鄉村去，把改革的情形告訴地主和佃戶，並且請他們自己到縣衙門來繳付確額的租稅。許多忠厚的農民，發覺他們會受了多年的勒索，佃戶們發覺他們會繳付了應該由地主繳付的租稅。紳士們知道了這種立法，却大為憤怒。縣政府的稅收開始增加了。

『這是一次巨大的變革。大多數人民都認為這種新制度好得多。』陳縣長說：『他們如數照付，然後拿了一張政府的收據回去，異常滿意。但紳士却常想賴付，因此我就不得不派警察把他們帶到法庭。』

紳士們對陳不滿的另一原因，是因為他根本禁絕了鴉片的販賣，這大部份是在他們手中的。他們認為鴉片比金錢還好，地主們強迫佃戶種植鴉片，然後囤積出售，博取厚利。縣衙門也從這同一源泉替省政府抽取了一半以上的歲入。但陳却嚴厲執行禁烟法，取締罌粟的種植，因此有些『地方流氓』便不得不去工作了。

『在廢除收租員之後，』陳說：『那些控制他們的紳士就聯名向省政府主席控告我，說我貪污。但我早已採行現代的簿記制度，因此我儘能駁斥他們的一切誣告。相反，我還能證明這些人中有許多已幾年來不會向國家納稅。』

他對於他的記賬制度非常得意，因為這把縣的每天收入或支出，連一分一毫都記得很清楚。一天，他捧出一大堆的簿冊給我看。我從這裏得到一種深刻的印象，覺得一個縣長廉潔而能平衡他個人的預算，實在是難

能的。陳的薪水似乎是每月一百四十元，秘書和各科科長的月薪每人只有五十六元。這不過是當時的生活費，顯然不够維持享受的水準和縣衙門官吏的『面子』。

據陳說，各科科長往往只簽具一張月薪的收條，而薪金實際上在縣長手中。爲了交換這種好意，縣長就讓他們用各種雜稅的形式，盡可能的向人民去榨取。

陳爲了補救這種弊病，便請求上峯允許他把科長們的月薪提高到七十元。於是他取締了一切利用合法記賬的作弊。大部份舊有的區長都辭職抗議這種『叛變』。陳爲了革除陋習，乃重新指派幾個能幹而年青的大學畢業生，他們的關於廉潔政府的『激進』理想，正和他相合。據陳說，由於他個人與這些新人的關係，以及由於他們的愛國思想，他們纔願意過着這樣月薪的生活。雖然陳縣長增加了每個人的薪水，但自己的確並未增加；雖然他摒棄了一切的宴會和革除了幾個無用的衙門裏的當差，但到第一年年底時，他自己還向財庫欠了八十元錢。

『一旦戰爭結束，我就要離去，跟我一起工作的忠實同志也同樣要離去，我們的戰時服務將告結束。那時，一切事情將仍照老法子進行，像他們在我們在此地來以前所進行的一樣。』

『那末，你認爲永久的改革不可能麼？』

『這種上層的改革是沒有用的。現在儘有許多忠誠的官吏，但他們對於這樣的一個制度，能够做些什麼？整個機構是錯誤的，因爲政治上的改革只能自上而下。我雖是一個國民黨員，但我却不相信任何獨裁制能够救中國。照我的意思，只有全體人民從村鎮起一致合作實行民主政治，纔能達到真正的改革。上面國民黨專政』

的錯誤正如下面保甲制度的錯誤一樣。要革除上層的錯誤路線，首先必須把下層的保甲和縣衙門改革過。」

「什麼是保甲制度？這是官吏控制人民一種很好的方法，但我們需要的却是人民控制官吏的方法。保甲起源於秦朝，當時帝國正瀕於危殆。到了唐朝和宋朝，人民都能安居樂業，所以不需要保甲。等到蒙古人征服中國，爲了控制臣屬的人民，他們恢復了保甲制度。後來中國恢復，推翻了蒙古人，建立明朝；保甲制度又告廢除了。誰恢復了它？又是異族的征服者——滿洲人。我們終於在一九一一年革命後廢除了它，因爲這是不適用於被解放的人民的。

「可是現在它又再度出現了。起先是日本人將它在東三省恢復，以威嚇人民。後來甚至南京也採行了，因爲這對於反共有用處。但今天我們已不再有內戰，這種制度却依然存在。難道我們的政府爲了取得人民的支持，不能再找到比這種日本人在佔領區所施行的制度更好的方法了嗎？」

「實際上，保甲是非人道的。十家中的一個犯了罪，怎能叫九家來共同負責？你怎能爲了你所知道而我並不知道的事情來懲辦我？保長總是由豪紳選出的人擔任的。如果豪紳要拘捕某一家，可以由保長簽發拘捕證。如果他們受到賄賂之後，要使某一家免除兵役，他們也可以叫保甲長來設法。」

這便是甯府的一個模範縣長對於保甲的看法。現在再讓我們來檢討一下另一種相反的制度——邊區，即前蘇區的制度。

五 民主政治的實驗

中國共產黨將是中國民主政治的溫床。

——林語堂

就我看來，以前西北蘇區的生活跟邊區政府統治下的生活，主要只是術語上的不同。一切社會的改革依舊。羣衆組織換了新的名稱；政府的議會以前叫做『蘇維埃』，現在叫做『參議會』，主要還是一樣的。鴉片徹底禁絕了；這裏沒有乞丐、盜匪和娼妓。土地改革繼續維持着；從前分得土地的農民，仍承認其所有權。但土地的重分配是停止了，在那地主未曾完全清除的區域，除了不在地主（absentees）之外，仍允許他們保持所有權。

取消蘇維埃的決議，是一九三七年春天內戰停止以後由蘇維埃代表會議通過的，在這次會議中對於『聯合陣線的需要』曾加以辯論。接着六個月是共產黨和紅軍領導的積極宣傳的時期，一切民衆團體、少年先鋒隊、抗日團體、合作社、學校教師以至兒童突擊隊都參加宣傳。當共同決定之前，在到處所有的地方蘇維埃中也引起了討論和辯論。

新選舉法是以南京幾年前所決定而從未實行的某些條文，以及國民政府有名無實的『建設綱領』爲根據。這些文件中規定着，如果省政府官員發現各鎮人民有統治他們自己的能力時，地方自治當即實行。可是這種發現終於沒有，因爲省政府的官僚政治當然不願消滅自己。蘇維埃政府却首先承認，它所統治的各村鎮，

已有自治的能力。

選舉權有幾點修改。在新立法中，合法年齡從十六歲提高到二十歲，選舉權是普遍而平等的，不問性別和階級。許多內戰時期遠颺的地主，現在重回老家，他們可以像農民一樣領受新地；這些人照樣有平等的選舉權，並有權參加政府的工作。商人和小資本家也一樣可以參加政治生活。當蘇區時，政治動力的關鍵在於各村鎮區的革命委員會。現在，這些委員會已為選舉委員會所代替，選委會主持指導和準備選舉的工作，然後舉行各村全體大會——伊甲制度當然取消了——以選舉代表去出席各鎮的推選會議。

當蘇區時，農民和工人可以比別人選出更多的代表，但新法律却規定着平等的選舉權，選舉是完全直接而普遍的。跟蘇區一樣，一切武裝部隊、正規軍、民團和警察也為選民的構成部份，雖然他們爲了職守的關係，事實上不能當選。依照規定，在各鎮的每三十居民中，應選出一個代表。這鎮參議會然後再選出縣或區參議會，它有權選出自己的區執行委員會，而由一個公推的縣長領導。梅成縣參議會的表係從每七百居民中選出，它有權從每五千居民中選出代表一人，出席中央或邊區參議會。這邊區參議會又選出邊區執行委員會，形成了邊區政府。

依照法律規定，鎮參議會每半年選舉一次，縣和邊區參議會每年選舉一次。鎮和縣參議會的選舉第一次舉行於一九三七年十月到十一月，從那時起自治執行委員會代替了蘇維埃。據說這一次有百分之八十的選民去投票——這就是比之先進的民主國家也是一個很高的百分數。不久以後就選出邊區參議會的表，但由於某幾縣的遲延，會有好幾個月不能召集參議會。原來有一半以上選出的代表都到前線去了！於是再舉行

第二次選舉，填補了空缺。一九三九年一月初，邊區參議會在延安開會，選出第一屆執行委員會，當即接收了前政權移交的統治權。

照我旅行中所能看到的，選舉的進行，絕無強迫性，雖然在選舉之前，先有共產黨或親共團體所進行的幾個月的宣傳。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正式報告（註）說：『一般說來，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民參加選舉，甚至小脚的老嫗也覺得她們必須參加，』從很遼遠的地方蹣跚着去投票。有人懷疑投票權利並未真正普及於『殘餘的地主』，報告中對於這種懷疑加以事實的糾正。『有人說這個法律只是一種欺騙的面具，所謂民主制度實際上是工農的專政。』報告中附有選舉統計的表格，以證明地主的投票佔總數的百分之六，因此是完全符合他們實際的人數的。

邊區執行委員會共有委員十三人，以老革命家林伯渠為主席，他是孫中山先生的老同志，又是國民黨的創立者之一。他曾在國民黨中擔任許多重要的職位，孫先生死後，他是黨的裏層半打元老中的一個，到了一九二七年因反對蔣介石被逐。他於是逃到江西，加入了紅軍。當一九三六年我在陝西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已五十二歲，剛完畢長征。他是一個清秀的白髮老人，氣概軒昂而矯捷，有一對閃動的烏黑的眼睛，與其說是一個布爾雪維克，倒更像一個最高法官，他是中國政治史的一部活的百科全書，除了朱德之外，他是紅軍中最受一致尊敬的人。最近他又被補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因此他現在同時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黨員了！

前政權下的四十二種雜稅廢除了，邊區政府的主要收入，都取之於鹽、羊毛和皮革的輸出稅以及幾種國

（註）見解放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延安。

有的工業。土地稅已有三年不會徵收了。農民們只要繳納一些最低限度的救國和公共糧食消費的輸捐。所有政府的官吏和職員就每人每日從這領取一磅半的穀。這筆繳納的捐，實際上只等於以前土地稅的三分之一。在政府發出輸捐呼籲後的一個月之內，農民就自動全部捐輸完竣，在一九三九年，那捐輸總額超出最低限度的要求百分之五十。

維持這麼一個行政機構所需的經費，小得幾乎難以相信，這是跟鄉村人民很低的收入和他們簡單的要求相配合的。縣政府行政官吏的新金是每月五元，加上他們穀類的補助和四分錢一天的蔬菜費。自然，此外還有一些公共種植的食物和穀物出賣的收入。至於旅行以及其他特殊任務的經費，則由地方政府撥款應用或由邊區參議會支付，當視它們的性質而定。

在全中國，戰鬥力和勞動力的動員，任何地方沒有像第一邊區這樣的有效，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它究竟怎樣做到呢？主要，自然是通過了自治參議會和他們羣衆組織的獨一無二的制度，把全部人口都團結於作戰的努力。無疑地，直接侵入的威脅刺激了敵愾心，因爲日軍已渡過了黃河。他們常常突襲陝北，這區域中的每一縣城會遭轟炸，因此，自由的農民們，現在都非常明白，如果要使他們和他們的家庭不致喪失新得的權利，就有犧牲的必要。

基本的羣衆組織包括了自衛軍、少年先鋒隊和耕種隊。自衛軍的前身是紅衛軍，每一個村莊都有，由體格健全的男女組成。所有從十一歲到十七歲的少年，都加入少年先鋒隊，他們由正規軍的軍官教以軍事訓練，並擔任着半軍事的任務。他們大部份到十八歲就自動加入正規軍，他們的許多領袖，則再入學校訓練，俾將來成

爲政治和軍事的司令。單是在那人口只有一百多萬的延安警衛區，自衛軍和少年先鋒隊的總共人數就有二十五萬人以上。

此外還有各種的運動，農民和農民的家庭都參加。千萬的青年從生產部門抽調到前線軍隊去了，因此便必須動員一切可利用的勞動力來維持並增加生產。爲了應付非常的需要，所有邊區各地都組織了秋收運動和春耕運動，這多少是脫胎於以前的星期六突擊隊和紅軍耕種隊。正如上面所指出，一切學生、教師、公務員、政治工作者以及衛兵，都參加這耕種和收穫的工作。有些公共機關如軍政學校等，都種植他們的穀物，因爲這樣可以盡量減輕農民的勞動負擔。

對於凡是遺送兒子去作戰的家庭，耕種突擊隊特別幫助耕種它們所有的田地。在村鎮參議會的指導之下，所有農民，包括婦女和小孩，都動員起來組織突擊隊，從事集體的耕種和收穫，以補救勞力的不足。山西河南一帶的千萬難民（許多都是八路軍家屬）進入邊區之後，立刻就由耕種隊的幫助，加入生產工作。邊區沒有淒慘的難民集中營，只有田地和工作。經過這種積極的努力，不僅以前的生產仍能維持，而且幾千畝的荒地也開發起來了，這些荒地多在山麓高處，以前從未耕種過。

邊區最顯著的一種成就，便是人民與戰鬥部隊密切的聯繫。人民常常表示他們對於保衛者的感激，有兒子或女兒在前線的家庭往往受到許多小小的禮物，這在鄉村生活中是十分珍重的。除了突擊隊幫助耕種之外，兵士的家庭還可以免除一切穀物的捐輸，並且向合作社買物只要出最低的價格。在戲院和會場裏，他們坐在最優越的位置，在別地方，這種位置總是替紳士們保留的。殘廢的軍人由執行委員會給他一筆小額的卹金

和一塊田地。

『小脚』和年青的姑娘，都組成編織隊，編製織物去慰勞前線的孩子；例如一九三九年，她們曾送了十萬副手套和襪子給八路軍。少年先鋒隊想盡各種方法捐錢給將士。有一個少婦每天爬到高山去拾柴，以換得幾個銅子。在另一地方，村中一個最窮的人把他所積儲的幾百個銅子也拿了出來。一個煤炭夫自願每天多工作一二小時，換取幾個錢去慰勞前線的孩子。諸如此類，說也說不完。在六個最貧困的縣裏，一年中曾捐了八百五十多元錢來慰勞兵士和他們的家庭。

自然，這種兵士與人民合作的一切情形，在進步國家中也許不算稀奇，但在中國傳統上却是新的。人民尊重武裝戰士，特別是前線回來的缺了一隻手或足的『無用的人』的觀念，到了最近纔養成，但紅軍却早已認識尊敬革命戰士的重要性了。孫夫人宋慶齡女士曾經說：『當一個人爲了國家從前線受傷回來時，國家的責任是好好撫養他們。』

直到今天，這個真理還是在大部份地方被輕視着，政府本身也遠沒有完盡這種義務。舉一個例，我曾看了全國救濟委員會一九三九年度的報告，覺得十分駭異，因爲在一百四十八萬五千元的各項總共捐款中，用於救濟傷兵的只有一千八百〇七元。許多傷兵救濟工作只限於地方的規模，由各種難民團體特別是紅十字會來進行，得到一些政府的幫助，或者甚至沒有；直到一九四〇年，孫夫人和蔣夫人纔組織傷兵之友會，推進全國性的慰勞戰傷英雄的運動。

邊區人民爲什麼特別踴躍輸將的另一理由，似乎是由於一種公衆的信任，相信他們的金錢一定可以

忠實地用於目的。當然，他們可以不必擔憂這會受貪污官吏的中飽私囊，或作買賣外匯的投機，或購買婢妾。那裏跟別的各處地方不同，沒有從軍火買賣舞弊的百萬富翁，也沒有剝削難民和傷兵勞動力的豪紳。這些有組織的農民知道，他們付給地方政府多少錢，他們的代表可以向參議會核對賬目。自然，舞弊也並非沒有；不過誰要是榨取忠實人民血汗的金錢，是並不光榮的。一旦揭穿之後，他們將因人民的要求，像叛國者一樣喪失他們的腦袋。

第八章 在日後

一 遊擊工業

戰爭的結果，決定於經濟者，較軍事爲多。——白崇禧將軍

美國人每年化在牛油上面的錢，會裝配並維持中國全部的軍隊。倘使十個中國人中有一個喝咖啡喝得像平常的美國人那麼多，那麼單是那一樣來路貨的所費就可在一年的戰爭中使中國破產。

但在這裏，大砲或牛油這種二者擇一的論法，意義絕少。倘使你叫通常的中國農民或工人自己選擇一枝鎗或一百磅牛油，那他就毫不遲疑地選定鎗，並且斷定你頭腦簡單。你也不能誘他放棄鎗，用同樣價值的咖啡、牛奶、乳酪、乾酪、巧克力、啤酒、牛排或其他東西，其完全缺乏使西洋政治經濟學在認爲是極端的艱難或甚至是民衆革命的條件。這些東西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中不值什麼的，他們對它們並未養成嗜好。而事實上，它們甚至在西洋飲食品中並不像一般人所設想那樣『必要』。如我在被迫不得不幾個月不吃這些東西而過活的時候所發現一般。

中國戰時的經濟力量在於兩件事情：她消費者要求的這種簡單性和國內供應這些要求的比較高的潛

伏的自足自給性。保存抗戰的經濟基礎，意思就是維持農業生產以養軍民；第二就是（當然除了充足的軍火以外）維持力足以幾種被認為真正缺不了的製造品供給人民的工業。

成爲邊區的一個主要經濟困難的，就是這第二個問題，農村市場的維持，正如在內戰時期對於蘇維埃一樣。在落後的內地，土著工業的缺少使市場貧窮化，把它開放給日方的經濟剝削，並威脅遊擊戰士氣的基礎。日本的軍事進攻可以擊退；她的經濟進攻可更陰險而難以抵敵。倘使日本繼續把她的貨物源源流入鄉村，從它們取得原料作交換，那麼，大多數遊擊領袖都承認，這種經濟的不能動員，最後將繼以軍事的不能動員。

大批的原料正在從中國的後方移進日本所控制的城市市場中去——如棉花、羊毛、植物油、鐵和煤。從城市漏回來廉價的日本製造品。這不僅在許多軍官公開做走私生意的中央軍所守的各前線省份是事實，而且甚至在共產黨軍隊所保衛的若干遊擊地區，也是難免，這些共產黨軍隊發見實行對淪陷城市完全斷絕貿易在實踐上極端困難。他們從經驗知道，一個中國農民會繼續作種種犧牲，只要他能够以他勞力的生產爲交換，購買必需品如布、鞋、烟、藥、燃料、毛巾、肥皂、植物油和農具。但當市場上長時期毫無這些東西的時候，那他的士氣毀了，他得到抗戰無益的結論，他失却希望，而革命軍失掉了它唯一的『根據地』了。

不久之前，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前方合作社視察孟永誠（Meng Yung-Cheng）從山東黃河北岸寫信告訴我說：

「晉東南是全中國最緊要的戰區之一，軍隊的大量集中於此，已使當地資源疲敝不堪。我們的職務即是減輕這種疲敝情形，並在物質方面協助抗戰。倘我們能供給軍隊布、鞋、紙、墨水、燭、麵粉、制服、（註）毯子等日常所

需，那麼我們不僅幫助他們，以及取已增加到極嚴重比例的日本生意而代之，而且也幫助本省受打擊的農民，他們的生活程度已受到這些商品的缺乏和物價的增漲所給與的慘重影響。

「倘抗戰而不能在遊擊區進行，那中國失敗無疑。顯然的，工會會在這些區域的任務，不僅在於創立合作社，而且還須抵抗日本的經濟侵入，幫助軍隊和遊擊隊獲致經濟的自足自給。去年（一九三九）七月以來日軍在山西的「掃蕩」運動，其特點之一就是：他們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是有系統地破壞每一種生產工具，甚至最原始的，如紡車。同時，他們試要傾銷若干種貨物，並封鎖其他貨物輸入。他們力求從根底上傾覆抗戰；他們要用經濟方法來破壞我們的力量和士氣。而因為缺乏其他的貨物來源，日本在山西的經濟進攻正在顯示成功的佳兆。」

共產黨領袖們，指出另一個不大為國外所了解並在中國被一般人忽視的事實，就是：數目最大的難民和失業者不在後方或華西，却在淪陷區的鄉村裏，在日軍所佔的城市附近。在一九三九年，一個新現象發生了。一支繼續不斷的流浪者的河流，開始湧回到他們的老家所在的區域裏。河北、山東和山西的大泛濫淹了幾百個鄉村，把包括幾萬個貧窮無依的男女的一個極大的負擔加給了遊擊區當局。這局勢需要在前方戰區中作恢復生產的英勇的努力，以便給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準備生計，否則這剩餘勞動力就要流浪到城市去在日方工廠裏找工作，或者被迫加入僞軍。

（註）在工合進入西北之前，許多中國軍隊不得不購買用中國棉花和羊毛做成的日本料子來做他們自己的

同時，邊區各地，有價值的天然富源擱置不用，如白煤和焦煤、鐵、硫黃、鹽和曹達。幾百萬包的棉花，因為當地中國需要的衰疲和運往後方的困難，被吸入日本市場，而在河北和湖北纖維短的棉花的場合，這是一種對敵方有軍事價值的原料。其中一部份能够和將要被新的人民的邊區政府所禁止；但是農民需要有一筆補助收入來更換所種的東西，須有軍事和非軍事工業來吸收所有當地的原料，並在自由鄉村中維持市場。

統制和處理穀類，創出工業和位置，必須有資本——在遊擊區，正如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樣。而資本恰是這些遊擊根據地所沒有的東西。當地的資本已經逃避到了那些約開商埠或到由後方去，政府和銀行資本已跟國民黨一同撤退到西部。也許我未曾在本書其他部份充分着重指出政府戰時經濟計劃在這一點上的根本的毫無遠見。官方有不少話談到迫近的反攻和規復淪陷區的鬥爭。但是在實際上，政府的經濟步驟（這些步驟使我們得到那判斷存心所在的可靠根據）對於遊擊區裏生產的重行投資，簡直不給援助，在遊擊區裏，軍民正在以至寡對至衆作戰着，努力要使侵略者無法在經濟方面控制他的佔領區。

十倍於投在所有遊擊根據地的總數的政府款項，投在四川一省（那最落後和反動的省份，因之也是最能從官僚政治手段的省份），作為農業和工業生產的資本。軍事委員會繼續着主張『在敵後發展新的前方』。在經濟方面，他們差不多沒有做過什麼來使它成為可能；他們把這些區域作為失掉而劃去了。一九四〇年，政府宣佈增加農業貸款四萬萬元的計劃——其中並無百分之二給前線各區域利用！

對於在經濟上軍事上都是戰爭的焦點的那七省中遊擊隊控制的部份，並無銀行資本可供利用。所以沒有地方比較在遊擊隊領袖中更熱烈歡迎工合運動了，這些遊擊隊領袖天天目覩日本經濟戰的直接效果，這

種經濟戰在遙遠的四川或者僅被模糊了解，或者正如一個官吏對我所說，將『無論如何使共產黨不致變得力量太大』

最初證明了小規模合作工業在戰時經濟中的實行可能的，是在蘇維埃時代。在江西，蘇維埃會經營他們自己的紡織工廠、機器廠和其他小型合作工業，在中國尚屬初次設立。這些合作工業生產足夠的製造品來供給許多簡單的需要，且是維持經濟力的一個重要因素。紅軍主力開入西北以後，同一種類的經濟被採用着。當我第一次在一九三六年訪問這裏的時候，區內各地都組成消費、生產、運銷和信用合作社。

蘇維埃撤消時，在延安召開了一個合作會議，採用了一套新的管理原則。已設的合作社都遵照國民政府所公佈的合作法規，但『顧及邊區特殊情形』而改組。信用和運銷合作社都經合併。（註）生產和消費合作社成爲主要的兩種，每種都有權在事實上經營任何種業務——生產、信用、零銷、整批和購買。基本的資本由合作社社員供給，邊區銀行也有權爲社員。合作社都有權經由邊區政府建設局『自國內各大銀行』商借款項。在實際上，如前所提出，後者對於在遊擊區裏投資任何工業都不表示熱忱，而供給資本的人們以北方貧窮的鄉村爲限。

資本和資本貨物雖少，邊區合作社却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社員代表十萬以上的家庭。單是生產合作在一九三九年就有二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個社員，比當時中國全部已設工合單位的社員的合計還要多。極端低的

（註）欲知邊區合作社詳情，參照一九三九年延安出版的兩本小冊子：『邊區合作社之發展及陝甘甯邊區合作事業管理原則』。

入社費，目的不僅在於動員一切可能的自由資本和勞動生產力，而且也在於把鄉村生活組織在作爲一個中心經濟力量的合作社的週圍。生產合作社中有許多代表經動員參加生產的一個或一個以上鄉村全體的儲蓄和剩餘勞動力。

生產合作社中，一百十四個從事紡棉花。許多鄉村都窮得只能合買兩三個紡車。這些紡車一家一家輪流過去，每一個有份的主人在家裏紡若干小時。合作社的資本，大多都投在榨油、製鹽和織布工廠，以及麵粉、炭、豆腐和陶瓷器合作社。

延安向中國工業合作協會下了緊急的挑戰書，後者是從開辦起就承認戰區生產的發展是它的主要任務。這裏是幾千個在合作生產方面已有組織已受教育的人，只缺資本和機器去開發當地的原料。

一九三九年初，作了一個開頭，當時有一個組織人員帶了寶鷄辦事處一小筆開辦借款，到延安去，設立了第一個『前線』工合分部。然而，對於這樣擴充到北方戰區去的政治的反對，在重慶發展着，使工合協會行政當局不得不把它的延安分部放棄了幾個月。那裏每一個單位都會瓦解了的，要不是給當地的合作社和邊區政府銀行『收養』了去。後者是一個可驚的機關，它的資本主要地包括學生、兵士和人民的儲蓄和捐影；它借給工合會分部一筆錢（約占其全部資產的四分之一）幫助它脫出了難關。

我到延安時，當時十五個工合工廠中最大的一個是衣服合作社，它每月出產一萬三千五百套制服。有一個化學合作社造肥皂、牙粉、粉筆、墨水、藥品、酒精和曹達。其他單位製造五金貨物、油燈、鞋襪、紙、農具、紗布、綳帶、皮件、皮衣和綁腿。一個紡織合作社每月出產一萬四千七百四十碼棉布。（註）

在這裏，工業合作社可以應用邊區政府設立的一個當地的自然科學院的技術援助。它包括大約八十個技術人員，主任是陳光沛博士（Dr. Chen Kang-pai）一個留學德國的科學家，以前是中國基金（China Foundation）的一個研究專家。八十人中，四分之一從事調查和研究工作，其餘都隸屬邊區中的學校、工業合作社和各種工業組織——有一些在山西河北日軍後方。趙益豐（Chao Yi-feng）——以前在全國經濟委員會的，是一個工業研究工作——借給工合做技術指導。

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延安的職員，自動同意接受跟邊區政府下面其他組織中所流行者相同的生活比例。職員不論其受有何種訓練，那時都每月拿最高薪水五元，比合作社工業本身的許多熟練工人要少得多。

曾經努力想勸誘重慶允准工合協會支持它所放棄的延安分部，並把工合活動擴至晉冀察邊區，深入敵後。一九三九年，生產合作社在延安開會，通過取消他們自己的規程的一切特點。（註）於是他們完全採用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規程，他們想要跟工合協會合併。我聽說，他們希望這一個姿態會促進全國的工業合作，用以去掉重慶方面的疑慮，並表示共產黨真誠歡迎任何統一戰線的組織。結果是叫人失望；重慶的政客們繼續反對工合協會擴張到遊擊區域，不管它有達到國內『經濟統一』的顯然的價值。

够諷刺的，最初承認在淪陷區維持中國生產的重要性的，不是在重慶，却是在愛國的華僑中間。爪哇和菲列濱的華僑募集了國幣四十萬元以上，以供在延安和晉冀設立一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國際中心。事實上，在南方新四軍所保衛北方八路軍所保衛的遊擊地區內，整個工合的工作，都是由華僑募集的特別捐款和資

（註）同上。

本，以及反對日本征服華東的美國人所投資的。

跟實際的軍民需要比較起來，這些數目是可憐的，但它們還不是無價值的。在中國別處地方，據計算，美金七元足供一個工合生產中的工人的所需；在邊區，這數目的一半就已够了。在別處，工合會輕單位中的資本週轉率，照生產價值說起來，每年自十二至十五次不等。在陝西和山西，因為低得叫人難信的維持費和運銷費以及其他特殊因素的關係，每年的生產價值平均要高過許多。（註）

即使可用的資本小，陝甘寧邊區却也達到某程度的工業自足自給。一九四〇年十月，這個區域裏，除了舊的生產合作社以外，已有八十多個工業合作社，這中間包括煤鐵礦和一家鐵廠、機器廠、製藥廠、運輸社、兩家小油井以及一個供給學校和八路軍運動者的運動器具廠。延安有成爲華北許多地方的「遊擊工業根據地」的希望。

可惜的是，兩百萬美元（假定國幣四千萬元）投資在華北遊擊區內各地的機器廠和「半流動性」工業上面，就可以已經有效地破壞了日本對東部內地的經濟剝削計劃。那工業每年生產價值五萬萬元的必需品，早可以帶來了經濟安全，堅固了人民的生計和士氣，並使守軍在次要的軍需品——炸彈、步鎗、手榴彈、刺刀和個人配備——方面，事實上得以自足自給。

不幸，這事的重要性，即在那少數愛國心可能已經克服了政治偏見的重要官吏、政治家和銀行家中間，也

（註）參照中國工業合作協會一九三九年九月延安分部每月生產報告，該報告指明生產價值較投資多二五

沒有被了解工合是一個被它的領袖們所確乎了解的組織。因此他們爲了竭力主張把工業擴展到遊擊區域去，而被加上『共產主義』的罪名，許多技術人員和組織人員被熱心過度的蠢貨關入了監牢。同時，重慶的那些了不起的頭腦，譬如說對於把手榴彈從四川經過幾百英里運到山西產鐵和硫黃的地區去的辦法，顯然一點都不以爲不對，在山西那邊，那些手榴彈只消化運貨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在當地造出的。他們批評八路軍破壞工作不行，但是不願把高度炸彈供給他們——而當延安的技術專家們要在西安買一個硫酸工廠自造炸彈的時候，簡直嚇得發抖了。對邊區實行定期的封鎖，機器的運入邊區常被禁止。襲擊日軍所佔的城鎮來獲得工具和機器，常被發現爲比較在國民黨區域裏採辦來得少麻煩些。

終於在一九四〇年，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設法獲得了政府對於它把活動擴展到黃河以東去的有限制的認可，工合設立了一個專門發展北方各遊擊區域生產的新辦事處。許多單位現在正在山西和河北經營着，幾百個已計劃好或組織好，只等依然被國民黨所封鎖的資本發放出來。

二 八路軍

朱德有勞勃脫·李 (Robert E. Lee) 的懇摯，格萊脫 (Grant) 的不屈，不撓和林肯的謙遜。——卡爾生少校 (Major Evans F. Carlson)：

中國其他的軍隊都比第八路軍操練得好，吃得好，配備好得多。奇蹟只有望之於後者。別的軍隊可以被打敗、被毀滅，而不致使公衆的士氣和信心受到嚴重的動搖。但是倘使日軍真會消滅了八路軍，那麼無數的中國

人就要失却對於最後勝利的希望。八路軍已經成爲一種英勇的傳說，這傳說在它萬次戰鬥的紀錄中，象徵着每一個作戰的人都必須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戰鬥的品質：忍耐、敏捷、勇敢、指揮的天才、不屈不撓以及——也許最重要的——精神的不能戰勝性。

這個獨一無二的軍事組織的秘密是些什麼呢？

它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它的軍事技術或它老於戰鬥的領袖們的手腕更有意義的事情，無疑地在於它極高度的革命意識。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今日的八路軍和昨日的紅軍之間並無根本的不同。當那些老戰士作爲統一戰綫協議的一部份，從他們的帽子上摘下紅星的時候，他們並沒把它丟掉。他們裏面許多人把它釘在上衣上，恰在他們左胸袋的裏面。

我們已經從新四軍方面看到政治訓練在共產黨軍隊的訓練中的任務，以及它在加強士氣紀律上面的價值。領袖們說：八路軍所受的一切訓練，十分之四是政治性質，只有十分之六是軍事性質。自下而上，每一個單位，除了一個軍事領袖之外，都有一個政治領袖，後者補前者之不足。在作戰中間，指揮權完全在那軍事領袖手中，但是在其他事情上面，兩個人共同行使職務。

從隊到師，每一個單位都有它選舉出來的兵士委員會，來跟那政治領袖合作，進行該單位範圍廣大的軍事以外的活動，如識字、文化俱樂部、遊戲和唱歌、民間宣傳工作以及『八條紀律』的實行。這『八條紀律』除了幾處措辭的改變，在八路軍中跟以前在紅軍中是一樣的，其主要目的在於與人民建立友好關係。共產黨軍隊行進時唱着它們：

- 一、跑進人家，要先得主人允許，離開之前，要留意把一切弄好；
 - 二、房子要保持清潔；
 - 三、對老百姓要客氣要互助；
 - 四、借來的東西，一律要歸還；
 - 五、損毀東西，一律要賠償；
 - 六、要誠實不欺，買東西要照市價付錢；
 - 七、要講衛生，上廁要跟老百姓家隔得够遠；
 - 八、不要殺死或搶劫俘虜。
- （原文找不到，此為重譯文。）

在這支軍隊裏，新兵的教育在入伍時開始，永不停止。我想世界上沒有軍隊是這樣敏於自己改進的。最下等的『苦力』，倘使表現出能力和智力，就能够成爲指揮官，這也是事實。幾百個都按時從兵士中選拔出來，到政治和軍事學校裏去受訓練，這些學校每年訓練出大約一萬個軍官。我親身遇到過幾個農民和勞動階級出身的人，他們已從最低級的兵陞任到了團長和旅長。

然而陞任的激勵當然不是金錢的報酬，因爲軍官和兵士的生活是一樣的，他們所真正愛戴的總司令朱德自己一個月支五元好薪金。這種激勵毋寧說在於要在共同的事業中求上進的心思。許多方法被採用來激勵個人和團體的競爭精神，表示進步的人被用微小而重要的手段給與榮譽。『老資格』照雇着新兵，努力要喚起他們的理解、自尊和責任心。譬如說，我有一次同一個運輸旅的年輕軍官旅行了幾個星期，他是好幾年前

加入紅軍當『小鬼』的。在路上或是在晚上，我常常偶然聽到他向着一個又一個人講解改進他工作的必要以及『進步的機會。』這使我覺得奇特，因為這傢伙在外表上顯然並不比任何一個聽他講的人來得高明，但是他們似乎不以這個事實爲重要。我甚至從未聽得他們有一個提起它。

因爲幾個實際的原因，這種高度的政治的奮熱是必要的。首先，共產黨軍隊完全是由志願兵組成的；新四軍呢，據我所知，是國內唯一沒有徵兵和被強制服役者的軍隊。第二，它幾乎完全靠老百姓的擁護而生存，這種擁護是以它所給與老百姓的待遇爲條件的。第三，八路軍是國內軍餉最少的軍隊。當人們爲了每月分文全無的收入而死時，他們一定堅信着一個極偉大的使命，對於他們的領袖一定有絕對的信仰和信任。

在別處，『人民動員』限於徵募和其他從上面壓下去的強迫辦法——在這一民主國家或是無所謂的，但是在一個老百姓新近才起來革命的專制國家，却又當別論。在北方遊擊區裏，日方始終在想得到一個政治的立腳點，所以必須在各方面喚起自動的熱忱和警覺，而達到全民動員。每一個地方，農民和工人在政治隊的領導之下，組成民團；在居民的各種份子中間，抗日團體成立起來。從這些組織中，出現了當地的領袖們；得到他們的幫助，每一個鄉村都成立它自己的動員委員會，它的自衛團和它的遊擊隊，這許多外圍的和半軍事性的團體是那保護幕，在它的背後八路軍活動着，八路軍時常從它更新其力量，吸收熱心和愛國的青年，當他們到達所需的標準時。

一切政治宣傳對於穩重的中國農民當然是毫無意義的，要不是八路軍實行它的諾言，要不是它的到達帶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到一九四〇年，在晉冀察邊區大多數鄉村裏，自治制已經成爲事實。區裏已經選出

了代表會議，縣長由縣民會議所選舉。晉冀察邊區政府本身對一個選舉出來的顧問會議負責，而新當選的縣長，十分之八以上是無黨派的本地人。

『因為老百姓只對於他們生活問題的實際解決發生興趣，』彭德懷有一次告訴我說，『只有立刻滿足他們最迫切的要求，才可能發展遊擊戰爭。』

在經濟方面，新政體對於一個幾乎被過多的債務和捐稅拖得破產的農民階級，給與立時的救濟。在『平均負擔抗戰義務』的口號下面，對於一切戰前債務和利息，一律宣佈延期償還。田租減低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苛捐雜稅都被取消，代以一種新的所得稅，依照漸次提高的比例而徵收，但決不超過百分之三十五。逃到了淪陷城市去的在外地主的田地，分給無田無地的農民，但是留着不離開的地主（有些確乎留着，積極參加政治和軍事生活），他們的所有權一點不受到擾亂。

合作社在農民和手工業工人中間得到鼓勵。即在中國工業合作社進入邊區之前，當地政府已經得八路軍戰時經濟團的援助，發展了生產合作社。燕京大學教授林特賽（Prof. R. Lindsay）曾於一九三九年秋冬旅行過河北和晉東，他告訴我說：在那一個區域裏設有五百五十九個生產合作社，工廠大多用手力開動的。焦土政策業已改善。當在日軍進攻之下中國軍隊暫時退出一個地方時，現在工業跟他們一起撤退了。組織成了緊密的若干單位，移動的遊擊工廠都可以在幾小時之內，把他們的機器和工人移到安全地方。

在日軍後方的一個山西鄉村裏，有一所印刷場，新近得了海外所集的借款的幫助，改組為一個工業合作社。六百個排印工人，大多都是除了排字之外還會放鎗的青年。除了別的東西以外，那工廠印刷一張在八路軍

團體中銷行的三萬份的日報。近來日軍在一次『掃蕩』戰中，侵入了這區域。整個工廠（我從孟永誠聽來的，他在那邊）在一夜裏被工人搬走了——而下一天的報紙準時出版！

像在陝西一樣，努力增加農業生產，修理灌溉工程，並實行穀物統制，來防止日方獲得棉花和其他可以賣得外匯的產品。一到人民可以教導得來支持它們的時候，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變革普通都仿照那種有許多地方都促舊時蘇維埃繼承下來的形式。

這樣，到一九四〇年，華北鄉間的無數農民都第一次被組織起來，受革命觀念的教導，達到某程度的政治和經濟解放。他們現在爲中國抗戰構成了一個比綿延的堡壘和塹壕還要機警和有伸縮性得多的活的屏障，一個巧妙地適應流動的八路軍的戰術需要的屏障。他們是中國動員起來抵抗法西斯惡性病侵略的健康的細胞。這是偶然當一個年輕的共產黨軍隊指揮對我說話中用了那個隱喻的時候，我才第一次明白爲什麼中國人老歡喜用對日『抗戰』而不愛用『戰爭』。

『就中國而論』他說，『日本帝國主義是一種傳染病，我們動員中的老百姓恰像人體上的好的赤血球，遵照自然的意志，抵抗侵入的病菌。』隨即他微笑着，添說道，『我們跟國民黨中間的分別，就在於我們認爲這是一種性命攸關的病，我們的赤血球必須有科學醫藥的幫助，而國民黨呢，認爲我們的醫藥太過革命，比病還要壞！』這話，我現在想起來，幾乎恰恰就是陳立夫從國民黨的見地，把情形講給我聽的說法。

無論如何，這一服藥，不論科學不科學，自從八路軍在一九三七年最初開入山西和河北的血流以來，總已經功效大增了。原來只有共產黨軍隊的老戰士約五萬五千人（註）渡黃河進軍。今日，日軍司令估計華北『共

匪」有二十五萬枝鎗，而外國觀察家所舉的數目最低爲十萬，最高爲三十萬。我自己根據跟八路軍各參謀司令官的談話，個人的觀察，和那幾個有資格判斷這事情的觀察家的估計，而作的約略估計是：在一九四〇年底邊，正規八路軍計二十六萬人，鎗力十七萬人。

不是小的成功：在戰爭中間，又沒有政府的補充，鎗力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五十。這是怎樣成功的呢？所增火力的來源，包括從日僞軍奪獲的鎗，盜匪繳的械，人民捐助或從販子買來的鎗。因爲獲得了閻錫山撤退時遺下在太原兵工廠裏的武器，八路軍的實力增加了大約三萬枝鎗。這些鎗被取了出來，分給自衛團和山西青年救國會，它們後來組成山西新軍，現在編入八路軍指揮之下。在重行訓練和收編打敗仗的省民的逃兵、散兵和殘部，獨立的遊擊隊，以及地方保衛團之中，獲得了大約四萬枝新鎗。在三年時期內，八路軍自己的鎗的損失僅約三萬枝，這主要是由於該軍的作戰技術和它三個人用兩枝鎗的習慣——所以在展開的軍隊中，常常有那第三個人從那些在作戰中死傷的戰士那裏收還鎗枝。

除了步鎗和身傍佩帶的武器以外，八路軍的配備包括機關鎗和砲以及從敵人奪獲的大量雜項軍需品——這些以後還要提到。上面的估計並不包括作爲主力軍後備隊的地方自衛團中差不多五十萬人（和若干女子）的各式各樣武器——大多是舊式步鎗、手榴彈、大刀和矛（！）它也不包括華北在軍事方面以及相當地在政治方面跟八路軍合作的各種「友軍」的火力。它更不包括東四省義勇軍的武器，這些義勇軍是應了他們的最高司令，那可尊敬的李杜將軍的請求，正在八路軍領導之下重受訓練和改編。

（註）一萬五千人留在陝北。

在它最初三年的戰鬥中，八路軍每月只拿軍事委員會六十萬元，或者說，三個師的標準經費。別的軍隊都發給新的武器和新的配備作他們的補充；八路軍只得到極少的彈藥貼補。到一九三九年，每月的經費甚至不夠養活戰地的軍隊。它是無法存在的，要不是它給那些民衆組織（它保衛它們的自由）成爲有機地分離不開的話。重慶對於這些戰士，不供給毯子，不供給冬季軍服，不供給鞋襪，不供給醫生、護士或藥品。在嚴寒的零度以下的氣候中，許多次的襲擊都是由這些人進行的，他們赤了腳踏過凍結的山和川，在他們背後，在那些雪道上，留下了深紅的點子；受傷的青年在薄薄的凝結着血的棉布短衣中發抖；許多人都因爲凍傷而掉了腳指、手指和耳朵。

然而回到遙遠的後方的安全之中，我有時聽得某一個穿得漂漂亮亮的官兒搖着一個胖胖的頭說道：『八路軍麼？他們是不打仗的。他們只不過白相捉迷藏。他們不去困擾日軍。政府應該停發他們的經費。他們把錢全部都用來宣傳，不用來打仗。』

他們方便地把一個問題置於度外。中國軍隊的主力既然一直退到了西部去，不打仗的八路軍怎麼設法把它華北各根據地守了三年的呢？讓我們試給它找一個答案吧。

三 遊擊隊的作戰效力

我們學得的最大的教訓，就是一個民族可以用了偶然得到的任何物資，而勝
利地作戰。

——朱德將軍

經過戰場上許多年的代價昂貴的經驗，（包括三十萬以上共產黨員的犧牲，）紅軍和後來的八路軍把遊擊戰從勞倫斯上校（Col. Lawrence）所達到的戰術的一種次要的附屬東西，發展而為稱作全民持久戰（註）的一種主要的戰略觀念。到現在為止，它是唯一的達到了使一個全能主義的侵略者無法收穫他全部勝利成果的方法，誰能說它不會是歐亞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人民（他們現在差不多佔了地球上男女的一半）獲得他們的自由所要經歷的道路？或者，對於社會的政治改組計劃，它不會終於證明為比魯登道夫將軍（Gen. Ludendorff）的理論，意義更大麼？

關於全民戰的戰術，遊擊領袖們已在他們的軍事和政治刊物上寫了無數的文字，當然沒有一個提要能夠希望透露它豐富的變化或它全部的可能程度。但是我在前面幾章裏既然已經嘗試暗示這形式獨特的抗戰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組織，所以在這裏我要指出它武裝保衛者的戰術中的幾個基本原理。

『全民持久抗戰』是以中國人數和空間的最廣大的利用為根據的。日軍連巡邏他們蹂躪區域大約三十萬個鄉村的一半的人力都沒有，巡邏的嘗試者無論如何在財政上自招滅亡。所以他們設法以佔領戰略的『內線』城市、公路和鐵路，並『勒迫』內地投降，而停滯抗戰和鞏固他們的力量。但是全民抗戰的理論是以下述一事的可能性為基礎的，即是把每一個鄉村變為抗戰根據地，使日軍不得不僅持武力，不能單獨對這些根據地中的每一個發動，而把日本戰略的『內線』改變為防禦的『外線』。

在實踐上，共產黨軍隊用三種主要的作戰方式，並用不同的技術方法發展每一種。這三種是（一）遊擊

（註）這名辭我相信彭德懷將軍第一個應用。

戰、(二)運動戰和(三)機動戰。第一第二兩種被認為是完全攻勢性質；而按照預定計劃的迅疾和熟練的分散，實是對於作戰逆勢的唯一防禦手段。只有在機動戰中，共產黨軍隊的戰術才包括積極保衛點線的準備。然而即在後一場合，也把陣地看作是暫時性質，當它們已經盡了掩蔽突擊行動或流動部隊撤退的任務的時候，就予以放棄。共產黨軍隊決不對着一個優勢的火力的集合，而把一個根本的陣地予以長期的保衛。共產黨軍隊跟其他部份中國軍隊的區別，就在於這一種完全講——以絕對的流動性和優勢兵力火力的迅疾集中為基礎的——進攻戰術和不變的主動的作戰觀念。

彭德懷將軍給了我關於一切遊擊戰術的最簡明的定義。他列舉他所謂打勝仗的六個最低限度的要素：『無畏、敏捷、智巧的計劃、流動、移動的秘密、和行動的突然和堅定。』他繼續說道：『這些中間缺乏任何一項，就難叫遊擊隊打勝仗。倘使在戰事開始，他們缺乏迅速的決斷，戰事就要拖長。他們非敏捷不可，否則敵人就會增援。他們必須流動而有彈性，否則他們要失掉他們機動的好處了。』

遊擊戰與運動戰的區別，主要就是少數的地方部隊獨立作戰與多數的部隊跟非正規軍主力在時間上地理上配合作戰的分別。有一句熟語，叫做『遊擊隊擊則殲滅敵人，遊以避免殲滅。』換句話說，他們主要的保全理論，既須不時出擊，又須不時移動。一個遊擊部隊可以是以一個鄉村為『根據地』，它的『後備員』包括一個自衛團；或者，它可以包括一個山谷裏或一個山上或一塊平原上的幾個鄉村。平常，它的人數不在五十以內，不出一千以上。政治教育盡那樣重要任務的，就在於這些小部隊的維持紀律上面；舊式軍隊嘗試遊擊戰的大多數失敗，都是為缺這種教育的缺乏和革命領導的缺乏。沒有革命教育，遊擊隊在防禦中成為負債性質多

於資產性質。

地方的遊擊隊常穿便裝；有時，他們白天種田，夜裏當兵，倘使情形不利，他們就連着許多天不採取軍事行動，却用各種各樣破壞行爲來保持當地活躍的精神：割斷敵方電話線電報線，在可能的地方開掘道路，破壞橋樑和暗溝，以及組織當地意見反對奸徒。也許他們最有效的工作就是用這些方法使敵方不能在村裏發動政治影響。只要地方遊擊隊活躍，紳豪之輩是不敢跟敵人合作的。

在軍事方面，地方遊擊隊作爲活動部隊的觸角，收集情報，肅清奸細，並以敵方部署的變更報告司令部。在有利的情形之下，當敵方巡邏兵減少或惡劣的氣候阻礙援軍調動時，地方遊擊隊在分區領袖們之下聯合起來，實行一連串的短時突襲和迅疾攻擊。他們或會甚至嘗試時間頗長的進攻行動。但他們總是迅速退隱到鄉間去的。

在猛攻設防的陣地時，遊擊隊總是夜間進攻，靠了出其不意，優越的進攻精神和地方的熟悉，使他們得到勝利。在突撲移動中的敵軍時，他們試用種種誘擊的戰術，來分散其部隊。於是他們從一個事先準備妥善的地位，進攻這分散部隊的最弱的一點。他們時常伏擊小隊的日軍，俘獲和繳械散兵。普通他們總使鄉間儘可能對移動的軍隊沒有好的接待，設法使他們的心神老是焦急不寧，硬不給他們休息和睡覺。

裝作了嚮導，地方遊擊隊有時把敵軍引入埋伏的地方；這樣的敢死隊平常總立刻就犧牲。偶然，從日方所雇的奸細那裏得知敵軍的行程，遊擊隊把移動的敵軍打算在那裏休息的一個鄉村的居民，全部都撤退。把村裏所有的家庭事務都接收過來，他們一直等到那些疲憊的侵略者一點都不猜疑的住下來過夜；隨即，信號一

舉，那些和平的村人都起來，消滅這個部隊。

另一個『引誘』的例子，也是常常用得很成功的例子：許多遊擊隊兵改穿了年輕女子的彩色鮮明的漂亮衣服，裝作鄉下人在日本軍營附近的田裏做工。一心想求快樂的日兵偷偷地跑出來，到田裏去捉那些女人。後者開始奔跑，在前面保持着足夠慫恿人追趕的距離。這樣，那些未來的羅米亞們，都被引入圈套，被那些鄉下姑娘的同黨們繳械或消滅。

貪吃肉吃也使許多日軍遭殃。牛或羊引人地排列在遠處山坡上，不謹慎的新來日軍，去追趕牠們，自招滅亡。有時，假砲架了起來，去迷惑敵軍的偵察機。有時候，破壞正常的道路，造起假的迂徑，於是不熟悉地勢的日軍走進了死路，應用了無數不同的方法。一到日軍懂得了一個巧計，遊擊隊馬上就又發明了一個。

第二、『運動戰』包括以共產黨正規軍的集中火力為基礎的比較大的行動，這些正規軍供給這種戰爭中的進攻主力。兵力從一團到整個旅都可以，用他們所有的到中型砲為止的一切來幫助，並有騎兵作伴。速率、秘密和細心的準備在運動戰中最關緊要。不損及流動性（共產黨軍隊出擊行軍一日或一夜平均行三十英里）的最高火力的發展是它的特殊才能。作這種性質的戰爭，是爲了完成移動部隊的全部殲滅，破壞極重要的戰略地點，掩護對於鐵路、公路、防舍等的大破壞行動。

日軍對於防衛軍主力的包圍戰術，被遊擊戰和運動戰的巧妙配合所挫敗。運動的戰術常限於仔細選定的作戰區域，其目的受時間、空間和軍事目標所明白限制。一個卓越的例子，德國軍事雜誌稱之爲『運動戰的經典』的，就是長城上平型關之戰。在這裏，八路軍把皇軍在被輕視的中國人手中所受的最最恥辱的失敗，給

與兩個精銳的日師團。由於優勢的機動，八路軍在一次使侵略者死傷六千四百人的戰事中，只損失了三百人。
(註)

第三種戰術稱爲「機動戰」的，只有在人民中組織努力已達一高度時期之後，才能成功地實行。它包括兩個或兩個以上從敵後中國軍隊所守地區中不同的根據地出動的師團的配合行動，有時與主要前方的進攻行動相合作的。

在華北，八路軍現在有六個主要的堡壘（晉西北、晉察邊、晉東南、冀南、皖北和魯北），在每一區域四週，伸展着人民抗日團體的波浪，它們接近日軍駐防地時，逐漸稀落下去。敵軍當然不能用暴力一個一個侵入到主要的非正規根據地的中心，實行殘酷的徵罰步驟。但是他們缺少軍隊足以同時把他們完全包圍，他們缺少人、錢、供應和交通便利來維持永久的步步佔領。所以當他們向一個根據地進行「殲滅」戰的時候，不在包圍之下的其他根據地的主力軍就進攻那從事進攻的日軍部隊的後方和側面，並使其不能動彈。

這一種被共產黨軍隊稱爲機動戰的配合行動，需要配合時間、參謀工作以及適當的無線電、跑差和其他爲別的從安全根據地出發的中國軍隊所罕有的交通。它並不老是成功的——主要因爲它有減少流動性和肉搏機會和傾向，共產黨軍隊是極借重肉搏來抵消敵方優勢的火力的。然而至今爲止，日軍所試的每一次包圍運動都被運動戰和機動戰的戰術所挫敗。雖然侵略者有幾次達到了流動軍主力的根據地，但是他們的到達，只是在被迫不得不作爲分散部隊在行進中作戰以後，在達到各路會合策略的最後一幕會合之前。他們進

(註) 欲看逼真敘述，參考 Helder Hanson Humane Endeavour N. Y. 1940.

攻的力量已經削弱，在那大魚已經脫逃的破網裏什麼都沒找到。

然而機動戰對於像八路軍這樣沒有重配備的軍隊是代價極大，極為危險的，而沒有各主要陣地的配合的幫助，它的目的只能部份地實現。

中國的主力軍一天繼續被動，不把他們所獨有的重火力發揮出來，那麼敵軍陣地的克復和主要的敵軍集中的殲滅，就一天不可能。共產黨軍隊司令相信最後勝利只有從大規模實行機動戰才能得到。但他們承認，這事能夠發生，只有倘使高級司令克服其反共偏見，以求廣泛的政治軍事團結，把主要的幫助給與流動部隊，而跟他們一同計劃一個在最廣大最深入的前方的配合攻勢。

那麼，這一新典型的中國軍隊的作戰效力，跟大部份的軍隊比較起來是怎樣的呢？軍事委員會所發表的包括戰爭最初兩年的統計，表明八路軍新四軍在中國全部軍隊所使敵軍損失的全部配備中，一共佔據了一個非常大的百分率。單是這兩支軍隊就截獲和破壞敵方損失的全部大砲的百分之六光景，全部機關槍的百分之十五，全部貨車的百分之二十八，和全部步槍的百分之三十四。全中國俘獲的敵軍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八路軍和新四軍俘獲的。一邊軍隊擴大，一邊作戰效力也增加；一九三九年內，他們差不多參加了全部作戰次數的百分之二十五，地方遊擊隊的戰鬥不在其內。在一九四〇年內，日軍停止他們前線進攻，把他們一半以上的軍隊集中於游擊區，企圖完成佔領區的平定；那百分率升得更高了。

一九四〇年初，八路軍各司令共同發表給政府的一個公文，（註）其中說：『在過去二年半中，八路軍死傷

（註）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

總計約爲十萬人（即幾及晉省原來作戰部隊之二倍），而使敵人死傷二十萬人以上。」倘使這話是正確的話——觀察家們不禁要相信它，因爲八路軍發表每日報告，在該時期內羅列了六千多次不同的交戰——那麼它的作戰效力比其他任何前線所達到的大約好四倍。因爲在別的地方，據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將軍的話，華軍與日軍損失的比率大約是二對一，在若干地區平均五對一。

「敵人在華四十個師團中，十七個專與八路軍新四軍交戰，」那個公文提醒軍事委員會道。「故吾人牽制全部敵軍五分之二之兵力。」同時，共產黨軍隊各司報告，說他們的經費只大約等於其他軍隊的五分之一，以致每個官佐或士兵每月平均只領到二元七角二分。他們提出其他嚴重的不平，我們必須在下一節中講到它們——因爲中國團結的這整座大廈可能存在或傾塌，就在於他們所提各問題的合理解決。

四 團結還是毀滅？

我們要求在抗戰團結和進步的旗幟下統一起來。——毛澤東

日本征服戰的戰略，正如中國抗戰的戰略一樣，可以大致分爲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是：大進攻時期，在這時期裏，日軍佔領中國緊要的城市，並控制沿海，主要的水道和交通線，以及主要的已經發展的中國根據地；軍事鞏固時期，在這時期內，日軍企圖穩定一條佔領區的邊界線，使線外的中國主力軍只限於一個被動的和純粹保衛的地位；鎮壓時期，在這時期內，日本想要消滅流動部隊和遊擊部隊以及他們在人民中的基礎，這樣通

過了對於她最後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奴役的那最後但是最堅決的反對力量的消滅，而達到政治的決定。

到一九四〇年，日軍已經完成這個戰略的第一階段，在第二階段上已得相當的進展，正在把他們主要的努力專用在第三階段。到現在，對於讀者該是非常明白的了，就是：只有遊擊的（大部份是共產黨的）軍隊才是使日軍在華北華東無法得到成功鎮壓的障礙。在『自由』中國發生的事情，既然跟增強淪陷區抗戰力量並無直接的關聯，就不會影響到結果。倘使日軍在他們侵入各省的『掃蕩』戰得以成功（而且倘使戰爭只由日本和中國來決定的話），那麼重慶將成爲西藏附近的區區一個經濟落後國家的首都而已。

一九三八年以來，日軍已作了多次的消滅進攻，對着所有主要的各遊擊根據地，最着重八路軍和新四軍，這兩支軍隊的各種組織現在的作戰次數約佔淪陷區全部交戰的五分之四。例如，到一九四〇年八月，單是對着晉東北和晉東南已經先後作了十二次以上的『最後殲滅戰』，同時對安徽和江蘇的新四軍發動了六次主要的進攻。在所有這些嘗試裏，日軍都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受到極重的損失，不能防止八路軍新四軍方面火力的繼續增加。但他們每次失敗學得教訓，這全靠久經戰爭的共產黨軍隊各司令的機敏來發展新的戰術而獲得勝利。

對於在最初幾個月中給了他們若干次慘痛失敗的共產黨軍隊，日軍已改變了他們輕視和不經心的態度。他們現在仔細研究和分析被板垣將軍稱爲『日本敵中最頑強最危險者』的敵人所用的一切方法。日軍正在運用受過特殊訓練的軍隊來作運動戰和遊擊戰，並已學會在小規模戰鬥中有效地運用毒氣。晉西北的一個八路軍司令把那個地區中的一個戰役說明給我聽，在這戰役中日軍只用化裝農民的小隊迅速的遊

擊兵，他們想要突擊鄉村前哨上的共產黨部隊。

但是普通中國軍隊沒有一種有組織的自治的人民做後盾而嘗試運動戰和遊擊戰時所有的弱點，在日軍的場合，變得格外明顯。還有一個對於只有有效反遊擊戰術的主要障礙，就是日軍兵士和下級軍官方面的缺乏自動性。一經從他們的長官切斷之後，他們就常常沒有臨時指揮的能力，無法應付各種意外情形。日軍不敢鼓勵普通的兵士相信他有着一個頭腦，而毀壞他們封建的武士的紀律傳統，而共產黨軍隊所用的訓練方法中，那恰是絕對基本的。他們的司令不僅在一次作戰開始之前，用了地圖和模型向部下說明每一個行動，而且在戰事發生過後，分析每次交綏，說明他們自己的錯誤，要每個兵士發表他自己的批評以及他自己認為應該怎樣作這次戰爭的意見！所以在每次交綏中，每一個共產黨軍隊的兵士都從頭到底用着頭腦，如果領隊的被殺死了，那麼那個伍長或甚至那個領班都可以起來指揮，繼續作戰。

日軍的行動全都以他們設防的城市為中心而在四週活動的，現在正在企圖把這些地區擴大成爲一個堡壘制度，跟蔣介石用來終於把紅軍趕出江西的那種一模一樣的。但是蔣用了一百萬以上的軍隊來包圍僅僅一個共產黨軍隊根據地，仍然免不了一個突破，而現在八路軍新四軍有着六個比江西更大更鞏固的根據地。即使廣泛應用偽軍來負責駐屯工作，日軍也還是缺乏足夠的進攻兵力來同時包圍所有這些廣大的區域。用碉堡來包圍每一處，是所費浩大，而且也許結果還是無效，因爲日軍可能仍舊無法完成殲滅。

總之，日軍在軍事方面對付共產黨軍隊似乎不大有什麼進展，而愈益憑藉對於平民的恐怖主義和懲罰步驟。一個新近旅行過河北和山西的教士說，在他所看見的區域裏，日軍在其懲罰行動中，每隔兩三村就燒掉

一個，並且屠殺了幾千個平民。日軍每次大規模的反遊擊戰爭，總隨帶着幾百輛的空車，他們退回城裏去的時，把每一樣想得到的值錢東西都裝在車上運走。一羣一羣的水牛被驅去殺掉。據說河北和山西的農家牲畜，大約一半已被毀滅。在許多村子裏，你再也買不到雞蛋了，因為沒有一隻雞保牢了性命。

一個魯北遊擊區來的中國教授告訴我，「日本人把一個市鎮週圍幾英里內的出產品統統搜光，把鄉下人弄得兩手空空，這是常有的事。他們把東西帶回市鎮上來，留下他們自己要用的。然後他們把多下來的擺到市場上去，賣還給被他們搶劫的人們。」

當日軍的車子不運農人的傢具或衣服或食糧的時候，它們常常裝滿了中國姑娘們。這些姑娘被運到城裏，出租給日軍特務部經營的妓院。有時候，男女孩子都被關起來勒索贖金，倘使日人疑心他們的父母有一點錢藏了起來。常常，整個村子都突然在夜裏被包圍，被機關槍掃射，算是一種「警戒處置」。無數的住在日軍大砲射程內的農民，都被迫不得不放棄他們小塊的田地，這些田地雖然經過了地主和收稅人的勒索之後從來沒有給過他們超過僅可糊口的生活，然而他們所知道的僅有的家。

日軍現在已經把握到究竟什麼才是這一種全民抗戰的基本事實：只有用整批的滅絕居民的方法才破壞了它。在遊擊根據地邊上的若干地區中，這個法子已被實行，用直截消滅和遷運這兩個手段。幾千個農民都被徵發去給軍隊做工，去重建被遊擊隊所破壞的碉堡、城牆和道路。幾千個壯丁和年輕女子都被用強力去爲華北日軍事計劃或工業計劃以及東北日土地計劃，從事吃飯不拿錢的勞動。不是這樣直接受奴役的人，都被用一百種不同的方法強制着做支持日軍佔領的工作。凡是日軍能够施行其命令的地方，農民都必須依照比

較市價低得多的價錢，把他們的米、麥、絲、棉花和羊毛，賣給日方的專利公司，交換常是分文不值的偽鈔。拒絕的人被毒打或祇當作『賣國賊』而殺死等等。那卑賤的事蹟已被許多可靠的觀察者動人地描述過了。（註）

但是這些極權主義的慣用手段得到這個酬報：它們足以加強人民抗日的決心，並使敵人難以在他們自己的鎗枝以不及的地方找到任何安身之處。中國人不是笨的。當一個市鎮的一頭在發生屠殺和火燒和強姦的時候，他們中不大人會被另一頭以貼的日本傳單所感動的，這些傳單痛斥『共匪蔣介石』或者在『亞洲人團結起來』的口號下，表明和顏悅色的日本兵撫着小天使似的中國小孩子的頭。諸如此類的情形，例子之多，使人似乎有理由可以懷疑日人是否有着辨別可笑的心。

這種的技巧，比共產黨向農民所作的宣傳，更有教育他們愛國心的功效。它把組織的重要性以及跟他們自己的防軍的合作的重要性，教給他們。他們得知，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使日軍不可能在他們自己的堡壘外面存在。只有通過動員，無數的農人才能因為他們自己跟那些組織起來保衛他們的生命和他們的自由的軍隊成爲一體，而找到保護。

然而，日軍懲罰的蹂躪的破壞性是那麼厲害，所以只有一種以最後勝利的革命性的希望爲基礎的超特的士氣，才能使遊擊隊和支持他們的人民繼續那個鬥爭。我曾經指出遊擊區域經濟的嚴重地位以及政府全無加強遊擊區域工業和農業的援助。我曾經提及八路軍新四軍的不充足的經費以及不發給主要的軍器，尤

（註）特別是上海美國情報委員會（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的出版物，它們把日軍所用的方法作了逼真而用文件證明的報告。

其是有效的破壞工作以必需的高度炸彈。然而，在他們地位上雖有這些被承認的弱點，我可從來沒有遇到任何遊擊區裏的一個男人或女人，他懷疑日軍鞏固佔領區的努力最後能够被擊敗。但我也碰不到一個人，他不把華軍後方半官集團的反共活動，認爲嚴重得多的事情，而且是那樣嚴重的事情，就是倘使擴大，可能成爲日軍勝利的先導。

跟紳豪之輩和關係複雜不疑的地方軍人共同合作的軍隊，國民黨和政府中的反共集團，對於遊擊地區及其週圍的無數「事件」，應該負其責任，這在中國是大家知道的事情。在漢口的最後許多日子裏，我第一次開始聽到這些磨擦的暗中報告。後來它們成爲人人知道的差不多日常事情了。

我曾經論及國民黨右翼竭力要保持一黨專政以及在未被侵入各省取締異黨活動，我曾經講過成立一個戰區黨政事務委員會，來根絕共產黨在敵後方所領導的抗日運動。這些辦法的發動者在他們的發言中是够坦白的，雖然報紙上不准報道。在重慶，國防最高委員會副主席張羣將軍告訴我，中國遊擊區內由人民選舉的地方行政組織是「非法」的，他說起戰區委員會決心要撤消它們。在西安，蔣委員長行營主任蔣鼎文將軍使我確知他同具張羣的見解。

中央軍和國民黨內的羽黨——當然是政府中的要人——用了在別的地方就要被稱爲第五縱隊主義的各種方法，來搗亂八路軍和新四軍。像戴笠主持的藍衣社，胡宗南將軍手下的「復興軍」憲兵，三民主義青年團，以及其他名字不經解釋便毫無意義（此處沒有地位來解釋）的團體——像這樣的秘密組織全都協力實行所謂「處置異黨問題辦法」。

事件迅速倍增，而在一九四〇年成爲那樣嚴重，以致無論什麼地方進步的人都有些擔心國民黨會完全放棄對付日本的努力，而專心於似乎成爲它的主要興趣所在之處：重來一次反共內戰。八路軍的兵士和軍官，迪有被捕，被監禁和被屠殺的事件。從綁架到延安去的學生起，到武力進攻共產黨軍隊的駐軍，什麼都有在裏面。中立的將軍們籲請蔣委員長干涉，但他似乎或者無能爲力，或者並無興趣。最後副參謀長白景禧將軍親自去見委員長，請他否認包括在那秘密的『處置異黨問題辦法』中的訓令。蔣否認知道這東西。但『事件』繼續發生。

有一個長時期，共產黨似乎惟恐把局勢弄得更加惡化，而勉強表示他們的不平。甚至在新四軍一個聯絡站的全體職員在江西被一個軍人所慘殺（註一）之後，他們只在重慶舉行一個小小的追悼會——他們邀請那個軍人的代表出席這個會。當中央軍的部隊進攻陝甘寧邊區，截去五個縣的時候，他們把軍隊撤退，籲請委員長干涉。他制止了衝突，但把中央軍的佔領弄成爲永久的了。無可奈何，八路軍各師司令終於在一九四〇年初發了一個極動人的公電（註二）給委員長，政府各要員和戰區全體司令，抗議對他們的繼續進攻，要求終止搗亂和不公平的待遇。這電報的一部份如下：

『在冀綏綏察魯諸省，八路軍會收復失地，建立抗日根據地，以保衛中央大平原及西北全部。但仍有人宣言八路軍必須逐出。彼昨日放棄土地於日本，且因畏懼日本屠殺而竄逃之將領，今日乃令其部隊進攻八路軍後方，而謂此行

（註一）即平江慘案——譯者。

（註二）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

動爲「收復失地」……特務人員紛入陝甘甯邊區，迭事騷擾，大軍又遣至包圍。彼等一日襲一城，一日擄一縣。不幸事件接踵發生。但我堅決站在抗日陣線上之戰士，決不放棄寸土。八路軍實已表明對整個民族之忠誠矣。

榆咸鐵路，隴海鐵路，八路軍必經之交通線，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此攔路捕人，特務機關，關卡林立，不僅八路軍之青年一律阻攔，並設立招待所，謂之「喚醒盲從八路軍者」，抗大學生，有經此途者都被捕，並勒寫悔過書，加入幹訓團，青年何辜，遭此荼毒。甚且盜竊八路軍軍車，僞造八路軍護照，物證俱在，可以覆按，以此爲例，其他可知矣。

特務機關橫行勾引八路軍與共產黨人員，立有價格，高級二百元至三百元，中級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下級四十元至一百元。造作倡言，則有百件之多；厲行破壞，則有無數萬之金錢……一個「制止異黨活動辦法」之不足，繼之以「對於異黨處理辦法」，又不足，繼之以「處理共黨實施方案」，開訓練班上磨擦課，「滅共」，「反共」之聲，甚囂塵上，山雨欲來風滿樓，是存心製造空前之慘禍也。」

陳誠將軍把這個邀請置之不理，但他的政治部却印出一集記事來作爲答復，這些記事使人以爲隨處受共產黨壓迫的是國民黨，共產黨被指爲自己犯着所抗議的那些罪。證據是大家知道，無從蒙蔽的，那情形已成爲一件全國的醜聞，蔣委員長不得不命令調查。但談判拖延幾個月，還沒有多少顯見的結果。直到一九四〇年六七月間，蔣委員長終於答應改善。

今日，共產黨員雖被排斥，不得參加各「自由省」的政治生活，（重慶和別處的代表只認爲八路軍的聯絡員，共產黨依然被正式禁止）但蔣委員長已承認某幾個前線的區域，在那裏共產黨軍隊享有跟國民黨軍隊在別處所享的相同的權利。軍事委員會現在也多發八路軍三個師和新四軍兩個師的經費。這一個調整（它仍然使共產黨軍隊大約有一半未領中央政府經費）要到滇緬路被封鎖使國民黨政府幾乎完全依靠蘇

聯的外國援助之後才被容納，這也許不是沒有意義的。

但當我坐了歐亞機從西北飛還重慶的時候，橫在我心裏的大問題是：這一種臨時辦法，是否能夠繼續把全國團結在將來必然要遇到的還要大得多的艱苦的考驗之下呢？一個政府正式否認一個政黨的政治存在，這政黨的收回其擁護隨時可以使這政府受到必然的禍患；我急欲知道，這樣的政府能夠繼續稱爲『國民政府』、『統一政府』到什麼時候呢？

第九章 帝國或民主？

一 自由中國的希望

世界上任何軍隊，如要對抗蘇聯中的中國底全部力量的，必遭挫敗。

— J·勃脫勒姆

這個經濟落後遭受着損害的國家底奮鬥，能否給予我們以任何教訓？能夠的。因為世界人類到處都在危險中。我們必須學習他們，如果我們自己在優勢方面作戰的話。第一，我要提出一項報告，這報告也許要使讀者驚奇：即是中國戰爭證明民主國家比獨裁國家更能作戰。中國還不是一個真正民主國，因而遭受着許多挫折。但因中國人民在戰爭中發展了民主主義底活力，免使國家遭遇最後的挫敗。中國政府雖不民主，然而這已成為一個民族的戰爭。民主主義的情緒，切實否定了失敗主義者底權力。

西班牙最初表現着真正民主國家只能被無限優越的軍備所擊敗。我們現在知道，法國的失敗，與其說是由於劣勢的軍備，毋寧說是由於國內出賣民主主義的結果。受着法西斯勢力所排擊的民主主義，必須具有動力，而且不斷前進，否則，只有和在法國一般，崩潰而已。中國的民主主義雖然幼稚，然比較的有動力。這樣，仍有勝

利希望。

第二、民主國作戰，以地方民衆底自衛行動爲基礎，倘不使各階級平均負擔，則作戰不能獲勝。全體性戰爭包含全體人民。平民與前線戰士，不論爲敵人攻擊的標的，抑爲國防機構中的因素，很少差別。備軍不足以防衛現代的國家，金錢的利益也不能固定民氣的根基。貪心和利己行爲必須祛除，而代以民主主義的邏輯，並使後者擴展及於全部經濟範圍。單是經濟的民主主義即能使一個民族，團結於共同關係之中，而此共同關係即爲軍隊所必需，俾可在砲火下密切聯絡。

第三、『自力更生』爲民主國最堅強的堡壘，且爲對付失敗主義所必需的消毒劑。戈德說：『一個民族應該能以隨遇所有的資源作戰。』每一公民必須規定担负生產工作和責任，不僅必須取得經濟權利，且須獲得經濟責任，不僅必須取得政治權利，且須獲得政治責任。失敗主義起自不負責任和人格底敗壞，而流歸爲逃避主義，以歸咎外來的因素，掩飾內部的失敗。

第四、人類人格的完整和歷史的偉大的運動需要一種能使個人底救濟與社會底革新有效地同時並進的主義。戰士與平民必須絕對地相信：偉大而明確的主義正在危險之中，這主義獲得勝利，則能在各方面根本改善他們和他們後裔的生活。這主義必須足以普遍感動敵人的良心，而在政治上打消敵軍底力量。中國未能準備這些勝利條件，即爲未能使日本接近覆敗的原因。然他們正逐漸受着感覺，或許仍能獲勝。政治、經濟和軍事底民主主義的發展極不平均，而利用國內資源『自力更生』的動員，其結果和真實的可能度相去尚遠。

福剛森 (Falkenhansen) 將軍曾經說：『中國自己不知道自己資源的力量。』這裏的『中國』如指

爲『中國少數人們』那是完全真實的，但或不是籠統的真實。假如一個政府發現了並從事於開發那潛藏於數百萬農民羣中和他們腳下的無限力量，則中國誠將如福剛森將軍所說：『不能被任何一國擊敗的。』

人們對這複雜的事件不能武斷地討論，但我在戰爭中的中國親眼目睹，却要肯定的說：國家所呈現着的戰爭力量業已動員者還沒有超過三分之一。這是指人力和資源而言。主要的弱點在於未能結合這二點因素，以招致最大的生產效能。在這後面，呈留着政治的和經濟的矛盾，等到國家處置下的人類力量底可能性完全被認識以後，這矛盾才能解決。

許多人因中國竟能作戰，大爲驚奇，他們忘却中國有着很好的勝利機會。我假定我是這樣主張的少數人中之一人；我預料戰爭爆發之年和戰爭多少要循着進行的趨勢，都符驗了。（文載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星期六晚報。）但災難將迫令國家實行必需的改革，使中國社會有效地改組，我對這點估計得太迅速了。現在似乎十分可能，政治的和經濟的改革，在亞洲戰爭擴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有機部份而進入新階段時，倘不加速進行，則機會或將完全喪失。

中國必須在最近的將來完成人力和資源底動員，否則在戰爭中的機動力將轉入他人之手。

戰爭成熟了必需的改革的條件，且使條件易於實現；但現在只有革命的指導的動力能推行這些條件所包含的意義。

就軍事方面說，至少有一打以上的要事，還沒有做到。在中國本部農民底有組織的力量，比別處更利用得有效，惟仍遠在可能度之下。原因由於缺少從主要的政府根據地而來的政治和經濟的援助。據行政院秘書蔣

廷獻稱：在自由區內，除正規軍外，尚有民團及保安隊約二百萬人。民團是地方上的武裝衛士，由地方紳董籌餉維持。爲紳董用作徵收租金，盤剝重利和拘押欠欸人（許多體態健全的中國人因欠欸入獄）所不可少的。民主的動員如果普遍地在中國進行，則僱傭衛士所用以實施產業特權的大批來福槍（至少一百萬枝）和他武器可以撥充前線士兵之用。一個民主的地動員了的民族，用市區自衛團足以維持安全。這樣不僅人民可以強固，而且一百餘萬的游惰者可以變成生產者，例如多數人在工業合作社爲新兵製作軍裝，或在合作社所開墾的無地主的荒地上生活着。

陳誠將軍說：大約有三百萬正規軍展開在廣大前線之後，在兩軍之間且有着廣闊的『中立』地帶，這裏各種交通路線已全被毀滅，日軍倘沒有大規模的準備，要在這裏進展是不可能的。中國軍隊保持這樣前線是被動的、靜止的，甚至是多餘的。

在西北，例如在黃河以西的中央軍比在黃河以東戰線上者約多三倍，而十八集團軍留在陝北和甘肅的後防地帶，僅有二萬人，大多爲地方志願兵，它靠着在日軍後方的主要部隊底攻擊力以制止日軍侵犯陝甘寧邊區。日軍雖有三四次越過黃河侵犯陝北，但常被追退回，以應付山西的反攻。所以從開戰以來，日軍從不能越過山西。現在，中國尚不能集積作大規模反攻的火力，除非大部份日軍力量在他處被牽制着。無論何處牽制着日軍，則在日軍陣線之後加強華軍動作，必然成爲重要的任務。事實上，我似乎認爲主要的反攻力量的本身必須從『牽制』中發展出來，也只有有在反攻力量充份強固之時，然後借重可能的西方來的打擊助成反攻的任務。

這點意義只是因爲大約半數中國主力部隊在自由區內『未動員』。這是一個只有靠着民主的動員才

能解決的問題之一，並且引起了爲加強政府所不可少的改革政治經濟的問題，俾可調出國家底最大的作戰力量。中國有着偉大的歷史的主義，這主義並不限於獲得戰爭的勝利。它底廣義是在全亞洲的解放鬥爭中作領導的先鋒。講到中國本身，日本如被擊敗，世界上沒有其他勢力可能恢復在中國戰前的半殖民地狀態。但欲求勝利，這個關係着全世界半數人口底運命的主義，不僅必須帶着改善人類生活的希望，而且必須立刻實現一個改良的民主的社會。

馬克雅弗里（Machiavelli）說得很對：『獨裁主義的目的在侵略，民主主義的目的在防衛。』防衛自由的戰爭只有應用最廣大的民主主義使大眾負起重大的責任，才能勝利。因爲侵略者以劫掠財物權力爲動機，而防禦底動力只能在人民實施力量應付危險時，纔能組成。

中國急需意義最真切的民主主義，依照這主義，人們不僅具有經濟和政治的權利，而且具有經濟政治的責任。在這裏，我所指的民主主義乃是從最小的鄉村出發，而達中央政府，其所代表權力之權，出自全體人民由底層至上層，經由當選的代表實施之。推托農民和工人有些是文盲（民主主義不實行則繼續爲文盲）因而茫然不能担负政治責任，那完全是廢話。推托中國大眾不能自治，乃是中國自己底半封建的官吏，所培植出來的神話。然而，必須奠定了民主的經濟底基礎，民主主義纔能在中國推行。

坦白的經濟問題研究者都知道，中國在戰前經濟呆滯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土地所有權集中於紳士階級的準封建的農村經濟，而這樣農村經濟底本身，因着複雜的理由，不能超越重利盤剝，囤積貨物和投機的資本主義前期的軌轍。因着戰爭，這缺點更爲顯明。政府從未宣佈關於土地所有權底任何詳明數字，但各類估計，顯

示半數農民竟全無土地，三分之二之多的農民成爲佃戶或半佃戶的農夫，而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人民則擁有全部土地的一半以上。就四川情形而言，在人口密集的成都平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爲百分之七的人民所有。通貨膨脹加深了農民的痛苦。農產品價格遠較製造品的漲起的成本爲低。重利盤剝盛行，利息不斷提高。在四川政府規定房租應保持戰前的租率，但各處紳士和黨部有關人員可設法規避它的限制。地主在經濟效用上比從前更不生產，主要的從事於土地和匯兌的投機、囤積，在農產品和製造品上獲取不正當利益，以及私運劣貨。

同時，顯然的，在建立了民主主義的區域內則推行着極不相同的趨勢。非耕農和離開家鄉移居他處的地主階級不再能收取封建的貢稅，而利益被奪的農夫正被授權認爲生產者和土地的居住者。重利盤剝禁絕了。如若地主留居自己土地上，則該處地租減去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農村借款被宣佈延期償還，囤貨和投機嚴厲受懲。地主權力正被改爲國家徵稅權力作爲作戰的主要基礎。縱使有不斷的戰爭底可怕的破壞和游擊區與資本聚積地的交通之斷絕，仍可十分有效地回復生機，以保持那建築在民主的經濟基礎上的防衛底表率。

蔣介石將軍在一九四〇年說：「我們所要建設的乃是澈底的民主主義。」我們現在希望政府澈底調和農民的需要。放債者和地主們從淪陷區逃至通商口岸，外國租界及香港，從事於投機的擾亂行爲，把囤積物變爲外匯，加以通貨膨脹和其他因素，都明示着土地改革的需要，以加強政府和增加稅收。如若具有趨向於變遷的意志，那末這點在目前比較的易於實行：把離開了鄉土移居他處的地主們底土地收歸公有；由政府用債券或通貨收買；出借低利息的政府貸款，使農民單獨或共同購買他們所耕的土地。

我們不能說政府完全不會注意這個問題。政府業已公布法律，規定由難民墾植公地、荒地，和在某種情形下離開了鄉土的地主們底未耕的土地。陳翰笙博士曾提出三種方法，授權政府從離開了鄉土的地主們收回未耕的土地：（一）以最低價格購買；（二）迫令地主售與墾植人；（三）命令地主免費租與佃戶，為期三年至五年。依照前二項方法，佃戶可用合理的分期付款辦法購買土地。雖然，陳博士指出大約只有五十萬難民（共有三千萬）可從這般土地墾植團體獲得利益，而其他現存的墾植計畫尚不能改變業已存在的地主佃戶間的關係。即使如此，這種方法確也「表明了一個最熱切的發展新經濟的企圖。」

但很可惜，落後份子不許可這進步的改革，也不承認各地情勢之急迫。相反地，他們却採取那鞏固和恢復地主紳士們底半封建的權力的經濟計畫。我已道及在「合作」信用貸款和農業復興計畫的方式下，大宗款項流入於紳士階級之手（在一九四〇年計有四萬萬元經由國家銀行付出，大約三分之一撥與川省）。許多這些信用貸款（決非全部）由紳士們用重利盤剝方式貸與農民，再把盈利用作投機，這樣，延長了資本主義前階段的中國經濟的墮敗。

假如政府有這樣決心，則能利多損少，易於應用農村經濟的戰時保險，作為為民主主義而建立的經濟基礎的方法，藉以消除目前的呆滯。顯然的，現在慣受紳士階級奴役的全體平民能易於推行進步的經濟改革，其法為再貸款與農民，使他們恢復土地管理權，實行平均負擔，廣大加強國民經濟，以鞏固政府作戰的基礎。

關於這點，無疑的，工業合作社業已證明農工能够完全負起經濟的民主主義的責任。在這運動中，人們確實見到實現中國將來的希望的一個真實的例證。在工業合作社目前奮力保持民主性質的結果上，人們可以

判斷能否使封建主義演變到民主主義的全般問題。如若官吏中的落後份子能迫令工業合作社採行農村信用合作社所建立的同樣的支配方式，那末那些尋求民主主義的中國底人們必須向別處尋求鼓勵。

合作國家 (Co-operative State) 的程序以真實的農村合作運動——密切地與真實的合作的工業化相結合——為基礎，與國家計劃相應和，現在我似乎認為這是授與中國奠定勝利的民主主義底經濟基礎的唯一機會。我想這也是中國的特質，在這特質內列強可在將來發展市場。關於這點以後將略加說明。

同時，國民黨容許他黨加入政府，增強它的目前的機構，因而縮小官吏與人民間的鴻溝，那是急切需要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國民主義中都代表着合法的事業，這些事業可由那擁有全國黨員的黨與黨間之合作暫時加以調和，等民主政治制度存立才有其他調和方策。沒有這初步階段，民主制度將如何實現呢？經過十三年的努力，『沒有代表的聯合』(Unific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似乎不能成功。共產軍與共產軍所保衛的邊區和其他軍隊與區域，一般只有在一個政制之下才能被聯合，那政制是容許它們在政治上的存在，和准許它們對於國家底決定有真正得發言權。

自八一三以來，共產黨員除要求使共產黨獲得法律上地位，以及幾許趨向於民主主義的步驟以外，從未有其他要求。共產黨似不願替代國民黨，假如國民黨竟能實行這時期的必要事件。在目前能够實行這樣一個改革而沒有內戰——內戰也許只利於日本——那是難於想像的。在內戰中無論誰『勝利』，整個國家將受重大的損失。

共產黨缺乏有訓練的技術家和行政官，須得徵集目前的許多官吏組成政府。如果他們不僅使一個舊官

僚機關接受一個新名稱，則他們爲欲完成民主的革命起見，將被迫打破那聯合紳士階級的反動的同盟。

雖然如此，趨向於澈底的民主主義的演變，必須而且迅速實行。否則國民黨或將失去權力。中國在目前的戰爭中，必須完成一個有動力的民主區；中國必須迅速完成動員，否則或被一個有動力的封建的帝國主義淪爲殖民地，暫時失却了歷史的地位。現在，中國比較容易爬入新世界，那是中國從艱苦得來的報酬，如果機會被實現了，無人再會懷疑過去很值得做的工作。戰爭的代價是極大的，但和中國所保留的現在的及將來的財富相比較，或和久長地被圈禁在黑暗中而人民又寧願爲奴不欲奮鬥毫無希望的情形相比較，則戰爭的代價，又顯然微小了。

假若妥協的『和平』被促成，而中國底主義底全部意義不能實現，那便成爲深刻的悲劇。然而，一旦在任何中國政府下實現了經濟和政治的民主主義，只有最殘酷的世界事變才能打消一個偉大民族底最後的勝利。在中國，三百年歷史正被縮成了三十年，縮成爲一個鬥爭，而要鬥爭的勝利，必須合法區美國甚至俄國革命底某種事績。時光不再行進；在政治上，時光是在衝進。執政的人們不能在火燒的世界繼續步行，但當他們仍能安然登岸時，必須躍奔。中國擯棄民主的動員愈長久，則日本愈近於勝利——因爲日本仍可獲勝。

二 日本的命運

戰爭現在進行……當爲是保全日本國家生存的企圖——R·蓋爾勃脫

本書所敘述的判斷錯誤，計算錯誤，和日本在中國所以易受創傷，讀者諒已讀及。日本軍閥不能取償這次戰爭的代價，而這戰爭對於日本人民只是拖累而已。

日本既已在『中國事變』上用去了大約十倍於日俄兩年戰爭中所化的代價，而士兵死傷又有四五倍之多。她的內債增加了三倍。正當日本在中國東北開始努力於『文化的感化』以前，即一九三〇年以來，幾已增加了百分之五百。這債款確已近乎日本全國在戰前總收入的三倍。國家全部似已抵押於戰爭中。日本與中國淪陷區的經濟關係給予日本以提早清償鉅大的侵略代價的幾微希望。

低估日本所仍保留着的攻擊力量，或斷定日本在任何情形下不能在中國取得補償，或認為她的戰時經濟不足以支持戰爭的再進展，那是錯誤的。少數專家預料日本在佔領東北以後經濟就要崩潰，現在他們仍能用亞丹·史密期的愉快態度讀他們自己用同樣態度所寫成的論文。返觀一九三二年和三三年歐美經濟學者所作關於日本在東北的希望，我覺得只有一二篇比不上納粹德國『經濟崩潰』的預言那樣的無價值。

在東北，日本獲得大於納粹執政前的德國二倍的幅員，擁有極大富源，如八千萬畝耕地，四萬萬噸鐵苗，六十萬萬噸煤，一千五百萬萬立方呎木材，而貯存黃金計值二十萬萬美圓。此外日本所奪得的交通機關底價值或廣大的資源、工廠和其他主要物品還不在內。可是現在我讀完正統派經濟學家的分析，知道他們非常相信日本在滿洲所得愈多則崩潰愈速的說法。除了一點意識（這不是經濟學家的意識）以外，他們似乎決非實體論者，那意識是：侵略必不久，因日本被迫作存亡的戰爭——而她或當失敗。

日本在東北建立了大陸根基，使能侵略中國，她在歐洲列強的綏靖外交之下，更有成功的機會。在今天，日

本擴展根據地到中國內地來，以求達到征服亞洲的目的。如果她在這裏失敗了，那是並非由於靜止的經濟律底任何障礙，而是中國抗戰底動力足以匹敵之故。

非專家而取深入專家所迷誤的範圍，那是不智的。而且，無論如何，這裏也沒有地位容得這樣難於接受的工作。但解剖日本軍事法西斯帝國主義的一些特點，使我們不再低估它底對於全世界的威脅力量，似乎是重要的。

『軍事法西斯帝國主義』的意義是什麼呢？它和第一次歐戰以後所實行的放任的帝國主義的方式有什麼不同？當一個國家的出口行商和資本集團聚積了『過剩』的貨物和資本，倘不竭力減低自己的利益，不能在國內市場處置這些物品和資本。舊帝國主義由是發生。這般國家參加着帝國主義的戰爭，戰爭的功能，由於政府購買軍火，（這不但不能增進需求集團的真正收入而且促成資本獨佔化）產生有利益的內國市場，同時在落後的殖民地設置出口市場，使資本暫時可能榨出良好的利潤。這解釋，雖過份簡單，亦能指出帝國主義底基本目的。當然，還有其他目的和內在的因素——社會的、政治的、地理的和觀念的。

日本帝國主義也當然具有這些特性，但更適應着自己底歷史的特點。在其他各區，現代帝國逐漸地自然地從放任的資本主義底矛盾中發展起來，而武裝力量乃為後者需要而產生。就日本言，過去在統治階段方面會有從資本集團方面來的極大程度的自覺的計畫，而且十分急迫，那是由於緊抱着半封建的經濟的內國市場的尖銳的緊縮，和日本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競爭勢力成就得太遲的緣故。

我們知道日本現代的海陸軍從半封建的統治的閥族中生長出來，當日本採行憲法時，他們只對天皇負

責。真正的國家支配權操諸於軍人官僚大地主和皇族之手。他們都主觀地計劃着使日本成爲大帝國。客觀地看來，只有使半封建的地主和商業資本軍事化，加以帝政的幫助，作爲對外征略的根基，才能開始走上這途徑。

帝國計劃底第一個成果，乃是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顯示着日本開始成爲資本主義國家。日本以賠款的方式向中國取得大批『信用借款』。這些款項乃是英國銀團貸給清廷的。她的統治者們又獲得土地上的財富，並且跨入高麗。軍人和國家的階級組織所策劃的更進的自覺的計劃靠着外國銀行的財政幫助，使日本在一九〇五至六年擊敗帝俄，當時她開始成爲最年青的世界霸權的競爭者。

在日俄戰爭中，日本化費了十倍於從前最高的預算。這些金錢是由國內舉債而來，作爲發展軍火工廠、交通、礦務和輕工業之用。然而頹廢的土地制度却未曾改革，並且至今還保留着封建性質。日俄之戰又使日本的資本從外國的領事裁判權中解放出來，使政府得有完全的關稅自主和全部徵稅權，並使日本進入國外市場。她的信用提高了。一九一三年外國在日本和她的『新領土』所投資本增加了十倍，大部份資本由英國銀行供給的，英銀行家確是奠定了日本資本主義的基礎。經過後來的日本資源的工業化，且藉國家底慷慨的津貼——向農民重徵稅收得來的——和高大關稅的輔助，資本擴張了它底外國市場，並且因利用世界上的低廉的勞力，聚積了鉅大的盈利，使資本本身更爲膨大。

在第一次歐戰中，當日本工業投資添加一百四十萬萬圓時，後者的程序更爲加速。那時日本初次成爲貸款達二十萬萬圓的債權國。重工業也適當地發達。礦務、航務、交通和電氣工業顯示着進展。

這些年代中，在日本底發展底背後的轉動力乃是戰爭和帝國。這轉動力在日本社會中具有壓制反封建

和民主勢力的功能，並且具有爲開拓國外市場而不斷改進它自己底需要的經濟功能。因爲日本底擴展從未在國外被抑制，民主主義從未發生強力足以控制軍人、財閥、皇族，或特別是代表地主的官僚政治。不管國內有許多爭執，而這些主要的政治力量常在危機之中合力作戰，以轉捩國內的民主革命。因此，當國外市場引起尖銳的矛盾和國內發生最危險的情況時，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主動力促使日本統治的寡頭政治決定趁着一九三一年在中國東北的戰爭，尋求出路。

一九三七年侵略中國的原因在那裏？那是有許多複雜的因素。中國工業已復元，並且正在競取自己在國內的市場，競取日本『自己』底國外市場——這些市場也正被敵對的列強更充份地壟斷着。滿洲並未解決日本底獨佔的資本主義在國內的困難。民主主義又在議會抬起它膽小的頭，阻止軍費的增加。大眾不息地要求『改革』。海陸空軍不有重大的事變不能強迫通過他們爲秘密巨大的軍備程序而要求的經費。

中國東三省經濟發展的性質對於日本底政策也必有決定的影響。東三省在日本底資本儲蓄項內吸取了數十萬萬日圓，但此係投資於生產，而這些生產除充軍備外，很少出口和銷售於內國市場。強迫東三省佔領區成爲資本化，乃是奇怪反常的事情。顯然的，銀行資本很少匯往殖民地作爲購買不動產或裝備物之用。東三省發展交通實業的財產的全部——礦產和其他一切資源——已被實行沒收。日本所輸往的那樣真實的資本大多用作開發軍隊所奪得的資源和維持軍隊所奪得的工廠，以發展軍事價值的計劃。

在東三省，日本獲得具有非常價值的聚積着的原料和資源，那裏有低賤的勞力，只須投下管理的資本使它真實地生產。她所準備的一切資本真實地表現着國內新資產成爲綜合的資本化的性質。除了一件事外，發

展不應不『健全』。大部份發展集中於軍隊，認它為市場。發展底轉動力就是軍隊本身，它以東三省為軍事根據地。

日本帝國主義底奇妙的形態乃是帝國金庫——實際上是支配國家資本的集團——在許多資本家底事業中擁有一半股份，並在武力奪得的新資產中分得一半利益。日本底獨佔的資本接收了其他半數利益——一部份是國家的津貼。

現在日軍在大陸上取得大宗財物以後，它和私有及國家資本的關係也增加了。實際上日軍支配着東三省底經濟發展，它可藉此加強它自己對國內經濟的發言權。它自必規畫使大部份輸入東三省的資本成為軍事化。這些資本，無論在國外或在殖民地，大多仰託軍隊，認它為購買者。

日軍使這市場擴展，增加自己底權力，逐漸擴大了不經濟的計劃，迫使日本逐漸增多負債。為欲使人民允許負擔更重的捐稅，以支持那對於人民毫無價值的負債，日軍就需要一個『全國的非常措置』。日軍必須以戰爭方式覓取一個出口市場，推銷所有的過剩貨物，以保持和增加生產。

我並想不到這個解釋應使各人滿意。這不過視為經濟上所不可避免的侵略底主要因素中的有趣的因素而已。

這樣日本在東三省似乎根本上已脫離了帝國主義底放任的型式。她成為軍事上的法西斯國家，因為陸軍逐漸建立了資本穩定的控制權，這權又使她規定投資的性質。這畸形現象只能使她本身繼續擴展軍事行動底主要企業。

當然，那只是客觀的情況。在主觀上，日軍對華作戰，推說是『使中國人民脫離共產的壓迫』，建立『東亞新秩序』，後來又說是『排除外國帝國主義的剝削』，爲實行『神聖的使命』，又假託大和魂中的神祕，以恢復舊時封建國家的教義。

日本終究必須在中國排除一切資本的持有人，最初爲中國人，最後爲外國人。

在戰爭之初，日軍即控制着大部份担保外債的中國稅收。它們從中國取得數百萬元的金銀，但海關報告冊上却無此記載。它們逐漸獲得通貨底主要經濟單位。完全同化貨物市場，把製造品換取可換黃金的中國法幣。它們用這手段而聚積着的外匯的總數，貿易統計表上從未宣佈。實則中國常被作爲日本國內的市場。它們輸入或輸出大宗貨物和資財，從不經由海關查核。

可能的，日軍已使用了很多稅收。它們底收稅權力雖未深入內地，然它們已完全控制着担保外債的淪陷區內的海關、鹽稅和鐵路收入。中國從前在關稅一項中付出百分之三十以償外國資本，而日本則拒付海關、鹽稅和鐵路的借款，因此她已實在沒收了約共七萬萬五千萬美圓的外國投資。

日軍不僅取得中國政府底大部份財產，而且沒收了大小工廠，獨佔了分配的業務。它們又取得國家的礦藏資源和許多固定的私人投資。這些資財合計約數十萬萬元，比日本可能希望在多年中向華爾街和紐約城所借者爲鉅。除了再以投資方式化於軍備和最後化在戰爭中外，不須再付出任何一部份。如果這些資財可能保留着，誰能說它終究可勿償付代價呢？

同時，沒收一個整個國家的最後的步驟尙待進行。就對內言，它們正用着消除中國青年商人和資本階級

底功能和財富的手段，以聚積資本；就對外言，它們必須排除外資底權利，以支配中國市場。最後日本必須接收外國在華的商業投資的資產，以完成她底佔領地底資本化。後者約共二十萬萬美圓，並且表徵一個具有極大戰爭價值的大陸根基地——特別是航行、礦務和實業。但日本最後必須和英美作正面衝突，也只有用這手段，才能決定保持或放棄。

問題只在於日本是否具有軍事力量來嘗試。因着顯著的不安定的經濟，立刻認定她不能嘗試，那是錯誤的。如果我們對着平時靜止的經濟型式，或對着它底戰前的甚至單是現在的資產，或以目前日本或中國淪陷區底大眾購買力相關連的生產為基礎而判斷日本的經濟，也許將感覺迷惑。關於日本經濟的狀況是這樣的：自日軍佔據東三省以來，日本經濟不時在一個體制內變動、擴大和改造；在這體制內，軍人成為主要的消費者，而人民消費只可隨軍用而轉移。這樣經濟，在我們一生中，不能恢復太平的社會。它顯然不可避免地依據着繼續不斷的擴展和戰爭，作為解決本身一切矛盾的方法。

大約四分之三的日本預算雖已歸入海陸軍，史坦因（Guenther Stein）（他不主張對日本估計太高）說：『一半以上的日軍預算費用，認為是充作對華作戰的代價，大概是誤解。自日軍在中國達到幾許自足的程度以來，其他一半日本底『戰爭』費用，或許已增至三分之二，業已充作準備最後逐退亞洲的西方列強之用。』

沒有人確實知道日本已儲積了多少戰爭原料，因為自一九三七年以來，無從得見詳細的輸入報告。多年來，美國一國售給日本的戰爭原料比較日本在華所耗者為鉅，並且給予日本以技術的援助和外匯，使她迅速

地發展戰爭工業。日本購買英美底戰爭原料，至最近為止，超過了全英戰爭工業所用的原料。

日本重工業靠着外國的輸入和從大陸上得來的財物而增加。史基因報告一九三八年增加的比率如下：機器和機械工具設備百分之二十五，五金工業百分之十，化學工業百分之五。同時期中在大陸上所奪得的或建設的工業尚不在內。日本工業對於空襲所能遭受的損害或較一般所假定者為小。日本的十一萬二千所工廠，大多為小廠，平均每廠雇工人二十八名，而且多數工廠設在遠離交通中心的鄉村。此外，數千小型機器和五金廠近年已自動地或被迫地移至大陸。在大陸上，陸軍已建設了很多重工業和軍火工業，其所能吸收的大量的鐵和其他原料，比日本現在所把持者為多。

從戰爭觀點言，日本三島苟非在自己的海峽中被封鎖，而與滿洲隔絕，則糧食可自足。她準備着的戰爭原料，估計足以支持對於一個大國作戰二年。她底全部戰爭的可能力仍較英國或美國為小。可是如果日本在進行戰爭時除了剝奪列強現在從殖民地所吸收的幾種重要戰爭原料外，再攫取了大東亞全部資源，則她在軍事經濟中或可自足。日本要和英美作戰，則她在耗盡她底儲備以前，只有從事於攫奪殖民地的賭博。

日本侵奪滿蒙，乃是在軍力上一部份的大轉變，她決意在亞洲從海軍國變為陸軍國。海軍司令們或不完全承認，但多數人現在懷疑：單是一個海軍國，即使能集合優勢力量以打擊日本的海防，也不知能否迅速克服日本。因為她已發展了大陸的根據地——根據地達到了緬甸邊境，接近英殖民帝國底心臟——她更可安心對抗海上的封鎖。關於這方面，她目前已在歐洲殖民帝國底東方殖民地上享着利益，這些殖民帝國仍然靠着海權保持土地，而她們底海權又劣於日本。

日本仍有多數後備人員以備侵略亞洲東南部。她在中國底損失重大，死傷或許達八十萬人。然而因為每年有四十萬體格及格的日本青年達到軍役年齡，因此在華的損失不致使日本人力發生動搖。蘇聯的專家在戰爭之初估計日本能動員六百萬戰鬥員。那是在她業已強迫徵得大批中國勞力的後備以前。她底五年陸軍改組和再補充程序開始於一九三六年，自後又因德國幫助而擴展，裝備和效能更爲增進。現下有訓練的後備役約計三百萬人，而常川駐防中國淪陷區或在中國前線作戰者幾達一百二十萬人。

日本侵略計畫底主要弱點，或許不是經濟的也不是軍事的，而在於她底政治的戰術和戰略。當然，在全體性戰爭中，這三個因素是不能分離的。但，或許我們能說，在不適當的日本政治的戰略中，我們很明白地看到了日本全般局勢中的深刻的矛盾——在這一要點上，日本底裝甲竟薄得像一張紙。

日本在中國的的政治的戰略底不合時代性，從她自己底帝國主義底封建基礎中生長出來，她底資源不充份，須用種種手段趕速獲取資源。此外，似乎也有若干『天然的』政治的不適當，那是自然地附屬於政治的無經驗之中，由於軍事訓練底封建的方法，更加深了政治的不適當。

有些人認爲，必須和紳士階級合作，有些人甚至對我說，他們願意籠絡農民——例如杜平，他的舅父近衛公爵現已任爲負責規畫職團制國家的七個永久委員之一。但陸軍首領們却如此短見，不分皂白地打擊地主、農民、商人、銀行家、學生和勞工。因此犧牲了可被利用的非完全反對日本的份子。

同樣的，他們不需要在各方面反對西方列強，如果有一些融通圓到的手段，他們或已輕易地使當時睡眠中的西方列強甚至入於更酣眠的狀態。他們可借用張伯倫哈立法克斯底綏靖外交的一切助力——受着不

適當的指導的克萊琪大使會藉此竭力尋求『諒解』的基礎——全力支持他們底計畫至少已能使英離美而孤立，直至他們準備着希特勒式的最後的背信。

日軍在中國的行動，對於全體中國人却是有着不可思議的教育價值。她底戰略不啻說明中國抗戰底決心和一致。也表現着她至今尚不能在中國劈開道路以獲得政治的把握。

這些弱點當然反映着日軍在國內的領導趨向於復古的程度。在政治上，現在所達到的乃是七十年前統治着日本的舊幕府的復活。在純粹封建時期這一制度之下，幕府將軍通過不同的稱爲『大名』的封建首領們的連環着的聯盟，而統治國家。

被民主主義打破了的各種封建的謎和迷信，現在且已成爲新機構中的教育底『魂靈』基礎了。因着這種原因，日軍底戰鬥精神次第降落，而華軍底戰鬥精神，則確已振發。即在戰爭之初，日軍缺乏那些經過政治訓練的華軍底精神，而肉搏決非華軍之敵。研究日軍戰術的外國專家覺得訓練底封建特質乃是一切弱點底根源：在運動中缺少理想力，對於敵軍戰鬥力估計差誤，出戰時缺少體力上的忍耐力，下級軍官無機動力，攻擊部隊替換時浪費火力。

蘇聯觀察家曾親自對我指出：日軍官對於他們步兵底進攻精神沒有信心。他們在敵陣被轟毀以後，還是延長砲擊，然後乃命令步隊攻擊，直至坦克車隊確已佔領敵陣，然後推進。有幾次，日步兵和優勢火力及坦克車隊隔絕後，被迫攻擊而大敗——例如在台兒莊，最近有多次在湖南。我想任何軍事觀察家將承認我底敘述：日本作戰勝利全憑她底龐大的技術和軍備的優勢。

但日本底進展大多得力於外界的援助。新陸軍幕府好比歐洲的法西斯主義。開始時，它底最壞的敵人在國內，最好的朋友是在國外。它靠着從外國來的太多的幫助輕易地獲得太多的勝利，國內的反對派因而逐漸失去了力量。這是意外的幸運。日本甚至在一九三七年舉行末次選舉時，結果雖無效能，而人民却用重壓力量排斥了代表陸軍底傾向戰爭的候選人——那是另一個侵略緣由。這些反軍閥份子現在那裏呢？大多數應徵服役於海陸軍中。

百分之八的日軍是從農民家庭中徵募而來。開戰以後，他們底生活狀況漸趨惡劣，而戰爭尙未在日本自己底半封建的農村經濟中解決任何矛盾。一百萬地主門閥向百分之七十的農民收取地租，全部農產利益百分之九十歸入地主，重利盤剝者，捐稅，和政府。在實業界，十二家貴族支配着全國資本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日本在中國所得任何經濟利益都已流入國內統治階級之手。人們可以根據痛苦加深的證據，證明日本底民氣已降落至若何程度，但不足證明帝國創造者已處於從內顛覆的急迫的危險之中。這只是進一步表明他們繼續從事戰爭的先天的深刻的需要。我們要制止這戰爭，只能在後方和在戰場中用優勢軍力並且巧妙地利用他們底政治弱點，才可成功。

但局勢是變動的，雖然日本底政略至今仍無效力，雖然她控制佔領區的力量確是薄弱。正如她現在所爲，把軍隊調入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局勢當能變更。因爲在那些殖民地中，列強底政治情況在幾方面有如日本同樣的落後。如果她們擊敗日本，則將需要一種防衛。那防衛須以政略底更高的概念爲根據；而這政略須對於日本的侵略政策給予有力的否定，且能使殖民地人民和日本大衆共同負責。

三 上帝要毀滅誰？

社會底秩序，除了用它自己底手之外，從不會消滅，這在歷史上也許是眞確的。

——J M 凱納斯。

西方底亞洲政策，和我們對於世界這部份的全部觀念深切地需要澈底的改變，在我們要瞭解這點之前，約略檢討一下過去關係中的我們底重大錯誤，是必要的。

東方的『問題』與西方的『問題』是不可分離地聯繫着的，單獨解決一個問題而不及其他，那是無用的。這裏的戰爭根源於第一次歐戰底結果。那次戰爭未能決定帝國與民主政治的問題，或未能尋出任何方式，使帝國主義延長生命而不致有另一次鉅禍。我們也許可以責備美國不加入國聯，或者可以歸咎凡爾賽條約，但基本的原因却有着深遠的歷史根源，並且太複雜，不能在此剖明。最重要的是帝國殖民地底全部的制度，是它對於每一脆弱的國際合作計畫的基本的否定。世界現在又分裂了。那是由於各『主宰』民族爲爭奪臣屬民族統制權而互相戰爭。我們將不能在世界上海受任何和平與秩序，直至被奴役的民族獲得了自由。

我先要說明，我完全贊助英國人民爭取自由。我認爲盡力幫助防衛和革新英國底民主主義是重要的。但不列顛和民主的自治領，並非就是作爲殖民帝國的不列顛。如果英國自己底民主主義得能真正保存而發展，那末歐洲和亞洲的矛盾也許可獲解決。

英帝國幅員現在（或過去）是大於俄國一倍半；包含全球可居住的面積百分之二十七。和世界人口四

分之一。在這五萬萬的人口，連自治領在內，享受民主自治的還不到七分之一。帝國人口五分之四，約等於她底屬民九分之八是亞洲人。多年以來，他們會鬧着要求自由。

我們既然拿遠東做出發點，現在就讓我們從凡爾賽條約底結果說起。這條約並未矯正了東方的殖民制度，却反而使歐洲各帝國宰制着五萬萬亞洲人，和地球上這部份的大塊土地。正如義大利一樣，帝國底重分割給予日本煽動的拓殖家，以轉移大眾對於國內情況不滿的好機會。日本在第一次歐戰中所分得的贖物，只有太平洋中一些德屬的島嶼。

世界重分割結果，滿足了英法（她們接管了德屬非洲和亞洲底其他一百萬哩）後來在華盛頓舉行軍縮會議，一九二二年成立了九國公約。這公約保證着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那是剩餘的完整），規定各簽約國尊重門戶開放原則。每一國家應有貿易、投資和居住的均等權利。中國應繼續忍受不平等權利，忍受外國領事裁判權，並仍為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列強底次殖民地。初次打擊這條約的是中國人自己。國民革命的開始以恢復中國主權，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而代以平等條約為目的。正如我們所看到，這努力是無結果的。

同時，以中伊為犧牲的向大陸推進的日本帝國主義計畫受挫以後，日本激起了類如德國維瑪共和國時期中的自由主義。民主勢力表現着極大的力量，並且顯示着完成推翻封建主義的徵象。這是一個艱苦的奮鬥，而日本民主主義終於在一九三一年消滅。陸軍和市民的反動者在覺醒人民的威脅下設法轉移人民頭腦，使傾向戰爭和征服作為出路，以消滅民主主義運動，有如希特勒在德國的所為。

日本在亞洲的軍事法西斯主義和歐洲的法西斯及納粹主義有這相同之點：它是反革命的，在它的勢力

下，那以消滅國內剝削階級來解決它的問題的國內民主運動，被後者巧妙地鎮壓着，並且被遣送到國外去消滅那邊的『剝削者』以尋求解決。國內的『有』的階級，誘惑着若干『無』的階級，使它們相信『無』的帝國主義者對抗『有』的帝國主義者的共通的目標。這樣國內鬥爭暫時變成了帝國主義的戰爭。就日本說，對華戰爭對於日本人民在觀念上自始至終被指為對付西方帝國底掠奪所必需的預先的準備。

這種詭辯，在國家政策軍事化以後，對於日本多數人民，似乎是合理的理論，甚至比德義更少神秘性。日本在過去是一個小而有力的國家，人口七千萬，平均每方哩人口密度四百七十三人，比任何列強為高。她過去又是半工業的國家，必須輸入大部份原料。她底統治者過去向國外注視，見到英法美和蘇聯佔有着全世界土地面積百分之六十有餘，約擁世界棉產百分之八十一，鐵百分之七十，煤百分之七十四，石油百分之七十六，錫和鋅百分之九十二，錳百分之九十二，金百分之八十六。在這些國家內，並且還有『人口不多』，未經開發的廣大區域。

在東方，日本又見到了少數歐洲『民主主義』底徵象。這似乎是使白種人成為棕色人底主人的特權；在富饒的比日本本部大三倍的東印度，數千荷蘭人一直從六千萬土人底勞力和資源中聚積着財富。在越南（也比日本大）亦是如此。日本又見到數千英人從傳路支斯坦到南海的所轄的廣大殖民地上搜集着財富。尤其重要的，日本底統治者們注意到東方底財富已被奪去而由武力把持着——但並非可以不受一個恣肆而有力的拳頭的打擊。

當然，英、法、荷、原可在民主的聯盟範圍內，用解放她們底進步的殖民地的方法來使『無』的侵略國在

政治上解除武裝。其他殖民土地亦『可』被放在國聯的國際委任統治之下，民主權利受着保障，且能迅速地
 被訓練成爲自治和民族聯邦的份子。同時，國聯亦可規定各國在殖民地都有貿易投資的均等機會。這樣一來，
 日、德、義煽動家和戰爭投機者便不能用『無』的國家的口號欺騙民衆了。她們將同列強一樣『平等』了。而
 世界軍縮和集體安全的基礎亦可奠定了。那時候各國人民也許已移轉注意力於他們國內的問題上。他們鑒
 於不滿意的消費者在他們自己國內市場的需要，或已聰明地從事於提高國內的購買力，以增加生產的財富，
 並且從事於發展一個經濟政治的民主主義，以代替榨取殖民地財富的不切實的希望。

但是，爲什麼沒有這麼做成呢？爲什麼日、英、法的主人翁拒絕這樣好的計畫呢？小民主國中一個無禮貌
 的代表有時會粗率地問到它。但你要期望某一國底資本家考慮放棄他們底奎寧、油、和橡皮的獨佔麼？或期望
 某一國人相信解放任何一塊殖民地土地並非等於『文化文明的消滅』麼？它底困難就在於這計畫等於取
 消帝國。如果你仔細一讀大殖民國家代表在日、英、法或他處所發表的演詞，你就知道這確是困難的所在。解放
 殖民地似乎是殖民帝國所願做的最後的事。她們認爲尙未到此時機。還有一些土地要等用比第二次世界大
 戰不能再可怕的代價來分割它。

因此，南次郎、荒木、和本莊繁等領導下的軍閥便在日本崛起，絞殺了日本的民主主義，墨沙利尼製造了一
 種『觀念』和第一羅馬帝國底計畫，希特勒在德國高舉了卍字旗，一切小元首們又在後跟蹤而起。一九三
 一年世界共和的火焰終於在中國、東三省熄滅，而帝國聖壇上又準備着新的犧牲。

就英法說，她們底世界霸權再度的打擊，大概在她們容許日本黷武主義在東三省發展時就已注定了。那

次成功鼓勵了墨索里尼進攻阿比西尼亞，並且實際地奠定了後來縱容希特勒侵略的綏靖政策。這次大禍難實基原於那次重大的錯誤。

我考察過滿洲的戰爭，認為它的主要衝突與其說在於中日之間，還不如說在於那時還存在着的日本主義與日本陸軍極端派及他們底國內與黨之間。假如當時用強有力的態度支持九國公約和凡爾賽盟約，則軍人當已失勢。我會親眼見到這戲劇式的表演，例如，在當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發出警告牒文之後，幣原子爵秉承上諭，命令日軍停止進攻錦州，陸軍因此立刻撤退。拓展主義者顯然遭了嚴重失敗。如果那時領導國聯的英法採取積極行動，局面或已改觀。也許可以促成殖民地問題的國際解決。可是後來竟無其他行動。日本軍人斥責史汀生為虛聲恫嚇者，又從打擊中恢復了過來，幣原內閣也就崩潰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史汀生再度努力，他對中日致送牒文，聲明他底「不承認」政策，宣布美國不承認在中國底國際狀態中由武力所造成的任何變動。這牒文底副本分送九國公約其他六簽約國，希望她們贊同這聲明，俾可迅速決定行動底共通基礎——因為美國未加入國聯，不能參加討論。這牒文對於日軍也有直接抑制的效果。然而西門爵士主持下的英外交部後來發出莫名其妙的公報，把史汀生底主張打消了，這公報認為日本已允許不違反門戶開放原則，因而認為沒有引起任何驚慌的理由。它好似擁護東三省的日軍，並幫助軍人克服在日本的反對派。

在這種外交政策之間的大空隙中，軍人們找出了侵略的道路。我記得有一夜在哈爾濱與大橋（東京外交次官）共餐，大約正當史汀生從唐寧街獲得缺少感應的答復之時，大橋前任哈爾濱總領事，業已參加那時

勢力仍然微弱的外交部底擴張領土派。他因飲酒過多，有些談言無忌，他對我說一椿冒險旅行的很長的故事，那是在九一八以前，他帶着大金錢財到黑龍江山裏交給匪徒。他又用同樣口氣說：『日本毋須憂慮，史汀生上校不了解日本，但英國對我們更爲了解，否則我們或將陷入困境。』

大橋常常充滿着赤色的恐懼。第二次見到他時，他說：美國不了解日本底使命。他是一個使人驚奇的青年。在同一天，他告訴我一個有趣的回憶：他在平綏路上旅行，當時那裏正在鬧荒，他想挑選幾個最好的中國婢女，到得綏遠，所有的女子都被送往北平去了。像史汀生那樣的理想家那能了解大橋那樣的現實主義者呢？

但在英外部公報拒絕以後，史汀生還堅持他底主張。二月初，他向西門建議由英美向日提送共同牒文維護九國公約，再由其他簽約國發表宣言。據史汀生底回憶錄所說，西門規避此事。史氏說：『我最後從他底態度上深信英政府對於共同提送牒文感覺猶豫』（史汀生著遠東危機一六四頁）這消息立刻傳到日本，東京獲得關東軍幕後的充份支持，日軍便迅速地佔領全部滿洲。

國聯因循了數月，英法對日採取有效的『延宕』步驟，更爲明顯。許多人常認爲西門替日本辯護，尤甚於替國聯辯護，日本主要的辯護人松岡當時在日內瓦恭維着西門，認爲他比他自己更能闡明日本底理由。不料松岡就任外相後，却聲明日德義要立刻分割英帝國了，那是對於西門的報答。

史汀生切實批評英法的因循態度說：『小國抱着擁護國聯所力爭的原則的意念，比她們底大國同伴更有生氣，當然困難是不多的。……但，雖然列強如此，小國却沒有畏縮的意向。至於大國方面有力的領導底重要性，她們已有着很坦白的表示，而這樣領導則未曾表現。』

「領導」從未表現。國聯後來採取了一種不承認主義，但爲它爭執數月之久。當日本幾已佔領全部滿洲之時，李頓爵士偕同大批隨從去調查已由武力解決了的「爭執」。正如威爾遜爵士（Will Rogers）所謂：「馬已被竊，乃鎖馬廐」已無用了。

英政府對於史汀生底回憶錄從未予以任何正式答復，但近來英方顯由外部核許而說明英美共同援引九國公約之無裨益。這些駁復更無情地暗示着史汀生是健忘病底犧牲者，它更暗示着：如果援引公約而引起制裁，甚至戰爭，美國也許脫逃，那是英國所感恐懼的。這是對於當時在遠東的人的詭辯，因爲那時日本無力對任何國挑起大戰，而那時七大公約國連同中國能於數月中共同在經濟上擊破日本底軍事力量，更不待言——特別是日內瓦。如果那時確定全部殖民問題的任何適當的解決，就任何情形而論，英國對於制裁，極少關切，它究曾向史汀生詢問美國的支持這樣行動與否，也毫無證據。

當然，那時中國政府自己底政策對英法底綏靖政策也有若干影響。中國底嚴重的錯誤，乃是接受英法勸告，命令張學良撤兵。在那時抵抗，雖或無效果，亦可以驚動世界，而促成中國團結。此後五年的內戰或可避免，至少亦可縮短時期，而滿洲運命，亦不致交給國聯。

現在，我也不知道如果西門贊同援引九國公約，美國是否真會實行制裁；不幸英國自從忽略了答覆的機會以後，一切不知。但真正使人驚奇的事情乃是史汀生這樣提議之後，而英國竟會忽略任何使美國參加防衛她門底帝國利益的機會——中國現狀必然構成了帝國底利益。美國在華投資不滿英國所有底十分之一。實際上：果英法失去一切自治領地和殖民地（加拿大除外）而美國投資也因之完全喪失，則對於美國，每人

損失不滿五美圓。在東方的帝國事業中，美國只有少數經濟利益的確，一九三二年國會通過菲島完全獨立時，已承認這點。這證明美國過去的外交政策乃是一種將來不牽入於殖民地之爭奪的政策。美國投資於菲島的全部價值不料竟不及兩隻超級戰鬥艦的價格。

當然，世界上還有比投資和直接貿易更重大的事，這些將在後面討論。但奇怪的是：當日本初次攻擊英國遠東的外衛時，英國竟放棄任何使美國對集體安全負責的機會。

英、法、荷三國在世界這一部份有着防衛和解放那擁有人口五萬萬的帝國各民族之極大責任。人們總以為一個聰明的外交政策當已看到日本向中國擴展將使侵略者進入她們底殖民地的必然性。她們底樂觀怎樣解釋呢？這裏我不能審察那時英、法、荷外交底各種源泉，但我們却可注意那影響它底決定的二三要點。

英法統治階級中有許多人一致深信日本有合法的拓展權利，一如他們認為希特勒應有的權利，並且應該規定在『正當方向』中進展。給予日本以『生存地位』則日本當可就範，而傳統地尊重年長的殖民國家。其次，有些最有勢力的英國貴族相信：日本控制滿蒙，甚至佔領一部份華北，不致礙及帝國底利益。或許他們並非不知英帝國底地位與日本帝國底擴展相抵觸。犧牲中國一些土地，不致嚴重損害他人。它當建築一條必需的隄防，防止布爾塞維克主義在北方散佈，正如有特勒是制止史太林在歐洲發展的良好工具。

第三，英國保守黨統治者深信（這裏沒有篇幅可引證文件，但證據很多），法國統治者熱忱附和：一旦日軍『從它底邊界上除去了布爾塞維克威脅』，那它就可恢復東亞『和平、秩序和投資安全』的統治。領土的再分割將予中國和日本以較好的投資市場。倫敦金融界和法國 Bourse 斷定日本沒有它們底資本，不能成

功，且須和它們妥協。很奇怪，這裏有着若干美國政策底歐洲批評底根基，終於影響日內瓦，決定不與日本侵佔滿洲的行爲相合作。這政策竟迫令日本極端主義者繼續侵略，毫無制止的效果。但強迫着國聯採取這態度的並非是美國底「不承認」，而是世界大眾的意見。

政治家們的一些希望，消逝得這樣緩慢，這樣痛苦。許多英國統治者直到日本最近和德義簽訂了軍事同盟——希特勒執政以來固有侵略底政略的一個結合——才相信她們過去的錯誤。我底書夾內留着日本軍人領袖們在一九三一年後所發的聲明、記事錄、和談話，他們在這裏明白宣佈他們接收全部英國利益的決心。列強也有這樣文件，但顯然地她們認爲這些並不比希特勒底「我底奮鬥」的希望和成見來得重要。

責任當然在於本國政府。或許我們會天真地想像到，例如相信可與墨索里尼底弗朗哥和好的張伯倫和他底屬員們，當能在日本對華戰爭中見到任何引起急迫的驚慌的原因。『萊巴新那裏亞』(La Pasionaria)喊着：『當心！你們必須援助西班牙人民！現在是我們，明天將輪到你。我們需要來福槍、飛機和大砲，以攻打法西斯黨徒於你們底邊界上！』但張伯倫、西門、和哈里法克斯等負着帝國責任的人們深信非良哥會受英國黃金誘導而歸來。在中國，關於日本，是相同的。

一個焦急的議員會辯稱日本是永遠損害着英國底利益。這裏是張伯倫底著名的辯駁：

『這許多資本(資本)正在這戰爭中被毀滅着的事實，』張伯倫顯然認爲並非壞事，因爲他說，『我想戰爭過後甚至有更多資本必須投到中國去。誰將供給資本？必然的，日本不能供給資本。因此，當這榮譽的紳士似乎在默想將來日本將獨佔中國貿易，而我們則被排斥時，我說他是在侮蔑事實。』

張伯倫錯了。資本並非流往日本也非流給弗朗哥，而是流入於軍備中，流往美國。

一九三七年日軍侵華後，龐納博士屢次在日內瓦籲請有效的援助。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最後的申訴中說：『如果中國屈服，則歐洲現下的緊張情勢的結果和列強在遠東的權益的遭遇毋須用智慧的頭腦去想想了。』龐博士要求並不為多：對華經濟援助，制止戰爭原料輸日，救濟難民，和履行國聯盟約。但這顯然需要比英國當時所能使用的更多智慧的頭腦。英外相哈利法克斯在答復中重行表示深切的同情，末後作慷慨的保證：『英政府定將繼續留意於中國人民底需要。』這樣，英國忽略了發動國聯集體援助她底遠東防衛的最後機會。法國代表龐納在決議中竭力贊助哈氏底主張。

同日在日內瓦，『英法否決了擴展反侵略陣線至遠東的中國提案。蘇聯、新西蘭和比利時代表則贊助顧氏底請求，然而英法外長數度反對這請求。他們底反對實際打消了這計畫。邁斯基 (Maisky) 說這信念正遍及全世界，堅定抵抗侵略，乃是防止大戰的戰爭。他又說這原則可完全應用於中國。』(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合衆電)

歷史遭逢着怎樣意想不到的結果，回顧這一幕情景，那時仍然在『注定了運命的世界』尋求安全的俄國當帝國使者之前辯護着資本主義的案件，而這些使者拒絕了和平救世的最後的方法，或許在這日內瓦的最後的勝利中，他們知道，已替自己贏得了文化底敗績。

然而，在這時，當英國在日內瓦拒絕一個廣泛的裁制歐亞兩處的侵略的集體安全計畫時，張伯倫派遣特則 (William Strang) 至莫斯科對於另一協定進行『談話』。我們不知道關於這協定的詳情，也許將來

的白皮書會宣布出來。

我在報紙和可利用的外交情報中密切注意那邊延數星期的莫斯科談話的進行。俄人繼續要求一個展延至遠東與中國合作爲根基的兩大陸公約。還有關於波羅的海和戰爭時向波蘭進兵的權利等要求。甚至在這些談話開始之前，蘇俄或已有所決定。或許在張伯倫拒絕了李維諾夫底建議，和哈里法克斯否決了邁斯基在日內瓦的提議之後，已無任何訂約的機會。我們不知道。但我依據可靠的談話經過的根據，英國決不展延公約至遠東。

六月十九日，我讀了兩條倫敦電訊，這些電訊底反語似乎證實了這要點。所有這些要點，難逃莫斯科底慧眼。哈里法克斯會請日使重光葵至外交部着重說明非難的理由，因爲英政府已收到天津英僑婦女受辱和其他全不需要的對於英僑脫衣搜查等不快消息。尚有一項錄自糧食業週報的電訊。據稱英國糧食購買部業與日人訂定購買罐頭薩門魚六百八千箱的交易，付給日人三千萬日圓的外匯，而由日人向英購回戰爭原料。路透社電末稱：報紙質問『爲何不把這欸用於遭受困難打擊的英國漁業，而交給歷史上最大的商業騙子。』

四 可能發生的事情

若非自己錯誤，我們不怕共產黨——羅斯福夫人

日本如果攻英，而美國在亞洲援英的話，那末只有從早把日本海軍完全毀滅於大規模的海戰中，才能使

戰爭迅速結束，如果如此，則在南方大陸上仍然缺少着相當根據地的日陸軍，或遭側擊，或被切斷主要根據地的連繫，或被大陸上的中國陸軍藉協約軍援助而返回。

日本冒着大規模海戰而自殺，似乎是不會的，因為即使她在大规模海戰中勝利，也不能完全決定戰局。她仍當在南亞洲作陸地戰，並抵抗美國風側擊——且須準備應付北方蘇聯底壓迫。更可能的，如若第一次大規模襲擊，日本不能佔取新加坡和爪哇，她底主要艦隊當羈留於自己領水內，而在數月中海戰將限於相互封鎖，小規模襲擊和轟炸。她或可奪取婆羅洲底油田——如果行動迅捷——再佔菲島底一部。但她除了在東南亞，由陸地攻馬來和緬甸外，無法覓取決定點。

中緬邊界具有戰略的極大重要性。如若日本佔領上緬甸，切斷英印與中國的聯繫，且可到達緬甸油田，那末，印度將直接遭遇危險。現下比較弱小的印軍似為僱傭性質，或嫌力量不足，而它底幹部英軍六萬人因歐洲在繼續戰爭中，不能使它大量增援。歐洲軸心公約底作用在於迫使英國分散軍力。

英國或當強令印度徵兵和實行全部戰爭動員。因在殖民地缺少重工業和軍火工業，印度酋長不易維持那些配備現代兵器的民軍。英方未得酋長合作，很難實行徵兵和動員。酋長們現正反對英國底統治者，情形日趨嚴重。若使英國失去印度人民（和中國人民）底政治援助，局勢更為可慮。

除了在荷印和其他外國殖民引誘當地的機會主義者外，日本又用『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引起泰國的共鳴。泰國介於馬來緬甸越南之間，在日本所計畫的攻擊中，佔着主要的軍路地位。她好像弗郎哥底西班牙。在十九世紀中，暹羅帝國曾在歐洲強國手中，遭受很大痛苦，英國截取湄（或稱泰）部和緬甸部份（一

八九五年中國割讓緬甸）而法人奪得暹羅底東埔寨和交趾支那。暹羅餘剩部份仍比日本本部爲大，嗣在英法競爭帝國利益的均勢之下，倖免完全瓜分。英法亦寧願保存這小國，作爲兩國間的緩衝地帶。

暹羅王國在民族主義興起和日本密切聯繫之中，採用「泰國」的正式名稱，不無政治的意義。在歷史上泰族是亞洲的大民族，除居住暹羅外，還散居於越南、緬甸、暹羅、暹羅和中國西南部。於此可見現在泰族底恢復領土主義和準備與日合作對抗歐洲殖民國家的根據。中國交通部長張嘉璈最近給我看一地圖，那是他在訪問曼谷時獲得的。在「恢復泰帝國」的範圍內包含全部被割去的土地。日本允許泰恢復這些土地，作爲泰國助日的代價。

英國在印度的政治弱點很是顯明，否則毋須仰賴美國援助她在亞洲的地位。印度約有人口四萬萬，而戰爭的潛藏力量比中日兩國的總和更爲豐富。假如她沒有美國底幫助，不能防衛印度和新加坡及緬甸底邊界，這就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說明。荷人在東印度亦然。荷人到達東印度，早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前，如果東印度人在他們統治下有長足的進步，他們儘足以自衛，況且那裏所有資源遠較日本爲豐富。

回憶英帝國在印度開始時，原爲東印度公司支配下的純粹商業的投機。該公司利用腐敗的封建時代，逐漸取得政權，英王加以干涉，遂建立了英國底政權（英屬、婆羅洲實際上至今仍由一公司管理，股東從地產物產中收取「紅利」）。印度帝國在現代世界中，更成爲時代的倒退者，這或許是近年英國政治生活衰微的主要原因。本書並非研究印度情況，不過藉此指出英國在亞洲的脆弱的性質。

美人或不得英屬印度是比美國更老的一個時代的國家。受英統治已歷一百八十年，而百分之九十三

的印人仍是文盲。美國統治菲律賓四十年，文盲從百分之九十八減至百分之四十五（任何殖民地中最好的紀錄），而蘇維埃聯邦二十年的治績，使人民中的文盲從百分之七十八減至百分之八。在蘇聯一年（一九三七年）中畢業於工業農業學校者計四萬五千九百人在印度人口比蘇聯多二倍，而工程師畢業者僅九百六十人。

印度未能發展重工業，又未利用豐富的資源以發展現代工業國家底基礎，在這種情況中，可以概見不合理的狀態。她有很多煤儲量，但出產僅及蘇聯產量六分之一，甚至比中國為少。她底鐵儲量雖佔全世界第三位（僅比美國為少），然鋼產在十年中僅增至八十七萬九千噸（一九三五年統計）。在同時期，蘇聯鋼產從一百五十萬噸增至一千六百萬噸。日本幅員僅達印度七分之一，鐵礦又少，而產鋼比印度多七倍。印度水力富源僅次於美國，然她只利用百分之三，而美國則已發展至百分之四十。蘇聯在二十年中電力生產自十萬萬九千萬基羅華特小時增至三百六十五萬萬小時（一九三七年統計），而印度則僅二十五萬萬小時。

印度不僅和中國一般有着尖銳的地主農民的土地的危機，更有五百六十三個封建王公輔助執政者把雙重負擔加諸於平民。王公封地佔全國一百八十萬方哩土地的三分之一，形成東方的荒地，『永遠腐爛』的區域。王公們完全是寄生動物，對於社會毫無貢獻，只能壓迫人民，勒索鉅額金錢，供作私人奢侈和娛樂的享受。（見一九四〇年六月八日 *Collier's* 雜誌 *Jim Marshall* 所著之文。）

英王從國會取得補助金，其數約為屬民所納稅款一千六百分之一。若干印度王公竟耗用稅款底半數，最少者如特拉凡可爾 (*Travancare*) 的王妃須得十七分之一。卑根赫 (*Bikanhir*) 的王公乃是一個半

度翩翩的君王，他底家庭每年所需的預算計二十一萬四千盧比，比他對於全體屬民所化的教育經費爲鉅。王族、王家婚禮、王宮和隨從的用費須佔卑根赫全部預算的三分之二。最富的王公、英國官吏和商人擁有多數財富和掠奪物，而印度人民只是貧窮和墮落。兩相對照，可以測知一百八十年代的英國統治的不合理。

因爲王公們雖享受華貴生活，顯耀權能，沉溺於好萊塢的聲色，然他們却客觀地阻礙着印度底政治的統一。這就是說明爲什麼還把他們留置於以分治原則爲基礎的統治的機構中。

日本底行動在多方面似乎踏着最先一百年的東印度公司底覆轍。該公司把無數財物供給英國，後來英國在世界上獲得工業的霸權。這比較的是最近的，自從奪取殖民地的支配權由工業家之手轉入了資本家之手，而後者需要本土的小市民階級。現在印度民族運動從這裏發展出來，迄至今日，已抓住了英屬印度底大市民衆。

最近雖設立了準代表的印度會議，以及經由印度國民大會控制着當選的代表，而總督却忽略了印度底民意，在歐戰爆發時即武斷地宣布印度爲交戰國。國民大會初時反對這舉動，後來允許全力援助英國底戰爭，如果英政府誠意實現『爲民主主義而戰』的口號，允許印度在戰後享受獨立和民主主義的話。英政府對這表示拒絕。國民大會現已撤回這建議，而印度會議業已解散，總督有着无份的獨裁權力。數千印度政治領袖被捕入獄。假如她和日本作戰，她不能和印度人民作戰，她也許被迫尋求和解辦法。

決定印度和其他英殖民地底命運，當然不是美國底事。但我們也該瞭解英國政治情勢底困難。因爲如果我們和英殖民帝國共運命，這或許不可避免地成爲我們底事。

我似乎認為有些問題美國人民現在應該密切注意。如果我們作戰，我們務求勝利，而且須在前進的主義中求得勝利。這主義第一須由我們自己底人民認為滿意，其次世界各民族須認為滿意。美國在世界上是最有力量的國家。我們如果團結一致，合力進攻，可能擊敗世界上的軍隊，驅它們入海，保持我們底自由。我們底最後的防線不在英國或中國，而在於自己底靈魂中，在自己底土地上。除了爲着自己底條件之外，我們毋須在國外作戰。

那些條件應該是怎樣的呢？假如我們遭遇着戰爭，我們是否支持帝國底非民主的意像或領導人們建立較真確的民主主義？

帝國戰爭底幕後，在兩方面，在每一處，有着傾向於社會革命的複雜的世界運動。這次奮鬥底最深刻的意義，乃是人們需要社會的和經濟的進步，其結果憑着最能表現這些需要的政略，或在各處勝利，或在各處失敗。歷史是有動力的，它的不再容許靜止的實物妨礙它底運動。

講到放任的舊式帝國主義，很明顯的，它的迅速地毀滅自己。它或可在各處獲得一二次勝利，但它正爲自己作清算，新的主義必將起來代替它。法西斯主義者用着帝國主義的全能的奴役的新方式企圖代替舊的帝國主義。民主主義如能生存，必須表現更有力的否定法西斯主義的力量。

英國與自治領地——假如她們願意保持團結，作爲政治的力量——必須宣布殖民地解放的程序，作爲民主主義的世界共和國底基礎。這樣一個宣言或當包含以下各點：（一）承認印度緬甸戰後獨立，立刻開始強迫教育和自治，並與現政府合作，實行全部動員，進行反法西斯戰爭；（二）立刻開始包含一切的強迫教育

的程序，俾可迅速在落後的殖民地推行自治；這程序作爲戰爭動員的一部份。至獨立時爲止；（三）承認被法西斯帝國所佔領的以及爲求解放而奮鬥的國家和一切殖民地底獨立；（四）允許以財政、技術、工業、醫藥和其他社會的援助給予殖民地國家，以及實行以國家並行的合作經濟爲基礎的殖民地工業化的程序；（五）立刻談判條件，使先進的殖民地獲得自由，並許她們加入世界民主國聯盟。聯盟底基礎如下：關稅同盟，共同防衛協定，國際糾紛的強迫公斷，國際海陸空軍的共同設置，民主方式政治的採行，或許可能的共通貨幣的採行，以及在集體安全機構範圍內的國際軍縮。宣言中或附帶邀請各自由民主國加入聯盟以對抗法西斯主義，並供獻智力、財力，以改造世界。

這是幻想麼？這或許是唯一可能的方法，使修正了的資本主義延長生命，和保存英帝國，使成爲世界民主主義的動員的中心點。據說解放印度即是打銷英國底「統一」。在事實上或許只有實行解放。民主的英國底最有力的同盟者爲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假如沒有加拿大以南的舊殖民地（指美國）底援助，她或許不能生存。自由的印度對英國能成爲有價值的資產好似自由的美國一般。以事實言，印度在全部帝國主義機構中能作最後的定局，一旦解放了，則其餘英殖民地問題當易於解決。印度人口佔英帝國海外人口五分之四，幾佔英殖民地人口十分之九。英國在殖民地投資印度佔三分之一，約四萬萬三千八百萬鎊（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倫敦經濟雜誌），但一九四〇年R. P. Dutt所著今日的印度估計共一萬萬萬鎊，但在另一方面，這數目祇是英國國外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十二。

殖民帝國對全體英國人民無大價值。英國投資者每年可從這裏取得進益三千八百萬鎊，這數目只佔海

外投資總進益的五分之一，佔英全國總收入的一百分之一弱。印度對於英國貿易的重要性也估計太高。英國生產的十分之九售於國內，印度僅購得百分之二。職業呢？全帝國殖民地合計約雇英國人口的百分之二·五。這樣，假若英國完全失去了印度，則在她底全國投資收入中每人約只損失四鎊，而在全部市場中，約減少了百分之二。也只有英國專利的資本家的一小部份感受這損失。這些和現在及將來的戰費相較，為數極微。但主張英國放棄印度底經濟的聯繫也是無理由的。相反的，印度底改造，應該需要比從前更多的幫助（新方式的幫助），若非英國重犯一七七六年的錯誤，英印合作或當實現。

美人在英殖民帝國並無任何重要的利害關係。英國對印實施全能的帝國主義——現在對於印度除推行民主主義外，也許祇有這方法。如若我們在『為解放中國而作戰』的姿態中支援英國，印度可能防守的麼？就美國投資資本而觀，主要的困難原因似乎是這樣的：世界半數人口生活於落後而未發展的殖民地中，這些殖民地處於放任的帝國主義之下，未能利用它們底資源，未能發展成爲現代國家，也未能擴展世界市場。解放這般國家，如中國、印度、荷印、和非洲的大部份等，爲振興外國市場所必要。戰爭之後，大部份資本將在美國，若非在戰時完全消耗於軍備，則美國必須在她所能合作的國家中，找尋資本的市場。

尙有一事。『政治借款』底舊意義和帝國主義的借款底舊方式，都在彌留狀態中。將來輸出資本或許不能再給與政府範圍內的私人社團或買辦集體，俾免助長法西斯主義，如果民主主義佔優勢，我們底借款必須直接給與在那些國家內的民主的團體。例如中國的工業合作社，它們從事於發展自己底內國市場，增強民主主義底基礎，而不是利用低賤勞力和原料在國內外牟利。這似乎是使民主主義在國內外趨於安定的唯一性。

質的借款。它包含着這些意義，如：推行密切的國際合作，和支配資本，以策畫合作事業和集體生產在民主國間的發展。

我並不想像我粗略地所指出的程序——馬克斯主義者將立刻加以譏笑，認為這只是用美國獨佔的資本，併吞英帝國主義的方法——可對資本主義『解決矛盾』。但這似乎是可能實行的方法，使能演變為新經濟，並恢復人們底希望，使他們知道了用全體性的長期的帝國主義戰爭以外，尚有一個真正的解決方法。

假如現在在東方宣布這樣的解放，則它或許使法西斯運動完全失勢，或竟使它在無希望的戰爭中自殺。切勿認為政治的邊界真能在戰爭中被封閉着，而人們底頭腦不會向各處取得武器，用來擊敗他們底壓迫者。有動力的政略是最需要的。無線電能適應人們底需要，就能具有生命。這次戰爭，一半是意識的戰爭，誰在意識上解除了武裝，誰就被擊敗。

如果美國對日作戰，美國應派飛機至日本散發大批包含解放宣言的傳單和中國遭受轟炸的照片，單上並註明美機為何用傳單以代炸彈的理由。經驗告訴我們轟炸市民，只有增加敵入底士氣。我們無須攻擊軍事目標以外的任何人物。

有動力的民主主義用這般戰略可能側擊歐亞兩洲的敵人。民主國家穿着這般精神的盔甲，不須恐懼任何意識。民主國家脫去了偽君子的態度，在這不受任何方面攻擊的時期，當已抓着制先機，以新的諾言和希望，鼓勵着人們底意志。她們不僅要取得戰爭的勝利，而且要獲致和平。這樣一個程序，在政治上既能打消法西斯國家底勢力，又能多半博得蘇聯底贊助。蘇聯被合作的世界圍繞着，或能安心履行民主主義的諾言，特別是，如

果這世界給予她們以友誼的援助，以代替無數教皇底通諭以及鼓勵十字軍攻擊異教徒的說教。就任何情形而論，蘇聯不會嚴重地威脅有動力的民主國家。

但對於根據着資本主義以恢復世界政治領導任務的民主國家這些需要可有機會實現麼？似乎是未必實現的。歷史至今證明着資本主義不能實行聰明的合作，或不能在任何既進步又安全的共同國際計畫中，策畫或預防着變化。在這一點，東方戰爭所給予我們的樂觀的理由，比歐戰爲少。

可是現在我們可能看到呈現在亞洲陣線上的某種趨向於重大意義的改革的趨勢。我們或許已能提出下列試行的結論：

第一、我們所知道的放任的帝國主義的帝國正作着決死的戰鬥。她由於內在的矛盾，國內正在崩離，海外受着外來的全能的帝國主義和內在的殖民地革命雙重打擊。爲在殖民地抵抗法西斯帝國主義者，則舊政制或採用敵人的許多方法，而自己開始仿效全能的帝國主義，或者必須感覺它自己底習俗的含義，而實行民主動員的程序，俾可發展屬民底全部戰爭的勢力。

第二、軍事帝國主義在歷史上是一個經濟和政治的怪物，我想命運决定着必早消逝。蘇聯在北方之謎，亞洲的殖民地解放運動的不能壓抑的勢力，反封建勢力，以及在它自己底腐敗機構內多變化而仍有勢力的西方帝國主義——這三點可以決定日本軍事帝國主義底運命。它對抗這些敵人中的每個人，或可得一時的勝利，或逐一與之妥協，暫圖苟安。但因它底陣線太廣大了——戰線底地理的延長，以及它底政敵底潛勢力——未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第三、殖民地底革命由於在帝國主義戰爭時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動員所促成，或在亞洲數國迅速地引起土地的社會主義前期的革命。多年戰爭，或當進行。苟非這改革的需要由若干新而聰明的世界新計畫緩和着，則新舊帝國主義，國民革命運動，和土地的社會主義前期的革命之間的妥協只是臨時的性質。

據我們所知，放任的帝國主義底命運反映着資本主義底命運。爲全體性戰爭而動員大眾的需要將在各地迫使先進的國家担負起管理生產消費和分配的責任。我們對於這些鷄蛋，似不會放棄不爭。從美國底蛋糕中或生出若干種法西斯主義和參加將來世界重分割的準備，或有些類如美工程師德勒漢（Carl Dreher）（一九四〇年十月所寫『希特勒因何勝利』）所說的『民主集體主義』。如果在舊民主國家的人民奮鬥保持他們底必要權利——尤其是投票權和民衆支配權——又如假若他們願意担負合作的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義』的責任和犧牲，則不須有干涉的獨裁制度，即可獲得過渡。在那情形下暴動和社會革命底破壞或可滅除，而經濟政治的合作或可在各地合理地從早實行。

我似乎認爲我們現在要看清的要事是：國家間戰爭底耗費只是戰前和平日耗費的悲劇化。把幾千噸糧食傾入海中；或付出代價，令農民燒燬他們底收穫；或供養飛行員，令他們用轟炸機完成相當任務，那有什麼主要的分別？安諾德（Thurman Arnold）說：『和平的社會具有和戰爭一般的殘酷。』

把戰爭原料售給那以掃射平民爲戲的人們，或把生產機器售給那以剝削所得供養尊貴的兒女底生命的人們，何者比較更殘酷？現在化費一百萬萬美圓的剩餘勞動價值於軍備上，或不化費其他百萬萬美圓而使從事於有用的生產和消費的一千二百萬人們失業，何者較爲浪費？倫敦東端的貧民窟，或燬滅這化外的貧民

窟的轟炸機，或貸款給納粹黨使它製造轟炸機的倫敦，三者中何者是最惡劣？

全體性戰爭是可怕的、浪費的、和原始的，但客觀的真理是這樣的：我們要驚醒我們來爭取那必需的需要——發展現在屬於人類的創造力和工藝知識的較好方法——除了戰爭外，我們顯然沒有其他辦法可以供獻給歷史。假如我們了解這點，則多方面的鬥爭的目的不必是『文化底終止』，而是使文化建設至較高的程度。因此，和平底恢復似乎需要在先進國家中從早接受社會底有機的觀念，依據世界尺度的經濟政治計劃，應付野蠻（不合時宜的經濟制度已死灰復燃）的緊急方策，以及能替人類打開那依據科學和真理的文化底無限的可能性的那個更廣大更負責的民主主義。

譯校後記

抗戰四年，中國已遭遇最大的危機。顯然的，這種危機，不是在於國際條件有什麼不利，不是在於日本力量有多少增強，而恰恰是在於中國國內政治呈現了逆轉倒退的現象。在今天，誰不感到國內政治陰霾的窒息呢？誰要是讀過韜奮的抗戰以來，或茅盾的如是我見我聞，誰都會搖頭太息。

到中國來的外國記者，也一再在英美報章雜誌發表文章，對目前中國政治危機，表示深切的憂慮。像美國名記者安娜·史特朗（Louise Anna Strong），像太平洋事件撰稿員希伯（M. G. Shipp）以及本書作者斯諾，都時常在亞細亞、歐亞、什誌、新羣衆、基督教科學導報等書報上，揭露中國政治逆流的各方面。尤其是斯諾，最近又完成了一本剖視中國的有系統的鉅著，叫做亞細亞之戰（Battle for Asia）。

亞細亞之戰所講到的範圍不僅限於中國，它是以中日戰爭為背景來分析各方面的。它分析到日本經濟的特殊發展，以及軍部怎樣成為統治的力量；它分析到英美的短視政策，怎樣拿各種軍需原料來支持日本的戰爭機構。但佔篇幅最多而且寫得最精采的却是關於中國的部份。它生動地描寫了中國人民為獨立解放奮鬥的熱情，以及他們對於一個進步的社會政治制度的迫切要求；它客觀地報導了中國進步勢力忠於聯合陣綫忠於抗戰的實情；它又毫不客氣地揭露了中國政治機構中妥協、貪污、倒退的官僚主義的傾向。斯諾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但他正確地看出中國要達到獨立解放，必須首先克服這種阻力，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斯諾是中

國的友人，它對中國的期望是如此的殷切，因此他把中國的陰暗面都毫不留情的痛下針砭。他的話也許不免觸痛了某些人的創疤，但對於目前中國却是一劑針對的良藥。爲了中國的前途，我們正需要努力來挖去一切朽腐的創疤呢！

在重重的新聞封鎖下，中國大多數人民幾乎不大知道目前國內的實情。這位外國作者的巨帙報導，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中國目前政治的癥結所在吧。因此，我們六個人就決定利用閒居香島的機會，把它趕譯出來；同時爲節省篇幅和便於發行計，把其中關於日本的不甚重要的幾節刪去了，並且將書名改爲中國見聞錄。美國名作家施尼特（Insidor Schneider）在新華衆雜誌上批評本書說：『這是一本有價值的書。這是一部生動的報告文學。它提供了許多有意義的報導，構成了一幅合適的現實的圖畫。我從未讀過一本外國記者的書，具有這樣深切的理解，豐富的內容以至動人的趣味。就議論的透闢和範圍的廣泛說，這本書實在比西行漫記更重要。』

三十年七月三日 P F 於香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8716B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月初版

不准翻印



版權所有

· 中國見聞錄 ·

每冊定價國幣三元八角

著者 美國愛特伽·斯諾

譯者 星光編譯社

出版者 星光出版社

經售處 各大書店



南京路中

國立編譯館

先施公司對面

71.00

上海圖書館

25